

目 次

第五部 党的合并

第一章 帝国的建立和社会民主党	3
一 色当、吕岑、凡尔赛	7
二 俾斯麦的醒悟	18
第二章 财源茂盛	25
一 濫設公司騙局和文化斗争	25
二 农业社会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	30
第三章 拉萨尔派和爱森納赫派	38
一 几十亿赔款时期的无产阶级	38
二 海牙代表大会	48
三 最后的党派斗争	54
四 特森多尔夫时期	69
第四章 哥达合并代表大会	83
第五章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91
一 帝国破产的开端	91
二 鼓动工作的实际成果	98
三 理論的不确实性。恩格斯反对杜林	112
第六章 反社会党人法	122
一 基督教社会鼓动	124
二 謀刺案和白色恐怖	130
三 剝夺工人阶级的权利	139

第六部 反社会党人法时期

第一章 混乱的一年	151
第二章 新的进军	166
一 維登宮的檢閱	166
二 决定性的斗争	181
三 无政府主义的幽灵	194
第三章 問題和答案	201
一 皇帝的告諭	201
二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	208
第四章 科学的收获	217
第五章 鞭子和糖果	224
一 救济穷人和奸細挑撥	226
二 太子党和它的瓦解	231
三 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	238
四 占领巴伐利亚	245
第六章 結束的开始	254
一 言論和行动	254
二 議會党团和党	258
三 俾斯麦的失望	267
第七章 反社会党人法的垂死掙扎	273
一 反罢工令和秘密結社案	274
二 封斋节选举	279
三 圣加侖代表大会	286
四 驅逐令	291
第八章 九十九天	296

第九章 总崩溃	300
一 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300
二 二月二十日	304
第十章 清算	317
一 反社会党人法的结算	317
二 老年派和青年派	320
三 哈雷代表大会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	323
四 爱尔福特纲领	326
第十一章 从一百五十万票到三百万票	328
一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政策	329
二 工会的十年	337
三 修正主义	345
第十二章 回顾与前瞻	349
注释	353
结束语	364
人名索引	365

第五部

党的合并



第一章

帝国的建立和社会民主党

1866年以來，俾斯麥和波拿巴之間一直在進行着外交戰，不過較大的王牌始終掌握在俾斯麥手里。 371

俾斯麥代表着一种經濟上的必然性，即形成一個廣大的經濟區域的民族統一，而波拿巴只是受那種腐朽的專制制度的日益加深的困難所驅使、也許還受到法國資產階級的利欲所驅使，這些資產階級大叫大嚷要“報薩多瓦之仇”。波拿巴主義在萊茵河西岸早就在走下坡路了，而在萊茵河東岸却還處於上升狀態；當波拿巴被迫採取失敗的冒險家的絕望行動的時候，俾斯麥還可以勉強應付得了。可是誰也不敢因此而貿然行事，丹麥、意大利和奧地利不敢接受波拿巴的拉攏，來組成反北德意志聯邦的攻擊同盟，俾斯麥也不敢受人誘惑，來拿國土和人民去作各種買賣。

因此俾斯麥所奉行的政策當然還不是光明正大和深得人心的，更談不到是什麼革命的了。如果說俾斯麥拒絕巴登自動提出的參加北德意志聯邦的要求，是因為害怕由此引起同法國的戰事，那麼他拒絕的真正原因，不是怕戰爭本身，而是怕一場太正大、太得人心的戰爭。假如波拿巴為了干涉純德國的事務而挑起戰爭，德意志民族的憤懣情緒就會上升到足以使俾斯麥害怕起來的程度。他願意同法國一戰，但是他希望這一戰是一場反革命的王朝戰爭，因此他用早就過時的秘密外交政策的殘磚破瓦，給他那塞納河邊的

372 老朋友构筑了一个陷阱。俾斯麦暗中策动霍亨索伦旁支的一个亲王继承山于 1868 年的革命而虚悬的西班牙王位。如果他的对手若无其事地听任他这么干,这个外交阴谋的结果,对德国将比对法国更为不利。可是波拿巴却笨手笨脚地掉进了这个拙劣的陷阱。由于所谓霍亨索伦王室继承西班牙王位是对法国荣誉的侮辱,波拿巴对普鲁士宣了战。在这两个魔术师中间,俾斯麦较为机灵,他懂得给波拿巴的宣战加上一个十恶不赦的侵略罪名,他用巧妙的手法把埃姆斯急电的原意倒转过来,并在一系列的官方声明中,厚颜无耻地否认自己曾参预霍亨索伦亲王继承西班牙王位之事以及类似的活动。

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都踉踉跄跄地跟着本国的波拿巴跑,而莱茵河此岸和彼岸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却洞悉战争的真正性质。国际的法国会员在 7 月 12 日的《觉醒报》上公布了《告各民族工人书》,其中说:“争夺霸权的战争,或维护某一王朝利益的战争,在工人看来只能是犯罪的胡作非为”,法国工人发表的许多类似的声明,都谴责了这一“纯粹的王朝”战争。这些声明在德国无产阶级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开姆尼茨、莱比锡、菲尔特、纽伦堡、慕尼黑的群众大会完全赞成这些言论。可是其他群众大会,尤其是在有白拉克出席讲话的不伦瑞克的群众大会和有施韦泽出席讲话的柏林的群众大会,虽然原则上表示同意,实际上却是有保留的,那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次的和平破坏者是波拿巴,法兰西民族若不及时推翻挑衅者,德国将不得不进行被看作不可避免的灾祸的防御战。这两个大会是在 7 月 16 日举行的,7 月 23 日,国际总委员会也在一篇宣言中谈到战争问题^①,对波拿巴和霍亨索伦的

^① 指《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第 3—9 页。——译者

政策都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宣言說，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不过德国工人不能容許这场战争改变純粹的防御性质。而約翰·菲力浦·貝克尔在《先驅》杂志上清楚而有力地譴責了兴风作浪的沙文主义，这种沙文主义在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也鬧得很凶。 373

毫無疑問，無論在德国的普通人民群众中，还是在德国无产阶级群众中，都有拿起武器打退波拿巴的进攻的要求。即使人們当时已經像今天这样洞悉俾斯麦的外交陰謀，事情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尽管俾斯麦做了許多坏事，尽管北德意志联邦同一个民族的理想国家毫无共同之处，但終究也有必要向外国表明，德国决心（而且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人民只是透过所有的外交謊言看到一事实：为了保证民族的生存，必須进行战争。南德王朝和人民代議机关被不可抗拒的浪潮卷走，預备队和后备軍都斗志昂揚地走上了戰場。只要这场战争是对波拿巴进攻的抵抗，就会深得人心，北德意志联邦的官方人士竭力把这場战争渲染为对法国政府，而不是对法国人民进行的純粹防御性的战争。

7月19日，北德意志帝国議會召开非常會議，一致贊同发行战争公債。可是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在表决时弃权，因为他們既不給用1866年的行动为現在的战争做好准备的普魯士政府投信任票，也不贊成波拿巴的暴虐的罪恶政策。这种示威行动本身是完全合理的，因为俾斯麦的陰謀同波拿巴的陰謀一样，本来就是應該反对的。可是，只在有可能制止俾斯麦和波拿巴的罪恶活动时，这种精神示威才是切合实际的政策。要是沒有这种可能，那就要看誰的事业更坏，誰的胜利造成的灾难更严重了。这个判断不能有絲毫含糊。《社会民主党人报》說得好：“拿破侖的胜利意味着法国社会主义工人的失敗，意味着波拿巴的殘暴軍队在欧洲的霸权，

意味着德国的完全分裂。”因此拉薩尔派的議會代表贊成战争公債，不仅施韦泽和哈森克萊維尔表示贊成，加入了爱森納赫派的弗里茨舍也贊成，而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从前的拉薩尔分子則对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的弃权表示很不滿意。

他們对《人民国家报》的态度也不滿意，在这些日子里，这家报纸确实表明，仅凭一时的热情不能执行坚决的政策。在7月17日的一号上，它宣称，“强大的北德意志联邦”在波拿巴的挑战面前投降；不在民族自由党的虛构世界中生活的人，就必然預見到这一結果；“假如普魯士接受法国的挑战，那就是发瘋”。《人民国家报》在下一号，即7月20日的报上不得不放弃这种錯誤的观点，十分正确地說：“波拿巴妄想通过征服普魯士，来巩固自己搖搖欲墜的統治，并对法国的社会共和主义运动发动一次‘国内的薩多瓦’。十二月王权是反动的欧洲的基石。波拿巴一垮台，現代階級統治和靠刺刀統治的主要支柱也就垮台。一旦波拿巴得胜，法国民主派失敗，欧洲民主派也就要失敗。我們的利益要求消灭波拿巴。我們的利益同法国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可是在这以后的一号，即7月23日的报上又說：“让德法两国的专制君主在驕橫的富豪的伴随下，自相廝杀吧，我們无产者同战争是毫不相干的。”党报的态度同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个委员会在7月24日的一篇宣言中，在完全維護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則的同时认为，因为战争是防御性的（而且只要战争是防御性的），德国工人應該支持这个战争。

在以后的几周中，这种对立发展到十分紧张的地步。白拉克用尖刻的言詞談論“李卜克內西君主国”和“傀儡”（指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員），而李卜克內西說，不伦瑞克的五个委員不能把他們个人的观点作为党的准則提出来；如果这样做，就会像审判伽

利略的樞机主教团一样可笑。可是“不伦瑞克的五个委员”是党的代表大会任命的党的领导，他们的看法毫无疑问得到大部分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的支持，因此较之李卜克内西的看法就远非“个人的”看法了。在民族问题上的冲突又一次使德国工人阶级有面临分裂的危险，不过这种冲突终究是最后一次了。

一 色当、吕岑、凡尔赛

统治阶级举行的背叛政策，使这种冲突得到了解决。德国军队迅速取得胜利，在短时期内就粉碎了波拿巴的统治。在色当战役的那一天，在莱茵河西岸，资产阶级共和国得到了保证，而在莱茵河东岸，德国的统一（就这种统一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得到而言）得到了保证。现在德国本可以迫使法国接受一个完全保持自己的荣誉和利益的和约，这个和约同时也能使欧洲大陆的两个最优秀的文明民族友好相处，从而为欧洲文明的和平发展创造重要的前提。

可是这恰恰与德国君主和容克的心意相反。正当他们能给这个曾经使封建浪漫主义的王权伤透脑筋的法兰西民族以致命打击的时候，怎么能期望他们采取宽容而有远见的政策呢！普鲁士国王当然一再庄严地宣称，他是同现在已被推翻的法国皇帝作战，而不是同法兰西民族作战，可是德国资产阶级却甘愿充当用尖利的牙齿咬坏侵略战争门槛上的五角星^①的老鼠。马克思用鄙夷的笔调写道：“这个在1846—1870年间争取公民自由的斗争中曾表现过空前犹豫、无能和怯懦的资产阶级，看到要在欧洲舞台上扮演凶猛吼叫的德国爱国主义狮子的角色，当然是欢欣若狂。”^②

① 中世纪人们画在门槛上辟邪的五角星。——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6页。

早在8月30日，进步党和民族自由党的“知名之士”就在柏林集会，为的是要在一份呈给普鲁士国王的奏折中和一份致德国人民的宣言中准备兼并亚尔萨斯—洛林，从而准备一场侵略战争。他们除了要求一个“统一的国家”外，还要求得到“巩固的边疆”，他们说，全世界应该知道，“君主和人民”决心弥补1815年没有做的事情；这个外交错误使欧洲处于武装和平状态达半个世纪之久，这一错误不能重演。资产阶级的裁军英雄斩钉截铁地说，如果德国在侵略战争中夺得亚尔萨斯—洛林，欧洲就可以废除军备。可是他们并不仅仅依靠这种意味深长的论据的说服力，还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对所有反对侵略战争者进行可耻的威胁。他们号召“人民”，把这些坏蛋“坚决从他们的生活中，从他们在城市和国家的集会中驱逐出去”，为了说得更明白些，他们在巴黎驱逐德国人的时候又补充说，“假如我们是法国人，他们的有害活动很快就被制止了。”今天看来，这种愚蠢的狂热与其说是可怕不如说是可笑，但是在一场火热的大战中，它并不是完全无害的，政府毫不迟疑地用一系列的暴行使这种狂热达到顶点。

面对着这一侵略战争，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国家报》马上取得了一致，拉萨尔派也转入反对假爱国主义的狂热行为的阵线。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只限于尖锐批评统治阶级的政策，而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在9月5日的一篇宣言^①中，号召德国工人利用群众大会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反对兼并亚尔萨斯—洛林，争取同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这个宣言包含着马克

^① 这篇宣言载哈因茨·拜克，《德国工人运动和1870—1871年的战争》，迪茨出版社1957年柏林版。也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886—887页。其中还载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1870—1871年战争的其他重要言论。——原编者

思在一封信中发表的意見^①，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員們在同李卜克內西发生冲突时，曾向馬克思請教。馬克思在那封信中明确預言了兼并亚尔薩斯和洛林事实上所造成的一切禍害：德法两国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俄国取得了欧洲霸权；他把兼并叫做“使未来的和平仅仅变成停战状态的万无一失的办法”。他的其他預言也得到了证实，他說，德国在战争中证明：它即使在沒有奧地利的德意志区的情况下，也能够不依賴外国而独立行动。这场战争已經把欧洲大陆的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移到德国。国际总委员会9月9日发表的关于战争的第二篇宣言，更詳細地指責了兼并政 377 策的历史謬誤；从这时起，《人民国家报》上每一号都写着：同法兰西共和国締結公平的和約！不要兼并！懲罰波拿巴及其同犯！

民族自由党的英雄們向福格尔·馮·法尔肯施坦將軍告发了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宣言，当时法尔肯施坦將軍在汉諾威任沿海地区的总督，他曾經非法地把几个无辜的丹麦人和汉諾威王党分子投入監獄。根据法尔肯施坦將軍的命令逮捕了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員白拉克、彭霍尔斯特、施皮尔、裁縫屈恩，木匠格腊勒，給他們戴上鐐铐，解往俄国边境吕岑^②附近的保应要塞。在同一天，执行委员会前委員銅器工人埃勒尔斯和印刷厂主人西維尔斯，也遭到同样的命运。西維尔斯是一个六十岁的跛腿老人，而且还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敌，他的罪过是：在他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他的营业主任接受了印刷宣言的生意。被押解的犯人在极有希望养成敬神和虔誠习惯的祖国走了三天，爱国的賤民对这一押解很感兴趣。白拉克和他的同志时而被看做盜墓賊和散兵游勇而

①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給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82—284頁。——譯者

② 波兰东北部城市，現名吉日茨科。——譯者

加以嘲笑，时而被用惊异的眼光看做是刚被俘的法国政府官员，时而又被用道义上的愤懑接待，因为他们只要能够得到一点饮食，总是吃得津津有味。他们用苦中作乐的谐谑，来忍受爱国的、愤慨的可爱批评，后来柏林波茨坦车站的兵站司令受到战争的神圣怒火的袭击，以“将在吕岑受折磨”的“野人、流氓、坏蛋”对待他们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持这种谐谑。在吕岑，他们起初受到的待遇很坏，后来才稍好一些。

连续发生的其他逮捕事件（约克也在汉堡被捕）完成了这一爱国主义的壮举，不过这些被捕者都被关在本地的监狱里。可是在汉堡的监察委员会根据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要求，在不受法尔肯施坦管辖的德累斯顿成立了一个新执行委员会以后，盖布也被戴上镣铐解往吕岑。法尔肯施坦禁止举行抗议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大会，并禁止《人民国家报》在沿海地区发行。自由党的庸人们看到这些无法无天的行为，不是暗中发笑，就是大声叫好。直到约翰·雅科比由于9月14日在科尼斯堡的一次会议上反对兼并，而被捕解往吕岑时，进步党人才发出表示抗议的微弱声音。

法尔肯施坦没有任何可以用来掩饰他的行为的法律借口。固然，沿海地区被宣布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并没有同时宣布取消法律保护 of 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也没有取消根据宪法作出的任何人犯罪都应正式受审的规定。俾斯麦在回答科尼斯堡市政机关的抗议时，找了一个借口说，反对兼并的运动使法国人的抵抗更坚决，因此军事当局可以惩罚抗议的主谋者，并有权扫清达到战争目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姑且不谈这种断言在法律上没有根据，它本身就有漏洞：一口气说出了两句谎话。第一，德国人反对兼并决不会使法国新政府的抵抗得到加强，这个政府的机关报说得很对，俾斯麦在他的侵略战争中不会由此而受到迷惑；第二，当抗议运动开

始时，当局还没有承认兼并是这场战争的目的。出于人类文化的崇高观点，反对兼并的工人阶级，同出于夺取新销售市场的利欲、赞成兼并的资产阶级具有完全平等的、符合宪法的、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资产阶级内部对兼并的几次怯懦的抗议，是由棉纺工业中发出的，因为它担心会受到亚尔萨斯棉纺工业的竞争。

若干情况表明，俾斯麦不是出于法律原因，而是出于政策的考虑，对法尔肯施坦将军在当时的情况下所干下的暴行并不特别满意。可是，即使他有这样想法，他也没有权力反对一位干出非法行为的普鲁士将军；军国主义也不容许他对自己进行攻击。后来俾斯麦利用11月举行的普鲁士邦议会选举，通过10月24日国王的命令，释放了被囚在吕岑的罪犯中的“普鲁士臣民”，“只要在这段时间没有作出对他们依法监禁的决定，只要没有对他们起诉”。在不伦瑞克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中，只有彭霍尔斯特是普鲁士人（因为他是被并吞的拿骚人）。其他人必须忍耐到11月14日，可是，由于不伦瑞克军事法庭认为他们“有叛国嫌疑”，依法对他们进行待审拘留，于是他们就被绳捆索绑地投入了不伦瑞克监狱。12月初，汉堡市参议会也鼓起勇气，请求释放了盖布，只有西维尔斯一个人还留在吕岑。因为在他身上找不到任何犯罪的迹象，所以根据普鲁士司法的奇怪的逻辑，他应该受到特别严重的惩处。到了圣诞节他才被释放。那时，由于法尔肯施坦下令封闭了他的印刷厂，他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也遭到了破坏。可是至少这种暴行并非完全没有受到惩罚；经过持续几年的诉讼，西维尔斯才争取到不伦瑞克高级法院作出判决：法尔肯施坦应赔偿他的损失。

这时，德国的君主们尽可能把德国的统一搞糟。假如任他们随心所欲，德国的统一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普鲁士国王写信给他妻子说，因为他要上这条船，所以他“心情郁闷”，当时已经半疯

或完全发疯的巴伐利亚国王，在咬霍亨索伦給維特尔斯巴赫^①套上的繩绳。几乎只有普魯士王儲熱中于德国的統一（当然他主要地也是从王朝功名心出发，而不是从民族利益出发），他是一个和藹可亲的人，虽然没有很大才华，但受过現代教育，大家都相信他对戰場上的恐怖景象怀着正直的嫌恶心情。同从前建立关税同盟时一样，建立新的德国共同体的又是經濟上的不可抗拒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使“大英雄”屈服于它的铁拳之下，在它的无情的强制下，一切至高无上的反抗都化为齏粉。德尔布吕克是一个普魯士官僚，同时也是一个曾在关税同盟的学校中枯燥无味地理解了資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的官僚，他主持同南德各邦政府的会談，后来在凡尔賽大本营中給这次会談作了不可更改的結論。只要在这个結論里有一种历史进步，它就是戰場上的无名死者带来的，他們所流的大量鮮血成了新建筑的牢固的油灰，君主們和大臣們是把这所新建筑造得极其簡陋和极不坚固的。

北德意志联邦宪法中所包含的有保证的民权，还没有普魯士宪法里那样多，忠实的爱国者米凱尔說，它的产生最多只是为了“暂时支持北德一个短命的軍事国家”，这个宪法就成了德意志宪法的基础，不过又向坏的方面作了一些重大修改。現在南德各王朝证实了施韦泽的話，他說，它們彼此之間可以屈从，但不肯向民族利益作絲毫让步。不仅如此，它們甚至证实了俾斯麦的諷刺，他說，对南德各邦來說，普魯士的政策太自由主义了。尤其是巴伐利亚分立主义現在又有了可以給“狂妄自大的普魯士主义”以沉重打击的好机会，一方面与易北河以东的容克階級相敌对，一方面竭力促进資產階級的利益，而对无产階級則只字不提。关于巴伐利亚分立

^① 巴伐利亚的王族。——譯者

主义当时由于形势有利而得到的权力，从下列事实可以得到一个明确概念：北德意志宪法共有七十九条，巴伐利亚邦就违反了二十六条，其中有几条当然只是在形式上违反，另外还自行全部或局部地废除了二十五条。可是它的所有要求中没有一个是以扩大一点点民权为目标的。相反，它竭力把已被普鲁士分立主义搞得不成样子的德国统一弄得更糟。它把北德意志联邦关于定居和结婚的进步立法视为眼中钉。巴伐利亚国民在普鲁士或萨克森结婚，如果没有得到国王批准，那末将来他的婚生子女在巴伐利亚境内在法律上就视为私生子女，这就是巴伐利亚分立主义为之流出大量宝贵汗水的崇高目标之一。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凡尔赛谈判中仅仅落得那个封建浪漫主义的称号——皇帝和帝国，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悲喜剧性的插曲。普鲁士国王宣称，他“丝毫”也不因此而趾高气扬，而巴伐利亚国王却不得不被迫（用手枪顶住胸口）在俾斯麦起草的那个“崇高的”文件上签字，通过这个文件，德国的皇冠就戴到了普鲁士国王的头上。 381

从一开始，德意志各王朝就非常重视，在塑造人民的未来命运时不要听人民的声音。可是它们也不得不承认，它们的凡尔赛协定，一方面要得到北德意志帝国议会的追认，另一方面要得到南德人民代议机关的追认。这个决定带着一种斯文的威胁口气：要不就接受，要不就拒绝。哪怕更改一个小小称号，德国统一就会化为泡影。南德各议院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无论怎样抵制最后也必须服从，而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它是在7月开幕的，这次会议的权限延长到年底），也不敢进行有效的反抗。它于11月24日开会，国王发表了御前演说，这篇演说同7月的御前演说有着尖锐的矛盾，它说，波拿巴进行战争是“得到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同意的”。现在它宣布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是战争的目的，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个

目的，它要求发行新的公债。为此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了修正案說，帝国議會应该否决公债，并要求联邦首相在放弃兼并任何法国領土的情况下，尽速同法兰西共和国締結和約。可是除了他們以外，贊成这个提案的只有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維尔。在就公债本身进行表决时，投反对票的还有弗里茨舍、門德、施腊普斯和汉諾威王党的分立主义者艾瓦德。弗尔斯特林在春天就已經辞去議員职务了。这六个社会民主党議員也一致反对凡尔赛条約，反对皇帝和帝国的称号。只有在表决巴伐利亚条約时，才有进步党人（甚至也有几个民族自由党人）投反对票。

382 尽管如此，皇帝和帝国的新生也沒有任何良好的預兆。德尔布吕克把一頂新制的皇冠像一件从未见过的样品一般放在議会的桌子上，他也不大清楚这件商品到底应该列入关税表中的哪一类。王太子厌恶这种商人习气。俾斯麦也承认，德尔布吕克应该設法让戏演得更好一些。不过，“世界历史性事件”通过戏剧性的化装是否会得到很大好处，还是一个問題。这场戏的演出，至少能坦率地表现出事态的真实情况。身兼大地主和大工业家的自由保守党領袖弗里登塔尔用露骨的商人腔調問道：德国人民是否会有一个領袖？德尔布吕克就用他那平板的声音朗讀了俾斯麦强迫巴伐利亚国王接受的那个“崇高的”文件，作为对弗里登塔尔的答复。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政党拥护君主之間的协定，他們清楚地知道，这些协定不是为了建立自由的王国，而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王国。它們又一次为了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粗暴地指責以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发言人的身分、勇敢而坚决地代表人民的不可轉让的权利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12月17日，帝国議會會議结束后，李卜克内西、倍倍尔，还有加入《人民国家报》編輯部的赫普納尔以“阴谋叛国”罪名被捕，这是同当时的实际情况

相适应的。与此同时，帝国議會多数派的一个由三十人組成的代表团带着拉斯克尔用他那晦涩难解的德語写成的奏折，前往凡尔赛再三恳求普魯士国王为祖国的利益接受德国的皇冠。

德意志民族的代表們站在凡尔赛宫的庭院里，就像从前亨利皇帝站在卡諾莎^①宫的庭院中一样。嘲笑和諷刺雨点般地落到他們头上。廷臣和容克地主用不同声調重复普魯士国王的輕蔑的話：“啊，我應該感謝拉斯卡尔先生給了我真正的荣誉。”可是代表团在凡尔赛也发现了一颗多情善感的心，这颗心在施梯伯的胸中跳跃着。俾斯麦正确地估計了施梯伯的独特的統治手段，又让他当了政治警察的头目。这位科伦共产党人案的伪证的主謀犯理所当然地感觉到，像他这样的人在资产階級国家中比在封建专制国家中更有可能得到优渥的待遇，于是他奴顏婢膝地拜倒在帝国議會代表团面前。代表团也不是忘恩負义之輩，施梯伯在一封庄严的信中，接受了代表团的“最亲切的感謝”和“完全的忠誠”。他把这封信寄到柏林，好让施梯伯的子孙万代能把它当作他們的祖先的荣誉证书而永世保存下去，他还写道：“为了使代表团受到体面的接待，我为它做了許多工作。宫廷党和軍人党的态度相当冷淡，我在这里代表平民党和德国人民。真是奇怪的时代！”是的，“时代”是“奇怪的”，連这个頑固的罪犯都为它而表示惊异，这是可以理解的。

✓ 德国的侵略战争引起法兰西民族的坚决而頑强的抵抗。法国志願軍作战的勇猛，就像学习过 1813 年普魯士国民軍法令^②似的，俾斯麦对这些“杀人犯”甚感惱火，认为这些杀人犯都該絞死，

① 卡諾莎是意大利北部的古城堡。神圣羅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与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爭夺主教叙任权冲突中，被教皇开除教籍，引起諸侯叛变。1077 年 1 月，他被迫到这里向教皇悔罪。——譯者

② 1813 年，为了进行反拿破侖战争，普魯士国王曾頒布建立国民軍的命令。——譯者

就像从前拿破仑下令把席尔的军官当做土匪枪毙那样。两国之間經過半年的鏖战，付出了不可估量的牺牲，法国的抵抗终于遭到失败。2月26日在凡尔赛签订了临时和约，根据这个条约，法国必须把亚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并缴纳五十亿法郎的赔款。

最后締結的和约也是反动派的胜利，这个和约签字以后不久，即3月3日，举行了德意志帝国议会的选举。对于社会民主党說来，这是一个最不利的时期，它是唯一坚定不移地反对侵略战争的政党，它受到的战争压力最大，这个党中有很一部分人还在法国作战，他們的人数远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的人都要多。虽然如此，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仍然得了十万零一千九百二十七票，約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三，其中拉薩尔派得六万二千九百五十二票，爱森納赫派得三万八千九百七十五票。拉薩尔派的人員的主要来源是普魯士王国，它在那里得了四万六千三百一十三票，其中萊茵区一万四千八百二十一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二票，在汉諾威得了六千八百零五票。爱森納赫派人員的主要来源是薩克森王国，它在那里得了三万一千零四十三票。拉薩尔派在薩克森只得了二千二百四十六票，爱森納赫派在普魯士只得了二千五百四十四票。爱森納赫派在巴伐利亚以二千五百一十九票，在不伦瑞克以二千四百八十六票占了优势，拉薩尔派在黑森以三千九百七十三票，在卢卑克以五百四十三票，在不来梅以一千五百零六票，在汉堡以五千零七十一票占了优势。1871年的选举是在一种非常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上述所有数字只有相对的价值。战争爆发前不久，在柏林有四千名拉薩尔分子在施韦泽率领下列队参加了瓦尔德克的葬礼，在那里的六个选区中，木工格劳只得到二千零五十八票。在爱森納赫派比拉薩尔派肯定要强大得多的維尔騰堡，社会民主党人所得的四百九十一票，又全部落入在斯图加特提出自己候

选人的拉薩尔派之手。在南德，总的說来，由于选举还是件新穎的事，加上編造选民册的手段极为卑劣，因而对工人参加选举起了阻碍作用。不过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宣传所要克服的困难愈大，它从1867年以来在选票方面获得的巨大进展就愈值得重視。只是大多数社会民主党的議席丧失了。拉薩尔派进入复选的不过三人，而且全部落选，他們是：裁縫布罗伊尔（阿尔托那），哈賽尔曼（汉諾威的高斯拉尔选区）和施韦泽（爱北斐特—巴門），施韦泽在那里得了八千四百七十七票，但却被各資产階級政党竞选联盟击败，这个联盟共得九千五百四十票。爱森納赫派只有倍倍尔在格劳豪—梅朗內当选，他的对手是資产階級作为示威性的候选人提出的舒尔采—德里奇。此外，在茨維考—格里米乔，施腊普斯取得了胜利，在米特魏达，施皮尔在复选中才为一个民族自由党候选人所击败。

3月24日，施韦泽宣布，他打算辞去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領導职务。他的理由是，他在很长一段时期內，为党牺牲了時間、劳力、心灵的平靜和金錢。誰也不能强求他繼續这样牺牲下去，他可以要求解除职务。人們不能肯定，施韦泽內心里对自己的独裁不能再維持下去这一点作了何种程度的考虑；从外表上看，施韦泽是由于不能維持《社会民主党人报》（由于战争，这家报纸的訂戶降为二千七百戶），才产生这种想法的。他甚至不能把这家报纸維持到5月中旬，即将由他召集的代表大会期間。最后一期是4月26日出版的。可是，如果党不得不接办这家报纸，那么施韦泽就不能再像直到今天这样独断独行了。竞选失败对他的决定可能也有很大影响。他本人甚至在这种意义上承认了这一点，他說，他对自己的选民已經不負任何責任了。事实上，他由于丧失了通过議会活动而得到保证的优越地位，他的独裁便失去了另一个重要支柱。战争期間，他的政治立場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比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的

385 态度软弱一些；也许他会逐渐看到，同爱森纳赫派相比，他已完全陷入困境，自从色当之役以来，两派的合并只是时间问题，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已经没有他的独裁的余地了，这种想法可能对他的决定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5月18日在柏林举行了第十次代表大会，出席的有代表七十四地区、五千三百五十六名会员的三十四名代表，大会对施韦泽“由于个人情况”不能继续担任党的领导工作表示遗憾，大会通过了一致的信任投票，对他“多年的英明领导”表示感谢，并建议会员，选举哈森克莱维尔为新主席。施韦泽继续处理党内事务，直到7月1日。同上一年的代表大会一样，人们对金库账目进行了详细的审查，结果没有差错。施韦泽把党的两家机关报的所有权交给了党，因此代表大会承担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债务一千塔勒。大会决定，7月1日以前《鼓动者》是党的机关报，7月1日以后停刊，《社会民主党人报》又作为唯一的党报每周出版三次。出席5月25日举行的全德支援联合会代表大会的，只有代表二十七地区的四千二百五十七名会员的十九名代表；毫无疑问，工会组织的迅速瓦解，多半是由战争造成的，但是个别劳动部门的混杂也使会员产生了顾虑；代表大会决定至少要把这种现象消除到这种程度，即同一行业的工人可以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建立自己的联合会分会，就以他们的行业命名。瓦工就一向保持着这种特殊地位。

7月1日，新任主席哈森克莱维尔就职，《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第一期也在同一天出版。

二 俾斯麦的醒悟

386 1848年3月18日，三月革命前专制主义的最顽固的代表普鲁

士亲王，被革命逐出柏林。1871年3月17日，同一个人以德国皇帝的身分从凡尔赛胜利回到柏林，统治阶级向他欢呼，颂扬他不愧为鄂图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继承人。他自己可以说，1871年3月17日的他同1848年3月18日的他，并不是两个人。甚至他那偏狭的头脑里也可能涌现出这种想法，即二十多年来在德国进行的争取自由的内争，无非都是欺骗，他那奉天承运的皇冠像那位天国之主那样永恒，据说他的皇冠就是从那位天国之主的桌上拿来的。

他刚一沉溺于这种梦想，第二天就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他宫廷的墙上写了“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①。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证明1848年以来的欧洲历史具有伟大的意义，虽然各国人民为了取得这种意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德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所在的一切地方，都对巴黎工人的革命起义报以响亮的欢呼声。无论是拉萨尔派或者是爱森纳赫派，都表现毫不动摇。柏林、汉堡、不来梅、汉诺威、爱北斐特的群众大会同德累斯顿、莱比锡和开姆尼茨的群众大会一样，对巴黎的社会革命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向这个革命的战士致以德国工人的兄弟般的敬礼。《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同样卓越地嘲笑了一些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巴黎公社或者反对它的“恐怖”的资产阶级报纸的“天真的恬不知耻”。利用这种狡猾的策略可能得到某些微小的好处，但是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策略，假如采取这种策略，

^① 事见《旧约全书》《但以理书》第5章。故事大意是：巴比伦迦勒底人的最末一朝国王伯沙撒为他的一千大臣摆设盛筵，欢饮之间忽有人的指头出现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的一切哲士都不能读那文字，后来但以理被领到王前，但以理说这字是神使手显现书写的，所写的文字是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讲解是这样：弥尼就是神已经算你国的年数到此完毕，提客勒就是你被称在天秤里显出你的亏欠，乌法珥新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与玛代人和波斯人。当夜迦勒底王伯沙撒被杀，玛代人大利乌取了迦勒底国。人们把它借喻为警告的意思。——译者

社会民主党就会染上德国自由主义的遗传病,也就是说,为了一点值得怀疑的小利,不仅丧失自己的荣誉和尊严,而且也丧失长远的重大利益。毫无保留地拥护巴黎公社,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有莫大的好处。今天所谓“公社的恐怖”的说法已经成为笑柄了。每个对情况稍有了了解的资产者,同一开始就洞悉情况的德国工人同样清楚知道,真正的暴行是公社的敌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卫士们干出来的,公社的缺点不在于它不人道,而是在于它不敢采取坚决的措施。

国际总委员会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坚决拥护巴黎公社。在马克思起草的论法兰西内战的宣言^①中,总委员会立即为工人阶级的战斗队伍升起了光辉的旗帜,这支队伍的法国支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没有人比马克思更清楚地知道,他这样做威胁着国际的生存,事实上,这篇卓越的宣言的后果和影响,同国际的没落是有一部分关系的。并不是所有欧洲的工人党,在政治上都像德国社会民主党这样成熟,尤其是英国工会被欧洲资产阶级竭力利用巴黎公社制造的恐怖的假象所吓退。可是在马克思看来,在必须维护事业的实质的时候,事业的形式不是重要的问题。能为他的政策作最有力的辩护的就是宣言本身,它是在事情发生后不久写成的,在后来所有论述巴黎公社的大量著作中,这篇宣言直到今天仍然远远地名列前茅。虽然宣言的目的是为公社辩护,在需要表示赞成或反对的时候,不因它大谈起义的缺点而减弱自己所表示的赞成,但是它也明确地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因而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关于巴黎公社的经典著作。

当时从俾斯麦那里传出一句话,即公社又使他经历了“第一个失眠之夜”。不管他有沒有这样说,这句话终究是很好地说明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1—389页。

了他当时的处境。巴黎工人的起义向他指出，他的外交同博伊斯特或波拿巴之流的外交相比，可能稍胜一筹，可是在当代的伟大群众运动面前，就是过时的笑谈了。他在夜间思索的结果是，他向帝国议会提出一个惊人的发现，他说，巴黎公社的真正核心是对普鲁士城市法规这个市区自治的天堂的向往。第一届德意志帝国议会中的唯一的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为一个严肃的会议没有因此而哄堂大笑表示惊异，他补充说：“请你们坚决相信，全体欧洲无产阶级和所有还怀着自由和独立的感情的人，都注视着巴黎。虽然巴黎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我提醒你们，巴黎的战斗只是一次小小的前哨战，欧洲的主要问题还摆在我们面前，用不着二三十年，巴黎无产阶级的‘对宫廷一战争，对茅屋一和平，消灭贫困和寄生现象’的战斗口号，将成为全欧洲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这个崇高的会议没有为俾斯麦的愚蠢的想法发笑，却认为对倍倍尔这番话应该报以狂笑声。当然从此以后，这种笑声就完全消失了。 388

俾斯麦本人后来承认，倍倍尔的这篇演说，是使他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质的“光线”；从这时起，他就把这个运动看作国家和社会应该对之进行正当自卫的敌人，力图反对它、镇压它。这一自白的诚实性，人们是用不着怀疑的，因为对于一个所谓政治家来说，这个自白是够谦逊的了。俾斯麦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公开斗争，事实上就是从这时开始的，这个斗争起初是以傲慢的态度断断续续地进行，后来在争取自身生存的绝望斗争中越来越不顾死活，直到可耻地垮台为止。

过去俾斯麦对法尔肯施坦的横暴行为在表面上没有表示满意，而现在在他看来，这些暴行就是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第一次打击。不伦瑞克的囚徒无缘无故地被监禁了约二百天，莱比锡的囚徒被监禁了约一百天，到3月末他们都被释放了。在这段

时间里，警察当局、检察机关和侦查法庭对在被捕者或他们的同志的住宅中进行多次搜查得来的材料，向叛国和亵渎君主方面做了分析，可是没有任何结果。所搜到的材料，内容丰富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花费了许多精力而毫无结果就显得更加难堪了。法尔肯施坦的突然袭击使爱森纳赫党领导的所有信件和书籍全都落到自己的迫害者手中。不伦瑞克法院和萨克森法院都没有表现出要把坏事做得更坏的特殊倾向，同时强逼这些法院扮演军事暴行的恭顺帮凶的角色的方式，可能也起了一些抑制作用。沃耳芬比特耳的高等检察院甚至建议，停止以图谋叛国罪对不伦瑞克的被捕者起诉，高等法院的上诉推事团也赞成这个意见。不过在这点上仍有保留，即对白拉克及其同志，可以根据不属于刑事推事团权限范围而属于地方法院权限范围的其他罪行起诉。可是很明显，用这种漂亮词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掩盖那令人愤慨的事实：一些完全无辜的人被剥夺了几个月的自由。

然而不伦瑞克的打算没有考虑到柏林的意图。俾斯麦力图实现沃耳芬比特耳高等检察院的保留条件。1871年10月10日，即被捕者被释后半年多的时候，不伦瑞克的检察官科赫完成了一件不愉快的工作：至少对白拉克、彭霍尔斯特、施皮尔和屈恩提起了公诉。老不伦瑞克和新北德意志的刑法有一些弹性条文，对违反公共秩序的起诉起了一定的支持作用。实际上经过三天审讯，军事法庭判处白拉克和彭霍尔斯特十六个月徒刑，施皮尔十四个月徒刑，屈恩五个月徒刑，待审拘留的时间计算在内。可是高等法院对这个判决作了很大的改变，只根据参加一个据说有非法目的的协会的罪名判白拉克和彭霍尔斯特各三个月徒刑，施皮尔两个月徒刑，屈恩六个星期的徒刑。即使这个判决也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它是三月革命前的旧法令为依据的，在理论上尽管可以对判决进

行反駁，但实际上这个判决就等于宣判被告无罪，因为高等法院认为待审拘留時間已經抵銷了所判的刑期。

萊比錫的資產階級陪審法庭比不伦瑞克的博学多才的法庭显得对柏林更加听从。1872年3月，李卜克內西、倍倍尔和赫普納尔被控图謀叛国，在萊比錫陪審法庭受了两个星期的审讯。证明被告有罪的材料，与不伦瑞克案件中的材料大致相同，只是多了一批不能证明别的、只能证明无论如何要对被告进行不公平的訴訟的“证据”。陪審員面前摆着一百四十份以上的证明材料，有信件、演說稿、報紙論文、綱領，1848年以来革命文献中的一堆乱七八糟 390 的、各种各样的文章，这些东西不仅有被告及其同志写的，也有他們的政敌写的。可是这些文件中沒有一件能够提供哪怕一点影子，证明被告蓄意进行一項在刑法意义上的叛国行为。为达到这个目的，米克庭长就用不公正的主持审判的办法来給自己帮忙，这种办法在当时德国各邦还相当少見，所有資產階級的独立报刊几乎毫无例外地对它进行了尖銳的批評。此外对陪審員也不是沒有施加压力，后来他們之中果然有八个人（正好是为作出判决所必需的人数），竭力設法要判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有罪。法院宣判他們两人各在要塞监禁两年（两个月待审拘留計算在內），赫普納尔被判无罪。

但是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有理由說，这个案件为传播社会民主党的原則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他們宁願为此忍受几年的要塞监禁。他們不仅获得了全体正直人士不断給予无辜的被判刑者的个人同情，而且还为他們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目标作了卓有成效的宣传。一开始就被定为这出法律戏的配角的赫普納尔，滿足于用强烈的挖苦来嘲笑对他的控告，而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則庄重而严正地为他們个人所受的审判辯护，而且表現非常坚决和机智，因而

他們輕而易舉地打退了庭長和檢察官的粗野的攻擊。況且，一向比倍倍爾少接近工人羣眾的李卜克內西，發展了那種使這個“革命士兵”很快就得到無產者的信任的優良特徵。因此這一審判具有很高的鼓動價值。這一審判掃清了許多對工人運動的偏見。審判中的問答成了帶進社會民主黨思想世界的引人入勝的嚮導。

1872年7月，倍倍爾又一次成了階級司法的犧牲品。萊比錫地方法院判他褻瀆君主罪，因為倍倍爾在一個公開會議上說了一句千真萬確的真話，即普魯士國王不實踐戰爭的成果應該是德國的統一和自由的局面這一諾言。法院判他九個月徒刑，並“剝奪由公開選舉所產生的權利”。法庭撤銷了倍倍爾的帝國議會議員資格，這是一件非常滑稽的事情。在德意志帝國議會的第一次會議中，倍倍爾很快就成為可怕的戰士。他孤軍作戰，沒有一個黨派支持他，但卻善於在資產階級議會的審判席上，把幾個最有名的舞蹈家——勇敢的拉斯克爾和西姆桑打垮。被倍倍爾逼得走投無路的拉斯克爾，竟用庸人的“棍棒”進行威脅，接着又偽造了速記的記錄，因為他覺得這個可怕的威脅太可笑了。被倍倍爾指責粗暴地違背議會規則的西姆桑，只是由於資產階級多數派毫無見識地宣布他沒有過失，他才得以擺脫窘境。這時萊比錫地方法院不僅為奉天承運的國王，而且也為資產階級的議會政治，對犯罪者進行報復。

可是格勞豪—梅朗內選區的勇敢的織工們，對愛國的玩笑了解得很差，他們投倍倍爾的票比上次多三千票，因而又把他送回了帝國議會。這時高貴的議會不得不親自擔任劊子手的角色；它否決了施腊普斯提出的召回倍倍爾的議案，這時他正被囚禁在胡貝爾圖斯堡要塞。哪一個愛國者能夠責備這個議會，說它不願傾聽響亮的聲音呢！這種聲音令人信服地說明，冠冕堂皇的新德意志帝國是何等卑下！

第二章 財源茂盛

一 濫設公司騙局和文化斗爭

普魯士軍事國家和德國資產階級間的妥協使自上而下的革命 392 得到了保障，於是這兩股力量就共同進行了色當之役以後的侵略戰爭，並共同分贓。自由黨的“知名人士”進行可笑的欺騙，說什麼兼併亞爾薩斯和洛林可以導致歐洲的取消軍備。毛奇非常嚴肅地駁斥了這種欺騙：“我們在半年內用武器取得的东西，我們要在半個世紀中用武器保護它，使其不被人們再從我們手里奪去。”軍國主義靠自己的罪惡起家，它發展到連六十年代的最大悲觀論者也難以置信的規模，自由資產階級不得不忍受它的天才政策的後果，不管這個後果是好是壞。

侵略戰爭的另一種後果對自由資產階級較好一些。德國軍隊的沖擊給它打開了世界市場的大門。雖然幾十億巨款絕大部分落到軍事國家的手中，國家利用這筆錢還債，支付贈款和养老金，建造要塞和兵營，更新現有武器和軍需品，但是現有資本和貨幣流通量的大量增長，使年輕的大工業得到了巨大發展。所有工業部門都在積聚資本。1871年至1873年股份資本達十二億塔勒以上，差不多等於法國的戰爭賠款的數字。各式各樣的銀行和工業公司

雨后春笋般地出现。钢铁企业和煤矿企业纷纷建立起来，并且计划修筑许多铁路。这是一股投机的热潮，在这里资产阶级连最后一点政治立场也抛弃了。

393 资产阶级在送给它金银财宝的“世俗人”^①面前表现卑躬屈膝。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之后逃亡国外、在巴黎同银行和交易所发生了关系的路德维希·班贝格，一语道破苦恼的官吏的心理：我们简直是狗啊！这句伤心话得到普遍同情，可是却被人明显地误解为班贝格和他的民族自由党的朋友们的政治自白。在经济立法领域内，俾斯麦暂时继续让自由资产阶级自由行动。他得到许多赠款，因而由半破产的小贵族的代表变成兼营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地主的代表，这个阶级非常热中于扫除封建行会的残余。此外，滥设企业的热潮必然激发起俾斯麦的波拿巴主义的本能，这种热潮为了能够使整个资产阶级世界陷于狂热，而把它变成一个赌场。暂时还是俾斯麦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得力助手的德尔布吕克，以政府官员的身分恬不知耻地得意洋洋地宣称，不损失利息，是当代的秘密，任何立法也不能阻止傻子摆脱他的金钱。对于这番话，俾斯麦是无可指责的。关于统一的民权和迁徙自由、关于营业自由、关于统一的度量衡和货币、关于保护国外的商业以及其他等等的新法令，尽管它们在个别地方还有缺陷，但总的说来肯定是一种历史进步。新帝国的预言家特赖奇克聳人听闻地断言，资产阶级把这个立法送给工人阶级，是“出于上层等级的责任感”，“正确地认识到它的社会义务”，这种说法是颠倒黑白。统治阶级很少或者从来没有把经济发展的一个早已不可避免的进步以如此狭隘和自私的方式记载下来。这种情况是出现在统治阶级发现无

^① 对俾斯麦的讽刺称呼，在本卷中反复出现。——译者

产阶级不向前迈进，资产阶级也裹足不前的时候。

甚至早在反对建立帝国的分立主义反对派組成一个議會大党以前，这种情况就出现了。德国军队間接地推翻了教皇的世俗統治，从而把天主教会的一切可以投入战斗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拥有五十七名成员的一个专门的天主教党团，以中央党的名义进入了第一届德意志帝国議會。这个党并不是真正对俾斯麦已經怀有敌意，在普法战争以前不久，俾斯麦还恭維耶穌会士是值得尊重的盟友，并反对过一切过分的要求，即要求通过外交干涉来阻止在1870年的梵蒂岡教会會議上宣布教皇毫无舛錯的信条。可是这个新党成了所有分立主义分子的汇集地，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莱茵河畔、西里西亚、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地区，一向对特殊的普魯士主义非常反感。信仰天主教的波兰人（稍后还有信仰天主教的亚尔薩斯人）也是这样。中央党的分立主义性质一开始就远远超过它的宗教的性质，以致信奉东正教和耶穌教的汉諾威王党分子也参加了这个党。所有由于拥护分立主义而反对新德意志帝国主权的人物，都集合在教皇全权主义的統一旗帜之下，这是一群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各不相同的分子，他們有各种各样的趋向——从小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观点到封建浪漫主义和狹隘的行会观点。曾任汉諾威大臣的文特霍尔斯特（他不是有一个有原則的人，而是像俾斯麦那样的旧派外交家），成了这个五花八門的集团的領袖，这就可以說明这个党的特点。

对于一个无须有天才、而只对現代文化生活有一定理解的政治家來說，最簡單的办法莫过于使这个反对派失去活动能力。只要新帝国不再用普魯士的班长棍而是像現代文明国家那样进行統治，这个反对派就必然分化为性质各不相同、但在历史上都是落后的一伙。可是在1870年以后，俾斯麦不再做他1866年以后在一

395

定程度上做过的事情了。他不善于巧妙地利用现状，对“十九世纪的海格立斯”^①的奉承，使他的眼光受到容克地主的旧水平的限制。每当他用普鲁士的班长棍痛打一切不愿立刻随着他的口哨跳舞的人的时候，他总以为自己走在时代的前头。谁不顺从他的脾气和禀性，谁就是“帝国的敌人”，谁就要受帝国的迫害。尤其是波兰人参加中央党，挑起了他对波兰人的盲目憎恨。中央党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把他推上正确的道路，因为中央党在1871年春天公布的纲领的两个要求中，把分立主义观点即各邦的独立和白决放在第一位，而把宗教观点即保护宗教团体不受世俗立法的干涉放在次要地位。由于对这种情况有悲喜剧性的错误认识，俾斯麦以为同天主教会交锋，就可以驾驭分立主义反对派。他给天主教会颁布了各种特别法令，用暴力干涉天主教会的内部事务，虽然他本人在青年时代曾经见过，罗马的传教师出色地严词申斥普鲁士的警察。他自己不用资产阶级自由的武器来进行斗争，而却迫使中央党使用这个武器，这就使得中央党能够在他的反动权术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尽管他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他是不会到卡诺莎去的。

当然，如果他的愚蠢还可以超过的话，那么自由资产阶级的愚蠢就超过了它，自由资产阶级也跟俾斯麦同甘共苦走向这条道路，虽然它是在封建观点支配下成长起来的，可是这种做法也不能使它得到宽恕。甚至像菲尔肖夫这样有学识的人，给这种羊人剧^②取了“文化斗争”这样一个尊贵的名字，自己也不认为太坏。然而对于狡猾的濫設企业的创始人来说，这个“文化斗争”只是更便

① 指俾斯麦，海格立斯是希腊神话中的古希腊勇士。——译者

② 古代希腊在演出悲剧后加演的一种轻松戏剧。因主角都是希腊神话里的小神“羊人”而得名。题材虽和同场演出的三联悲剧有一定的联系，但主要用以缓和剧场气氛，供人娱乐。——译者

于掠夺群众财物的机会罢了。人们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认为，在议会里和报刊上“攻击罗马”最卖劲，最庄严地召唤可怜的乌尔利希·胡登的阴魂的人，在濫設企业的泥沼里也必然陷得最深。有几十个进行文化斗争的帝国议会议员，为了给自己的欺騙性的诺言鍍金，把他們的議員头衔印在創辦濫設公司的緣起上，并为“爱国的金錢勢力”效劳，尤其是为毁灭中等階級的幸福的血鬼中的两个巨头——貼現公司和布莱希勒德家族的銀行效劳。从前的共产主义者、现在的民族自由党領袖米凱尔，在貼現公司的議會代表中出类拔萃。他是貼現公司的經理之一，四年內，他的收入达到一百三十三万八千七百三十馬克十分尼。如果某个好管闲事的“帝国敌人”认为，米凱尔可能在貼現公司的可怕的濫設企业中进行了同这笔收入相适应的活动，那末米凱尔便含着眼泪訴苦說，他是遭到誹謗的无辜者。米凱尔硬說，这笔可爱的收入，是他附带从事司法 396 鉴定（每个穷陪审官都很乐意为每年几千馬克的收入做这种工作）得来的。在布莱希勒德的議會代表中超群拔俗的西里西亚容克和自由保守党領袖馮·卡尔多夫，也同样巧妙地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濫設許多最血腥的投机企业，只是为了致力于議會活动，并給祖国保持他作为立法者的不可替代的力量，而又不遭受財產損失。

自由資產階級的政論界先鋒战士同这个階級的議會活动的先鋒战士是互相适应的。这时鮑尔·林道和他的《現代》代替了古斯塔夫·弗賴塔克和他的《边境使者》，林道是一个末流作家，他甚至不懂得把第二帝国的文学輸入德国，而是把这种文学的渣滓輸入德国。1866年以后投靠了俾斯麦的卢格，現在丢掉了一切的梦想写道：“布伦奇里和雷特維茨被宣布为主要作家。难道这就是‘現代’嗎？难道这就是我們的时代嗎？……林道让所有著名人士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言論，而不管他們属于哪一派，历史似乎是純粹

的空論。”不錯，历史是純粹的空論。古伊多·魏斯在《天平》上做了打起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旗帜的最后嘗試，可是，不管这个小小的周刊在风格上、精神上和知識上比林道的《現代》高出多少，仍然沒有熬过几年的慢性病。

一群沒有操守的記者像一具死尸上的蛆一样，聚集在資產階級的日报里。至于交易所報紙和商业報紙就更不用提了，只有傻瓜才会期望这种報紙不是这个样子，甚至連自命“伟大”而“高尚”的政治报刊也受到了腐蝕。在虔誠的《十字报》上也刊登交易所的广告，民族自由党的《国民报》和进步党的《福斯报》的商业編輯利用他們的社会地位来欺騙公众，凡是受法兰克福交易所支配的濫設公司，都成了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的股东。这个報紙的商业編輯貝恩哈特·道克托尔写信給《泰晤士报》說：“假如我們不是有一种煽动工人反对他們的老板，并用决不可能实现的希望逗引他們的荒唐蠢惑家的挑衅精神，社会各阶层就会太平无事，国家就会享受迄今从未有过的幸福。”为此馬克思对他进行了严厉的駁斥，可是馬克思尽管目光敏銳，也沒有預見到，不到五年，整个官方德国——从天才政治家俾斯麦到同样天才的反对派領袖欧根·李希特尔，都会唱出那曖昧的交易所經紀人首先唱出的同一調子。

二 农业社会主义和讲坛社会主义

在資本主义濫設企业极盛时期，出現了两种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按其实质來說，这两种社会主义不是什么新鮮的东西，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各具有特殊的形式，它們企图利用这种形式来影响当代的階級斗争。

农业社会主义是在普魯士容克地主的“信貸困难”中产生的，

他們的地产有的由于經營不当,有的由于产权变动、出让或分配遗产,或者由于其他原因,而大量抵押出去。这个階級的經營方法虽然落后,但在大工业的发展中也有它的一份,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粮食价格也上涨了,可是資本利潤比地租增加得更快,因此容克地主的地产的价值就随着降低。土地本身沒有独立的交换价值,因为它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它的表面的交换价值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在社会交往中,一块土地所产生的地租被看做是資本的利息,是按照当时的利率資本化了的東西。一块能收四千馬克地租的土地的交换价值,在利率为四厘的时期,为十万馬克。現在利率是按照資本利潤加以調整的;如果資本利潤比地租增长得快,那么土地的交换价值就要降低。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如果地租由四千馬克增加到四千五百馬克,而利率由四厘增长到五厘,这块土地便只值九万馬克。它的生产价值增长了百分之十二强,而它的交换价值却降低了百分之十。事实上,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初期,利率由四厘增加到五厘,而地租只是相应地緩慢增长,以致耕地的价值降低了将近五分之一。因此又給从老弗里茨时代以来一直依靠受之有愧的或者受之无愧的国家援助来維持的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階級提出了一个生死攸关的問題。 398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生死攸关的問題是給有产階級的这个阶层,而不是像容克地主喜欢断言的那样,給农业生产本身提出来的。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涸竭了,容克地主才趋于沒落,而是因为农业生产被掌握在一个封建閉塞的、負債累累的階級手中,农业生产才好像涸竭了。它渴望資力雄厚的双手,能使它同現代大規模的生产方式相适应,并由此达到空前的高涨。这种发展肯定是由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生存条件中产生的,因此在資本主义基础上是无药可医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們仍要試驗或建議的药方,就具

有违反历史必然性的一切行动的命运；它們本想減輕压力，結果却增加了压力。許多抵押銀行企图用把抵押券变成流通证券和世界市場证券的办法，帮助容克地主渡过“信貸难关”，正如洛貝尔图斯所說，它們为了把馬变成鳥，白白浪費了許多力气。即使人造翅膀能够帮助駿馬暂时飞騰上去，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匹馬立刻就会蹕下来，跌得粉身碎骨。可是洛貝尔图斯推荐的药方也不高明。他以真正的空想主义者的方式，想用不可收回的地租证券代替可以收回的抵押資本；商品應該作为商品生产，而不应作为商品交换；洛貝尔图斯企图利用中世紀的地租证券，封建生产方式的負債形式来保护总的說来作为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的地租，使其不受在資產階級世界中可能遭到的一切討厭的冒險的不良影响。如果这种意图正如它有很多理由不能实现那样，也有許多理由可以实现，那么它就会使容克地主完全陷入困境，因为他們依靠不可收回的地租证券，只会在比依靠可以收回的抵押券更为不利的条件下，从資產階級那里得到他們所需要的資本。

399 所有这一切同无产階級沒有直接关系。工人沒有任何理由为許多世紀以来赶走小农，而現在自己也被現代大資產者赶走的旧普魯士的“世家”掉眼泪。由宗法式的农业向大工业的农业的轉变，虽然沒有使农村无产階級脱离苦海，但却減輕了它的苦难。虽然如此，却有一种見解认为，容克地主同无产者之間具有共同的利益。容克地主的“信貸困难”是由于資本利潤比地租增长得快而产生的。如果通过提高工資在国家产品中的份額，降低資本在国家产品中的份額，結果增加工人对面包和肉类的消費量，同时也就提高了地租，那岂不是很好嗎？农业社会主义就是以这种思想为基础的，它的先驅者是洛貝尔图斯和魯道夫·迈耶尔。

魯道夫·迈耶尔比洛貝尔图斯足足小三十岁。他的出身和所

受的教育使他进入易北河东的农业利益集团，而他明显的自命不凡和他在历史和经济学方面所获得的丰富知识，能够使他不致走上封建浪漫主义的歧途或者甚至成为容克阶级的雇佣文人。他是瓦盖纳的小同乡，在瓦盖纳的领导下，在一家保守党的报纸中崭露头角。可是无论是瓦盖纳还是洛贝尔图斯都不能决定他的一切。鲁道夫·迈耶尔已经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开始占统治地位的新时代的儿子。对于洛贝尔图斯的空想，他并不感到实际兴趣，而只从学术的角度表示钦佩。相反地，他对洛贝尔图斯始终不了解的东西，却有了深刻的理解。鲁道夫·迈耶尔具有真正的战斗性，他对“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具有一种亲近性的感觉，他用勤劳而熟练的手，先在《柏林评论》，后来也在一本内容渊博的著作中收集了这一斗争的证据。在他同自由派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进行占优势的战斗的时期，他喜欢出席社会民主党的会议，虽然他有自己的特殊立场，但毕竟是一个正直的人，工人们把他看做是值得欢迎的客人。他不进行社会蛊惑，并不是因为他为人正直，而是因为他很聪明。他坦率地对工人们说，他们的道路同他的道路最后是要远远分开的，但是他想同他们共同走的一段路程，并不是离开正道通向泥沼，而是确实在他们的道路上一直通往标准工作日的里程碑。 400

鲁道夫·迈耶尔在工人那里得到了同他对他们的有条件的友谊相适应的有条件的赞同。可是他想无条件地进行帮助的容克地主，却无条件地不赞成他的意见。如果说容克地主已对经常玩弄手腕给自己的丸药裹上糖衣然后再给他们服用的洛贝尔图斯发生怀疑的话，那么他们就对鲁道夫·迈耶尔的“保守的街垒风格”越来越感到恐惧。洛贝尔图斯抱怨说：“这些乡下佬太愚蠢了”。农业社会主义肯定也不能长期对容克地主有所帮助，但是它可以保证容克地主在完成了日益失去历史礼仪的任何概念的日常工作以

后，在历史上有一个体面的归宿。这些勇士为了利用更殘酷地压榨和压迫群众的办法，换取苟延殘喘的时间，宁可利用他們的慣技，去抓“立法的門把”。只要地租还在增长，他們就感到刀子还没有真正擱到他們的脖子上。

在濫設企业和文化斗争时期，他們在政治上分为三个集团。自由保守党人从大地主那里吸收自己的成員，这些大地主同时也是大資本家，并且已經用經營工业的方式經營农业。他們同資產階級进行可爱的竞争，拼命濫設公司。正如卡尔多夫是布莱希勒德的議会代言人那样，烏耶斯特公爵和腊提博尔公爵成了資本主义冒险家施特魯斯堡的凱旋車的挽馬。这一派的容克地主在变成資產階級的成員以后，甚至毫不客气地利用了原来同等級的人的“信貸困难”。他們为了换取不多的报酬，成立了臭名昭彰的中央土地信貸公司的裝門面的管理委员会。这个公司是由六家大濫設公司，即路特希尔德、奥本海姆、富尔德、弗雷米、布莱希勒德和汉泽曼一米凯尔創办的，政府賦予这个公司以非常的、甚至有一部分在法律上成問題的特权，据說是为了拯救地产，实际上是为了把它交給資本的暴力。相反，新保守党是由那些根本没有地产或者只有很少的地产因而完全依靠政府維持过活的容克組成的，也就是由跟着政府的指揮棒轉的“邦議会合唱队”組成的。最后，老保守党是始終不理解世上发生了什么的頑固容克的真正战斗部队。他們以为通过祈禱和詛咒就能够回到宗法时代；正如魯道夫·迈耶尔所諷刺的那样，他們把輪子的响声和蒸气机的吼叫当作紡車的优雅低吟和牧笛的奏鳴，他們想用“懲罰”使工人“变好”，以便消灭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在学院的溫室里成长起来的讲坛社会主义的举动比洛貝尔图斯和魯道夫·迈耶尔这样一些人的农业社会主义更为怯懦和可

疑。就其根源而論，讲坛社会主义是学者們对由于美妙地无所不包而终于跌倒的自由貿易論的反抗。自由貿易論鼓吹資本的任何利潤和利息都是人类的重大成就，在英国和法国几乎引不起人們同情的最无聊的花言巧語，以“国民經济科学”的名义流传于德国的市場和街巷。过去拉薩尔曾經用夸张的批評口吻說，德国的自由貿易論者最喜欢废除一切国家，把司法包給索价最低的人，而現在該諸家布朗却严肃而激憤地宣称，如果国家管理司法，国家就扮演市民社会的，即資本主义社会中的沒有生意的营业主任的角色；判決案件是那个社会所信任的法律技术員的事情；国家應該干脆执行他們的判決。可是，班貝尔格尔贊揚交易所是一个巨大的劳动工場；他认为，現有的社会存在形式以外的其他存在形式，都是人类所不可想像的，正如世界以外的存在不可想像一样。自由貿易論者甚至宣布，利用統計研究現社会也是白費脑筋的，因为国民經济是受永恒的自然規律支配的。

于是有許多研究过历史和統計学的、大多数比較年輕的学者起来反对这种鬼話。統計学使他們对自由貿易派的永恒的自然規律产生了异端的怀疑，他們从历史上知道还有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的人类生存形式。为了向各邦政府告发他們的这种罪行，为了在小市民面前中伤他們，憤怒的自由貿易主义者把他們叫做讲坛社会主义者，这些被激怒的人之中的一个甚至从他那庸俗的商人意識中挤出一句美丽的詩：他們沒有勇气去找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其实讲坛社会主义者同科学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階級 402 斗争都毫无关系。他們根本不是一个團結一致的学派。他們的大概可以以赫尔德为代表的右翼，“对原則具有原則性的厌恶”，同比較明白事理的自由貿易主义者大同小异。他們的大概可以以阿道夫·瓦格納为代表的左翼，有时极笨拙地模仿了拉薩尔的論战方

式，或者也向洛貝尔图斯献媚，然后又心甘情愿地担任教会或国家中的一切反动派的帮凶的角色。

讲坛社会主义的重心落在它的中間派身上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派别身上，表现出当时德国仅存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资产阶级社会分裂为进行着你死我活斗争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采取的态度。施穆勒论德国小工业的著作和布伦坦諾论英国工会的著作是两个永久有价值的历史文献，它们包含着讲坛社会主义的内核，如果讲坛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是值得提的现象的话。讲坛社会主义赞成工厂法和工会，但不是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不是把它们当作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个阶段，恰恰相反，是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精神，这种经济学企图在从逻辑上能够保持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下，保持资产阶级社会。这些讲坛社会主义者不是资产阶级的敌人，而是它的莫逆之交。他们的错误是，他们认为长期拯救资产阶级社会是可能的，但是只要这种拯救还有可能，当然只有采用布伦坦諾和施穆勒所建议的方式。他们的建议要是被及时采纳，德国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即使不致于窒息致死，也会显著缓慢。

即使讲坛社会主义者有了某种贡献，那也是个别人以个人的身份完成的。他们想组织起来，成立凌驾于正在斗争的阶级之上的机构的企图，一开始就毫无成果。他们没有共同的原则，只能把各种不同的脑袋放到“伦理的热情”这顶曖昧的帽子下面。因此给一切可能发生的混乱敞开了大门，这种混乱肯定会准时产生，以致几年以后，讲坛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就同国民经济代表大会结成了亲密的同盟。它对最近几十年的阶级斗争不发生任何影响。

资产阶级则在1873年春天实际表明了它对“伦理的热情”的了解。1866年以后又走进政界的瓦盖纳，为旧日的嗜好所迷惑，

尝了尝濫設公司的騙局的味道。他不是比任何人都坏的罪人，他只参加了波美拉尼亚中央铁路公司，这个企业本身是有益的，建立这个企业比建立其他上百个企业，带来的不是更严重的犯法，而是比較輕微的违法行为。同卡尼格先創立的汉諾威—阿尔滕貝肯和呂納—維能堡铁路公司相比，波美拉尼亚铁路公司差不多像用沐浴海綿洗过的嬰兒那样干淨。瓦盖納应得的几千塔勒的濫設企业利潤，在大发橫財时期，也是一件小事，以致后来交易所諷刺說，瓦盖納受到懲罰是應該的，因为他以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損害了事业。自由党人已經把瓦盖納看做俾斯麥的凶惡的守护神，非常惧怕他，按照他的服务年限，不久将被任命为內閣首席顧問；一旦担任这个职务，他就可以向皇帝面奏。这个在此以前由貼現公司的一个心腹担任的要职，决不能落到一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同时又是对資本主义有透彻了解的人的手中，于是拉斯克尔（在他的集团中，至少有三十六个加倍有罪的濫設公司）在普魯士众議院中用“倫理的热情”攻击瓦盖納，破口大罵他是一切濫設企业的腐敗的典型。

这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厚顏无耻的喜劇，可是这场戏演得很成功。俾斯麥为了“愛国的金錢势力”牺牲了他的老朋友，又是貼現公司的一个心腹担任了瓦盖納沒有到手的职位。人們还成立了一个王国調查委员会，在扫除濫設企业时期，这个委员会显然成了一把非常奇特的扫帚。容克地主对农业社会主义置之不理，資產階級也对讲坛社会主义置若罔聞，对于他們这些太聰明的人來說，什么好建議都是不值錢的；他們宁可让他們的学费增加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对于他們已經开始被大破产扫除掉的大錢柜來說，也是难以支付的。

第三章

拉薩尔派和爱森納赫派

一 几十亿賠款时期的无产阶级

404 工人运动很快就从战争的打击下恢复过来。如果說 1866 年以后的危机教会工人运动思考,那么 1870 年以后的工业发展就教会工人运动行动。由于得了几十亿賠款,货币貶值了,工人阶级的生活必需品涨价了;工人阶级要使它的实际工资保持不变,就得提高货币工资;一个巨大的罢工运动席卷整个德国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报纸咒罵这种完全不可避免的自卫是輕率的攻击。同时它自己就陷入特殊的矛盾之中。因为根据自由貿易論,任何罢工都必然在国民經济的永恒的自然規律面前碰得头破血流,所以资产阶级报纸完全抹煞事实地指出,任何現在还在順利进行的罢工,終归要失敗,可是,因为还必须证明工人根本没有理由罢工,所以尽管据說一切罢工都已失敗,工人却被描繪为生活豪华的人,他們吃早飯时就用白啤酒杯喝香檳酒。对这种行为的道德上的憤慨,在资产阶级机关报上表現得尤为雅致,而在下一栏中又滿意地叙述到,在濫設企业的神話般的酒宴上,人們把香檳酒倒到金魚缸里,让客人看金魚的垂死掙扎以取乐。

从某种意义上說,事实同自由貿易派报纸所断言的恰恰相反。

这些报纸中的一家有一次在专门谈论柏林的罢工时说漏了嘴，它承认，“尽管提高工资有时也是以某种扭扭捏捏的形式实现的，这些罢工仍然常常取得胜利。不过罢工不能改善工人的痛苦境况，工人们今天从资本家的利润里得到的工资，明天就必须付给房东，成了他们的地租；一般说来，柏林工人的工资增长赶不上房租的增长”。于是房荒问题暴露出来了，虽然房荒是伴随大工业革命的一个老现象，但战后在许多比较古老的城市中，尤其是在柏林，这个问题曾经使许多社会庸医大伤脑筋。大工业一在旧城市落户，立即就吸引来了一支工人大军，为了给现代交通建筑宽阔的马路，还必须拆除狭窄而弯曲的胡同。工人住宅的需要不断增长，可是它的供给却减少了。在柏林、布勒斯劳和科伦，从四十年代起房荒就逐渐形成。1870年以后，由于大工业的急剧发展，房荒便变成了急症。不过它并不是工人的切身痛苦的唯一症候。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到处发挥作用，只是在这里主要通过高昂的房租表现出来，在那里主要通过昂贵的面包和肉类表现出来而已。在柏林，有千百个没有房子住的人流浪街头，不知道该到哪里去睡觉。在纽伦堡有千百个饥民在马路上游荡，砸坏面包店和肉店的窗户。在柏林，据当时计算，房租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十四，伙食费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服装费增加百分之十八，整个家庭生活费增加了百分之六十六。但是，在柏林的工人中，只有瓦工和建筑房屋的木工经过斗争使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制造家具的木器工人（也许还有油漆工人）的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他工人的工资的提高都在不同程度上远远地落后于物价的上涨。

如果一部分德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果真能得到微小的提高，另一部分人通过提高工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跟得上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那么第三部分人想要改善劳动条件就如缘木求鱼了。第二

部分人比第一部分人的数量多，而第三部分人比前两部分的总人数还要多。恰恰是在大工业的起示范作用的部門，不是由于工人的体力消耗太大(如在紡織工业部門)，沒有形成群众性的罢工，就是群众性的罢工大多遭到失败，比如矿工和五金工人的罢工就是这样。1872年夏天，魯尔河谷的一万六千名矿工为了爭取实现八
406 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資百分之二十五，勇敢地进行了几个星期的斗争以后，被迫无条件地放下了武器。1871年11月，大約八千名开姆尼茨机器制造工人遭到同样的命运。同一时期，紐伦堡格腊梅尔—克勒特大机器和車輛厂的三千名工人发起的一次爭取提高工資运动，也沒有任何成果，虽然这些工人由于确实預見到自己的失败，而沒有举行罢工；柏林机器制造工人的两次罢工也沒有成功。一般說来，几十亿賠款时期德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急剧恶化；这一时期少数人的生活虽然暂时有所改善，但是由于生活資料价格上涨，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他們的工資沒有相应地增加，或者根本沒有增加。

如果說工人們由此对資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有了一个深刻的認識(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这个社会也不能給无产阶级提供过得下去的生活)，那么統治阶级对待罢工的态度就向他們表明，他們可以期望从这些“最好的朋友”那里得到什么东西。企业主首先实行歇业或实行懲罰，成立反联合組織并提出黑名单，在資产阶级社会中，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战争；而国家机关竭力偏袒企业主，干預要求增加工資的斗争，这也不是什么新鮮事，在柏林瓦工的一次大罢工中，“社会王国”使瓦工行东有可能延长了国家建筑合同的期限，把服兵役的瓦工帮工供行东支配。特別使人惊奇的是資产阶级政党，不論属于哪个政治派別，都同样深恶痛絕地攻击罢工工人。沒有一个資产阶级政党打算稍稍客观地評价一下不能

不引起工人的爭取提高工資运动的原因。它們的最高智慧就是，指摘罢工是“社会民主党的阴谋活动”，这是极不高明的伎俩。

因为这种行徑，不可避免地使工人群众認識到，在所有的政党中，只有社会民主党永远是他們的可靠朋友。事实上并不是社会民主党各派以某种方式迎合工人的罢工欲望。它們支持工人的工資运动，指出工資运动的合理性，工資运动一旦爆发，它們也尽一切力量保证罢工的胜利，但是它們决不煽动罢工，它們不倦地教育工人；应该先成立一个坚强的組織，然后采取这个使双方受損失的罢工手段。甚至像奥格斯堡的装釘工人約翰·莫斯特这样一个不守本分的人（曾参加过奥地利工人运动，1871年加入了爱森納赫派，由于有許多放肆行为从一开始就在党内引起不滿），也在开姆尼茨尽力阻止机器制造工人罢工，直到最后一刻为止。鉗工卡尔·格里林伯格比他的成就更大，格里林伯格慎重地领导过格腊梅尔—克勒特工厂的工資运动，进行了不可避免的退却，沒有使罢工遭到損失。资产阶级报纸和进步党市政府（同时也是警察署）为了对此表示感谢，就意味深长地說，在格里林伯格和紐伦堡的其他几个社会民主党人煽动下在同一時間內发生了面包暴动。直到战后还属于进步党的最忠实的拥护者的紐伦堡工人，由此而认清了事情的真相，大批地轉向社会民主党。

各邦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对由罢工发展起来的工会运动也像对待罢工那样充滿憎恨和敌意。在薩克森王国这种情况最为严重。自从爱森納赫代表大会以来，自从色当战役以来，自从薩克森分立主义看到它已經不能再玩弄工人和不能再同普魯士霸权对抗以来，那里的政治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薩克森工人一公开地参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薩克森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就像阳光下的雪那样融化了。早在1871年帝国議會选举时期，薩克森激进

派中的大部分人就已經轉向态度最曖昧的民族自由主义，罗伯特·勃魯姆的一个老同志萊比錫警察署长呂德尔，已經成为薩克森工人的一个最凶恶的迫害者。过去博伊斯特之流的阴谋家为了压制资产阶级反对派而想出来的整个警察机构，現在被资产阶级反对派同一切落后分子一起用来削弱工人运动，而且对工人的工会运动的压制几乎比对工人的政治运动的压制更为厉害。在薩克森王国，有損健康的紡織工业及其巨大工厂建筑大量集中，这个工业部門使用女工和童工，几十年来它的家庭工业逐渐衰落，它依靠国外市場，发生危机和蕭条，使得体力衰弱的工人阶级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他們的工資很低，八千人挤在一平方公里土地上，那里的統治阶级——从反动政府到资产阶级自由英雄都在不遺余力地堵塞工人摆脱这种饥饿处境的道路。1872年初，莫特勒用下面一段話描述了压制薩克森工会运动的阴谋詭計，他說：“人們时而把我們称做违法团体的联合，时而給我們打上政治团体的烙印，好用某些法律条文来制裁我們。时而說我們同伦敦的国际走一条道，时而說我們干預公共事务，危害秩序。”可是，薩克森政府在这場警察的小战中暫時走在前面，而普魯士政府則始終勇往直前。1873年，普魯士政府向帝国立法机关提出了一个懲罰破坏劳动合同的刑法草案，它将取消刚刚給予的联合自由。

有人說，德国工人同他們的英国伙伴不同，宁可追求革命的空想，也不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改善自己的阶级状况，我們只要举一个簡單的事实就可以消除这一切可怜的抱怨。事实就是，每当德国工人要轉移到工会領域时，他們总被警察的狡猾的压迫手段推回政治領域。本来世界上很少有什么东西像現代工人阶级的工会組織这样，不能一律对待。組織工会的可能性，以及工人对工会的关心发生种种变化；各个行业越是以手工业方式或手工业工

場方式进行生产，工会組織就越坚强；而在进行资本主义剝削的家庭工业中，也在女工和童工起重大作用的、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大工业中，工会組織却日趋衰落；而在机器工业中，在劳动力的竞争受到体力或技能的限制时，或者有一个有效的工厂法来保护工人不受有加无已的剝削时，工会組織就重新兴起。所有这些和其他的观点，錯綜复杂地构成一张能不能組織工会的五顏六色的样本卡片，而且大家知道，英国工会在成长成为一种力量以前，也有过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慘痛經驗。

可是，英国工会能够成长成为一种力量，是因为它至少具备一个工会組織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毫無疑問，英国禁止联合的法令用比德国更严厉的惩罚来威胁工人，并常常真正进行了这种惩罚，但是英国工人有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德国工人却从来沒有这种自由。联合自由同普选权的情况相似：沒有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联合自由就成为一把沒有刀柄的刀。联合自由只有依靠坚强的联合会，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沒有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这些联合会是不能存在的。如果工会联合会的萌芽被反动的出版法和結社法的恶毒手段摧毁，那么工人除了对摧毁他建立阶级組織的一切前提的反动派进行政治斗争外，沒有別的办法。

德国工人一开始就依靠政治斗争，因此显然地，他們对工会組織的重要性，有时就看不清楚，正如（不过顛倒了一下）工会組織使英国工会看不到政治組織的重要性一样，而且这种情况持續的时间还要长得多。因为在七十年代初期，德国工人对工会組織的关心程度即使不能說超过了对政治組織的关心程度，但也几乎是相等的。当然存在于工会組織性质中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在这里也起了作用。德国两个最老的工会中，排字工人进行的工資斗争比烟草工人有成果，但这并不是說，烟草工人的工作成就不如排字

工人。此外，烟草工人比排字工人更激烈地参加了政党斗争这一点，也不起决定性作用，因为工会领袖弗里茨舍是善于巧妙地克服困难的。烟草工人成就较小的真正原因在于，家庭工业劳动和妇女劳动对烟草工人就像肉里的刺一般。排字工人和烟草工人各有自己的机关报，制帽工人、金器匠、银器匠、陶磁器工人也做到了这一点。工会组织的幼芽也在建筑业工人——瓦工、粗木工、细木工、抹灰工中成长起来。五金工人的进展较慢，有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组织没有根据行业仔细分工，因此许多利益不同、甚至利益矛盾的工人全被容纳在一起。织工们于1871年在格劳豪，1872年在柏林举行了会议；他们有了成立工会组织的善良愿望，可是他们也必须克服巨大的困难。

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中，还有一派始终对工会组织或多或少是抱拒绝态度的。这一派在拉萨尔派中比在爱森纳赫派中更为强大，但是拉萨尔派也出现了最能干的工会活动家，如瓦工格罗特考和木工卡佩尔，在吕普克尔特移居国外以后，格罗特考担任瓦工工会的领导，卡佩尔担任木工工会的领导。在爱森纳赫派中，巴伐利亚人、鞍匠伊格纳斯·奥艾尔开始在柏林把他的同行组织起来，莫特勒在萨克森不倦地工作，当时党的书记约克在为工会的发展而斗争方面，几乎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坚决。首先，在1872年6月，他在爱尔福特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九千九百二十名参加工会组织的工人。其中有六千一百五十二名属于国际工会，有三千七百六十八名属于地方专业团体。这些数字并不大，这个代表大会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可是，事情本身存在的障碍越难克服，精心培植起来的幼苗一旦被警察的暴力摧残，其损失就更为严重。

统治阶级徒然地企图掩盖自己的敌意，他们说，他们并不压制

工会，而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濫用工会。他們用这种伪善只能欺騙庸人，而欺騙不了工人。社会民主党的工会运动推动者肯定不想通过工会运动来削弱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但是他們也不想輕率地对待工会运动。像約克这样热心腸的党性很强的人也一再表明，必須把工人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区别开；这两者同样重要，但又各有各的特殊意义；要发展工会运动，就不应使它单纯成为政治运动的尾巴。約克和他的同志們所希望的工会，是工人在經濟方面独立自主的組織。他們比资产阶级报纸的文人，也比讲坛社会主义的教授們，对英国工会更有了解。这些教授起初对进步党的工会表示高兴，可是几年以后通过布伦坦諾之口承认，这些畸形的組織根本不是工会，而是单纯的疾病互助会、伤残人員互助会和喪葬互助会，它們的會員对某些工会理想具有柏拉图式的爱。可是政府和资产阶级甚至对于进步党的工会也抱有掩盖不住的敌意。工人的捍卫經濟利益的表面組織已經使它們感到不痛快，由于它們使用政治武器向工会組織的真正的幼芽进攻，使得工人理解到，必須首先推翻有产阶级的政权，給予革命的工人运动以有力的推动。

这个运动在純政治領域內，也得到了同样有力的推动。一成不变地在新德意志帝国繼續存在的旧普魯士統治制度，很快就使人們对皇帝和帝国的一切热狂的高兴心情烟消云散。軍費和捐稅的重担沒有減輕，而在人民还不习惯这种可爱的刑罰的一切地方，发生加倍可怕的作用。除去当兵和納稅以外，“莫談国事”也是旧普魯士的“荣誉”。在北德意志的新刑法中，旧普魯士刑法的弹性条文写得更明确一些。1873年，新出版法草案送到帝国議會，这个草案的第二十条規定：“在印刷品中用破坏道德、法制或爱国心的方式，攻击家庭、財產、义务兵役制或国家制度的其他基础的人，

412 或把法律认为应该惩罚的行为说成是值得仿效的、有价值的或忠于职责的，或用危害公共安宁的方式攻击市民社会的关系的人”，处两年以下的徒刑或要塞监禁。正如经济方面的破坏合同法一样，这个条文在政治方面是俾斯麦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非常法，但是就其具有弹性的内容而言（同它相比，曼托伊费尔的弹性条文变成了单纯的孤儿），它也能够打死任何资产阶级反对派，因此对资产阶级政党说来，这个条文并不是在开玩笑。改选的日子临近了，因而拉斯克尔甚至有一次敢于喃喃地说到关于“人民权利”这个难于出口的词，可是这个词对他极为不利。俾斯麦叱责他说：“我们大家都属于人民，我和您一样也属于人民，我也有我的人民权利，我决不容许垄断人民这个名义，并把我从人民中排除出去。我决不允许这样做。”自由主义反对派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答案来回答这个粗暴的挑战。进步党人同民族自由党人几乎是一丘之貉，1873年进步党人为下一届帝国议会选举发表的、由菲尔肖夫草拟的选举宣言，得到半官方主要报纸的应有的赞扬，说什么就是最保守的人也不会不对这个宣言表示赞同，当另一家官方报纸做了一个好像善意的推测——进步党的左派不会同意菲尔肖夫的过于忠诚的作文练习——的时候，这些勇士们还扮演了受到侮辱的爱国者的角色；他们断言，他们的选举宣言从来没有像这个宣言这样，得到全体党员的一致赞同。

政治上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推动了那些在俾斯麦面前表现坚强不屈的党派，用帝国爱国主义者的隐语来说，就是赤色国际和黑色国际，即社会民主党和教皇全权主义的党。自从俾斯麦和自由派的文化战士对天主教会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以来，天主教会就把它古老的、但仍强大的组织投入战斗，在这个世界性的争论中，天主教会像蛇一样狡猾，它善于挥动俾斯麦的警察政策强迫它

使用的資產階級自由的武器。在帝國內的天主教地區，它把不斷增長的政治怨恨的洪流，導入自己的河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工人運動。在萊茵河畔和西里西亞，社會民主黨的宣傳在1870年以後的進展極為緩慢，在巴伐利亞，社會民主黨宣傳的主要據點從天主教城市奧格斯堡和慕尼黑移到耶穌教的紐倫堡—菲爾特。教皇全權主義在這一方面決不低能，它用社會主義的要求來引誘在它的精神影響下成長起來的工人羣眾；它善於巧妙地建立分布很廣的協會，這些協會特別在許多方面能夠吸引手工業幫工；美因茲的大教堂司祭莫方提出的社會政治綱領，從遠處看來，同拉薩尔的綱領差不多。首先，殘酷的迫害使天主教傳教士在天主教工人中得到比他們應許塵世的或天堂的一切幸福所能博得的更多的好感。

在至今還沒有發生普魯士的暴行的耶穌教地區，社會民主黨的宣傳活動有了發展，在不同程度上遠遠超過歷史上形成的條件對它的限制。耶穌教的巴伐利亞是這樣，漢諾威是這樣，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尤其是這樣。當德意志民族的這個受溺愛的寵兒終於可以從母親的乳房中吮吸到虔誠思想的乳汁的時候，他甚至露出驚奇的眼光。除了全德工人聯合會一向就有會員組織的幾個工業區，如阿爾托那、奧滕森、皮納貝克、基爾、諾伊明斯泰爾以外，什列斯維希—霍爾斯坦和它的從事農業的居民、富裕的農民階級、根深蒂固的分立主義以及北德的方言，同社會民主黨的宣傳看來是格格不入的，可是1870年以後，拉薩尔派在這裡取得的成就比愛森納赫派在薩克森王國所取得的還大。當然社會觀點也發生了作用。因為德國新立法規定，在某地居住兩年以上的貧民就可以得到所在村鎮的救濟，而根據霍爾斯坦的法律，必須居住十五年以上才有享受救濟的權利，所以東霍爾斯坦的容克地主就大批解雇本

来就过着贫苦不堪生活的雇工，于是在那里的大私有土地上，农村无产阶级群情激愤。可是，一般说来，对于柏林政府的政治赠礼的愤怒，促进了社会民主党在易北河公国^①的宣传鼓动工作，而堪与萨克森匹敌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警察则做了其他的事情。

414 情况还相当紊乱。许多无产者，按其阶级地位来说，属于社会革命的政党，可是目前却信奉本质上反动的教皇全权主义，而在新普鲁士地区的社会民主党拥护者中，又有许多不可靠的分子。党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的地位仍然极不稳定。不过有许多同路人已经变成了忠实的党员，主要问题是，社会民主党能够做自由主义根本做不到、而教皇全权主义只是暂时能做的事情，因此在纯政治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也是经常可以信赖的。因为人民中的受折磨、受压迫的阶级（远远超过无产阶级的范围），把社会民主党看做是永远可靠的支柱，它就获得了一个产生力量的新源泉，俾斯麦的剥削政策和压迫政策越占优势，这种力量就必然不断壮大起来。

二 海牙代表大会

巴黎公社不仅使俾斯麦了解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也使他和他的同伙了解了国际。欧洲反动派武装起来反对工人协会，大陆上的所有国家都起来迫害工人协会。英国政府虽然反对西班牙政府提出的共同举行警察围剿的建议，并因此触怒了俾斯麦（他在自己的半官方报纸上指摘不列颠成了一个避难所，秩序的神圣事业将从那里遭到破坏），但是英国政府也干涉爱尔兰的国际支部，并通过它的外交代表搜集关于协会支部的情报，人们费了很大力

^① 在十九世纪，易北河公国即指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译者

气，才能阻止瑞士共和国政府把公社的逃亡者移交給存心报复的法国资产阶级。

欧洲各国政府勾結在一起，挖空心思地采取許多迫害措施，与此同时，文明世界的造謠专家还对工人协会展开了誣蔑宣传。伪造国际的历史和秘密、拍发聳人听聞的电报、对公开文告进行无耻歪曲的事层出不穷。人們通过电报向全世界宣布，芝加哥大火是国际的恐怖行动，正如国际总委员会理所当然地以諷刺口吻所說的，他們沒有把当时侵襲西印度的颶风也說成是国际的魔力，这真是太奇怪了。1872年9月，三国皇帝在柏林开会，爱国主义的吹鼓手把这一天說成是世界和平与世界幸福的新时代，这时全欧洲对国际的迫害也就达到了頂点。按照他們的說法，为了拯救现代文明，一个东方强国的封建的反动旧同盟已經恢复了。可是他們忘了这样的經驗：早晨叫得过早的鳥儿，晚間常常被猫吃掉，他們认为沙皇到柏林开会，就彻底消除了法国的一切报复的念头。 415

从表面上看来，他們的凱歌也不是完全唱得沒有道理的。因为这年秋天，正当德、奥、俄三国皇帝在施普累河畔的宮殿中开会的这一周，国际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結束了它的存在的历史。由于公社的失敗，协会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1870年退出商业活动、同馬克思一起在总委员会工作的恩格斯关于这一点說道：“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前面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无法再进行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梅林的引文中是“鼓动”。——原編者〕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許它动員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則就必然要失敗并会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①实际上，情形就是这样，而不是別的样子。由于总委员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0頁。

会拥护巴黎公社，“值得尊敬的”英国工会退出了国际，在經過一場消耗一切的战争以后，在巴黎粮食供应断絕、公社大量流血以后，法国无产阶级需要有重新集結力量的充分时间。国际失去了法国支部，也就失去了支柱，代替它的是一个很可疑的現象，即公社的逃亡者充斥伦敦总委员会，引起了无休止的爭論，这是一切失败的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馬克思夫人写給約翰·菲力浦·貝克尔的信中，表明了对这种混乱状态的預感，她說，如果誰不願无条件信賴法国人的一切欺騙勾当（她是完全不可能相信的），誰就被看做是普魯士人。

416 当国际在英国和法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立足之地的時候，它在許多經濟和政治上比較不发达的国家，如在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西班牙和瑞士的一部分，由于内部不和而日趋衰落。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有一部分还处于英、法、德三国的工人在三月革命前经历过的发展过程，即处在不愿过問政治（因为工人在有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經常受到欺騙）的社会主义时期。这种社会主义还不能根据資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存在条件来理解这个社会。它既不理解資本主义社会的产生的必然性，也不理解它消亡的必然性。因此它对无产阶级爭取解放的手段也完全不了解。它把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看做是重蹈复轍，是培养一种新的压迫力量的新誘惑。这种社会主义企图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社会，毁灭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的一切痕迹，但是它打算在现在就实现这个未来的理想，它要求无产阶级“脱离政治”，放弃自己的組織，从而也放弃唯一能够使它战胜統治阶级的集中的权力手段的武器。

脱离政治的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識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因此它在国际中必然也有自己的代表。国际的任务恰恰是要向各国不同的工人党，闡明現代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

任务,从而縮短它們的必要的发展阶段。可是六十年代末期,当巴枯宁开始把这种社会主义置于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之下,并企图借助于它来夺取对伟大的工人协会的領導权的时候,这种社会主义对国际來說就是一种危險。常常有人說,巴枯宁是俄国政府的密探,但是这一点从来沒有得到证实。这种說法的根据也許是因为巴枯宁具有泛斯拉夫主义的傾向,早在革命年代他就由于这种傾向,遭到他的老朋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对。如果人們把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論完全归于他个人的功名欲望,那就未免过分了。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俄国人,在他出生的那个国家里,无产阶级的 417 阶级斗争甚至还没有经历它的最初阶段,他远离欧洲的精神生活有十年以上,1860年,当他从西伯利亚的冰牢里逃出来的时候,他还完全停留在三月革命以前的社会主义的观点上。在理論上,他通过他的无政府主义同蒲魯东和施蒂納有联系,在实践上,他同魏特林有种种接触。他把群众的貧困化的不断增长,看做是社会革命的最有效的动力,把阶级地位下降的人看做是最坚强的先鋒战士。巴枯宁企图取得他对国际的統治权,因而破坏了国际的組織,并把欧洲工人运动推回它的历史发展的早已走过的阶段,就这一点来看,說巴枯宁是个人野心和对馬克思的妒忌心作祟,也是正确的。

很明显,非政治的社会主义有一个雅諾斯^①的脑袋,一面是非常溫和的面孔,另一面是非常殘忍的面孔。一种主张脫离政治,但又要改革資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要是不走向最溫和的自助、建立宗派和空想的歧途,就势必要走向搞秘密阴谋、暗杀和暴动的歧途。同样很明显,在許多空想主义还很盛行的四十年代,这种社会主义的溫和的一面占主要地位,而在資產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間的

① 羅馬神話中守門的两面神。——譯者

自发的阶级对立已经表现得如此明显的六十年代，它的残忍的一面就占主要地位了。无政府主义者通过“行动的宣传”同公社逃亡者的最坚决的一派、即布朗基主义者发生了一定的接触。这两派在目的方面相距甚远，因为布朗基的拥护者恰恰想通过迅速的突击夺取政权，以便利用这个政权实行革命专政，但是两派在进行革命突击方面是一致的。这种实践必然给各国政府提供值得欢迎的机会，对劳动阶级进行一种反动的突击，也就是施加巨大的压力，同这种压力相比，巴枯宁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个别地或共同地所能进行的谋杀和暴动，只不过是幼稚的儿戏。

国际总委员会和它的领袖马克思，坚决反对巴枯宁的煽动，如果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很快就会战胜这种煽动。可是在巴黎公社
418 失败后的非常情况下，巴枯宁的煽动甚至在国际中占了上风。可是另一个问题是，维持正在受着内外夹攻的国际，是否会给欧洲工人运动带来得不偿失的巨大牺牲呢。马克思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决定擦去国际无产阶级为了实际行动和战斗而锻造的武器上的无政府主义之锈，然后把这个武器放在剑术馆中，以等待比较有利的时机。在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宣布了他的决定。

工人运动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大，在国际的这一次代表大会上比在从前几次代表大会表现得更为明显。根据代表出生的国家来划分，六十四名代表中有二十个法国人、十六个德国人、八个比利时人、六个英国人、三个荷兰人、三个西班牙人、两个瑞士人、两个匈牙利人、一个波兰人、一个爱尔兰人、一个丹麦人和一个科西嘉人。事实不久就表明，目前的这个总委员会拥有明显的多数，特别是德国人，还有（这次是例外）法国人也站在总委员会一边，英国代表分成两派，投了不同的票。巴枯宁主义者力图按照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理论，把总委员会贬低为一个单纯的“信箱”、“通讯和统计

局”，結果这种企图沒有得逞，总委员会在它作为协会的执行委员会的权力方面得到承认和保证。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庄严的決議，表示对巴枯宁主义者的活动不負任何責任，并把巴枯宁和他的一个助手开除出国际。

总委员会至今的大多数委員，其中包括同恩格斯一起亲自参加代表大会的馬克思，要求把总委员会迁往紐約，这件事使胜利的多数派碰到更大的困难。特别是德国代表反对这个最后被勉强通过的提案。促成这个决定的是，至今的总委员会的委員除少数例外，都拒絕再度当选，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这样，因为否則他們就不能繼續写他們的科学著作了，我們当然不应（事实上也沒有）从主观方面而应从客观方面去理解这一点。当工人阶级有实际行动的机会的时候，馬克思总是乐意中止他的科学著作活动，而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他就喜欢恢复著述工作。但是，如果总委员会当时的多数派退出，那么协会的最高领导如果留在伦敦就有落入法国布朗基主义者及其暴动策略或英国工人领袖及其“值得尊重的”倾向之手的极大危险。如果不在伦敦，那紐約就是唯一具备档案的安全和总委员会的国际成分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了。 419

毫無疑問，海牙代表大会的这些討論和決議帶有某些玩弄外交手腕的色采，当时国际的状况可以充分地說明这一点，并为这一点辯护。几年以后，恩格斯扼要地写道：“……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情况下不可能滿足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并且要继续充分进行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許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于是它暂时退出了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① 它不只是暂时而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1頁。

且是永远退出了舞台。1873年国际在日内瓦还举行了一次代表大会，但是事实表明，它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国际团结的思想在现代无产阶级中已经根深蒂固，因而它已不需要任何外部的支持，各国工人党由于七十年代的工业革命而得到独特和蓬勃的发展，使它们越出了国际的范围，正如欧洲工人运动由于五十年代的工业革命而越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范围一样。

三 最后的党派斗争

420 国际的危机对德国工人运动完全没有、或者等于没有发生影响。协会的总委员会在为反对巴枯宁而发表的一篇文件中附带地进行了相当轻率的评论，说拉萨尔派在阻碍德国工人组织几年之久以后，已经变成了警察的单纯工具，这种不公正的攻击激起《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对马克思和国际进行了同样不公正的攻击。但是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一样，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毫无关系。

色当之役以后，两派在民族问题上有了一致的看法。它们对柏林的政治制度进行了共同的斗争。在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性见解方面，它们也保持共同的水平，那就是它们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仍然是生疏的。哈赛尔曼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以“自然法的”方式阐明，工人单独创造的产品应属于工人，保险公司职员卡·奥·施拉姆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几篇值得一提的论述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文章，他用十分类似的方式断言，从马克思的价值论中产生了社会主义要求的正当性，即工人对他们所创造的价值的要求。甚至李卜克内西也认为曼彻斯特学派的历史学家布克尔是在历史科学方面的划时代的天才，正如马克思在社会科学方

面、达尔文在自然科学方面是划时代的天才一样。

当时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唯一的党的作家是狄慈根，他是爱森納赫派的最热心的理論家，可是他的才华洋溢的論文只在狭窄的哲学軌道上活动，因而不能对正在进行实际斗争的工人发生有效的影响。《人民国家报》发表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許多新旧著作——关于农民战争的論文，关于巴黎公社的宣言，内容过深，工人不易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大师很少涉及能够最清楚地說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日常实际問題。爱森納赫派的拥护者常常抱怨《人民国家报》发表的文章学术性太强和过于呆板，甚至党的委员会也劝告編輯部以《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风格为学习榜样。拉薩尔的宣传作品仍然是这一派的工人的主要精神食粮；后来，爱森納赫派的年輕一辈中的一个最能干的人卡尔·格里林伯格在回顾这一时期时写道：“从組織方面来看，我們是爱森納赫派，从原則和宣传方面来看，我們是拉薩尔派。”

毫无疑问，《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不仅在叙述的通俗方面，而且也在对經济学—社会主义問題的理解方面胜过《人民国家报》⁴²¹。当大家都在研究房荒問題的时候，哈賽尔曼为了用一組最明晰的論文說明土地問題，而联系到房荒問題，而《人民国家报》却让蒲魯东主义者米尔伯格关于这个問題发表了种种胡言乱語，这些胡說后来由恩格斯的关于住宅問題的經典論著所澄清。正是在理論問題上，爱森納赫派喜欢对拉薩尔派发出傲慢而自負的声調，可是它实在沒有理由这样做。白拉克对由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这个“拉薩尔的建議”发动的攻击，表明这个优秀的人物走上了歧途。他称拉薩尔的建議是“徒然追求陞見資格的、普魯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他根据拉薩尔的建議描繪的一幅諷刺画只存在于他的幻想之中。哈賽尔曼同他以前的施韦泽一样，始終只是在这

种意义上拥护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即在不产阶级胜利以后，这些合作社应该成为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第一个实际据点。彻底修正自己的綱領的要求，在爱森納赫派中是普遍存在的，但这种修改方式只是暴露了这一派在理論上还很模糊。土地改革、废除继承权以及在拉薩尔派中早被施韦泽摧毁的各种折衷的社会主义，在爱森納赫派的优秀人物中还很盛行，甚至白拉克也沒有抛弃把原則的共产主义暂时隐蔽起来，以迎合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的傾向。

只有在一个問題上，即在非常重要的工会問題上，爱森納赫派在理論認識方面比拉薩尔派清楚得多。1873年5月，《人民国家报》发表了許多論工会的卓越文章，这些文章今天讀来还是一种享受而且也是有益的。这些“实际的解放信号”指出，工会运动是与政治运动同样重要、同样正当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武器，但是这两种运动应该严格加以区别。这些論文清楚地論述了工会的任务，指出工会作为无产阶级阶级状况的有效杠杆，作为民主自治的学校，作为未来的社会組織的雛型，一句話，作为爭取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自觉斗争的机构所能做的一切，它的前提始終是工会运动通过另一条独立的途径，追求与政治运动相同的目标。这几篇匿名发表的論文是排字工人卡尔·希尔曼写的，同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对工会問題的探討相比，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当然在《人民国家报》上立即发出反对这些文章的声音，但是希尔曼的見解显然在爱森納赫派中占有重要地位。相反地，拉薩尔派的工会工作者的处境十分困难，如果不是柏林建筑工人以他們卓有成效的罢工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取得了重要地位，他們的处境还会更加困难。支援总联合会在严肃的罢工运动面前表现得軟弱无力，要把当地的联合会改組为柏林工人同盟的企图，沒有获得較好的成果。按行

业組成的工会，如瓦工工会和木工工会保持着实际的力量，但是空洞的反抗并没有停止。在每次代表大会上都有人发出反抗的声音，并始終要求作出取消現存的工会或至少把工会贬低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分会的決議。

在組織方面，拉薩尔派又走在前面。比較起来，它的队伍装备更好，更有战斗准备，人数也較多。拉薩尔派 1871 年、1872 年在柏林，1873 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举行的代表大会，看到他們的积极的成員已經增加到二万人，而 1871 年在德累斯頓，1872 年在美因茲，1873 年在爱森納赫举行代表大会的爱森納赫派只有将近一万名党员。当然拉薩尔派的組織也有其危險的一面。这个組織是同独裁领导相适应的，如果主席是像哈森克莱維尔这样一个在好坏事情上都缺乏独裁者的才能的人，这个組織就必然要发生爭夺权势的恶劣竞争。协助哈森克莱維尔工作的有联合会机关报編輯哈賽尔曼，杜塞尔多夫制帽工人、書記德魯西和會計格呂威尔，这些工作人員每年由代表大会选举，主席由全体會員直接选举。哈賽尔曼在联合会机关报中怀着妒忌的心理不让任何作家同自己竞争，联合会的精神生活虽然沒有宗派性，但是仍帶有宗派色彩。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如格罗特考、卡佩尔兄弟，尤其是回到伊塞隆的特耳克，在哈森克莱維尔领导下比在施韦泽领导下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如果党的领导有一套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可以分別工作，那无疑是一种进步；由于他們缺少这种合法的活动場所，因而他們像仇敌似的自相冲突。拉薩尔派对自己的組織的崇拜，有它一定的理由，不过这种崇拜太过分了；它的最頑固的代表人物是特耳克，他本人虽然在外省，但是他觉得柏林的领导仍然不够集中。

1871 年以后，爱森納赫派的委员会設于汉堡，盖布和約克在那

里担任领导，监察委员会于1871年迁到柏林，1872年迁到布勒斯劳，1873年迁到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爱森纳赫派的组织远比拉萨尔派的组织松弛，会员缴纳会费不太踊跃，而且也不多；同拉萨尔派的财政日见充裕的情况是个鲜明对比，爱森纳赫派始终处于负债的困境。爱森纳赫派的组织尽管有许多显著的缺点，但也有它的优点。党的各个领导机构之间的不可避免的摩擦一向都能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对这一点给予再高的评价也确是不为过分的。

特别是爱森纳赫派所掌握的书籍和报刊机构比拉萨尔派多。早在1871年，除了《格里米乔市民和农民之友》以外，还创办了《德累斯顿人民使者》、《开姆尼茨自由新闻》、《不伦瑞克人民之友》这些地方党报，不久又在纽伦堡—菲尔特出版《民主周刊》，1873年这家报刊成了党的财产。接着在霍夫、格腊、爱森纳赫、美因兹、慕尼黑（在慕尼黑出版的《无产者》这时已停刊）等地，出现了几乎过多的新的地方报纸。筹划中的著作股份公司变成了莱比锡的合作印刷厂，这个印刷厂除了《人民国家报》以外还出版日益增多的小册子。白拉克除出版《不伦瑞克人民之友》外还出版了许多党的书籍。

对爱森纳赫派说来，“知识分子”并不象拉萨尔派所说的那样有害。只是在纽伦堡—菲尔特，平素很有才能的作家梅明格尔和摩克之间的一次不愉快的争吵，对法兰克尼亚的运动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后来在清除了这两个捣乱分子以后，这个运动在工人格里林伯格、加布里埃尔·勒文施坦、舍尔姆、佛尔来因的正确领导下，便蓬勃发展起来。伯恩哈特·貝克尔参加爱森纳赫派，无疑也是一个有价值的成果。他主持《不伦瑞克人民之友》的编辑工作，写了一些论拉萨尔的宣传鼓动和死前一段时期的活动情况的充满怨

恨的文章，这就加深了对拉薩尔派的敌視。但是爱森納赫派的青年作家也表现出一些优点，他們是布勒斯劳的布魯諾·盖泽尔和麦克斯·奈泽尔，汉堡的約翰奈斯·韦德，还有来自南德人民党的，不久就同赫普納尔一起編《人民国家报》的威廉·布洛斯，而这时李卜克内西正被囚禁在要塞里。在遙远的科尼斯堡，候补法官科科斯基出版了一个周刊，叫《民主报》，当然沒有能够維持很久，后来科科斯基轉到《不伦瑞克人民之友》工作。

在爱森納赫派那里，工人們也远比在拉薩尔派热心地参加各种小册子的著述工作和报刊工作，而拉薩尔派主要是进行口头宣传。历史发展必然使得七十年代的工人运动不能产生四十年代曾經产生过的理論家，在四十年代，共产主义者同盟关切而有見識地同德国哲学家和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学派一起斗争。狄慈根是一个佼佼者，他令人想起魏特林、埃卡留斯、普芬德来。新的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承担了許多实际任务，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家暂时完成了理論工作。普及他們的研究成果，同資产階級經濟学家进行日常斗争，当然是在爱森納赫派中做文字工作的工人的起碼的任务，但也是有益的、卓有成效地加以解决的任务。排字工人弗兰茨达到了他的目的，1870年他曾經得到党内同志的同意，逃避了巴伐利亚政府对他（《无产者》的編輯）进行叛国案审判，到了苏黎世。德国的自由貿易論者維克多·伯梅尔特在那里当了大学教授，因为他是該学派的比較有見識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責任，用苏黎世州的官方統計证明自由貿易論者恩賜的“永恒的自然規律”（根据这条規律，随着資本的积累，小資产階級和无产階級的幸福也会同时增长），并认为自己有責任立即消除社会主义。弗兰茨在一本有点粗野、但內容精辟的著作中证明，政府聘任的統計学教师由自己提出的数字中看出同实际所写的相反的东西。

西。由于为人正直早就是拉薩尔的宣誓证人的德国最著名的統計学家恩斯特·恩格尔，这时在普魯士王国統計局的杂志上承认，伯梅尔特遭到弗兰茨的严重打击；他說，弗兰茨无可爭辯地指出，中等階級减少，而无产階級增加的现象，而且無論从絕對意义上說或从相对意义上說，都是这样，甚至在一个自由的共和国，在田园式的瑞士，“資本发瘋似地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的手里”，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社会民主党这两个派別之間的差异的根源是它們的历史发展不同。拉薩尔派是一个較老的派別，它的战斗經驗比爱森納赫派多六年。当爱森納赫派开始战斗时，最有利的陣地已經控制在拉薩尔派手中。拉薩尔派在新帝国的唯一大邦中占有很大的优势。他們掌握了帝国首都，并由首都出发占据了新皇帝的祖国勃兰登堡馬尔克。他們控制了从布勒斯劳到施泰廷的奧得河道。他們的旗帜飄揚在古老而有势力的汉堡和沿海的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上空，飄揚在現代工商业正在蓬勃发展的古老的汉撒同盟城市不来梅、卢卑克和汉諾威的上空。在西部，他們占有爱北斐特—巴門和貝尔格—馬尔克工业区，在西南部，他們占有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美因部。与此相反，爱森納赫派虽然也控制了古老的德国文化的先进地区，可是自从十九世紀初期起，薩克森王国在政治上已經成为民族发展的落后地区，尤其是它的大城市也受到巨大影响，只有萊比錫是唯一的例外。在首都德累斯頓，博伊斯特的长期統治严重地妨害社会生活，工业城市开姆尼茨由于它的沒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戶的精神迟鈍而得到不好的名声。《人民国家报》有一次也直率地指出，在德国沒有一个城市在同薩克森的曼彻斯特^①

① 开姆尼茨（現名卡尔·馬克思城），因紡織工业发达，有薩克森的曼彻斯特之称。——譯者

一样的条件下，文化水平也像它这样低的。此外，爱森納赫派的主要陣地扩展到德国中部小工业区的遭受资本主义剝削的家庭工业⁴²⁶里，扩展到南德中等邦的像島屿一样从手工业的大海中突出来的工业区。在爱森納赫派中明显地流露出組織同乡小集团的願望，就是由上述情况决定的。如果这一派的报纸有时过分热中于地方分权，那可能是他們为了掩飾当时的困难处境，而不是忽略了中央集权的优点。

从这里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两派的差别主要表明它們需要相輔相成，而不需要互相攻击。拉薩尔派的任何一点特殊长处都使人想到爱森納赫派的一点特殊的短处，反之也是一样。在罢工时的互相支持、在工会中的共同工作、为反对共同敌人而进行的实际斗争，都使得两派的成員在許多地方結合起来。在維尔騰堡（当然拉薩尔派只是在維尔騰堡的首府有一块巩固的根据地），甚至达到了完全一致。1873年起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卡尔·希尔曼主編的《南德人民报》，就是拉薩尔派和爱森納赫派合办的。可是在实践中紡成的和解之綫，往往在不可避免的势力范围冲突中重被扯断。1872年夏天，当弗罗默和汉堡的鞋匠哈特曼开始在南德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的时候，爱森納赫派特别感到不愉快。因此只有通过正式途徑才有真正和解的可能，而这方面的情况却是很特殊的。

拉薩尔派有点像家里的长子，次子必須順从他。对于两派的联合問題，他們采取观望态度，可是只要他們对这个問題发表意見，至少都是經過一番仔細考虑的。他們认为爱森納赫派的組織不切实际和他們的“半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要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些看法可能有夸大的成份，也可能是完全不正确的，可是他們还允許对这些观点进行討論，加以澄清。相反地，爱森納赫派在宣揚和平方面非常热心，而在建立和平方面則十分笨拙。他

們主要責難拉薩尔派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追隨普魯士政府，这样一
来，当然任何实际談判一开始就会擱淺。爱森納赫派的报刊甚至
427 认为拉薩尔是个杰出詩人，但却是个蹩脚的政治家。在《人民国
家报》上，甚至出現过这样恶毒的話：要是拉薩尔不自动去，俾斯
麦也一定会找到他。

所有这些臆測的唯一证明，就是断言拉薩尔派几乎不受警察
和国家检察机关的干扰，而爱森納赫派却不免要受殘酷的迫害。这
种論断的正确性不是沒有問題的。拉薩尔派在什列斯維希—霍尔
斯坦同爱森納赫派在薩克森一样受到压制。在南德进行宣传鼓动
的所謂的“警探”弗罗默，却會因此而屢次被控告，像一个普通罪
犯一样（有时同普通罪犯拘押在一起），从他的居住地不来梅由一
个監獄轉到另一个監獄。虽然他的腿受了重伤，但仍必須戴着手
銬脚镣走过据說他在那里犯了“叛国”罪的从奧登瓦尔特山麓的
本斯海姆到洛尔施的道路。最后，由于对他的起訴毫无根据，他被
从待审拘留中释放出来，这一切对于一个“警探”来說，倒是极奇
特的遭遇。《人民国家报》受到被控訴违犯出版令的压迫比《新社
会民主党人报》更为严重，这是事实，可是这是一种暫時現象，也同
《民主周刊》当时在萊比錫享有較多的出版自由那样，并不說明任
何問題。至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會自夸說，它比《人民国家报》
更懂得避开反动的出版法和反动刑法的圈套，这也并不是沒有根
据的。

可是爱森納赫派的沒有希望的和解策略找到了一个口实，因
为拉薩尔派給这种策略以一种合理的外貌。特耳克想向 1872 年
的代表大会提出一个取消拉薩尔派的一切工会的議案。可是哈賽
尔曼拒絕在联合会机关报上发表这个議案的全文，由于出版委員
会同意哈賽尔曼的意見，使特耳克极不愉快。毫無疑問，出版委員

会这样做是有其实际理由的；在罢工运动高涨时期，在工人群众中散布不和，是完全沒有益处的。这时特耳克正在为拉薩尔的純洁的不可侵犯的組織而努力，他感到在駁回的批示后面，隱藏着施韦泽的阴谋。1872年5月3日他在汉諾威举行的理事会會議上，指責哈賽尔曼同施韦泽狼狽为奸，他說，施韦泽为普魯士政府效劳，主张成立工会，以便通过分散工人运动的力量来破坏工人运动；施韦泽同柏林警察总署有联系，并向这个机关报告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特耳克談到他担任联合会副主席时期的情况，他說：“施韦泽在服刑前不久对我說，一旦发生情况，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找警察总署。施韦泽同我一起到那儿去，并且給我作了介紹，同时表现出他对那些房間都十分熟悉。”特耳克接着說，施韦泽曾經为自己的私事挪用过會員繳納的会費，并且曾从支援总联合会的金庫中拿出五百塔勒存到自己存款的銀行里去。

428

这些揭发給听众的第一个印象是发出很自然的呼声：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知道这一切，但却始終拥护施韦泽，那你就是一個比施韦泽更坏得多的叛徒。这个結論是不可避免的。要末事情像特耳克所說那样，那么他从1868年秋天以来就起了同施韦泽同样可耻的、或者更可耻的作用，要末特耳克由于热狂地崇拜組織而想入非非，以便表示他所不理解的对严格恢复拉薩尔組織的反抗。今天一切有关情况已經昭然若揭了，毫無疑問，第二种情况是存在的。特耳克是一个正直人，他相信自己的想法；他本人在这里起了最坏作用这一点，在道德上是沒有責任的，可是这些想法的毫無根据，就更加暴露无遺了。說施韦泽搞工会运动是为普魯士政府效劳的推測，根本不值一駁，如果人們回想一下把特耳克叫到柏林来的时候施韦泽的情况，那么对警察总署的訪問也就不会使人感到气憤。当时全德工人联合会在萊比錫剛被禁止，而在柏

林又差不多无形恢复起来了；施韦泽始终重视维持联合会的正式组织，他为了确定警察机关是否承认特耳克的代理资格，而同特耳克一起到警察总署去，那他并没有做出比一年后白拉克所做的更坏的事。白拉克为了了解迁移到不伦瑞克来的爱森纳赫派执行委员会会不会受到警察机关的刁难，也曾到不伦瑞克警察局去过。倘若施韦泽为了在自己服刑期间让工人运动掌握在叛徒的手中，而从百里之外把自己的可能是最能干的追随者叫来，让他代替自己的职务，并派他为警察总署的密告人，那施韦泽不但是个恶棍，而且也是个傻瓜。假如事情果真像特耳克五年以后所想像的那样，那么老街垒战士特耳克当时一定会马上就大吵大嚷起来。

关于施韦泽的所谓侵吞公款事件，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也就不言而喻了。他的确从支援总联合会金库中取出五百塔勒存到他存款的银行里去，可是他存款的银行也就是联合会存款的银行，联合会的收入只要超过一定的数额就要存到银行里去。施韦泽只在手续上犯了错误，他在存款时，没有按照会章的规定，找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一同办理。全德工人联合会和支援总联合会的司库如不同他合谋，施韦泽根本就不可能侵吞公款。况且由于考虑到爱森纳赫派对施韦泽的指责，1870年和1871年的代表大会曾经仔细检查过账目，并通过一致的决议，承认账目完全没有问题。

在这些争论的过程中，施韦泽被加上了这样的罪名：虽然没有非法地盗窃联合会金库，但利用他独裁的全权合法地挪用公款。不过施韦泽为联合会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没有报酬的，直到1869年人们才未经他本人同意每月发给他四十五塔勒的薪金，而他自己把这笔薪金降低为二十五塔勒，而且起初根本没有领取。后来领这笔薪金，也只是在他担任主席的最后一年的事，正如他为1869

年11月和12月的最后一次长途旅行，也領了普通的宣传鼓动出差費一样。所謂被他侵吞的其他几千塔勒，也都用于联合会的机关报方面，这笔款不会超过《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其存在的六年多期間所支付的訴訟費用和罰金。《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的头几年，它的亏空是用霍弗斯特騰的錢来弥补的；这笔錢用完以后，就靠联合会金庫的补助，直到施韦泽由于父亲去世而得到一些遺產为止。然后施韦泽就自己弥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亏空，直到党接收了这家报纸和它的部分債務。名义上是施韦泽，实际上是联合会机关报用这种方式拿到的款子，主要是1868年的代表大会批准的一千塔勒和1871年的代表大会批准的一千塔勒。此外还有普法战争期間柏林会员为党报募集的几百塔勒的捐款。施韦泽的对手說总数是二千五百塔勒。即使这笔錢果真是这样多，或者差不多这样多，始終也是用于党的一个即使不說是最重要的，也是相当重要的目的，这些化費收到了巨大的益处，并且光荣地载入党的史册；《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六十年代是无产阶级的模范的机关报，正如《新莱茵报》在革命年代、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八十年代是无产阶级的模范机关报一样。

第三种說法是，施韦泽沒有使联合会金庫受到損失，反而用政府的秘密基金充实了金庫，同时自己也从秘密基金中得到过豪华生活的費用。但是，1870年和1871年的代表大会經過仔細检查以后一致声明，沒有任何一个分尼是非法地拿到联合会金庫里去的，关于施韦泽生活豪华的說法，也只是在他继承了父亲的遺產以后才有的，在这以前，他过着非常簡朴的生活，在退出运动以后，他就只有靠写舞台剧本的收入来过清苦的生活。

这些細节說得比較瑣碎，这是因为这些事情曾在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发生过很大的作用，因为一个人的荣誉是同它們有关的。

它們对于施韦泽有无过失的这一历史問題，是沒有任何意义的。这个問題轉化为其他两个問題：施韦泽有沒有执行坚决而經過深思熟虑的政策？这种政策不管在个别問題上存在多少缺点，总的說
431 来，它是从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从政府的利益出发的。一个由无产阶级中的最有力量、最先进的阶层进行的蓬勃发展的运动，能不能长时期受一个警察密探的欺騙呢？历史事实会給这两个問題做出答案的。

理事会會議的爭論，在1872年5月于柏林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繼續进行。会上又猛烈地指責了特耳克。有一个代表提議把他开除出会，如果一切情况像特耳克所說的那樣，这个提案就是完全合理的。可是这样一来，联合会也就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这时对严格的中央集权的崇拜，表现出它有害的一面。假如是在爱森納赫派那里，这种冲突定会得到解决，得出最后結論，不管这些結論的性质怎样，而在拉薩尔派那里，联合会的利益起了决定作用。在討論期間，人們曾要求出席旁听的施韦泽退出會議厅，因为他不是联合会會員。随后把这件事交給一个委员会去調查，这个委员会作出决定說，根据一些重大的但是未能得到完全肯定的事实证明，不能信任施韦泽，相反地哈賽尔曼的一切嫌疑都洗刷干淨了，过去特耳克也不能采取別的行为，因为他当时沒有充分的证据。他們两人取得了諒解，于是开除特耳克的提案也就被撤銷了。代表大会應該對他們两人表示信任。委员会的这一决定，除一个委員外，其他委員都表示贊成，接着代表大会还作了一个決議說，不能再接受施韦泽加入全德工人联合会。表决时，有五千五百九十五票贊成，一千一百七十七票反对，一千二百十九票弃权。

当这些事件通过代表大会的記錄为人所知的时候，爱森納赫派当然对此感到十分兴奋。《人民国家报》不仅說，我們指責施韦

泽的一切，都得到了证实，而且也像許多拉薩尔分子那样說：如果施韦泽有过失，那么哈森克萊維尔、哈賽尔曼和特耳克也会有过失。爱森納赫派尤其激烈地反对特耳克，这件事不能归咎于他們，因为特耳克在1869年指責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是虛伪的家伙，而根据他現在的說法，当时他已經知道施韦泽同普魯士警察有秘密关系。拉薩尔派認識自己的严重缺点为时已經太迟了，現在他們432
企图糾正这个缺点。《新社会民主党人报》說，在給施韦泽下判决时，問題不在于他同普魯士政府有关系，而在于“一些別的事情”，因为人們拿不出他同普魯士政府有关系的证据，甚至也沒有对他提出指責。的确，人們不能证明他有这种关系，但是确实对他进行过指責。所謂“一些別的事情”，原来是魯道夫·迈耶尔为了写一部工人运动史而从施韦泽那里要来的一些关于全德工人联合会历史的普通筆記。施韦泽本人偶尔也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談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他对一个保守党的、但有独立見解并对工人运动抱有同情的作家，在文学方面表示了一点好感，只是由于《新社会民主党人报》把迈耶尔給施韦泽的筆記所加的表现形式記在施韦泽的賬上，这件事才被夸大成为“背叛”。

于是两派的和解嘗試遭到彻底破坏。但是《人民国家报》繼續进行这种嘗試，它迫切要求拉薩尔派在抛弃施韦泽以后，也必須把同施韦泽一伙的人免职，《人民国家报》的这些努力只能得到同它的預期相反的结果。布勒斯劳的监察委员会在刊登在《人民国家报》的显著地位上的明确的指示，結束了这种合并的策略，监察委员会正确地指出，合并的策略不但不能阻止分裂，反而会使分裂更加扩大。

这时，资产階級报纸也接二连三地刊登了施韦泽受到拉薩尔派指責的消息，施韦泽在情緒激动的情况下，給这些报纸写信說，

这些“忘恩和愚蠢”的现象在这些人身上是不足为怪的，“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受一种新思想的鼓舞力量的推动，而绝大多数人则是出于对较高社会阶级的妒忌心或其他不光采的动机”，况且他们都是鼠目寸光。这是施韦泽为了自己也不应该说的一句很不漂亮的话，但这并不是他的结论。当汉堡的全权代表布罗伊尔由于认为对施韦泽不公平而带着几百个会员脱离联合会的时候，施韦泽
433 拒绝担任他们的领导，以免为他个人而给工人运动造成障碍。他没有制造新的分裂，而是在一份《致德国工人》的传单中极力鼓吹两派统一。他为他受到的侮辱巧妙地说了下面几句话：“如果我沒有过错，那么代表大会对我的态度就是卑鄙的不公正的。如果我有过错，那么代表大会给全德工人联合会做了一件卑鄙的不公正的事，因为它让这样的人担任党的领导，这些人在我的周围有几年之久，了解我的一举一动，在我的任何职务行为中，他们都是执行者，因此他们都是我的同犯。”接着施韦泽通过回忆他最活跃的时期，透彻地论证了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统一，如果领袖们愿意，就同他们合作，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就抛弃他们，如果他们反对，就反对他们。”人们读了这些已经变黄的传单不能不受到感动，这是一个人的朴实而聪明的告别词，这个人在最困难的时期用可靠的手掌过社会民主党的舵，给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作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他受他的卓越行动的后果的束缚，做过一些错事，也忍受过更严重的不公正的待遇。过了不到三年，即1875年7月，施韦泽就在瑞士逝世。

他的传单没有产生实际效果，甚至“布罗伊尔一伙”还作为没有影响的分裂主义集团继续存在。1873年，两大派之间的争论继续进行，其形式几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激烈。同年春天，宗纳曼对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次小骚动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说，这次骚

动是拉薩尔派根据普魯士政府的命令挑起来的，其目的是要破坏一切市民道德、人类友誼和民主政治这块坚固的岩石，即法兰克福的交易所民主。这时，《人民国家报》对宗納曼的解释表示贊同，而特耳克却发表了一个小册子，企图证明哈茨費尔特伯爵夫人、李卜克内西和施韦泽始終是隱蔽的同盟者，他們打算通过公开的佯战毁灭工人运动。看来这两派之中的任何一派都要想方设法使任何一方在即将取得和解的那一天都不能給对方提出任何責难。

四 特森多尔夫时期

1874年1月10日举行的帝国議会改选，向各界揭露了这一事实⁴³⁴：俾斯麦在短短三年之中，以无比的浅見攪乱了极其有利的局面。过去他犯了罪，現在受到应得的懲罰。对他的专制的任何反抗，都被他的雇佣文人指責为“敌視帝国”，这次选举的結果是，不算进步党的五十万票（根据俾斯麦的計算，其中有一半應該算做“亲帝国的”，另一半應該算做“反帝国的”），还有二百四十万八千五百四十九张绝对“亲帝国的”票，二百三十三万九千九百三十六张绝对“反帝国的”票。因此“帝国的朋友”只有七万四千六百十三票的微弱多数。事实上，如果人們考虑到，好几十万“亲帝国的”票是用人所共知的选举手段榨出来的，那这个多数就是一个严重的少数了。

当然，議席的分配比所投票数的比例对俾斯麦更有利。民族自由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各得整整一百五十万票，但是前者約得一百五十个議席，后者約得一百个議席。社会民主党人在这一方面最为不利。他們得了三十五万一千六百七十票，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六），其中拉薩尔派得十八万零三百

十九票，爱森納赫派得十七万一千三百五十一票。可是拉薩尔派在第一次选举中只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两个选区——阿尔托那（哈森克萊維尔）和普勒恩—塞格貝克（萊麦尔）——取得胜利，爱森納赫派只在薩克森王国的六个选区，即弗賴貝克（盖布）、米特魏达（瓦尔特希）、开姆尼茨（莫斯特）、格劳豪—梅朗内（倍倍尔）、茨維考—格里米乔（莫特勒）和斯托貝克—施内貝克（李卜克内西）取得了胜利。进入复选时还有十一个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他们分布在：柏林第六区和西哈費耳地区，汉堡第一区和第二区，伊策霍和基尔，德累斯頓旧城、萊比錫郊区和波尔那，罗伊斯（长系）侯国和爱北斐特—巴門。这十一个人中只哈賽尔曼在爱北斐特—巴門和約翰·雅科比在萊比錫郊区获得胜利。可是由于雅科比放弃当选，因而在补选中又丧失了他的选区。雅科比在萊比錫叛国案后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加入了爱森納赫派，可是实际上他又不願参加活动，因为他不能承认新帝国的产生是合法的。后来《人民国家报》对雅科比十分尊敬地回答說，正如普魯士宪法和雅科比长期参加的普魯士邦議會是合法的一样，新帝国也是合法的，如果雅科比站在这个立場上，那他就不要在一个有希望当选的选区当候选人。这些話同六年前对雅科比的不协调的抗議政策寄予莫大希望的《民主周刊》的話是多么不同啊！

尽管所得的九个議席为数很少，可是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人对于他們的努力成果已經十分滿意了。在薩克森王国、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在汉撒同盟城市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所投票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为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所得；在北德和中德的小邦中，尤其是在不伦瑞克和图林根地区，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所得票数最为可观；在普魯士各省中，只有波森一省还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在东普魯士他們已經有三千二百六十二票，在波美拉尼亚

有四千九百十八票。柏林的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九票还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数字，可是从哈森克莱维尔在进步党的堡垒机器制造工人区同舒尔采—德里奇一起进入复选，以及资产阶级对未来事件的朕兆惊惶失措中，这种轻微的失望得到补偿。在教皇全权主义的三个主要根据地，即莱茵—威斯特伐里亚、西里西亚和巴伐利亚，进展较慢。可是在巴伐利亚，新教的法兰克尼亚以一万一千零二十九票成为光荣的例外。在维尔滕堡还没有开辟完全明确的道路；在不少选区，社会民主党一开始就同人民党合作，在斯图加特，爱森納赫派和拉薩尔派之间的不和由于选举又一次爆发出来。拉薩尔派得了一千九百七十七票，爱森納赫派得了四百三十四票，在整个维尔滕堡邦社会民主党共得八千九百五十四张选票。在巴登，从曼海姆出发为拉薩尔派进行鼓动的是德雷斯巴赫，为爱森納赫派进行宣传的是室内装饰工埃哈尔特；两派共得三千五百十六票。在普法战争以来，开始在凯撒斯劳滕，尤其在前普法尔茨建立了大工业的莱茵巴伐利亚，无产阶级还缺乏必要的锻炼。当小城拉姆布莱希特的赤贫的织工在市区选举中突然决定把所有厂主从市议会中赶出去的时候，新的无产阶级市区参议会又被轻而易举地取消 436 了，因为他们斗不过他们的剥削者的阴谋和诡计。

社会民主党的两派互不联系地进入了选举战。从表面上看，这样做对它们是有利的，因为如果它们一开始就共同作战，那它们也许可以多得几个议席。事实上对它们是有利的，因为两派所得的票数差不多相同，这对双方的过分激动能起镇定作用。拉薩尔派看到，爱森納赫派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尾巴，爱森納赫派认为，所谓拉薩尔派同政府友好的说法是无稽之谈。拉薩尔派在竞选中的政治态度是无可责难的。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当他们在复选中要在拉斯克尔和宗納曼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他们不顾

一切地选举了他們的老对头宗納曼。两派在自己的复选中互相支持，事实上两派统一的日期是1874年1月10日。外部的逼迫提供了完全合并的最后动力，可是它不是最初促使合并的思想。无产阶级的团结，是无产阶级的绝对有效的、但也是唯一的武器，这种团结有一种自发的不可抵抗的力量。当这种力量对自己的目标还不明确，当它本身似乎受到威胁的时候，它是能起破坏作用的。各党派之间发生极激烈的斗争、整个一生都表现为同样忠实的工人阶级先锋战士的人们的互相指责以及施韦泽的悲惨命运，原因正在于此。但是，当无产阶级的团结看清了前途的时候，它就用不可抗拒的力量闯了进来，就像一条必须起着泡沫和漩涡从河底的岩石间挤过的流水一样，平静地流入又深又宽的河床。资产阶级人士当然不能理解这种现象，否则近几十年来他们就不会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内部可能发生分裂的时间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选举以后，帝国议会立即召开，这时社会民主党议员私人之间也比较接近了。新议长福尔肯贝格也许比他的前任西姆桑更有偏见，班贝尔格尔竟然敢于要求工人阶级的议会代表讲究礼貌，以免成为引起主人不高兴的客人。当然资产阶级多数派也拒绝要求把
437 还被拘在胡贝尔图斯堡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议会开会期间放出来。于是七个社会民主党议员只有依靠自己的紧密团结。起初，他们还有一些意见分歧，可是这些分歧已经根据党内同志的精神得到了解决，同时他们还表明，两派的旧的敌对集团已经开始发生变化。现在，拉萨尔派对新军事法案提出了1867年李卜克内西想提出的建立国民军的示威性议案。当莫特勒承认帝国是民族共同体的时候，哈赛尔曼表示反对说，没有德意志—奥地利人参加，新帝国就不是民族共同体，社会民主党应该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德国，这个国家当然只能是一种自由联合。在一切实际政策问题上，两

派都肩并肩地站着。他們同样坚决拒绝对天主教会实行軍事警察政策，同样尖銳地鞭責沙文主义多数派对第一次进入帝国議会的亚尔薩斯—洛林議員的可恶举动。

俾斯麦馬上又給新帝国議會带来两个在上届帝国議會中他就在这上面碰过壁的、反对无产階級的非常法，即破坏契約法和出版法第二十条，不过后者这次是以比較緩和的形式提出的。这次他还是沒有成功。在一讀以后，哈赛尔曼就指責破坏契約法是“对工人階級的宣战”，以后这个法案轉交委员会审查，而且自由派各党暂时还不贊成出版法第二十条。此外，他們当然贊成按照俾斯麦的命令拟定的出版法，这个法是旧普魯士出版法的翻版，它对普魯士本国还有一点进步作用，而对許多中小邦來說，却是一个巨大的退步。在这一突变中，受俾斯麦的资本主义利潤所誘惑的普魯士自由派是主要罪人。他們圍繞着取消保证金和印花稅問題，討論了自由报刊的政治理想。如果可能的話，进步党在保护利潤的同时，当然也要保护节操，可是，当它对民族自由党的背叛发出第一个可怕的破門令，并表示对这一畸形的出版法不負任何責任的时候，拉斯克尔便冷冷地对进步党人說：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們进步党人坚定地揮舞着原則的旗帜，我們民族自由党人处理資產階級的实际事务，一般說来这样做可能是有益的，但是你們这次对空話作了过分的夸张，既然我們不應該同你們一起反对出版法，你們就必须同我們一起贊成出版法。在这次友好的冲突中，进步党人放弃了节操，只保护了利潤。落进自由派報紙老板的腰包里的錢虽然很可观，但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的生意很不景气。至少有一个資產階級政論家看透了這個买卖：古伊多·魏斯在《天平》上正确地預言，如果对报刊的政治压力仍然存在，只是維持它存在的物质条件有所改善，那它就会比过去更多地接受产业性质，它的主张就越

来越适应于市場規律。今天悲叹沒有立場的商业報紙相互竞争的資產階級自由思想派，是自食惡果了。

比出版法还要重要的，是帝国議會将于 1874 年春天討論的軍事法令。它接触到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切身問題，在普魯士冲突时期，這個問題沒有得到解决，而是被自上而下的革命所推迟了。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和普法战争提供了很好的机会，通过贊成多年的預算，对議會是否每年必須同意軍事預算這個問題推迟答复。可是現在尖起嘴已經沒有用处，只有吹口哨了。政府提出的軍事法令草案第一条要求，永远在法律上确定德国軍隊的平时定員为四十万一千六百五十九人。按照即使最軟弱的自由派在 1867 年也會表达过的观点，这就是宣布实行“赤裸裸的专制制度”。如果帝国議會放弃它本来不多的几項权力中最有效的一項，那么虛假立宪政治就死亡了。

1874 年春天，自由派資產階級为了反击俾斯麦对它热中的立宪政治的謀害，既不需要远見，也不需要多大勇气。进步党人和民族自由党人加在一起已經形成了微弱的多数派，因为他們在維護議會的批准預算权中，得到所有“帝国敌人”的支持，所以他們支配
439 着强大的多数派。可是俾斯麦对这些人了解得很透彻，有一次他用刻薄的輕蔑态度，对他們随口說了这样的话：他們根本不知道，假如 1867 年他們能够坚持到底，就可以从他手里夺得許多东西。現在他以同样輕蔑的态度对民族自由党人說，他們是“以他的名义当选的”，因此必須干脆服从。这个威胁和俾斯麦让他的雇佣文人掀起的喧嚣的愤怒风暴也足以打倒許多民族自由党人。民族自由党的領袖卡尼格先还做了一件多余的事情，这位民族联盟的前领导人对自己較好的过去进行了嘲弄，他說，1848 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像反对帝国議會批准預算权的半官方騷动这样原始的运动深入

人民群众。在拉斯克尔领导下的其余的少数民族自由党人，虽然企图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当他派人去問进步党，可否指望这个后备队的时候，传来了令人惊异的消息，这些“不屈不挠的人们”^①也正紛紛潰逃。于是俾斯麦得到了七年時間，在法律上确定了为期七年的平时兵員，这甚至比长期确定兵員更符合他的心願。因为，如果議會完全无权批准軍事預算，睨視他的宮和职位的宮廷党和軍人党，就能比較容易把他攆下台，而議会的預算批准权由于一下子放弃了七年，就已經受到了不可挽救的打击。俾斯麦不得不稍稍提前依靠“全民投票”，但是他也看到，波拿巴主义的这一剂最后的救命药，在純朴的德国人身上比在变化无常的法国人身上所起的功效大得多。此后他在自己的外交药房中留給这种药以光荣的地位。

在所有这些問題上，社会民主党議員都坚持斗争，毫不退縮。有人說，他們經常只做“社会民主党的演說”，这也不是事实。他們不追求議會雄辯的可疑的荣誉，他們簡單明白、实事求是地論述了他們所要討論的問題。只有哈賽尔曼的演說有时带着比較严重的鼓动形式，此外，他的演說也是值得贊揚的。敌人的憎恨也使两派变得沒有什么区别；他們用笔和棍棒攻击了爱森納赫派，也攻击了拉薩尔派。

自从选举以来，从“世俗人”的办公桌上到庸人的啤酒桌上，都 440 出現赤色幽灵。可是无論是“世俗人”还是庸人都超不出痴呆的怯懦和痴呆的怨恨，虽然他們并不缺少明智的忠告。根据自由貿易派論工人运动的肤浅拙劣的著作，农业社会主义派和讲坛社会主义派已經接近了它們的历史理解，1874年出版的几本著作，頗为尖銳地向統治階級指出，它們的自杀的欺騙政策的結果。

^① 对进步党人的一种諷刺称呼，下文中也常出現。——譯者

阿尔伯特·朗格論工人問題的一部篇幅不大的书（第三版），是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一种。許多情况促使朗格又接近資產階級世界观。1872年，当他应馬尔堡大学之聘的时候，他已經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了。在瑞士，他用剩下的一点力量領導小資產階級和小农民主派，进行了光荣的斗争。此外，布伦坦諾論英国工会的著作对他也不是沒有影响的。朗格說，布伦坦諾的“重要著作”动摇了馬克思的“极端的見解”，馬克思认为，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相比，有力的工会組織和有效的工厂立法，都是无关紧要的。朗格虽然不再专门对工人說話，但他并不因此就不是工人階級的忠实的老朋友。他始終把“工人由他們对企业主的不体面的从属关系中真正地彻底地解放出来”当作所有严肃的社会改革中的最高目标，他尖锐地諷刺了讲坛社会主义的变节分子阿道夫·瓦格納，他說，誰在专门的小册子中引用富兰克林的話来证明工人只有通过勤劳和节儉才能改善自己的命运，这个人就一文不值。朗格虽然尊重布伦坦諾的著作，但是他也說，我們是否还把时常被資本的力量突破和击退的工人的一切辛劳成就不只看做是彻底改革各种关系（这种改革也牵涉到国家制度和占有形式）的准备工作，这至少是值得怀疑的。这样朗格就同馬克思的观点接近了，馬克思从沒有說工会組織和工厂立法是不重要的，但他經常只把它們看作是“彻底改
441 革的准备工作”。但是，从实质上看，朗格在他的著作的第三版上是对資產階級讀者說話，而在第一版上則是向无產階級讀者說話。他揭穿了怀有偏見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欺騙，用明显的理由——总的說来还与自己的名称相适应的資產階級文化不可能有一个較忠实的領袖——反对有教養的庸人的成見。

1874年春天，作为資產階級陣营中的警鐘而出版的另一部著作——謝夫萊的《社会主义精义》的价值就低得多。謝夫萊在政

治上是一个糊塗虫，从前是士瓦本的仇視普魯士的分立主义—民主主义者，后来在奥地利的封建內閣中任商业大臣，最后是俾斯麦的慈善社会主义的阿基利阿^①，他从来没有理解朗格充分理解的工人运动的历史权利。他把科学共产主义理解为一种要在资本主义价值概念的基础上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空想的学說，因而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誤解。但是他的真正貢獻而且在1874年可以算做真正功績的是公开反对“口号、虛伪、激情、成見、自我欺騙和告密”的恶劣影响，資产階級以为自己用这些东西可以压倒社会主义者的所謂“分配者”。謝夫萊說，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一个不能实现还大成問題的目标，但是他指出，如果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是可能的，那么它比资本主义私人經營，比“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不知要优越多少倍。他的論证也像朗格的論证一样，不是对資产階級意識形态完全没有发生影响。但是在这种影响扩大和加深以前，新帝国的使者和預言家就为了再一次迷惑爱国者，而鳴鑼开道地走近前来。

1874年夏天，特賴奇克发表了論社会主义及其保护人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給所有爱国者指出，讲坛社会主义的檸檬水，甚至科学共产主义的沒有搀假的葡萄酒，都是危险的毒汁。根据特賴奇克所受教育 and 所走的道路，他属于讲坛社会主义派，但是作为資产階級的热中于統一的人們中的最正直和最有才华的一个，他以正确的本能預見到，社会民主党中有一种力量正在成长，这种力量将以胜利的步伐越过他辛辛苦苦地用铁和血粘合起来的一切 442 理想。于是他就成了社会主义者的所有敌人中最积极的一个。他从沒有认真地研究过經济学，他不得不使用曼彻斯特学派的最老

^① 阿基利阿 (Egeria) 是古意大利生育和水源的女神，据羅馬神話，他曾在文教問題上向她的情人努瑪献策。——原編者

的陈詞濫調，并且庄严隆重，喧嚣一时，仿佛他从西乃山^①上把神的秘密的新使命带回家来。他硬說，他的社会政治見解是从自由貿易論者的社会統計学中汲取来的，即从一个从来没有而且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涌现过的泉源中汲取来的，这样他自己就暴露了对經濟問題一窍不通。他令人惊异地断言：英国自由貿易主义者是英国工厂立法的創始人，这样他就牺牲了作为祖国祭坛上的历史学家的声誉。但是，在自由貿易的空論抛弃他的地方，他就用自然科学的空論挽救自己。如果作为人类社会的調节器的唯一造福的競争名誉扫地，那么打起生存竞争的旗帜同样行得通。人类的发展决定于人的永远不平等，因为人类的发展是靠群众的貧困来維持，并在战争的血泊里恢复青春的。凡是达尔文以研究家的誠实态度，确认为动物的不自觉的生存本能的东西，特賴奇克都称之为人类的伦理法則。^②古伊多·魏斯正确地指出：兽性将来不必为自己的名字感到羞愧，到那里去，向野兽学习吧。

他們到那里去，向野兽学习。不管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报纸把终于被人发现的杀龙勇士特賴奇克捧得多高，俾斯麦仍是一个讲究实际的政治家，不会相信聖經上的奇迹，不会希望耶利哥的城市会被这样有力的喇叭吹倒。^③他指望有具体的权力手段，因为帝国議會还不同意他提出的反对工人阶级的非常法，所以他的明确的意見是，可以比至今更有效果地利用曼托伊费尔反动派的工具来

① 紅海北端，苏伊士运河以东山脉名，此处大概是指《旧約全书·出埃及記》第十九章，摩西受耶和华呼唤上西乃山，将耶和华的吩咐曉諭百姓的事。——譯者

② 1875年梅林发表了第一篇独立的批判性短文《社会主义者的杀害者馮·特賴奇克先生和自由主义的最終目标》，来駁斥特賴奇克关于社会主义及其保护人的文章。最近在托馬斯·霍勒：《弗兰茨·梅林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版第367—390頁中，引用了这篇文章的最重要几节。——原編者

③ 聖經中的故事，相传約书亚吩咐自己的战士随着吹羊角的声音大声呼喊，从而使耶利哥城墙塌陷。——譯者

反对社会民主党。俾斯麦在这一政治行动方面的主要工具是国家检察官特森多尔夫，他是一个偏狹的官僚和拙劣的法学家，但也是一个对任何帮凶勾当都不畏縮的奴才。特森多尔夫原来在馬格德堡任国家检察官，由于瘋狂迫害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而嶄露头角，后来被召到柏林，在柏林市法院的第七庭中发现了同这个国家检察官旗鼓相当的三人团。

443

早在1874年1月，特森多尔夫就在爱森納赫派的柏林受托人、排字工人亨施身上立了第一次救国功勋，亨施并没有由于演說或写文章犯过罪，但是他作为工人阶级的卓越的組織者，就应该受到严厉的处罰。亨施被以挑撥罪和其他罪名起訴，因为他曾在工人集会上散发了背面印了广泛流传的、从沒有受过攻击的工人歌曲的卡片。特森多尔夫建議判刑二年，第七庭决定判一年监禁。同时特森多尔夫宣布，不久他将同莫斯特“說說理”，因为莫斯特曾把那首詩歌收入他所編的一本歌集中。帝国議會會議一結束，莫斯特就在美因茲被捕，并解到柏林，同窃賊和騙子手拘押在一起。后来受到控告，理由是他在一篇关于巴黎公社的演說中曾經說过，如果統治阶级不及时进行改革，革命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起了挑撥作用。借口这种“可耻的威肋”（事实上这是連最溫和的讲坛社会主义者也常說的一句話），特森多尔夫建議判刑两年半，柏林的可敬的法官判了莫斯特一年半监禁。

然而特森多尔夫和同他类似的其他国家检察官决不只迫害爱森納赫派。1874年的头七个月，有不少于八十七个拉薩尔分子在一百零四个案件中总共被判了二百十一个月零三个星期的监禁（以罰金了結的小案件不算在內），判罪的根据完全是下面这些弹性条文：誣蔑国家机关，挑撥不同的居民阶层互相敌对，反抗国家权力，褻瀆圣上罪或其他侮辱罪，还有侮辱俾斯麦罪，除了别的許

多人而外，哈森克莱维尔也被扣上最后一种罪名判处了三个月的监禁。这个“世俗人”终于想出了他的旧恩主曼托伊费尔还没有想到的独创的办法；他使人印了几千份起诉书，自己利用空闲时间亲笔在这些起诉书上签了名，以便把它们射向批评他的计划的人，说他们侮辱了他个人。对遭到控告的拉萨派所下的判决，同对亨施和莫斯特所下的判决都是同一种司法口径，第七庭的独树一帜的荣誉，很快就黯然失色。爱尔维修过去关于领薪金的法官所说的和著名的法学家如特韦施腾用比较客气的话所证实的事情——假如要颁发瘟疫勋章和年金，那法学家们就会证明，瘟疫是为了上帝和法律而存在的，逃避它就是叛国——又一次应验了。

对拉萨派和爱森纳赫派同样严酷的迫害，又清除了仍然堆积在社会民主党的这两派之间的一大堆陈年垃圾。虽然如此，圣灵降临节在汉诺威举行的拉萨派的代表大会，仍然拒绝了同爱森纳赫派合并的提案，而几个月以后在科堡举行的爱森纳赫派代表大会，虽然表现了要求统一的愿望，但把关于统一的可能性的实际讨论推迟到下一年。现在完全合并的唯一障碍是组织问题。爱森纳赫派不愿适应过分严格的组织，而拉萨派则不愿舍弃这个组织，虽然汉诺威代表大会又一次指出，这种组织的最恼人的后果，即领导人之间的摩擦不断发生。于是特森多尔夫想到一个挽救办法：如果我们破坏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那社会民主党就不能存在了。七十年代的社会民主党报纸常常把荣誉送给这个灾难的救星，这是最理所当然的了。

汉诺威代表大会以后，柏林许多著名的拉萨派成员的住宅受到搜查，他们的信件、文件装了好几筐，全拿到警察总署去了。他们认识到这一行动的目的，于是哈森克莱维尔立即把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址迁到不来梅。可是现在已经不是反动派至少还尊重

自己的法律的意义和文字的时代了。特耳克企图再一次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证明，即使利用普魯士結社法也不能奈何联合会的組織，事实上，联合会的組織比其他任何政党的組織更严格地恪遵这个法令。但是編輯部对特耳克的言論发表了一个簡短而确切的評論說，如果联合会應該解散，那么法律上的考虑就是最后的障碍了。早在6月25日，特森多尔夫就作了一个法律上的决定，暂时封閉全德工人联合会。同前几次的情形一样，为了找借口，不得不把結社法第八条（由于成立分会）端出来。人們用类似的方式对付拉薩尔派的工会和对付开始組織无产階級妇女运动的女工联合会。不久，爱森納赫派的柏林組織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同結社权一样，工人的集会权也变成泡影，他們的集会被当作所謂联合会的秘密組織的繼續而加以解散。特森多尔夫时期充分表明，人們可以用同从前反对资产階級时所用的完全不同的方式，利用反革命的反动結社法来对付无产階級。 445

这样一来，社会民主党两派的合并就势在必行了。既然組織的外部支柱已經打倒，那么党越大就越坚强。拉薩尔派懂得考虑这一点，并且根据这一点行动。他們的領導人之間的妒嫉心对較快地同爱森納赫派合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是主要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特森多尔夫消除了最后的不和种子，殘酷的迫害使一切有階級觉悟的无产者組成統一的密集方陣。前此拉薩尔派中最頑固的盲目相信組織的特耳克，在1874年秋天去找盖布和李卜克内西，他們毫不迟疑地握住了伸过来的和解之手。

1874年12月15日，社会民主党帝国議會議員第一次討論了进行合并的細節問題。盖布詢問拉薩尔派的条件，哈賽尔曼宣布他們的主要要求就是双方毫无保留地承认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这使爱森納赫派似乎有点惊奇，因為他們以为对方会提出拉薩尔

綱領的特殊要求（比如国家資助的生产合作社），可是根据拉薩尔派的整个历史发展，哈賽尔曼只能把这个要求作为合并的根本問題提出来。当然爱森納赫派馬上就同意了。同一天晚上，举行了
446 群众大会，会上柏林工人用热烈的欢呼欢迎两派的議員。

三个星期以后，工人运动的两股巨流也在汉堡汇合了。1875年1月1日，忠实的約克死了，他在这精力旺盛的壮年，就过早地被工作和斗争折磨死了。拉薩尔派和爱森納赫派共同給他送葬，在五千人的庄严的送葬行列中，飄揚着二十面旗帜。当約克的一位老朋友在霍尔斯特門旁，走进队伍問一个旗手，这面漂亮的旗帜属于哪一个工会的时候，那个年輕力壮的工人回答說：这是无关紧要的，为什么要問这个呢？我們大家是一个整体啊。

第四章

哥达合并代表大会

1875年2月14日和15日，在哥达就两派合并的問題进行了⁴⁴⁷深入的討論。双方各派出九名代表参加，代表拉萨尔派的有哈森克莱维尔、哈赛尔曼、哈特曼、两个卡佩尔、賴因德斯，代表爱森納赫派的有李卜克内西、莫特勒、瓦尔特希、盖布，此外还有年輕的柏林銀行職員爱德华·伯恩斯坦、对鞋匠的工会組織有过貢獻的哥达的威廉·博克和伊格納斯·奥艾尔，后者在担任薩克森选举战的领导人期間，表现了卓越的才能，从1874年夏天起接替約克担任党的書記。当时倍倍尔还被关在監獄里。

这个預备會議的記錄沒有公布，可是发表了这次會議的結果：关于新的統一的党的組織和綱領的两个提案。由于反动派的迫害，組織草案放弃了一切联合会的組織；凡是拥护党的綱領，并以实际行动（也通过捐款）增进党的利益的人，都可以入党。独裁領導被废除了，但是为了加强集中，决定由每年的党代表大会选举党的一切机关。除去暫時繼續并存的两个正式机关报的編輯部以外，作为党的机关行使职权的有：一个由五人組成的执行委员会，一个由七人組成的監察委员会和一个十八人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監察委员会的成員必須住在同一个地方，十八人委员会的成員可以住在不同的地方。十八人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执行委员会和監

察委员会之间的意见分歧作出决定。

448 綱領草案是拉薩尔派和爱森納赫派至今的綱領之間的妥协，但主要是形式上的妥协而不是实质上的妥协。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无须放弃自己的信念，理由很简单，因为两派的信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在这方面还有一点差别，那就是拉薩尔派比較开展，而且他們还把自己的一切警句全放到新綱領中去了：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全归工人、铁的工資規律、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反动的一帮”，但是这一切都不要求爱森納赫派牺牲自己更好的見解。对这些要求中爱森納赫派唯一不熟悉的要求，即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人們明确地作了这种意义的解释：拉薩尔派經常在这种意义上提出这个要求，爱森納赫派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毫不迟疑地表示同意。

綱領的第一条：“劳动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員”，就是两派的共同財產。这一条忠实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因为社会必要劳动創造一切价值，所以这些价值也不折不扣地属于所有工人。工人对“他的劳动的全部产品”的要求是对地租和資本的利潤，对統治階級侵吞剩余价值的道德和法律上的抗議，是一种“自然法”的抗議。两派都还没有把剩余价值理解为使資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杠杆，不了解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进行生产，共同劳动的所得也属于社会，并只在各个社会成員中“有折有扣地”分配，可以进行分配的只是共同劳动所得中不为社会共同目的所要求的一部分。此外在綱領的原則部分中，下列几点都表达得十分明确，尽管个别用語是不恰当的、不精确的：把劳动資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財產，彻底消灭雇佣劳动，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是工人階級解放的唯

一手段。同样明确地强调了必须首先在本国范围内进行活动，但也要意识到国际工人运动的任务和义务。

綱領草案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的实际要求，可以归结为国家 449 彻底民主化，没有限制的联合自由和有效的工人保护立法。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起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桥梁的作用，这种生产合作社应该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在工业中或农业中普遍建立，使得从它们里面必然产生出整个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大家知道，馬克思曾經对这个綱領草案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5月5日他从伦敦把这个批评意见寄给白拉克、盖布、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①由于它的原则性的、积极的观点，这个批判今天还很值得一读；但同时也有许多消极的见解，这是因为批判是从事实上不正确的前提出发的。馬克思否认綱領草案忠实地反映两派的理论观点；他认为，爱森纳赫派已经彻底理解科学共产主义，而拉萨尔派是一个落后的宗派，这个宗派被历史发展所战败，必须向爱森纳赫派投降。这个错误完全可以说明，馬克思写这个批判时的严重不满。他并没有夸大綱領的价值，而是十分坦率地说：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綱領更为重要。但是他反对“拿原则做交易”，认为人们参与其事以前，宁可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这种看法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假如两派中的一派哪怕只牺牲了自己的一点点原则，新的统一的党当然就会因此“挫折锐气”；这样很快就会产生新的分裂，而当缺乏详尽的理论观点的现象即将显露的时候，就产生更危险的分裂。

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在理论上高估了爱森纳赫派，而低估了

^① 馬克思：《哥达綱領批判》，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1—36页。

拉薩尔派。他为什么会产生对爱森納赫派的这种錯誤看法，我們不能下明确的断語。如果他仔細地、按期地讀过《人民国家报》，那他就很难否认在爱森納赫派的机关报中，各种折衷的社会主义还
450 占很大势力。看来，馬克思把狄慈根这样的人看做是爱森納赫派的群众的化身，他被《人民国家报》反对拉薩尔派的所謂宗派集团的斗争，不知不觉地引导到这种看法，即爱森納赫派的理論比实际更进步。馬克思为什么低估拉薩尔派，是比較容易理解的。正如《人民国家报》在党派斗争时期常說的那样，馬克思根本不看《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如果他所想像的拉薩尔派就是《人民国家报》上所描繪的样子，那他就必然給自己描出基本上是錯誤的拉薩尔派画像。

在哥达綱領草案中爱森納赫派沒有背叛自己的原則，拉薩尔派也沒有提出使馬克思对他們产生怀疑的保留条件。平常他习惯于根据工人运动的重大成就來評价工人运动，这次却过分地把事物放到显微镜下面，在詞句的笨拙、不适当、不准确这些小缺点后面寻找实际上不存在的阴险企图。不可否认，他对拉薩尔的嫌恶在这封信中也影响到他的判断。他說，拉薩尔为了粉飾他同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敌人結成联盟，而粗暴地歪曲《共产党宣言》，这种指責是既苛刻又不公正的。拉薩尔沒有締結这种联盟，也沒有粗暴地歪曲《共产党宣言》。在铁的工資規律方面，他不是以馬尔薩斯的学說为依据的，而是像《共产党宣言》那样来理解这个規律。拉薩尔也沒有創造“反动的一帮”这句话，它可以說是自行产生的，根据德国工人阶级十二年的經驗，当它在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要支持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時候，它总是首先受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最猛烈的打击。馬克思还犯了一个錯誤，他在“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資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这句话后面看到了拉薩尔的仅仅攻击了资本家，而沒有攻击土地所有者的

可恶的遗产。“资本家阶级”一词恰恰来自爱森纳赫派的纲领，在那里这个词当然也是从包括土地所有权的一般意义来说的，而恰恰是拉萨尔派比爱森纳赫派更懂得从原则上来讨论土地问题。在这些论点和类似的论点上，马克思受到不满情绪的影响太大了，假如这种情绪的实际前提是正确的，那它就是完全有道理的。 451

这封信发生了它在当时的情况下所能发生的作用。它使得纲领草案的个别论点写得更清楚明确，但丝毫也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证明草案符合两派的理论认识的另一事实是，草案在有阶级觉悟的工人中得到几乎完全一致的赞同。4月15日在多特蒙德举行的西德工人大会还对草案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在这里提出的责难，在许多方面同马克思几个星期后在他的关于纲领的信中提出的原则性指责有关，最特别的是，参加西德工人大会的几乎都是拉萨尔派的代表，而且《人民国家报》很不高兴地接受了这一批评。5月18日，特耳克写了一封安慰人心的信给报纸说，西德工人大会决不想在统一的努力中散布不和的种子；关于统一的问题，西德工人大会的参加者无论如何要接受任何不与党的原则相抵触的纲领，哪怕它只是一张白纸，上面有一只握紧的拳头。^①

两派的合并是在5月22日至27日举行的哥达代表大会上进行的。大会只代表最后一季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缴纳党费的党

① 梅林的上述种种说法都是错误的。在两派合并中，爱森纳赫派的若干领袖以原则作交易，对拉萨尔派作了不应有的让步，从而把机会主义带进了新的党内，造成了后来的恶果。梅林特别错误的是，他把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说成是一种吹毛求疵，“是从事实上不正确的前提出发”，而没有认识到这个批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意义。至于梅林说到的，这个纲领草案曾得到有觉悟的工人的赞同，这并不能证明纲领就是正确的。正如恩格斯在1875年10月12日给倍倍尔的信中说的，这是因为工人们从纲领中读到了纲领中所没有写的东西，而且对它作了共产主义的解释。——译者

員。拉薩尔派有七十三名代表，一万五千三百二十二票，爱森納赫派有五十六名代表，九千一百二十一票。會議进行順利而迅速，沒有碰到任何重大的障碍。李卜克內西和哈賽尔曼在和睦的气氛中做了关于綱領問題的報告。李卜克內西虽然攻击铁的工資規律，但是沒有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闡述的观点出发，而只认为按照普通的語言习惯，“铁的規律”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永恒的規律，而工資規律只存在于資本主义社会而不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可是不言而喻，拉薩尔始終只是就資本主义社会来談“铁的規律”的，关于这一点决不存在任何誤解，于是铁的工資規律仍然載在綱領里。同样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也保留下来，关于这种合作社，哈賽尔曼說得对，它們从沒有被拉薩尔派所誤解，而始終只被爱森納赫派所誤解。关于“反动的一帮”特別进行了表决；一百一十一名代表以452 二万三千零二十二票贊成，十二名代表以二千一百九十一票反对；少数派主要由薩克森和南德代表組成，他們不是从《共产党宣言》的立場出发駁斥这句话，而只想把它当做在策略上同人民党結成联盟的障碍而加以清除。关于綱領的討論并不热烈，这正证明，两派之間在理論上不存在严重的意見分歧。

組織問題也沒有特別令人头疼。

全德工人联合会和拉薩尔派的大多数工会，已根据3月16日的法院判決在普魯士最終解散了；根据最近一年的經驗，人們知道即使开始时有些抗拒，最后也总有一些法庭来批准警察机关对結社法所做的随心所欲的解释。組織提案基本上通过了，党的三个最高机关的有点臃肿的組織也保留下来，做有关組織問題報告的奥艾尔的建議沒有被接受。因为哥达的組織不久就被特森多尔夫摧毀了，所以不能說这个組織好还是不好。总的說来，形式上的組織問題从現在起就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感謝党的迫害者，現在

党可以使“組織迷信”的奢侈得到节制了；它干脆在敌人經常发动进攻的地方建筑碉堡，无产阶级的团结使这些碉堡經常由善于抵抗的队伍駐守。执行委员会的駐地迁移到汉堡，正如倍倍尔所說的，汉堡是社会主义德国的首都。按照倍倍尔的建議，根据两派的力量对比，有三个拉薩尔派和两个爱森納赫派被选入执行委员会：哈森克萊維尔和哈特曼任主席，奥艾尔和德魯西任書記，盖布任司庫。新的組織定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在有关党的报刊的問題上，同样很快就取得了意見一致。各方面都希望只有一个主要机关报，但是由于一些不得已的、特别是財政方面的原因，《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暂时作为中央机关报保留下来。地方党报只有在創辦时得到党机关同意的，才被认为是党的机关报，可以要求党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⁴⁵³对过分热心創辦地方报纸（在爱森納赫派那里也是这样，恰恰是他們在这一方面积累了許多实际經驗）已經有了一定的反应。正是在这个时期，在卡尔·希尔施和奥艾尔之間的很有教益的論战中，討論到地方报刊多的利弊問題。与此有关的还有另一个問題，即建立合作印刷厂的問題，爱森納赫派在萊比錫已經这样做了，拉薩尔派則至今还拒絕作为战斗的党而背上这个可能被沒收的财产的包袱。在这个問題上，爱森納赫派的見解取得了胜利。在运动的巨大中心，对自己的机关报的需要非常迫切，不能等閑視之，为了保证党员对党报有尽量广泛和可靠的所有权，創辦合作印刷厂是适宜的。

在工会問題上已經没有什么爭執了。代表大会根据弗里茨舍的提議，宣布只要存在着雇佣劳动，工会組織就不但是必要的，而且能促进工人的事业，如果在資本主义社会的經濟条件下这是可能的話。双方現有的工会組織合并起来了；当然，工会运动蓬勃发

展的时期已經成为过去。

5月27日午夜，哥达合并代表大会在它的参加者各方面都感到满意的情况下閉幕了。自从拉薩尔建立全德工人联合会以来，整整过去了十二个年头。在哥达大会的这些日子里拉薩尔主义永远消失了，但是这些日子也是拉薩尔的最光荣的日子。不管馬克思对哥达綱領提出的积极的反对意見多么正确，他的关于綱領的命运的命运仍清楚地表明，拉薩尔正确地認識了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德国的一个强大的、不可战胜的工人党作为社会革命的支柱能够得到发展。

第五章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一 帝国破产的开端

在革命的工人党建立一个团结的组织的同时，在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动的一帮”中开始了反动的分化。已把自己的第一个影子投到 1874 年的帝国议会选举中的商业危机规模巨大。经过短时间的陶醉以后，新帝国在长时间的痛苦中体验到，作为同等的强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竞争是怎么回事。1875年初有一个统计数字：五百五十六家股份公司（其中有一百零五家铁道公司）的股票的价值，由 1872 年底的六十七亿七千万马克降到 1874 年底的四十四亿二千五百万马克，即减少了二十三亿四千五百万马克，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以上。仅制铁工业就损失了四亿五千五百万马克。

由于销售危机而感到悲观失望的大工业家，发出了保护关税的痛苦叫声。现在这个要求的意义同三十年前完全不同了。如果说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人们把保护关税看做是民族工业的暂时的抚育手段而要求它，那么现在就谈不到这一点了。七十年代中期，德国的贸易总额在世界市场上仅次于英国。1874 年几个大国的贸易总额（包括进出口）如下：英国一百三十三亿八千万马克，德国九十三亿马克，法国六十八亿马克，美国四十九亿八千万马克。

在工业和交通运输方面，德国使用的蒸汽力比欧洲大陆上的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上的保护关税的本来的历史意义已经消失了。从这时起大工业家要求保护关税的崇高目标是，为了在世界市场上能够更有成效地实行廉价倾销，而保证在国内
455 市场上的高价。为了能把大工业的过剩产品更便宜地卖给外国人，于是敲骨吸髓地压榨本国人民。

保护关税的大工业家同保护关税的大地主结成了强大的同盟。不多几年，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由道地的自由贸易论者变成了道地的保护关税论者。工业的繁荣使工业人口在农业人口相对减少的情况下不断增加，在农业中，奢侈品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有所增加，粮食生产相对地减少。粮食消费量的增长超过了本国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谷物和其他农产品已经不能输出，而必须输入了。由于交通工具的巨大改革，铁路和轮船航运的迅速发展，使进口非常方便。尤其是美国的农业，在七十年代中期成为出口工业，用肉类和谷物充斥德国市场乃至整个西欧市场。可是，这样一来，肉类和谷物的价格也下降了，于是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地租开始下降。在这种困境中，这些经常得到证实的爱国者甚至会背叛上帝、国王和祖国，更不用说把自己的自由贸易原则扔到垃圾堆去了。同大工业家一样，大地主为了使已经降低的地租得到回升，决定疯狂地压榨群众。

保护关税的宣传得到政府的支持。俾斯麦既是大工业家又是大地主，这位鼓舞世俗人的天才同两个身受苦难的阶级同声哀叹。此外，他还有自己的特殊的痛苦。五十亿从烟囱里飞走了，军国主义依然存在，要求作出一年比一年更大的牺牲。必须开发新的税源，而且是来源滚滚、不会被议会的决议所堵塞的税源。其措施就是征收间接税、财政关税，把大工业和交通部门国有化。全

德国的烟草专卖和普鲁士邦的铁路国有化，是俾斯麦的理想。现在这个世俗人发现了自己有“社会主义”的心。这种光荣的“社会主义”的祖先在烟草专卖方面是老弗里茨、拿破仑第一和梅特涅，在普鲁士铁路国有化方面，贴现公司起了这种社会主义的助产士的作用。贴现公司给帝国残废者基金以大量的铁路股票，危机发生后，这些股票的市場价值同它们的票面值相差很大。因此由国家按价收购普鲁士铁路必然成为每个真正的爱国者心神向往的目标。

虽然如此，如果牛犢不是自己把脖子伸给屠夫，大量掠夺的计划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小资产阶级心甘情愿地采取这种富有牺牲精神的友好行动。农民很容易就被美国竞争的恐怖的怪影吓坏了，虽然大多数农村小私有者生产的粮食还不够自给，必然受到谷物关税的直接危害，而少数比较富裕的农民最多只得到很少利益，这点利益立即又由于同时实行财政关税和工业关税而抵销了。在被大工业的迅速发展大量瓦解的手工业者那里，为了引起他们对过去的关税界限和行会界限的美景的向往，也用不着高明的说服本领。城市和乡村中的小私有者不了解历史的发展，或者已经遭到没顶之祸，仍然抓住一根稻草不放，他们被农业和工业中的保护关税论者给他们描绘的安乐景象所蒙蔽了。

对大资本的滥设企业的正直的愤怒，变成小资产阶级反动的特别有效的杠杆。危机越是清楚地揭露滥设企业年代的欺騙行为，事实就越清楚地表明，在大资产阶级社会中沒有处罚这些大窃盗的绞架。王国调查委员会（拉斯克尔曾经自负地许愿说，这个委员会将“用火把照亮每个角落”）甚至吹灭了可能照到一个“高贵而优秀的人物”的最微弱的灯火。通过“找不到的证人”阿迪克斯的奇异历史，这个委员会已经开了法国巴拿馬丑

聞^①的先例。阿迪克斯所供述的大概是在汉諾威—阿騰貝肯附近
457 进行的濫設企业牟利的事情，但是調查委员会虽然經過紧张的寻找，仍然找不到阿迪克斯，与此同时，阿迪克斯却以民族自由党的帝国議會議員的身份每天同拉斯克尔和卡尼格先坐在同一张板凳上。几乎所有想用法律懲罰濫設企业年代的最露骨的欺騙行为的企图，一开始都遭到失敗或毫无效果。在最順利的情況下，这些企图也只导致这样一种审判：戴着眼鏡的官僚在审理中很快就陷入資本主义迷宮的死角，在法律上感到无計可施，往往結結巴巴地談一些关于对“最有名望的人物”的“职业上的誹謗”的道德譚話。庸人的过时的信念（法律始終是法律）成了肥皂泡，所有庸人对此都感到气愤。

他們用“蠢貨的社会主义”和排犹主义补充保护关税和烟草专卖的“社会主义”。毁灭农民和手工业者的資本，通常都以高利貸的面目出現，他們由于見解偏狹、思想落后，因而把事物的代表者看做是事物本身。当高利貸在濫設企业时期喧囂一时，不可避免地把人們的不愉快的注意力吸引过来的时候，这一点就更容易理解了。尤其是在柏林，社会生活的犹太化达到能使智者納旦^②的最大胆的崇拜者也感到不安的規模。在“知識界的无产阶级”中，在小資產階級的后輩中，有許多能文善墨的人进行排犹主义的活动，自从小企业垮台以后，这些小資產階級的后輩就走进了学术界，但这里已有人滿之患，現在他們开始攻击在他們这个領域内进行的

①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法国大賄賂事件。1878年，法国一家公司从哥伦比亚政府取得了开凿巴拿馬运河权。1881年开工，但因管理不善等原因，經濟发生困难。公司負責人賄賂政府，进行股票債券投机，1888年公司破产，运河停工。受害的股票債券持有者达五十万人。1892年賄賂事被揭发，使法国发生了政治風潮。——譯者

② 古犹太的預言家，萊辛写过《智者納旦》的剧本。——譯者

犹太人的竞争。在实际政策中，排犹主义是一个毫无目的的运动，这个运动处于俾斯麦、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双重庇护之下。这些人同高利贷关系十分密切，虽然他们可能暗中轻轻地斥责高利贷，但不能使高利贷受到严重损害。对他们来说，“蠢货的社会主义”只是进一步愚弄“蠢货”的一种手段。

可是整个后退的运动遭到了在正常情况下必然使它粉碎的抵抗。德国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知名之士完全有理由拒绝大工业家把他们拴在保护关税的绳索上拖着跑，大商业，大船舶业，以及自由贸易理论家更是拒绝这样做。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这种保护关税是现挣现吃，是宰生金蛋的母鸡的办法。国家奖励德意志帝国在国外的倾销价格必然会使其他工业国采取报复手段，使它们建立将导致德国的国外市场大大缩小的关税壁垒。德国工业的竞争能力也受到生产成本增加的威胁，而生产成本的提高是国内各种商品涨价的必然结果。长此以往，工业税必然不能补偿粮食税给工业造成的损失。加之，俾斯麦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也将大大限制资产阶级的已经很小的政治权力。恰恰是这个阶级中比较坚决、头脑比较清醒、比较有远见的人坚持他们的自由贸易原则。 458

毫无疑问，在七十年代中期，他们的处境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阵营内部就有敌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追随者离开了他们，官僚群起反对他们，新近改变立场的容克地主特别气愤地攻击这些顽固的罪人。当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的神话四分五裂地躺在濫設企业时期的成万个瓦砾堆上的时候，要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是很难办到的。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必然力图消除这个巨大的商业危机，把名声最坏的濫設企业描绘成“最正当的”事业。虽然欧根·李希特尔及其一伙在解决这个崇高任务的过程中说了许多谎话，自由贸易派资产阶级只是部分地做到这一点。它没有利用人为地培养

出来的亲犹主义来解除“蠢货的社会主义”的武装，这种亲犹主义不比农民和手工业者天生的对犹太人的憎恨更聪明，而却更可恶。

尽管如此，自由貿易派資產階級仍可以为自己建立一个它得从这里进行艰苦的机动战的障地。它必须依靠一开始就对即将实行的大量掠夺进行最坚决、最无情的抵抗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不言而喻，这两个部分之间的谅解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它们共同反对历史上落后的敌人的毁灭性侵犯，保护它们所立足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土地。但是恰恰在这个条件下
459 也存在着一种联盟的力量，各种稅吏都懂得考虑这个联盟的危险性。他们企图用各种关于“保护民族劳动”的假社会主义的口号诱惑工人群众，他们甚至伪称保护关税的真正目的是提高工资。俾斯麦胡说什么烟草专卖是“无产者的世袭领地”。俾斯麦又把他的慈善和奴僕的社会主义搬了出来，他在加紧用暴力镇压工人阶级中的在政治上成熟的阶层的同时，企图用稍加改善的貧民救济这点小恩小惠来欺騙工人阶级中的在政治上还不成熟的阶层，使它们认不清自己在政治上的长子继承权。

这种蛊惑宣传越没有希望，自由貿易派資產階級就越有理由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中寻找牢固的支柱来维持自己的摇摇欲坠的地位。但是它由于传统的模糊观念，却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它拽住了无产阶级打击经济反动的手。自由貿易的行商们自夸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运动中站在“光荣的立场”上。他们在中伤“浪费工人钱财”的“领导人”，在说这类闲话方面，事实上比半官方的和反动的报纸有过之无不及。当保护关税的宣传家们通过他们关于打算提高工资的欺騙，至少承认了提高工资的必要性的时候，普魯士財政大臣奧托·康普豪森（除德尔布吕克外，他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的国务活动家的典型人物）一再硬说什么治疗危机的唯一药方

是降低工資。德国企业主的财富虽然不断增长，但是由于他們并不放弃他們在初期的营业方面所使用的卑劣伎俩因而遭到惨敗，自由貿易派的報紙企图把这些失敗的責任推到无产階級身上。它們娓娓动听地說，由于工人的懶惰和无能，使得帝国專員勒洛不得不責备参加費城世界博覽会的德国工业代表团“价錢便宜而质量低劣”，或者使得德国棉紡工业失去了中国市場，因为正如特賴奇克用諷刺口吻所說，亚洲人对商品质量的要求比善于忍耐的德国人严格。俾斯麦胡說什么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破坏了德国工人的工作能力，欧根·李希特尔也鸚鵡学舌地替他帮腔。由于实行了这种聰明的政策，自由貿易派資產階級已經向它的反动敌人投降了。⁴⁶⁰ 它开辟了暴力政策的道路，俾斯麦就在这条道路上执行他的財政計劃、稅收計劃和關稅計劃。

当然，德国在經濟和政治方面的倒退不是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內完成的。而当这种倒退在帝国立法中只有各政党彻底轉变立場才能实现的时候，这一点更不可能。几年以来，易北河东的容克地主对俾斯麦的資本主义和文化斗争的政策进行了这样恶毒的攻击，以致这些“好人”之間的和諧一致不能立即得到恢复。在帝国議會中的两个最强大的党团中，中央党及其莱茵区的大工业家和西里西亚的大地主，以及追随中央党的农民、小市民和政治上不成熟的工人可以立即贊同反动的經濟政策，而在民族自由党人中，自由貿易派資產階級占了优势。但是現在中央党已經为了反对“基督徒的殘暴迫害者”俾斯麦而完全武装了起来，民族自由党人已經降低为这个“世俗人”的越来越沒有独立意志的卫队，1876年，他們在审判法規事件中的妥协就表现了这一点。对俾斯麦來說，在他走上到卡諾莎去的艰苦道路以前，是值得設法說服民族自由党人拥护經濟反动的。因为对这位天才的政治家來說，这一点当

然是肯定的：如果没有别的办法来提高地租和资本利润，那么“卡尔卡斯和阿迦門农^①之间的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就必然像影子戏一样从墙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严重的商业危机促使事态迅速发展。1875年中期，容克地主反对俾斯麦的战役在《十字报》的时代论文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在同一年，地租也开始下降。1876年春天，容克地主就在俾斯麦暗中鼓励下，在经济上组成赋税和经济改革派，在政治上组成德国保守党。与此同时德尔布吕克看清了情况，在被免职以前自动辞了职。俾斯麦在帝国议会1875年秋季会议中宣称，帝国预算必须“尽可能完全由间接税”开支。同时他透露了他未来的工人政策的要点，一方面用新的非常法来反对社会民主党，另一方面颁布
461 新互助会法，给工人一点小恩小惠，以便使工人变成工厂主和官厅的奴仆。

社会民主党看清了自己处境的严重性。为了同外部进行更激烈的斗争，它不得不结束了自己内部的斗争。在它周围布满敌人。它看见风暴已经到来，于是武装起来准备迎接这场考验。

二 鼓动工作的实际成果

在社会民主党的两派合并以后，党的鼓动工作就更健康地向前发展了。经过考验的老党员团结一致地进行工作，同时也涌现出一批新的力量：沃滕森的雪茄烟工人莫尔肯布尔，伦茨堡的排字工人奥尔登堡，卢卑克的水手施瓦尔茨，佐林根的制革工人舒马赫，杜塞尔多夫的细木工图曹尔，柏林的店员凯泽尔，郎根比劳的

^① 卡尔卡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预言家，在特洛亚战争中是希腊军队的随军祭司；阿迦門农在特洛亚战争中是希腊军队的统帅。此处喻中央党和俾斯麦。——译者

裁縫屈恩，格罗森海因的雪茄烟工人盖尔，哈耳伯施塔特的制帽工人海涅，格腊的木雕工人勒迪格尔，奥芬巴赫的钳工烏尔利希，紐伦堡的商人維麦尔和奥格斯堡的排字工人理查·費舍。从资产阶级的头脑清楚的理論家中，党也获得了一批新的力量：柏林的候补法官菲勒克，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教員薩博尔，斯图加特的詩人杜尔克和曾經当过軍官的格奥尔格·馮·福尔馬尔。福尔馬尔生于慕尼黑，普法战争时期当邮局職員时曾受重伤，在身体长期受折磨中接受了社会主义世界观。

敌人想方設法使社会民主党不缺实际的鼓动材料。在新帝国成立后的头五年，拥有十字架的有产阶级，充分利用增进自己的阶级利益的法令为自己祝福。在整个这一时间，为了（还不如說名义上为了）劳动阶级的利益，只通过一个很可怜的赔偿义务法，这个法令的既阴险又杂乱的条文給企业主提供了逃避自己企业对意外灾难的赔偿义务的可以利用的机会。1875年秋天帝国議会通过互助会法也具有类似的精神。政府的議案表面上是給工人恩惠，实际上把他們当作必須教他們学步的幼儿看待。它严重地威胁无产阶级的迁徙自由，同时也严重地妨碍无产阶级自己管理自己的最切身的事業。政府的議案处处給工人的自由互助会制造困难。甚至帝国議会的资产阶级政党都觉得政府太恶毒。但是这些政党自己也完全具备这种貨色。因此它們排斥社会民主党議員，不讓他們这些最有經驗的行家参加对这个議案的临时討論。

虽然互助会法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减免市区的济貧工作，但是工人阶级的議会代表認識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真面目，因而只要求这个社会对工人和一切其他阶级一視同仁。他們同意互助会的强制措施，但反对强迫的互助会；他們拒絕资产阶级的任何施舍，但是他們要求工人有权不受限制地自己管理工人互助会。各工人

阶层提出的无数的請願书和抗議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即使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还有一定距离的工人，在管理自己微不足道的疾病互助金的时候，如果受到立法机关的监督和阻挠，必然也会感到十分痛心，因为这个立法机关曾經宣布要监督和阻止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掠夺是办不到的。尽管如此，这项法令还是以社会民主党代表坚决反对的方案通过了，虽然这个方案使工人的自由互助会活动范围比政府认可的要大一些。

政府为对付工人阶级提出的政治非常法，也起了革命的作用。刑法典的訂正的条款企图把德国刑法中的微小的进步的东西改成落后的东西，第一百三十条規定：“以危及公共安宁的方法公然煽动人民各阶级相互敌对者，或以同样方法口头或书面公然攻击婚姻、家庭或财产制度者，处以徒刑。”为了在帝国議會面前为这个条
463 文辯护，俾斯麦机敏地任命欧伦堡伯爵为普魯士內政大臣。三十年前，这位伯爵在任检查官期間曾在萊茵区妓院同巡夜人进行过英勇的毆斗^①，自那以后作为享乐的独身汉对资产阶级婚姻的准則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际攻击，因而由他担任这种神圣制度的理論上的辯护人似乎是特別合适的。欧伦堡伯爵毫不隱諱地說，第一百三十条的矛头是直接指向社会民主党的。他第一次抬出一个装满引文的大口袋，此后这个口袋就在德意志的管理国家的武器中占有光荣地位。他企图利用社会民主党报刊中的个别論文，甚至从那里断章取义地拿出几句话来证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危害了公众。他說，被称为境况較好的阶级决不会自願地放弃自己的权利，社会决不会达到自願地、沒有强迫地一律平等的地步。因此，如果人們不願造成兵戎相見的局面，第一百三十条就是絕對必要的。

^① 參閱本書第一卷第155—156頁。——譯者

俾斯麦本人的令人信服的雄辯也达到同样的水平，他要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对大商业危机負責，他对德国法官的“温情”进行恶毒的諷刺，为德国刑事审判的更严重的腐敗做好了准备。他令人可笑地歪曲事实，要求在怀着恶意的公众面前更多地保护德国警官，使得他們享受到英国警官所得到的普遍尊敬。他在帝国議會宣称，他可以容忍議會否决第一百三十条，但是它恐怕是一条不死的虫，如果他可以把一个立法时期理解为一代的話，現在的議員的子孙們将还必須討論这个問題。在这种反动行为方面，俾斯麦始終是一个很好的預言家。

帝国議會暂时通过了俾斯麦的反动的刑法修訂条文中的很大一部分，但还没有通过第一百三十条。相反地这个怪物遭到一致的反对，甚至引起哄堂大笑，以致如果不是进步党領袖亨內尔用庄严的声明挽救了議會的政治尊嚴的話，这种尊嚴就岌岌可危了。亨內尔說，第一百三十条是对我們帝国和各邦的立宪状态的基础的毫无根据的严重攻击，是对一切自由党十年乃至二十年来視為 464 固定目标的那些原則的无法辯解的严重攻击。同一个亨內尔在这以后的第二立法时期完全按照俾斯麦的預言认为：做子孙的人真不幸啊！他追求的不再是固定的目标，而是十分瘋狂的目标，即几乎一字不易地重新提出第一百三十条，鎮压社会民主党。特森多尔夫于 1876 年 3 月底提出了柏林市法院的一个决定，用所謂“組織分会”的罪名在普魯士邦取締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这样他就为他的恩主俾斯麦的暂时失敗报了仇。

当統治階級这样提供十分确切的宣传材料的时候，資產階級的卜士們就在談論他們的鼯鼠眼睛（天曉得在哪里）发现的社会民主党的“退却”。空前严重地首先压在不產階級身上的商业危机，如果不同时也使精神革命化的話，它必然会削弱革命的工人运动的

可以說是肉体的力量。况且，統治階級的非常敌对的态度，关于工人應該对大商业危机負責的可怜謊話以及不可平息的憎恨的类似的发泄，消除了进步的工人阶层的最后幻想。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天天都占領新的陣地。1876年8月19日至23日，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表明了使資產階級預言家大吃一惊的“退却”。

为了使党組織“被查封”的那些邦的黨員也能参加，代表大会是以社会主义者全体代表大会的名义召开的。大多数中等邦，也有不少小邦，首先是巴伐利亚和薩克森热心地追求特森多尔夫的荣誉。在德意志帝国中，只有一小部分地方——汉撒同盟城市以及图林根和南德的几个小邦，成員分散在不同地方的社会主义团体，勉强能保持下来。

然而，1876年的代表大会指出，特森多尔夫及其高貴的追隨者来得太迟了。摧毁党的外部組織早就不是阻止党的发展的手段，而只是促使党向前跃进的一种动力。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九十八位代表，他們代表二百九十一一个地区，三万八千二百五十四名黨員。党的金庫在十四个月（从1875年6月8日至1876年8月10日）中的总收入达五万八千七百六十三馬克，其中有四千三百三十馬克是《选举人》的发行人繳納的，这是一份巴掌大的小报，每月出版一次，以每份二十分尼的价格售給“被查封的”党組織的成員，使他們能够用这种方式繳納党費。党金庫的收入中，也包括德国工人不顾当时的一切严重困难，为本階級的解放募集的捐款。代表执行委員會做报告的奥艾尔估計，用于地方党的工作費至少还要多两倍。

此外，奥艾尔的报告也提供了一种极可喜的景象。党拥有一百四十五名受到欢迎的演說家，他們都已經光榮地經受过大会的

火的洗礼，其中有八名完全支薪的、十四名部分支薪的鼓动员；党还有四十六名干部，主要是党报的编辑和发行人。自从合并代表大会以来，新办了十二种政治机关报和一种文艺性的报纸——《新世界》。党共有二十三种政治机关报，其中有十五种是在合作印制厂印行的。有八种每周出版六次，八种——三次，四种——两次，三种——一次。小册子的销售额达数十万册，党的年鉴《穷康拉德》销售额为四万份。因此奥艾尔可以说，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退却”的说法，只能表明所有敌对阵营对工人党的日益增长的力量们的恐惧。

他提到迫害，只是为了肯定这一点：尤其是在普鲁士和巴伐利亚，对工人来说，结社法等于完全被非法地任意废除了。他说，社会民主党不抱怨反动的结社法，因为社会民主党尽管为在法律上废除这种拙劣的东西而进行了鼓动，但它也懂得容忍反动的结社法；它所反对的是一种有偏向的反动手法，人们用这种手法来把现行法作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解释，而对其他政党则忠诚地执行现行法律。奥艾尔认为建立新的党组织可能性不大。他说，普鲁士的党员小心翼翼地绕过了结社法的暗礁和浅滩，虽然如此，如果普鲁士政府决心在它的势力范围内不容许社会主义组织存在，那么它就经常找到执行它的意志的检察官和法官，而保守党和自由党对此都是欣然同意的。但是，如果正式的纽带被扯断了，那么为共同的伟大事业，即为贫困的被剥夺继承权的人民——无产阶级的事业服务的思想是会使全体党员紧密团结起来的。

代表大会必须解决两个主要任务：首先是把合并工作结束一下，其次为下次帝国议会选举进行动员。要消灭在从前两派的两个中央机关报中继续存在的分立局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在表决新中央机关报是在莱比锡出版还是在柏林出版这个重要问题时，旧的分歧又一次相当尖锐地显露出来。从前的拉萨儿派大多

贊成在柏林出版，从前的爱森納赫派大多贊成在萊比錫出版。表決結果除六票弃权外，四十九个代表贊成在萊比錫，三十八个代表贊成在柏林出版。这时就有很多人抱怨說，代表大会所在地的地理位置使薩克森和图林根的代表占有不相称的优势。由于哈賽尔曼拒絕參加設在萊比錫的新中央机关报的編輯部的工作，紧张状况更加尖銳起来。但是不惜一切維護统一的正直願望終于战胜了一切困难。老拉薩尔派中的腊科夫、济罗弗斯基等人尖銳指責哈賽尔曼的阻撓，而哈森克萊維尔爽快地答应接受哈賽尔曼拒絕担任的职务。由李卜克内西和哈森克萊維尔担任总編輯，新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从1876年10月起在萊比錫出版了，同1873年以后的《人民国家报》一样每周出版三次。曾經为两派的合并出了很大力气的哈賽尔曼从此在党内采取反对的立場。在《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停刊以后，他到了他的选区爱北斐特—巴門，在那里出版《紅旗》，名义上是按期出版的竞选小报，实际上是一家不很隱蔽地同《前进报》竞争的报纸。根据哈賽尔曼的内向的性格来判断，他个人的功名欲沒有实现对他的行动起了一定的作用。他的反对立場虽然令人不愉快，但并不危险。他沒有建立反对派的实际理由，即使創立一个宗派成为可能（事实上已不可能），哈賽尔曼这个人也不会成为一个热狂的宗派領袖。

代表大会的第二个主要任务是为即将到来的帝国議會选举进行准备。經過仔細研究以后，大約有四十个选区被宣布为“正式”选区；这就是說，党在这些选区中很有把握在竞选中获胜。因此党應該参加竞选的有：十二个薩克森选区和五个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选区，汉堡的两个市区和郊区，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不伦瑞克第一区，在西里西亚有賴辛巴赫—諾伊罗德和瓦尔登堡，在萊茵区有爱北斐特—巴門、累内普—梅特曼和佐林根，在美因部有哈瑙

和奥芬巴赫，在巴伐利亚有纽伦堡，在维尔腾堡有埃斯林根—基尔希海姆，此外还有中德小邦，如安哈特—别恩堡、萨克森—迈宁根和罗伊斯(长系)这几个选区。

为了领导选举，在汉堡成立了一个由五人组成的中央选举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同时承担党领导的其他一切任务。根据普鲁士最高法院的裁判，为一定的选举而成立的团体不受普鲁士结社法约束。从前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被选入中央选举委员会，他们是哈特曼、德鲁西、盖布、奥艾尔，还有代替已迁居莱比锡的哈森克萊維尔的H. 布腊施。规定两个主席的月薪各为四十五马克，两个书记各为一百五十马克，司库为一百三十五马克，中央机关报的两个编辑各为一百九十五马克。社会民主党议员每天可领九马克的日薪，如果他是月薪在一百马克以上的党的干部则每天领六马克，如果住在柏林则日薪只三马克，一个常任鼓动员每月薪金为一百三十五马克，此外到自己的鼓动地区以外旅行时，单身汉每天可领一个半马克的津贴，已婚的每天可领三马克津贴。临时任用的鼓动员，单身汉日薪六马克，已婚的日薪七个半马克。在1876年代表大会上党的薪金的调整，充分表明所谓“劫掠工人的金钱”是怎么回事，聪明的资产阶级对这个争论也像对所谓“退却”那样感到兴趣。如果党按条件较好的工人的工资水平发给它的工作人员薪金，那么它就履行了它为了自己的尊严应该履行的义务。党不能像任何资本家那样支付极低微的工资。但是党决没有超过这条界线：从没有一个人由于做党的工作而发了财。在为党的工作而耗 468
尽精力的人们中，恐怕只有很少几个人不是这样：如果他们选择资产阶级的职业，他们的工作就能得到较高的报酬。

1877年1月10日举行的帝国议会选举，实现了人们对它的期望。有一百七十五个选区提出了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他们共得

四十九万三千四百四十七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九以上。这时社会民主党已经成为帝国内的第四大党。它只是还在很大程度上次于民族自由党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党，稍次于保守党。如果撇开帝国议会的小党团不谈，那么在真正的政党中社会民主党已经胜过了进步党和自由保守党。选票的分配表现出阶级斗争的更严酷、更尖锐的征象。在运动主要从政治上的普遍不满中汲取力量的地方，运动已经停止，甚至稍有后退。相反地，在柏林、汉堡、阿尔托那、布勒斯劳、马格德堡、不伦瑞克、不来梅、德累斯顿和其他许多大城市中，运动得到了惊人的进展。现在柏林一下子就补做了在过去的帝国议会选举中所耽误的事情。在柏林，社会民主党获得了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二票，几乎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四十；在汉堡，得了二万五千九百四十二票，它所占的百分比更大一些。资产阶级煽动家的手摇风琴不得不完全改变调子。1874年的选举后，社会民主党的成果是依靠“堕落的”产业无产阶级和农村的工业居民得来的，而大城市被誉为教育和文化的安全地，可是现在大城市成了没有祖国的贱民的障地了，而农民则起了坚定地使摇摆不定的天平趋于平衡、阻止将要破坏现行制度的石块滚动的光荣作用。

普鲁士除六个行政区外所有的省份都“受了传染”。当然除了波美拉尼亚的一个行政区斯特拉尔松和西普鲁士的一个行政区马里恩威尔德外，还有西里西亚一个行政区奥佩恩、威斯特伐里亚一个行政区明斯特尔和两个莱茵行政区亚琛和科布伦茨，这就证明教皇全权主义的宣传仍然是工人运动的严重障碍。但是这也表明，这种限制已经开始被冲破了。自从1874年以来，社会民主党

469 所得选票，在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由二万八千八百二十四票增加到四万四千六百九十票，在西里西亚由九千零四票增加到二万三千四百四十九票。在中等邦里，萨克森的选票增加最为显著，社会

民主党所得的选票在六年中增加了将近三倍，达十二万三千九百七十八票，占所投票数的百分之三十八。在巴伐利亚也已经出现了抗拒教皇全权主义潮流的运动，不过这个运动比莱茵—威斯特伐里亚和西里西亚的运动还稍逊一筹。在巴伐利亚诸省中，法兰克尼亚和社会民主党的堡垒纽伦堡遥遥领先。在维尔腾堡和巴登，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数从1874年以来几乎没有增加，但是在这两个邦中，运动也集中于大城市。在斯图加特，社会民主党得了四千六百零九票，几乎已经等于一个月前社会民主党在它首次参加的维尔腾堡邦议会改选中所得的票数。为了维持《南德人民报》，人们作了许多努力，费了许多心血，在卡尔·希尔曼转到汉堡的党机关报工作以后，排字工人格奥尔格·巴斯勒担任了该报的编辑和行政工作。自从反动的出版法公布，从北方吹来一股烈风以后，在士瓦本邦迫害也开始了。正如斯图加特在维尔腾堡是运动的据点一样，曼海姆在巴登，路德维希港在普法尔茨也是运动的据点。曼海姆共得了一千六百八十九票，同年，德雷斯巴赫创办了《巴登—普法尔茨人民报》，每周出版一次，不久就有了几千个订户。主要由于埃哈尔特由曼海姆暂时到普法尔茨进行鼓动工作，两派合并以后，第一个有二十个地区的代表参加的工人大会就在普法尔茨召开。普法尔茨的三个选区共投二千五百票。进行宣传鼓动的主要据点是路德维希港的苯胺—苏打工厂，老百姓叫它“骨粉制造厂”，有几千个工人在那里劳动。但是由于莱茵巴伐利亚的大工业只吸收了很小一部分有技术的手工业工人，而吸收了許多由于日益恶化的份地经济而过剩的小农和雇农，所以运动受到了阻碍。这些没有要求的、还被财产的魔鬼束缚住的分子，是进行剥削的资产阶级的理想工人，因此很难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

在分配议席方面，党又吃了大亏。党指定的四十个正式选区，470

規定得很正确；根据它的票数同总票数的比例，它应得三十六个議席，但实际上它只得到十二个議席。在第一次选举中，过去的九个議席党只保住了五个：阿尔托那（哈森克莱維尔）、格劳豪—梅朗内（倍倍尔）、施托貝克—施内貝克（李卜克内西）、茨維考—格里米乔（莫特勒）和开姆尼茨（莫斯特）。此外党赢得了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弗里茨舍和哈森克莱維尔）、薩克森选区奥尔巴赫—賴辛巴赫（奥艾尔）和莱比錫郊区（德姆勒尔），最后还有罗伊斯（长系）选区（布洛斯）。在这十个席位中，在补选时又失去了阿尔托那，这次补选是由于哈森克莱維尔在柏林第六区担任議員而引起的。此外党参加了二十次复选：在柏林第三区、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馬格德堡和紐伦堡，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的伊策霍、格吕克施塔特、普伦—塞格貝克各选区，在薩克森的德累斯頓旧城、波尔那、弗賴貝克、普劳恩和茨朔泡各选区，在莱茵区的爱北斐特—巴門和佐林根选区，在西里西亚的賴辛巴赫—諾伊罗德和瓦尔登堡选区，最后还在哥达、哈瑙和奥芬巴赫参加了复选。但是党在这些选区中只在三处获胜：德累斯頓旧城（倍倍尔）、賴辛巴赫—諾伊罗德（奥·卡佩尔）和佐林根（里廷豪森）。倍倍尔在德累斯頓旧城担任議員，在格劳豪—梅朗内，白拉克代替了他的职位。

但是，党不必由于議席不多而減輕对自己的巨大成果的欢欣心情。因为除大地主在农村无产階級中进行了恐怖監視的普伦—塞格貝克外，党在即使遭到失败的选区中所得票数也大大增加；在复选中党所得票数比它在这些选区中的候选人在初选中所得的票数多六万二千三百六十八票。在增加的票数中，人民党分子和天主教工人所投的較少。在必須阻止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得胜的紧要关头，资产階級的牛鬼蛇神都不顾一切恶毒爭吵，毫不犹豫地联合起来。党使它的敌人如此惊慌失措这一事实，就抵得上几个議

席。在帝国議會中，社会民主党議員感觉到有一种比前一个立法时期更严重得多的敌意；民族自由党人瓦伦頓为了打断工人階級的議會代表的发言，常常提議停止討論，因而得到了一个臭名。 471

1877年的代表大会是由社会民主党帝国議會議員召开的，大会地点在哥达，時間在5月27日至29日。出席大会的有代表二百五十一个地区的九十五名代表，根据他們的委托书上所載的选票数，他們代表三万二千名积极的會員。奥艾尔又代表中央选举委员会做了报告，报告叙述了1876年8月11日到1877年4月30日的工作情况。在这不到九个月的時間內，党的金庫收到了五万四千二百一十七馬克，其中有一万馬克是《选举人》的发行人繳納的。与此同时，各选区为了竞选作了巨大的努力。阿尔托那为竞选花費了三万馬克，在柏林举行了三百零七次报告会和討論会以及一百四十四次选举协助者會議，由黨員散发大多数是无償的一百三十四万六千一百四十五份印刷品。此外，在这个短期的火热斗争中，党还創辦了十八种新报刊。現在除了《前进报》外，党还有四十一种报刊，其中有十三种每周出版六次，有十三种每周出版三次，三种每周出版两次，十二种每周出版一次。这些报纸中有二十五种是在合作印刷厂印行的，这种合作印刷厂在德国有十四所。根据奥艾尔的統計，党报的四十四個編輯中有十二个受过差不多完全的大学教育的記者、十一个排字工人、四个商人、三个鉗工、一个瓦工、一个制革工人、一个皮带車床工、一个机械匠、一个雪茄烟工人、一个木工、一个桶匠、一个鞋匠、一个金匠、一个书商、两个裁縫、一个教員、一个制图員。奥艾尔列举这个数字，駁斥了所謂“怠惰的天才”的鬼話和这些人通过煽动和剝削工人而过着放蕩生活的胡說。随着党报的增加而增加的对党报的告发和懲罰性判決表明，这种放蕩生活到底是怎么回事。《开姆尼茨自由报》在一年中

被判八年徒刑，大多数党报也有同样情况。但是这些迫害使党变得更加坚强，由于党相信自己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老的組織迷特耳克才能够提出沒有任何爭論就一致通过的議案：代表大会“考虑到普魯士官厅空前无耻地正式宣布普魯士的社会主义团体完全非法”而放弃一切党的組織，由党员根据当地的需要和条件自己組織起来。

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經被认为是国际工人运动的强大的先鋒部队，各国的无产者向它的代表大会致以兄弟般的祝賀。为了表示各国社会主义者的团結，1877年哥达代表大会根据福尔馬尔的提議，决定派代表参加由巴枯宁主义者九月在根特召开的世界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大約有欧洲三十个工人党的代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是李卜克內西。經過激烈的爭論之后，无政府主义派以十三票对十六票失敗。取得胜利的多数派締結了一个团結协定，发表了宣言，根据老国际的精神，論证了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因为它是一种有力的鼓动、組織和宣传手段。但是李卜克內西本人在《前进报》上提醒說，不要对这些事件作过高估計；有許多不得已的理由禁止用旧形式恢复国际的尝试。

工会运动比政治运动的范围狹窄一些。持續許多年的商业危机抵消了两派合并給工会运动的新的推动力。警察的迫害不仅从外部損害了工会組織，而且也通过关于組織的最好形式的爭論开始从內部削弱工会組織。甚至連以往沒有同二十六个邦的二十一种不同的結社法打过交道的英国工联，也从沒有发生过这种爭論。1877年和1878年之交，在一千三百个地方有五万工人参加了工会，这个数字本身是很小的，实际上它只占有有关工业部門的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一點五，虽然如此，它仍然为德国无产階級对工会組織的强烈要求提供了光荣的证明。

由盖布統計的、并在 1878 年 1 月公布的一个詳細的数字，說明了当时工会的概况。根据他的計算，有二十六个中央联合会和五个地方协会，这个数字显然是过小了。九个中央联合会設在汉堡，被特森多尔夫解散了的工会都逃到汉堡去了。十五种工会报纸中最大的、讀者最多的（有九千三百五十个訂戶）报纸《先鋒》⁴⁷³也在汉堡出版。这家报纸是桶匠、車匠、細木工和粗木工的机关报，同时也为男女工場工人和手工工人服务，这些工人总数为四十万人，但組織起来的只有一千二百人。包括該行业工人的半数左右并拥有相当多的經費的最强大的組織，是印刷工人工会（有會員五千五百人）和造船木工工会（有會員三千人）。差不多男女各占半数的六万五千名烟草工人中，已組織起来的只有八千一百人，但是他們的經濟情况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好轉。在德国貴金属工人中心普福尔次海姆組織起来的、后来迁到士瓦本的格明特的金工和銀工工会，在成立六年之后，它們的殘废互助会的基金达一万八千馬克。鞋匠工会設在哥达，有三千五百八十五个會員；五金工人工会設在不伦瑞克，有四千會員。鉗工和鍛工已經脫离了五金工人工会，成立了自己的最初人数很少的联合会。瓦工和石匠共有二千五百人，他們的机关报是在汉堡出版的《基石》。各工会每月結余八千馬克左右，其中很大一部分（三千五百三十八馬克）归印刷工人所有。只要危机繼續存在，增加会費就不可能，而当工会急于要避免利用“互助会法”对它进行的打击而迁移到还没有取消工人的独立的疾病保險法的狹小地区的时候，增加会費更是不可想像的。只有十六个工会設有备过案的互助会。盖布认为把原来过于分散的工会报纸集中起来，是最近的一个进步。1878 年圣灵降临节时将于馬格德堡举行工会代表大会討論这些問題和其他組織問題。

但是“工人营的脚步声”总是首先在政治运动中发出回响。3月10日，当柏林工人为了使他们的选举获得胜利的組織者送葬的时候，《馬格德堡报》以悲喜剧性的惊駭心情写道：“这已經不是营，而是团、旅、师，是整个的兵团了”。奥古斯特·亨施在年富力強之年死于慢性的无产者病，他的葬仪成了巨大的示威运动，自从3月18日的死者的葬仪以来，柏林还没有举行过这样的葬仪。因为像平时一样寬大的警察禁止展开旗帜，甚至扛着掩蔽起来的旗帜也不許可，所以成千上万的人紐扣上都带着一朵紅石竹花，聚集到丧宅前面。在穿过东部工人住宅区通往墓地的路上，屋頂和窗口都飄着黑旗。柩車經過时，几十万人佇立街旁，默默地脫下帽子。4月28日，人們同样肃穆地給《柏林自由报》的編輯鮑尔·登特勒尔送葬，登特勒尔也是由于患严重肺病死在看守所里，虽然那里的医生曾經建議释放他。

一支懂得这样紀念自己的牺牲战士的軍隊是不会像愚蠢的资产階級那样受人愚弄的，俾斯麦和同他一起企图掠夺群众的人物是能够理解这一点的。

三 理論的不确实性。恩格斯反对杜林

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装备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它的实践远远走在理論的前面，为了即将到来的艰苦斗争，党像需要实践一样需要理論。过去它反对过从半官方的《地方通訊》到《人民报》有成千个传声筒的自由貿易派，現在它面临着势必使它站到彻底的自由貿易主义者一边去的轉变，即必須反对用社会主义口号裝飾門面，但实际更落后得多的流派。像社会民主党的鼓动这样强有力的人民运动，不能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为达到社会主义最終

目的而进行的宣传方面，它必須实际干預日常的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但不能損害原則：党不能用結論，而只能用方法，不能用科学共产主义的最后的思想，而只能用科学共产主义的全部思維方式来完成这个任务。可是党等于完全缺乏这种东西。

毫無疑問，党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它不会立即被流行的反动的“社会主义”所誘惑。1876年的代表大会已經通过了反对俾斯麦的保护关税政策和国有化計劃的決議，代表大会决定社会民主党 475 議員應該在帝国議會中提出工人保护法案。可是討論的情况表明，代表大会并不了解法律上的工人保护的意義。提出这个議案的哈賽尔曼只把这个法案当做掌握萊茵选区十分必要的手段和对教皇全权主义者的攻击手段，可是奥·卡佩尔甚至把它看做是一个违背原則的錯誤。在短時間的爭論中，沒有一个发言人是根据国际代表大会贊成工厂法的精神发言的。1877年社会民主党議員在帝国議會中提出的工人保护法草案，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制、选举工业議會和工业法庭、委派工厂視察員、对劳动場所进行卫生警察監督、把工会組織从反动結社法的束縛下解放出来。这个草案同許多資產階級政党提出的关于繼續形成工人保护立法的各种溫和的提案一起，供政府考虑。

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的結果，許多資產階級分子，甚至連官僚分子，已經不再像頒布工业法規时期那样，对法律上的工人保护毫无理解了，不管这种較清楚的認識出于极端恐惧，还是出于一种較好的感情。普魯士从1875年起，薩克森比普魯士早几年，开始委派少数的工厂視察員。在普魯士商业部中，甚至制訂了一个規定全帝国都必須实行的工厂視察員制度的修訂法令。当然这个法令被对它作評价的大工业家扼死在搖籃里了。这个法令尤其遭到俾斯麦的反对，因为他的心至少为一种自由，即为剝削自由而热

情地跳动着。1878年春天，提交帝国議会的工业法規修訂案，根本沒有提到委派工厂視察員的問題，而只有几点改进工业法規的不充分的保护規定的温和建議。帝国議会通过了这个修訂案，自动地增加了委派工厂視察員这一条，但不适用于帝国，而是規定各邦政府應該委派具有地方警察机关的一切职权的工厂視察員。各邦政府不敢公然反对帝国議会的这个決議；它們只是偷偷地抽掉
476 了它的重要內容，它們在职务条例中規定新官吏无权行使地方警察机关的职权。

反对保护关税和铁路国有化的決議，同社会民主党的劳动保护法草案的情况相似。1876年的代表大会能够走上正确道路，主要是出于觉醒的階級意識的实际本能，而不是由于对事态有明确認識。反对铁路国有化的決議十分强烈地动摇于小資产階級的两种看法之間：一方面，为了消除私有财产的毫无理由的垄断現象，铁路應該轉归国有；另一方面，占有铁路将使帝国拥有新的反人民的优势。沒有能够把这个表面的矛盾化为观点一貫的正确立場。在反对保护关税的決議中，甚至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同时并存。莱茵区的代表，尤其是柏林代表，如弗里茨舍、腊科夫、哈賽尔曼和莫斯特倾向于保护关税。因而费了不少力气才勉强达成協議。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民主党对有产階級内部发生的关于自由貿易和保护关税的爭論应采取冷淡态度；第二种观点认为，自由貿易的商业协定对德国工业不利，需要加以修改；第三种观点认为，應該告誡工人不要替渴望保护关税和爭取国家援助的資产階級火中取栗。因此不久以后，当政府利用所謂对铁的調节稅而开始执行保护关税政策的时候，社会民主党議員在投票中表現了三种不同的态度：一部分人弃权，一部分人贊成，一部分人反对。

党报在橫广方面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深度方面沒有同时获

得发展。許多新报的基础还不巩固，必須尽最大的努力，才能繼續生存。它們的大多属于无产阶级的編輯沒有空暇时间来精通自己的业务。在他們的論证缺乏实际力量的場合下，他們就求助于豪言壯語来表达自己的信念。党也沒有一家指导性的机关报。在一个有充分民主的工人党的内部創辦一家这样的机关报，不是輕而易举的事。这家报纸必須經常非常机智地在严厉的传令簿和寬大的信箱两种厄运之間航行。可是六十年代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八十年代的《社会民主党人报》表明，这个困难任务是可以光輝地加以解决的。在七十年代，尤其是两派合并以后，党的情况不怎么好。《前进报》不缺乏民主的实际行动，但却缺少卓越的理論。1878年夏天，《前进报》在連續許多期进行的冗长的討論中，对于价值論的形形色色的見解有了发言的机会，但是它沒有以一个能够說明問題的总结来指出整个爭論的結局，而这正是一个中央机关报的真正任务。經過这次討論，工人对价值論的認識必然比过去更加混乱。

在日常的政治問題和社会問題上，《前进报》对情况沒有清楚的認識，对德国的事态沒有具体而明确的看法。一切不愉快的事情都被用几个口号“打发”走了，于是一种自負的，但不令人高兴的音調传入了党内。同时《前进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发展，并不能掩盖它在国内政策方面的弱点。它在俄土战争中的亲土耳其的立場，就其性质而言，几乎同統治阶级的亲俄立場同样值得非議。党的影响最大的日报《柏林自由报》的情况也是大体相同。莫斯特在这里常常談論他实际上并不了解的东西。虽然他对蒙森的《羅馬史》的論战还有許多缺点，但不像资产阶级报刊所說的那样沒有意思，可是莫斯特所做的《資本論》第一卷的通俗摘要却存在許多最严重的誤解，他的論解决社会問題的办法的讲演把前此在社会

主义文献中經常受到尊重的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粗暴地打倒在地上，然后当自己在描繪“未来国家”时却陷入极肤浅的空想主义之中。

478 人們无須为伟大的灯火的这些阴影过分难过。它們不是年老衰敗的象征，而是茁壮成长的象征，在个人的一生中，人們常把这个时期称为年少气盛的时期。社会主义文献在同資产階級对手爭論时一向是占上风的。白拉克为 1877 年的选举所写的两本宣传小册子和自由派的辯論文章为这一点提供了明确的准繩。虽然白拉克只是从唯心主义道德的立場出发攻击資产階級財產的不义和不合理，但是他却毫不費力地战胜了《馬格德堡报》的幼稚的指責，也战胜了忠实的翁魯用来光荣地結束他对工人階級的三十年背叛的可惡的猥褻語言。当时《前进报》的最有急智的撰稿人之一銀行職員 H. 萊維，在一篇很值得一讀的文章中用一个反問回答了李卜克內西的关于“欧洲是不是應該成为哥薩克的欧洲”的問題，他說：“德国工人党是不是應該成为土耳其的党？”危险的庸俗感情在党内十分活跃，它直接或間接地促使从 1877 年 10 月起出版的两種科学杂志創刊。

弗·維德在苏黎世出版的《新社会》月刊只通过一部分撰稿人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关系，而卡尔·赫希柏格在柏林出版的《未来》半月刊，則能够适应当时党的环境。赫希柏格是法兰克福一个彩票发售人的儿子，是一个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自己承担《未来》杂志的費用，但不追求任何附帶目的，哪怕是个人功名的目的。社会主义在他是一种恋爱事件，当然不仅是从这个詞的褒义來說，而且从这个詞的贬义來說，也是恰当的。赫希柏格是阿尔伯特·朗格的学生（那时朗格已經主要求助于有产階級的政治家的見解，而不訴諸劳动階級的革命本能），他把无产階級的階級斗

爭的粗暴方面視為畏途。他相信能使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切公正而有見識的人的事业。他的唯心主义哲学把他的理想和信念引入了迷途。在《未来》杂志的头几期中，他宣称，社会主义“仅仅由观念中产生它的要求、目标和目的”，“社会政治理想的唯一創造性泉源是：不受現存状况的約束而且同它对立的独立意識及其應該存在的概念”，“社会主义学說”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叙述“社会主义国家”，并证明它是能够實現的。这就使理論的社会主义倒退了大約半个世紀。在《共产党宣言》出版三十年后，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 479 不以特殊的感覺來讀这种綱領性声明。^①

他們遵守良好的紀律，保持沉默。假如《未来》能够存在得更久一些，恐怕它的空想的社会主义不久也会治好。甚至在《未来》的唯一的年集中（尽管这一卷也是五花八門的，相当杂乱），已經存在着許多这样的萌芽。卡·奥·施拉姆是赫希伯格的最热心的撰稿人之一，他熟悉反对自由貿易派的斗爭，熟悉到已經帶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极为自信的腔調，可是現在却以为这里面包含着社会主义，并含糊地反对俾斯麦的反动的国有化計劃，而对可恶的自由貿易派的几句咒罵，对这个計劃是不起什么作用的。米尔伯格也再一次拿出了他的蒲魯东主义的庸医处方，实际上《未来》的很大一部分篇幅被用来討論建立“未来国家”的問題。但是已經有一些人起来反对这样做了，特别是倍倍尔，他直截了当地駁斥了米尔伯格的荒謬举动和施拉姆的动搖性，同时在一篇論帝国卫生总署的論文中表明，他懂得估价資本主义社会解决真正的文化任务的能力，如果这种能力确实存在的話。总之《未来》暫時增加了党内理論上的

^① 參閱 1877 年 10 月 19 日和 1879 年 9 月 19 日馬克思致弗·阿·左尔格的信。（見《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342—343 和 363—364 頁。——譯者）

不确实性。《新社会》的情况即使不致于更加严重，至少也是这样，它的出版人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偿赫希柏格的极端理想主义的真正而深刻的正义感也沒有。

当时从有产階級中前来参加社会民主党，以便在这个初升的太阳的照耀下使自己得到温暖的，并不都是赫希柏格这样的人。莫名其妙的发明家和改革家、种牛痘的反对者、自然疗法医生和类似的奇怪的天才人物，企图在极为活跃的劳动階級中寻找自己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贊許。在改革腐朽世界的新冲动中，有階級觉悟的无产階級表現得也不很冷酷，它主要注意自己助手的善良願望，而不注意他們的实际力量。来自学术界的人特別多。自从旧大学生协会时代起就一直在大学生中保持着的资产階級激进主义传统，在进步党的政治分解中消失了。按照禀賦、出身和社会环境的不同，大学生們不是追求庸俗的功名（这种功名心最强的还用排犹主义的豪言壮語来虛张声势），就是力图同社会民主党接近。

资产階級的社会主义术士中最重要的一个，是私人讲师欧根·杜林，他已經远远超过了他过去同俾斯麦和瓦盖納的秘密协定。他极为成功地讲授許多不同的学科，同时在迅速陸續出版的几本著作中提出了独特的哲学—社会主义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断言已經发现了許多最后的真理。同这样高的要求相适应，除了少数例外，他都是用十分傲慢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哲学和社会主义先驅者。他特別对馬克思和拉薩尔发泄了大量怒火。虽然如此，受到杜林的著作和演讲的相当大的影响的，并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最坏分子。主要的問題是要了解杜林，而不是简单地像他宣布馬克思和拉薩尔的罪状那样，也宣布他的罪状。毫无疑问，杜林有很大的才能。同讲坛社会主义者不同，他反对一切不完全消灭工資制度的社会主义，他贊成工厂立法，尤其是工会組織，但是只

把它們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代表以拜伦和雪莱、馬拉和巴貝夫以及巴黎公社的人們为表率的政治激进主义。恰恰是社会民主党中那些头脑发热的分子，他們不再满足于拉薩尔的鼓动著作，而且还没有根据馬克思的《資本論》的一切历史联系去理解《資本論》，就必然强烈地被杜林的学說所吸引。

杜林的一生也不是沒有伟大之处的。他是一个普魯士官吏的儿子，从小就丧失父母，曾在孤儿院和寄宿学校里受教育，进入司法界不久，双目失明，他从这样困苦、窘迫的境遇中上升到一种自由的世界观，并在同生活的需要作最艰苦的斗争中坚持这种世界观。当然他实际上只了解旧普魯士的状况。因此他不得不带着他那思想工作的一切力量和勇气停留在虛无飄渺的境界，但并没有脱离他确实亲眼見过的落后的世界角落的痛苦的人間渣滓。杜林否定专门普魯士的社会主义，但是他并没有战胜这种社会主义，因为481他把政治暴力看做一切奴役的起源。他不了解現代资产階級社会，但却像过去那些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以革命的市民階級的启蒙文献为依据。同时他也陷入空想，陷入了他那可怜的、索然无味的未来公社幻想之中，他自以为由于設計了这个未来公社，他甚至比馬克思更高明。他以輕蔑的口吻談到經濟的階級斗争的单纯“飼料目的”，可是普魯士大学教授职位的飼料桶却在他的思想和斗争中起着极大的作用。最卑微的出发点和空想的模糊的目标之間的不相称，以另一种方式显露出来了，杜林在同大学的官方人士爭論时，产生了一种可恶的夸大狂，因而他最后想在所有科学中独树一帜，可是哪一門也不彻底地加以研究。

在这种情况下，杜林对革命的工人运动的不断增长的影响，是一个严重問題。革命的工人运动恰恰最不可能从一个想在自己的体系中(不管这个体系如何)不久就結束科学的发展的人那里学习

它最需要的东西——辩证——历史的理解方法。当然社会民主党已经成长壮大，杜林不能使它成为他的夸大狂的垫脚凳，可是他能够在刚刚合并的党内重新引起不幸的混乱。从1877年初，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发表的一批论文中制止了这种危险。他从各个不同的方面考察了杜林的体系，在他的批判性的分析中，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考验了历史和自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

杜林为反对马克思和拉萨尔而发表的议论，无非是一连串的谩骂夹杂着一些误解，这些看法是不是真的误解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恩格斯没有考虑给杜林以任何宽恕，恩格斯说得好，对于一个具有这些要求的人来说，这种考虑便是一种奇耻大辱。恩格斯认为杜林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嚣声中。”^①恩格斯并不讳言，近来德国社会主义也大吹牛皮。从他的论文中的好几个地方可以看到，他和马克思已经脱离了马克思写关于纲领的信时的错误前提了。当杜林的诽谤结束的时候，他们用冷静沉默的态度回答了比杜林的诽谤更恶劣的攻击。这次恩格斯所以进行干预，并不是为了不久就退出争论的杜林这个人，而是另有目的的。

还在恩格斯的论文在《前进报》上发表的时候，大学的官方人士由于杜林有其好的一面而早就把他看做眼中钉，他们利用异端裁判所来压制这个可恨的敌人，根据莫须有的理由把他赶出大学。他的社会民主党的追随者勇敢地出来为他辩护，从而开展了一个活跃的大学生运动，这是德国最后一次大学生运动，它得到了理想的发展。可是杜林本人给自己丢了脸，从这时起他公然以宗教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8—9页。

立人的姿态出现，要求得到一个宗派首領的可靠的权力。这样一来，他对革命的工人运动的影响就永远消失了。

相反地，恩格斯对他进行的論战，直到今天还是生气勃勃，还在发挥作用。这篇論文用卓越的方式向德国和国际无产阶级闡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观点；一个范围广闊的文献就是以这个观点为出发点、为基础的。它的积极的成果是很有价值的，资产阶级学术界虽然頑固透頂，也大部分不能否认这些結論的令人信服的证明力。可是它的划时代的意义却在于，它通过理論和范例帮助辯证的思維发生作用。恩格斯正是通过这一論著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当时像面包那样迫切需要的东西給了它。他提供了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就其性质來說同十几年前拉薩尔的《公开的答复》所給的动力具有同样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

党对这一著作的有点粗暴的接納可以极确切地說明，这一著作是多么必要。莫斯特和其他一些人很想不让它在《前进报》上发表，像大学的官方人士对杜林那样，对恩格斯进行同样的异端裁判。幸亏 1877 年的代表大会不同意这样做。它只由于宣传上的实际理由，决定不在正刊上、而在中央机关报的科学副刊上連續发表这篇純学术性的論文。这篇論文的发表当然引起許多的恶言恶語。奈泽尔为《前进报》辯护說，編輯部沒有足够的力量适当地检查恩格斯的著作，瓦尔特希用曾經使拉薩尔反感的傲慢态度說，恩格斯发出的調子必然引起味觉的錯乱，使《前进报》的精神粮食成为不堪入口的东西。 483

論文續完以后于 1878 年夏天出版了单行本。正当一片阴云使政治地平綫变得阴暗的时候，这盞明灯安詳地放射出它的光輝。

第六章

反社会党人法

484 在这期间，俾斯麦十分顽固地执行他的财政计划、税收计划和关税计划。在1877年的选举中，他就得到了初步成果。民族自由党人失去的大约二十个议席，都落到保守党手里。自由贸易派的力量稍稍削弱，保护关税派的力量却略略加强。但是在帝国议会中还没有形成保护关税的多数派，保守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加在一起仍然是少数，俾斯麦不得不进一步设法使民族自由党人就范，这对他来说本来是极方便的事情。

这里还必须列举一下俾斯麦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的各种尝试：威胁性的辞职、忿然退入庄园等等的手段。1877年圣诞节，俾斯麦和卡尼格先在瓦尔岑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谈，以失败告终。当时卡尼格先还不像今天他的继承人这样；俾斯麦所给的，他觉得太少，俾斯麦所要求的，他觉得太多。民族自由党人可以派一个或几个人进入内阁担任无足轻重的角色，可是为此却必须赞成烟草专卖和一大堆财政关税，没有“立宪的保证”，也不保证由此大大缩小了的议会批准预算权；民族自由党人将得到一部分表面的政权，但却要放弃他们现有的实际政权的相当大一部分。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过分无理的要求，而当俾斯麦同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日益亲密、早就使民族自由党人对他们的专制独裁感到畏惧的时候，事

情就更是这样了。

在1878年2月开始的帝国議會會議期間，矛盾更大大尖銳化了。俾斯麦明目张胆地要求实行烟草专卖；过分貪恋大臣职位的康普豪森不得不下台。像施托尔貝克—維涅格罗德伯爵这样一文不值的封建人物，或者像霍布萊希特这样中立的官僚分子进入內閣，担任了卡尼格先拒絕接受的职位。复活节前后，半官方报刊发表了这样一种言論，这种言論使人毫不怀疑地认为，由于装病或者真正有病退居弗里德里希斯魯的俾斯麦，只是在等待解散帝国議會的机会，然后通过某种“全民投票”成立一个能給他带来几亿馬克新稅款、并竭力削弱本身的权力的議會。

485

俾斯麦过去一直憎恨社会党人，現在也是如此，因此他很容易想到，把赤色幽灵当做他攫取人民金錢的卓越的推动者。假如他在这一方面还需要一个动力的話，那这时走在攻击社会党人的資产階級前列的进步党就給他提供了这种动力。进步党的較老的，无论如何还比較能干的領袖已經死了，現在它的領導权掌握在勇敢的欧根·李希特尔手里。这位杰出的思想家咒罵社会民主党是“警察国家的胎盘”，或者说，任何人也不用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那部书所证明的无非是只要人类还没有成为天使，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有其阴暗的一面。在这个时候，人們如果怀有几分好意，便可以把这看做是病态的、但无害的放肆行为。可是欧根·李希特尔却以党的名义宣布，同反动党派斗争是次要的事情，同社会民主党斗争是主要的事情。他的口号是：宁要路秋斯不要卡佩尔！^①《人民报》并没有提出实际要求，只是曾經用假設的語气說，如果在爱尔福特进行补选，需要在俾斯麦派的路秋斯和社会民主党人卡佩

^① 路秋斯是大地主，帝国議會議員，俾斯麦的亲信，卡佩尔（奥古斯特·卡佩尔）是社会民主党帝国議會議員。——譯者

尔之間进行选择的话，进步党应该投票赞成卡佩尔，反对路秋斯。这一来不仅所有其他进步党报纸都对这个胡说八道的孩子破口大骂，而且进步党中央选举委员会也庄严地登上讲台宣称，《人民报》的假设违背党的一切神圣传统。这些传统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血管中汲出了最后一滴血，从它的骨头里汲出了最后一点骨髓。

一 基督教社会鼓动

486 这个时期声势赫赫地登上社会舞台的基督教社会鼓动，虽然同进步党的政策差不多一样狡黠，但它仍企图压倒别人。

十九世纪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有两个历史根源，一个是：它是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的伴随现象，从工人共产主义的理论形式来看，它以它所熟悉的思想材料为基础，正如伟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他们熟悉的启蒙的思想材料为基础那样。现代无产阶级在其解放斗争初期喜欢回忆早期基督教，同卡贝和魏特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自发的工人共产主义的历史上两种最重要的形式，都带有宗教色彩。只是这种色彩通常很快就褪了色。群众对他们的运动的无产阶级内容理解得越透彻，他们就越无情地粉碎运动的教长形式。

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历史根源是：它产生于有产阶级，是封建社会主义的伴随现象。因此它用不着一开始就进行有意识的欺骗。宗教思想家可能理直气壮地认为，采取宗教途径可以援助穷人和无产者。可是，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总是短命的；它的反动内容很快就突破了无产阶级形式。有时它非常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可是，只要一触犯到封建主义剥削，或者攻击剥削关系本身，它就不管怎样总得投降，它的信徒只

有两种抉择：后退或者低头。

历史发展必然使德国工人运动不会长期受到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纠缠。手工业者和进步的工人热烈欢迎的古典哲学，早就把他们头脑中的天国幻影清除掉了。在魏特林那里，宗教因素甚至已经以简直是落后的形式出现。三月革命以前的反动派利用它的假社会主义信仰，并没有能够在工人阶级中得到任何东西。在七十年代初，工人运动重新抬头的时候，它对一切宗教问题都是漠不关心的。只有爱森纳赫派有时以无神论的理论信徒的面貌出现。倍倍尔有一次在帝国议会宣称，他在宗教上是无神论者，在政治上共和主义者，在经济上是共产主义者。1872年，美因兹代表大会虽然否决了党员有义务退出德国国教教会的慕尼黑提案，但是代表大会建议这些党员在接受了党纲，真正放弃了一切宗教信仰以后，正式脱离教会团体。

可是，恰恰是对宗教一哲学问题较有深入研究的爱森纳赫派了解到，宗教问题已经完全被经济问题吞没了。大卫·施特劳斯的论新旧信仰的著作，前半部宣扬了最坚决的无神论，而后半部却宣扬最反动的帝国爱国主义。布鲁诺·鲍威尔在自由贸易派的主要杂志上发表了论基督教起源的划时代的研究著作，他同法赫尔一起创办了施特鲁斯堡派的机关报《邮报》，同时为鲁道夫·迈耶尔的《柏林评论》写了政治概论。时髦哲学家冯·哈特曼故弄玄虚地论述了“基督教的自动分化”，他是攻击社会主义者的最可恶的人之一。几乎所有德国达尔文主义者都是这样的人。总之，经济的阶级斗争不再披着宗教的外衣，这是越来越明显的事实，这是不广泛支配自然界、不彻底摧毁一切超自然的观念便不可能出现的大工业的明显的后果。

在哥达纲领中，这种认识得到了还不完全自觉的、但恰恰因此

而很明确的表达。在原来的草案中，要求“信仰自由”，而在最后定稿时，用“宣布宗教为私事”一詞代替了“信仰自由”一詞。这样改首先是出于使概念更精确的純外部的原因，在普魯士政府喜欢装扮成反对羅馬教廷的、爭取“信仰自由”的先鋒战士的时候，精确地确定概念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宣布宗教为私事”一詞在实际上馬上被轉义为：对于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來說，宗教也是私事。只要宗教成了統治階級的权力手段，反对宗教就应列入綱領的其他章节內，諸如一切禁止自由思想和自由研究的法令都应废除，学校应由国家管理等。可是反对宗教本身的一切导因已逐漸消失，因为人們每天都看到，反对最后一个普魯士警察的斗争比最胆小的庸人也能泰然进行的反对亲爱的上帝的斗争需要更大的勇气，同时也看到，現存的一切宗教烟雾并不妨碍无产階級階級意識的觉醒。

当然文化斗争給工人运动制造了一些障碍，因为它又一次使天主教工人更紧密地同他們教會的被迫害的教士联合起来。可是，如果由此证明，对純宗教观念作斗争，是一种无效的、損人不利己的武器，那么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事实却表明，大工业的发展和同大工业有密切关系的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的階級对抗的尖銳化，比任何言論都更彻底地清除了宗教意識。哪里的天主教企业主和天主教工人驟然对立起来，哪里自动地不让把无产階級的反抗鋒芒指向“自由派”資本家和“新教”資本家，哪里的天主教社会主义的蠱惑性就暴露出来，教皇全权主义的資產階級絲毫也不比自由派資產階級强。这种变化的典型場所是萊茵区的大工业城市亚琛。那里“自由派資本家”很少，天主教剝削者和天主教被剝削者之間的斗争逐年尖銳化，天主教會表明，一到紧要关头，它都是站在統治階級一边。副堂神甫克隆能貝克、拉夫、利岑格尔企图进行反抗，不仅遭到唯利是图的工厂主的鎮压，也遭到他們的教會中的上

司的同样程度的镇压。有的（如拉夫和利岑格尔）被迫屈服，有的（如克隆能貝克）被免职。但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历尽艰险，胜利地进入旧帝都^①。

福音教会完全依赖国家，因此它从一开始依靠自己对工人运动的影响的程度，就远不如天主教会。1871年阿道夫·瓦格纳在柏林举行的所谓“伪善者代表大会”上尴尬地小心翼翼地对社会问题发表了议论，可是并没有什么结果。在这个问题上比他的老师洛貝尔图斯模糊得多的鲁道夫·迈耶尔想为了农业社会主义目的而把福音派教士动员起来，可是他的努力也没有特殊成就。正如一个福音派教士对鲁道夫·迈耶尔所说的那样，愿意这样做的教士被上面“制止”了。俾斯麦是一个十分讲究实际的实业家，他不特别重视用宗教掩饰剥削方法。他也不希望有一个可能妨碍他的宫相职位的“福音派中心”。鲁道夫·迈耶尔和瓦盖纳力图使俾斯麦制定一个严肃的工厂法，可是他对他们的努力早就置之不理了。后来，当鲁道夫·迈耶尔在一本充满严酷的真理的、气势磅礴的论著中对俾斯麦不愿抛弃的资本主义腐朽制度进行了猛烈冲击的时候，这本书立即被没收，作者由于犯侮辱俾斯麦罪被交付法庭。顺从的法庭要判鲁道夫·迈耶尔很重的徒刑，而他选择了流亡的道路。

可是他争取到了几个福音派教士，首先是马尔克的乡村牧师鲁道夫·托特。1877年托特由于写了許多论德国激进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的文章而闻名于世。他是一个守正不阿的人，而且还是一个聪明伶俐、勤勤恳恳的劳动者，他的著作也是值得重视的成就，尤其是当人们考虑到，它是出自一个偏僻乡村的牧师的手笔

^① 亚琛曾为查理大帝帝国首都。——译者

时,更是如此。这本书表明了对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广泛了解,因此同自由派文人企图迴避根本观点的卑劣手段相比,它是一部杰出的著作。托特从基督教立场出发宣称,社会民主党的经济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政治目标,是无可非议的;他只是完全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无神论。当然任何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社会鼓动不能以此为依据。但是托特也不愿做政治—社会的鼓动员。相反地,他根据自己的这本书,建立了一个社会改革的中央协会,并创办协会的机关报《国家—社会主义者》周刊,这个刊物主要研究理论问题。

490 宫廷传教士施特克尔的情况却与此不同,他也受到鲁道夫·迈耶尔鼓舞,但是不久就对呆板的音调感到厌倦了。施特克尔没有托特的彻底性和追求真理的欲望,相反地却有进行有效的鼓动的一切才能:豪放的天赋的机智,思想和言论方面的大胆、敏捷,以及最困难的环境也不能使他沮丧和消极的情绪。施特克尔虽然具有真正的鼓动者所应有的一会儿坚持事实,一会儿取消事实的那种适宜的轻率,但他决不是自由派报纸狡猾地企图把他变成的那种虚伪的怪物。同欧根·李希特尔之流相比,他仍然可以被看做是爱真理的典型人物。甚至,他的崇拜者称他为“路德第二”,也不是完全不适当的。只是他缺乏把路德造成一个伟大历史形象的条件:一生中的革命时期。

施特克尔于1878年1月开展的基督教社会鼓动符合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只是适应它们的利益。当然施特克尔决不是受俾斯麦保护的人,他的第一个社会政治行动的矛头就明显地指向俾斯麦。在俾斯麦同卡尼格先商谈将由民族自由党担任大臣职位时,施特克尔对所谓自由主义的产物——社会民主党发动了进攻。他追求教会中的正统的统治,这种正统统治是同国家中的绝

对王权和封建容克阶级的统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基督教社会鼓动的目的，就是要使工人阶级为这些势力服务。他没有任何比较深刻的经济阶级斗争的见解。他的工人纲领是用农业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天主教社会主义的和行会制度的材料拼凑起来的。把法律上的工人保护和大肆掠夺的保护关税说成是同样美好的事情，对他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托特不会这样做，鲁道夫·迈耶尔更加坦率地取笑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畸形儿”。

施特克尔为了主要对八十高龄的皇帝发生影响所使用的手段，同他的崇高目的是完全相称的。他收集了社会民主党抛弃的一些蜕化变质的人，在他们的帮助下，于1878年1月3日在“冰窖”召开了一次民众大会，议程之一是建立基督教社会工人党。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有几千个社会民主党工人到会来看看情况，于是莫斯特和施特克尔之间展开了剧烈的舌战，这场舌战一直继续到后来的几次民众大会上。施特克尔巧妙地利用了他遇到莫斯特的这一意外收获。莫斯特热情而轻率，对这种喧嚣的舌战不但颇有好感，而且自己也着了迷，在一次民众大会中他违背党的一般策略，进行了号召集体退出国教教会的鼓动。这一鼓动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成果，这并不是因为工人对教会忠心耿耿，恰恰相反，是因为工人对教会极为冷淡，不值得正式退出，以免由此招来许多麻烦。但是施特克尔毫不迟疑地利用社会民主党的突击这一表面上的失利，并且还善于大敲共鼓。虽然鲁道夫·迈耶尔对柏林工人讲过几次话，没有用比嘲笑更坏的东西威胁参加社会民主党民众大会的保守党演讲人，但是施特克尔扮演勇敢而完美的骑士，敢于首先闯入狮洞，把莫斯特在公开的通告信中的普通的引文“同天国进行清算吧，你们的气数尽了”的词句夸大为教唆暗杀。年老力衰、脑筋迟钝的皇帝也被这位“比武者”所感化，而以新教教会最高主教

的身分，帮助在文化斗争时期稍受削弱的热狂的正统主义者重新站立起来。

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当然不信施特克尔的基督教社会鼓动。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反而约束莫斯特，阻止继续论战下去，这一论战似乎使施特克尔的活动有了一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重要意义。当工人对此不再关心的时候，基督教社会的肥皂泡就立即破灭了。施特克尔只不过是各种流氓无产阶级的磁石，流氓无产阶级在他那里寻找社会民主党所没有的美食，俾斯麦为了点燃他的地雷所需要的、在这个硫磺质的团体中的硫磺纔慢慢烧起来了。

二 謀刺案和白色恐怖

492 1878年5月11日，正当皇帝坐着敞篷马车经过柏林菩提树街的时候，洋铁匠帮工赫德尔放了几枪。这个虽不是厌世，但却极堕落的人硬说，他想开枪自杀以便引起皇帝注意民众疾苦，这肯定不是真话。可是另一种说法——他想击中和打死皇帝——也是不可信的。赫德尔的转轮手枪是打不准的杀人武器，它的枪身是斜的，根据一个在法庭上宣誓说自己是行家的宫廷制枪工人的证词，这支手枪从九步以外发射，就会比靶子高一英尺，向左偏一英尺。

赫德尔本人决不是一个政治热狂分子，二十岁就成了一个人间废物，身上带着资产阶级社会常常用来惩罚那些未被邀请而来参加他们的盛宴的不幸者的伤痕。他是一个私生子，患有遗传性梅毒，童年就曾因行窃遭过鞭打，被当作流浪汉送进了感化院，后来在一个洋铁匠师傅那里充当毫无反抗能力的剥削对象，他一辈子到处挨打受气。他的精神和肉体都有毛病，没有一种革命发展的力量，而是作为骗子手和二流子来同把他贬到牛马般的生活的

敌对力量进行斗争。当他企图在莱比锡（他的母亲在那里做洗衣妇，他的继父是修鞋工人）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时候，他已经无可救药了。他的流氓无产阶级习气使他很快地被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所摒弃。3月，他已经受到莱比锡的党员同志的斥责，5月9日，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通过明确的决议，把他开除出社会民主党。在这期间，赫德尔曾经扮演了“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角色，同巴枯宁在德国的两三个信徒之一的排字工人威纳尔发生了关系，后来他向民族自由党莱比锡地方领导人施帕里希作了坦白，施帕里希认为这是对社会民主党的所谓“揭露”，付给他现金报酬。最后施特克尔的响亮的喇叭声把他诱到柏林，赫德尔在柏林又一次企图同社会民主党人接上关系，结果又遭到他们的断然拒绝。 493

因此赫德尔在社会民主党中一再受到不友好的接待，而头脑不清的无政府主义者、民族自由党的打折扣的爱国者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宫廷传教士却对他表示欢迎。不过把这个堕落分子算做任何一个政治党派的人（不管这个党派平时怎样错误），都是不公平的。赫德尔追随这些政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过着尽量舒服的生活，也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在菩提树街放了几枪。这是一种严重的不法行为，赫德尔企图通过这一举动引起人们注意，希望这样能给自己带来种种好处。被捕时，他身上一文莫名。这场滑稽剧对这个可怜的家伙并不相宜，不过当他颇为勇敢地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他依然否认他向皇帝开枪，即使这不是真话，他的行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完全具有为沽名钓誉而犯罪的虚荣心，为了引人注目而扮演“皇帝陛下的暗杀者”的角色。

即使人们认为赫德尔是企图刺杀皇帝，那这样做也是一个白痴用愚蠢的手段做出的谋刺行为，不应把这个白痴送上断头台，甚至不应把他投入监狱，而应当把他送进疯人院。赫德尔发表的所

有口头的、书面的言論都清楚地表明，他在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是沒有責任能力的。菲尔肖夫希望政府把这个被处死者的脑袋給他进行解剖試驗，假如政府不断然拒絕这个要求，那么上述事实就会从医学上得到证明，从而消除一切怀疑。国事法庭对赫德尔进行的审判的各部分都表明，政府一定要把他当作严重的叛国犯处理，从极端不公正的起訴书到軟弱无力的辯护和矛盾百出的判决，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个判决为了处这个“精神上 and 肉体上受过損害的人”以死刑，而认为他充分具有責任能力。

494 無論如何这一謀刺事件(如果它真是一件謀刺事件的話)是当时的最不足道的謀刺事件之一。尽管如此，自从普法战争以来在有产階級中形成的卑躬屈膝的风气，使这一案件变成一件国家大事。爱国的庶民在皇宮前面边走边唱：大家都感謝上帝。起初皇帝也不相信这是謀刺，后来別人說他逃脫了一場大难，他自己也就相信了，并且声称，为了避免这一恐怖行为，人民應該坚信宗教。資產階級報紙中，只有很少几家是神智清醒的，大多数都胡說八道，比如《国民报》說：“今天，对于毫无預感的世界的首腦，作出了多么重大的决定啊！手枪稍稍高一点或低一点就会造成不可估計的損失”，接着就是一篇冗长的廢話：假如皇帝得不到“奇迹般的”拯救，整个世界历史就会发生变化。政治性報紙这样說，文艺性报刊也这样說。它在每一期上都描述这一“謀刺事件”，給“刺客”刻了这么漂亮的木刻，使他留名后世，可是对一般的不朽人物它往往不这样做。当然通过这一切发作，也对赫德尔的所謂养母——社会民主党进行了极恶毒的指責。不言而喻，社会民主党报刊只有給予这些鬼話以应有的尖銳諷刺和嘲笑。产生許多墮落分子的資本主义社会，也制造了一种人为的嗜杀狂，社会民主党对此是完全沒有責任的。資產階級的愚蠢行为甚至不能給自己找到借口，来

說明是由于思想简单才这样做的。英法两国的历史提供了足够的例子提醒人們：如果暗杀犯（哪怕他是像赫德尔这样的一个可怜虫）被捧为明星，那么暗杀事件就要传染开来，甚至要广泛传染。

俾斯麦主要从实际煽动方面，而不是从感伤的激情方面来理解这个悲喜剧性的偶然事件的，他一听到赫德尔开枪射击的消息，立即从弗里德里希斯魯复电說：頒布反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过了几天，这个拙劣的作品就完成了，根据布赫尔的半官方传记作者的記載，这项法令是布赫尔起草的。它用六项条文取消了社会民主党仅有的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联邦議会有权禁止“追求社会民主党目的的出版物和团体”，但是帝国議会保有“在它下次开会时”废除已經发出的禁令的权利。这项法令的有效期限为三年。 495

这个草案在联邦議会中遭到一些人的反对，而在帝国議会中一开始就肯定要遭到否决的。在5月23日和24日的討論中，只有两个保守党派表示贊成。这两派的主要发言人是毛奇，他販卖所謂社会主义者要“分财产”的謔言，頌揚“貧困”是“上帝的世界秩序”中的“必然因素”。其他資產階級政党还不敢任意把独裁的全权交給警察。这件事首先取决于民族自由党人，他們尽管十分卑屈，可是他們清楚地知道，赫德尔的謀刺是一个“无用的年輕人”（卡尼格先語）的愚蠢的恶作剧；由于瓦尔岑会談的失敗，他們变得胆小起来，不希望“在目前普魯士和帝国的內閣混乱状态中”有一个独裁的統治。卡尼格先认为，只有当人們知道誰行使这种权力时，才能容許这种暴力，如果人們看不见有什么危險要求必須有这种独裁，那人們就更应坚持这条原則。民族自由党的发言人堆砌了許多美妙的詞句；他想要在人人平等的法律基础上維護資產階級自由，反对用来对付几十万德国公民的非常法。当然，卡尼格先用他那庄严辞令的飄动的上衣是遮不住反动的馬脚的；他不可思議

地发现，現行立法还没有被用来在可以容許的最大限度內反对社会民主党，并表示願意在普通法的基础上，弥补現行立法可能存在的漏洞。

当然，教皇全权主义者比民族自由党人更不信任警察独裁。只要他們自己还受到非常法的控制，他們就不能立即贊成反对另一个党的非常法。至于进步党方面，欧根·李希特尔所說的同卡尼格先大同小异，只是更带有斥責的口吻，更加卑賤。卡尼格先表現了对社会民主党有一定的历史理解，而进步党发言人却把社会民主党看做“主要”是普魯士政府的“一件艺术品”。他責备警察没有很好地执行出版法和結社法，甚至曼托伊費尔也认为这两个法令是足以維持秩序的，而他——自由派的大英雄也认为“如果巧妙地执行这些法令，它們是完全够用的”。只是他没有表示願意弥补这两个法令的“漏洞”，这件事大概等过些时候再談。正如李卜克內西宣讀的社会民主党議会党团的声明所說，虽然社会民主党議会党团“为了防止对人民自由的史无前例的破坏”而投票反对这个提案，但是它认为参加这种辯論“同它的尊严是不相容的”。声明还說，法庭偵查工作还没有結束，就企图利用一个瘋子的行为来实现一个蓄謀已久的反动阴谋，把没有得到证实的謀刺德皇的“道义上的主謀責任”推到反对一切形式的暗杀、认为政治发展和經济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轉移的政党的身上，在一切没有偏見的人的眼里，这种企图恰恰給自己下了判決。政府的提案以二百五十一票对五十七票遭到否决。各党派內部在投票时几乎没有发生分歧，只有三个自由保守党議員倒向反对派一边，而民族自由党反对派中有三位教授发生了变化：特賴奇克和貝泽勒尔投了贊成票，格奈斯特弃权。帝国議会当天就宣布休会。

九天以后，即6月2日，爱国庶民和俾斯麦之流的政治操纵者

播下的种子发芽了：一个堕落的人，出身于有产阶级（一个国有地租賃者的儿子）的卡尔·諾比林博士从菩提树街一所屋子里用霰弹枪射击从那里經過的皇帝，使皇帝受了重伤。諾比林在被捕前，自己向头部打了一枪，公众听到的关于他的第一个可靠报道，是他在9月10日死去的消息。在这段时间里，他是不是供出他的行为及其动机以及关于这方面說了些什么，政府始終保持緘默，这是一个反面的但却有力的证明：政府不能发现諾比林同社会民主党有任何联系。

根据人們平常对諾比林的了解，这个爱虛荣而又庸碌无能的人，就其精神素质和意向來說，應該属于民族自由党的反社会主义者集团。据偵查法官对一个教皇全权主义的編輯說，諾比林比赫德尔还愚蠢，給諾比林治疗的獄医写信告訴自己的同事說，諾比林亲口說过，他受到席勒关于法国卡佩王族的历史叙述的鼓舞，要想刺杀皇帝，因为皇帝受別人挾持，为害人民，而皇太子可以比較独立地进行統治。这种愚蠢的見解符合諾比林有恶质遗传的事实，此外，他也患有同赫德尔相同的性病。他找不到滿足自己欲望的地位，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不願像别的自杀者那样无声无臭地离开这个世界，有一回他談到这样的自杀者時說，他不理解，他們为什么不打死一个大人物，自己就死了。赫德尔的光荣給他的虛荣心指出了道路，只是由于他受过高等教育，才認識到人們对赫德尔的謀刺行为的荒唐可笑有所譴責，因此他就用恶毒地执行他的杀人計劃来防止这一点。 497

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暗杀一个在政治上早已不为人所憎恨的八十多岁的老人，感到憤慨。社会民主党报刊也沒有像它完全有理由对第一次謀刺所做的那样，对第二次謀刺进行諷刺。它一刻也沒有忽視諾比林射出的霰弹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不过“勃兰登堡

选帝侯国的藩臣”俾斯麦只有一个想法：现在是实现波拿巴式的行动的大好时机。诺比林的行刺是在中午，当天晚上半官方的《电讯》就发出了一个所谓“官方的”、实际上根据其全部内容是一个虚构的急电，据说头部中了一颗子弹卧床不起的诺比林在“法庭审讯”中供称，他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并曾多次在柏林参加社会党的会议，他蓄谋刺死皇帝已有一个星期了。丢到激动的群众中去的这个火星燃起了一种情绪，《前进报》上有一首诗确切地表达了这种情绪：

全体国民产生了憎恨和错觉
狂怒改变了人们的面貌

古伊多·魏斯在《天平》上更为精辟地写道：皇帝受了伤，国民发了创伤热。

498 这时民族自由党议员和机关报异口同声地宣称，他们准备赞成政府提出的反社会民主党的非常法。可是他们发现俾斯麦根本不听他们这一套。这个世俗人恰恰想使民族自由党人“陷入窘境，使他们啾啾叫唤”，他以自己所特有的果断执行了这个纲领。缩手缩脚的皇太子代替卧床的皇帝执政，在这种情况下，宫相就能够比过去更加独断独行。他毫不费劲地克服了他在普鲁士内阁中和联邦议会中遭到的反抗，6月11日帝国议会解散，帝国议会的改选定于7月30日举行。俾斯麦为这次选举制定了一套白色恐怖措施，目的是使激动的庸人由于害怕而变得盲目和疯狂，从而拼命地往屠宰凳旁边挤。进步党的举动也是愚蠢不过的，它清楚地知道而且也公开说出，俾斯麦想干什么，可是它却力图在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进行无尽无休的诽谤方面，超过最反动的政党。

控告、搜查住宅、逮捕、解散集会和没收报纸，这些行动空前疯狂地向社会民主党袭来。预定在哥达举行的党代表大会遭到了禁

止，預定在馬格德堡、后来打算在汉堡举行的工会代表大会也遭到同样命运。警察对房主极尽刁难和压迫的能事，不准他們把房子借給社会民主党召开大会。警察解散工人集会的几个“理由”可以說明，当时工人仍然享有的集会权利遭到何等卑鄙的践踏，这些“理由”是：連會議厅中間的通道也挤滿了人；有一扇窗戶开着，因此會議是在露天举行的；人們站在关闭着的玻璃門后面向會議厅里瞧，有可能碰破玻璃；有一个出席大会的人在听报告时喊了一声“可笑！”；个别与会者听了演讲人的发言而发笑；一条狗跑进了會議厅。在薩克森王国，所有談到暗杀事件的會議原則上都应解散。工人階級的出版自由的命运也不比集会自由好些。甚至在最无耻的誹謗面前，工人階級也不受法律保护，它不能通过自己的报 499
刊用打击回答打击。像救国者欧根·李希特尔所要求的那样，救国者特森多尔夫甚至利用职权对一切“侮辱”个人罪也都提議予以惩处。在哈雷，党报編輯全部立即被捕，以致最后坐在監獄里的編輯人数，同报纸出版时的編輯人数正好一样多。

对有階級觉悟的无产阶级实行政治迫害的同时，还对他們进行經濟上的迫害。特賴奇克像一个疯狂的巫师叫嚷說：“我們的大企业主为什么不宣布，在他們的工厂里不雇用参加社会民主党的煽动的工人呢？”許多資產階級报刊都力图达到同一目的，不久它們就发表了一长串保证不再雇用社会民主党人的企业名单。这些企业多半是在濫設公司时期由于它們的投机冒险活动而出类拔萃的。在要迫害正直人士的时候，騙子手总是挤到前面来。普魯士商业大臣迈巴赫发布了一項命令，正式把这一高貴的放逐方法提給工商业議會。在这种文明民族的历史中沒有先例的精神压迫面前，社会民主党报纸要求受威胁的工人，什么都答应但什么也不遵守。用饥饿威胁工人的企业主不得不任人愚弄，自食其果。沒有什么

自卫权利比工人报纸在这种场合所推荐的自卫权利更不可侵犯的了。

但是，不仅在文明民族的历史上，甚至在拜占庭式的帝国的历史上，像这样一些充分发泄爱国热狂的侮辱皇帝案也是没有先例的。除了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是唯一的例外，德国人民各阶层都染上了危害公共安宁的告发病：在慕尼黑，著名的画家皮洛提告发他认识的七十岁的特雷滕巴赫医生，因为他在私人谈话中议论了患精神病的巴伐利亚国王；在柏林，流氓无产阶级的下等酒店里的无赖互相告发。这种可恶的流行病蔓延到家庭内部。妻子有可能告发丈夫，儿子有可能告发父亲。告发者惯用的一种恶劣手法是，在工人集会上或者在工人常去的酒店里突然高呼皇帝万岁，谁要是不站起来，或者不脱帽，就得因侮辱皇帝罪受审。事情竟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美国驻柏林公使请求华盛顿的国务卿告诫旅居德国的美国公民不要谈论政治。

德国许多官吏和官厅由于良心发现，企图堵塞这股浊流。但是没有得到显著的成效，尤其没有得到持久的效果。前汉诺威司法大臣、现任普鲁士司法大臣列翁哈特（他的良心的伸缩性允许他脱离失败的韦耳夫王族的格奥尔格而投靠胜利的霍亨索伦王族的威廉），指示国家检察官以最严厉的手段处罚侮辱皇帝的罪人。在这类案件中，法院常常要受到这种压力。臭名昭彰的柏林市法院第七庭在6月8日一天之内，以侮辱皇帝罪判处七个人二十二年零六个月监禁，其中有一个被告被判二年零六个月监禁，因为他在吃醉酒回家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威廉死了，他不在人世了。”哈费耳河畔的勃兰登堡有一个妇女被判一年六个月的监禁，因为她听到关于诺比林谋杀皇帝的新闻时说：“皇帝至少不是穷人，他可以得到护理。”波恩有一个人也因为说过类似的无关紧要的话，在

第一审中被判三个月监禁,后来由于国家检察机关起诉,在第二审中被判三年监禁。开始统计侮辱皇帝案件的自由党报纸,由于被嫌恶和羞耻之心所战胜,于7月初停止了这项统计工作。仅仅一个月內,由于侮辱皇帝罪所判的监禁远远超过五百年。

德意志民族由于中了社会民主党理论的“毒”而得的病症,在这种精神错乱状态中,霍然痊愈了。

三 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

俾斯麦企图利用白色恐怖追求的两个目的,有一个已经完全达到:使民族自由党人陷入困境,使他们连剩下的一点点政治独立性也丧失了。自由党失去了约四十个议席,这些议席都落入保守党之手。有了一百十五个议席,俾斯麦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組成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或保守党—教皇全权主义党多数派。在这一点上,他的反动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501

但是他没有达到第二个目的,虽然自由党执行的自杀政策对他有帮助,但是他未能摧毁社会民主党。在初选中,社会民主党失去了至今在帝国议会中的十二个议席中的七个:开姆尼茨、莱比锡郊区、茨维考—格里米乔、奥尔巴赫—赖辛巴赫、柏林第六区、罗伊斯(长系)和赖辛巴赫—诺伊罗德,而只保住了两个:格劳豪—梅朗内(白拉克)和施托贝克—施内贝克(李卜克内西),于是“秩序党”过早地发出一片胜利的呼声。可是,当“胜利者”想仔细观察一下他们的丰功伟绩,而只看到了自己的失败的时候,这种胜利呼声很快就消失了。

社会民主党在这次竞选中的困难处境是从未有过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合法武器,社会民主党使用不上,

或者至少受到很大限制。在帝国的广大地区，它根本不能享有集会权利，在其他地方也受到极大的限制。它的传单被用最没有道理的借口没收，它的报纸也由于警察和检察署的不断的打击而陷于瘫痪。党的言论方面的先锋战士至少有一半被关在监狱里。一家自由党报纸说，警察可用一切手段反对社会民主党人，一家保守党报纸证实说，警察“用一切可能的方式”阻止社会民主党进行竞选宣传。不过资产阶级政党只是在内部发生争吵时，才偶尔这样招供。无论是保守党人还是自由党人，都毫不客气地利用警察对工人阶级的压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进步党也像往常一样，在警察的慈母般的保护下顽固地反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此外还有使工人受了五年折磨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无数党员所受到的经济处罚、所谓为谋杀皇帝的道义责任对社会民主党发泄的憎恨和愤怒之火。《前进报》毫不夸张地说：“这不是用同样的武器、在同样的阳光下进行的公正的战斗。敌人从头到脚全付武装。社会民主党却手无寸铁，手脚都被捆住了。”甚至当时比较起来对革命工人运动最有了解的资产阶级报纸《汉堡通讯》也说，受到各方面攻击的、在最困难环境下的党，将受到一次猛烈的回击，它可能会缴械投降，只是为了面子才进行战斗。

事实上，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一点也没有看错，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进行防御战，不能进行攻击战。它在6月18日的竞选宣言中说：“上次的竞选显示了我们的党何等伟大；而7月30日将向我们显示，党有多么巨大的抵抗力量。”敌人的共同作战口号是：把社会民主党赶出帝国议会！因此必须利用一切力量保持在帝国议会中占领的阵地。因此战斗必须集中在最有希望当选的选区。在其他选区，则在不费过多的经费和努力就可以进行鼓动的地方（如城市和工业区）进行鼓动，而在鼓动受到严重阻碍，花钱多而收效

不大的地方，則放弃鼓动。中央选举委员会规定有二十九个正式选区，在这些选区中党必须全力以赴，这二十九个正式选区是：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汉堡第一区和第二区，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是阿尔托那、格吕克施塔特、基尔，在莱茵区是爱北斐特—巴門和佐林根，在美因部是哈瑙和奥芬巴赫，在中德小邦是哥达和罗伊斯（长系），在西里西亚是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賴辛巴赫—諾伊罗德和瓦尔登堡，在巴伐利亚是紐伦堡，在薩克森王国是奥尔巴赫—賴辛巴赫、波尔那、开姆尼茨、德累斯頓旧城、弗賴貝克、格劳豪—梅朗內、莱比錫郊区、米特魏达、施托貝克—施內貝克、茨朔泡和茨維考—格里米乔。

在竞选中，工人表现慎重而且劲头很大，他們的举动是典范性的。《前进报》有几个星期在明显地位上发出警告說：党员同志们！你們不要受人挑撥！有人要想开枪！反动派为了取胜需要騷动！党领导有极重要的理由发出这种警告。当时俾斯麦已經为实现后来他曾以政治家的厚顏无耻态度公开承认的計劃而努力，这个計劃是：尽可能激怒社会民主党，使它发动攻击，以便更彻底地消灭它。当时从某些容克地主嘴里透露出来他們之間流行的一句話：人 503
們必須不断地揮舞这块紅抹布，直到它在吓破了胆的庸人眼里像是正在燃燒的城市为止。可是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用冷靜鄙夷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挑战，并傾其全力进行竞选活动。从1878年2月1日到10月18日，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金庫收入六万四千二百十八馬克，其中約有一半用作选举基金。根据偏低的估計，包括地方經費在內，为了竞选一共筹集了十五万馬克。丹麦、比利时、英国、法国、奥地利和瑞士工人寄来約八千馬克，这个支援的精神力量比物质力量还要大。馬克思也从伦敦向敌对陣营扔了一颗炸弹，引起了不小的混乱。为了承认俄土战争的結果，1878年夏天在柏林

举行了外交家会议，俾斯麦企图利用这个会议在国际范围内迫害工人，马克思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用辛辣的讽刺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外交家会议的官方秘书布赫尔在1865年秋天邀他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报纸撰稿而提出的条件优厚的建议。布赫尔狼狽地作了一个“说明”，只有使自己更受大家的嘲笑。^①

社会民主党的选举策略宛如这样一个要塞司令官的行动，当优势敌军逼近时，他为了更有把握地据城死战而焚毁了郊区。一开始党就不打算获得同1877年一样多的选票。尽管如此党的候选人还是得到了四十三万七千一百五十八票，相当于总票数的百分之八，只比前一年少五万六千二百八十九票，这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成就。当然这大大扭转了局势，使敌人的突击队在党的筑垒营寨前面确实碰得头破血流。在二十九个正式选区中，所得选票由二十二万增加到二十四万。这个巨大成就有其不好的一面，如果选票增加不是平均分配在各选区，那么其好的一面——除纽伦堡外，各大城市的选票都显著增加——将更为突出，而且这些城市的选民所受的迫害越严重，增长的数字就越大。在白色恐怖达到极点的柏林，社会民主党的选票由三万一千五百二十二票增加到五
504 万六千一百四十七票。顽固的进步党人本想用哑哑的声音高呼他们在警察的庇护下取得的“胜利”，可是当他们看到哈森克莱维尔在柏林第六区竞选失败时所得票数为一万五千票，或者看到弗里茨舍在柏林第四区进入复选时所得票数为二万票的时候，他们的“胜利”呼声就没有喊出口来。《汉堡通讯》老实地承认，这种选举成果理应得到十几个议席。

^① 关于布赫尔的这个建议，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给伦敦的《每日新闻》，该报于1878年6月13日发表了这封信。后来马克思又于6月29日在《法兰克福报》上回答了布赫尔6月20日发表在《北德总汇报》上的答复。马克思的这两封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9—162页。——译者

“把社会民主党赶出帝国议会！”这个有名的竞选口号，甚至就其最干瘪的形式来说，也只是个虔诚的愿望而已。党除了保住两个议席外，在汉诺威和在十五个党所规定的正式选区中参加了十六次复选：在柏林第四区、在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在阿尔托那和格吕克施塔特、在爱北斐特—巴门和佐林根、在哈瑙和奥芬巴赫，以及在萨克森的选区奥尔巴赫—赖辛巴赫、波尔那、德累斯顿旧城、弗赖贝格、米特魏达和茨朔泡。进行复选时，“秩序党”的头脑已经清醒多了。当初选的结果迫使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注意自己的阶级利益时，他们身上的拯救祖国的神圣热情就已经冷却了。自由党人不愿取得胜利的保守党人更加强大，而保守党人则不愿失败的自由党人鼓起新的勇气。在复选中，这个坚硬的秩序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分解，因此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

因此党在十六次复选中还得到了七个议席：柏林第四区（弗里茨舍）、布勒斯劳第一区（赖因德斯）、爱北斐特—巴门（哈赛尔曼）、德累斯顿旧城（倍倍尔）、米特魏达（瓦尔特希）、弗赖贝格（凯泽尔）和茨朔泡（维麦尔）。党特别兴奋地欢迎在普鲁士两个最大的城市柏林和布勒斯劳所取得的选举成就。在布勒斯劳上空第一次飘起红旗，在柏林，弗里茨舍得了最多的票数——二万二千票，过去还没有一个帝国议会议员候选人得过这么多票。现在社会民主党又有了帝国议会的九个议席，同1874年一样多，也同当时一样是三个普鲁士议席和六个萨克森议席。三个议席和不足六万票是这次狩猎的微薄的猎物，在这次狩猎中，所谓“法制国家”露出了穷凶极恶的面貌。潘都尔兵^①在党主动放弃的外围地区进行了一些掠

^① 潘都尔兵是十七、十八世纪在奥地利军队中服务的匈牙利步兵，以残暴和不守军纪出名。——译者

夺，而密集的方阵仍像从前那样坚强地守住了阵地。

505 但是恐怖活动的严重失败，对俾斯麦和资产阶级政党都没有起到告诫作用。8月中，政府公报发表了一个新的反社会党人法的草案，帝国议会将于9月9日开会讨论这个草案。根据这个草案，各地方警察署有权禁止“以危害公共安宁，特别是危害居民各阶级的和睦的方式，为旨在破坏现行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企图服务的”协会、各种团体（特别是合作金库）以及出版物。这种禁令将在全帝国范围内生效，有不同意见者可向联邦议会提出申诉，但不能稽延禁令之执行。据推测有上述倾向的会议也应禁止，或者在会议过程中出现这种倾向时，应解散会议，如有异议只能向监督机关提出。此外，还禁止为社会民主主义目的而募集捐款。违反这一切禁令而参加被禁止的团体、继续出版和散布已被查封的出版物等等，将处以巨额罚金或重刑。警察当局禁止职业鼓动员或根据这项法令依法被判刑者在一定的地区逗留，在同样的前提下，也可以撤消出版商、书商、租书人和阅览室所有人以及旅店主和酒店主的营业执照，最后，“参加联邦的各邦的中央机关在得到联邦议会批准后”，可以对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活动而使治安受到威胁的地区，实行“至少为期一年”的小戒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在得到警察当局批准后，才能公开贩卖出版物、享有集会权和占有及携带武器的权利，尤其是警察有权拒绝有可能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的人在地区逗留。这个法令的有效期没有明确规定。

506 尽管这些条文规定得极严格，但俾斯麦还是认为远远不够。因为他知道，要榨取群众的大量钱财，对他来说，怎样厉害地箝制群众的先锋战士也不为过。这个冷酷的人从基兴根发出一封信，斥责他的办公厅过早地发表了这个草案，以致现在不能再进一步

加重它。俾斯麦认为应特别加重这两方面：第一，剥夺得到证实的社会民主党人的选举权和被选入帝国议会的资格；第二，免除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官吏的职务，并且不发給退職金。俾斯麦企图通过这个办法給“薪金微薄的下級官吏”、“守路員、扳道工和类似的人員”（按照他完全正确的估計，这些人有很多是社会民主党人），灌輸爱国思想。可是他这些创造性的思想确实提得太迟了。目前公众认为政府公布的这个草案已經够了。

帝国議会对这一提案进行的六个星期的討論，形成了一出錯乱的喜劇。两个保守党的一百十五名議員准备全盘接受政府的要求。相反地，由一百六十名左右的議員組成的資產階級反对派（主要是教皇全权主义者和他們的追随者，其次是进步党人），不接受这个法案。但是这个反对派并不是原則上反对凶恶地压迫工人。虽然十分明显，自从特森多尔夫时期，尤其是自从諾比林謀刺案以来，可以利用“普通法”做出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事情，无论如何比資產階級民主派在曼托伊費尔的“无耻的反动时代”和教皇全权主义党在俾斯麦的“殘酷迫害基督徒”时期所受到的要多得多，但是进步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仍表示願意弥补“普通法”的“缺陷”。也就是說，很少改动就利用了三年前整个帝国議会曾經在皆大欢喜的气氛中否決了的第一百三十条。这个法案形式上是普通法，实际上也是对付工人階級的非常法，它的制訂人俾斯麦和欧伦堡始終毫不隱諱地承认了这一点。相反地，进步党和教皇全权主义党的攻击，表面上針對政府提案的非常法性质，但是它們真正担心的是，政府所要求的无限制的警察权不仅会被用来反对工人党，也会被用来反对資產階級反对派政党。当进步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放下心来以后，他們就不在他們能够否決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否決它了，因此他們在第一次討論中所唱的高調沒有

任何重要意义。

草案能否通过取决于民族自由党人，对他们来说，草案也是一块很难下咽的食物。拉斯克尔把这个草案叫做“法律怪物和政治怪物”，认为它是“完全不可接受的”。这个资产阶级党的狡猾的商人比它的空谈理论的“驽马”更清楚地看到，如果俾斯麦真的利用这种暴力政策摧毁了社会民主党，那么自由派资产阶级也要吃苦头。政府不断提出保证，使他们感到十分不安，政府保证说，当然这件事不仅仅有警察镇压这一面，而且也必须通过“积极”途径来关心工人阶级的福利；在最近一个时期，俾斯麦的“社会主义”会比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更使他们感到不舒服。他们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今天有谁还想欣赏一下这种奇妙的舞姿，可以读一读班贝格当时的演说。当然这个党是不会进行真正的反抗的，它软弱无力，在选举中又刚刚一败涂地，俾斯麦的主要报纸用一个威胁性的问题吓唬它，看来也是不必要的，这个问题是：为了再一次竞选，民族是否应该对拉斯克尔先生表示感谢。

当然，民族自由党在转变中也不是没有表现出通常的政治伪善。尊贵的先生们不愿扼死社会民主党，而只想取消它的危害社会的活动和革命性质。他们所制定的法令并不是“因为政治信仰的缘故而把一部分公民置于法律保护之外”；拉斯克尔说：“我们尽可能清楚地表达了相反的一面，不是要把社会民主党及其倾向而是要把危害安宁的鼓动置于法律控制之下。”民族自由党人通过一系列的“修正”，完成了这一立法的艺术作品，这些“修正”是想用几条法律的细纱缚住警察独裁的巨爪。在提案的橡皮衣裳上还缝上了几颗橡皮钮子：“破坏”一词应改为“颠覆”；接受申诉的机关不是
508 联邦议会，而是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帝国委员会，这九个人由联邦议会从自己内部选出四人，由最高法院选出五人；新加进去的几项条

文是要更好地保护已登記的合作社和互助会不受警察专横压制。在这些和类似的“修正”中，只有两点有比較重大的意义：一、法令的有效期为二年半，二、只有法院判决（而不是警察的处分）可以限制职业鼓动员或根据法律受到惩罚的人在某地逗留或撤销他們的营业执照，同时規定，逗留的限制不能扩及被判刑人已經居住六个月以上的住地。

除这两点外，民族自由党人的“減輕”只不过是小孩子用紙牌叠造的房子。俾斯麦及其党羽摆出一副狐狸的誠实面孔接受了这种儿童游戏，这种态度是比較有害的。他們清楚地知道，他們只要能够打开这个法令的风神的口袋，第一陣风就会把民族自由党的紙牌房子从桌子上吹得无影无踪。他們装作，仿佛单純由于爱才要吃掉工人阶级，这是他們的一貫伎俩，为什么他們不在套在工人阶级脖子上的麻绳上系上几根无害的紗綫呢？拉斯克尔主张保护合作社和互助会，普魯士新內政大臣（又是一个欧伦堡伯爵^①）完全同意，而俾斯麦本人为工人的联合自由和罢工辯护，他使这些工人同社会民主党的未来的阴暗图象产生有利的对立。俾斯麦由于同拉薩尔的商談，而被倍倍尔推进了窘境，他甚至硬說，他經常关心工人阶级的福利，这时，他只是小小的倒霉，在公众面前表现出他对当代的重大問題毫无所知。他把革命工人运动的根源看作是，巧妙地隱蔽起来的“未来国家”的图象施加于群众的不可抗拒的魔力，在这一点上，他同他亲密的敌人欧根·李希特尔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熟悉普魯士政治奸計的人，当然不会被俾斯麦的言論所欺騙；他哭丧着脸抱怨法令条文不够严厉，他又阴险而恶毒地挖苦“善良的法官和溫和的法律”，他对白痴的赫德尔被处死表现

509

^① 普魯士前任內政大臣是弗里德里希·阿尔布莱希特·欧伦堡伯爵，新任內政大臣为博托·欧伦堡伯爵。——譯者

了幸灾乐祸，这一切都表现出他的豺狼本性。

被非法排除在讨论提案的委员会之外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在全会中勇敢地为每一条文而进行斗争。它的发言人令人信服地说明，谋杀案同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毫无联系。他们揭露了俾斯麦一向对工人阶级玩弄的背信弃义的把戏。他们指出，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性质”还远远没有达到资产阶级运动在其革命时期曾达到的对一切教会和世俗权威的令人高兴的明确程度。他们预言，这个法案是极端不公正的，因此它也不可能发生实际效力。白拉克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无视这个法令。这句中肯而有力的话使爱国者大为震惊，以致他们起初以为这句话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是不礼貌的；议长福尔肯贝格派一个秘书到记者席去叮嘱报社的记者说，白拉克只想“无视”这个法令而不想别的。

10月19日，反社会党人法以二百二十一票对一百四十九票通过。此外，这次会议还实现了一个政治阴谋；各党派的二百零四名议员（超过议会的绝对多数）认为必须“修改德国关税率”，据说“德意志帝国的广大阶层”都要求这一改革。在发出压制无产阶级的信号的时候，也就是响起压榨群众的信号的时候。但是，这个如意算盘失算了。剥夺德国工人阶级的权利的工作完成了，可是德国工人阶级的英雄时代也开始了。

第六部

反社会党人法时期^①

① 参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1878—1890）的斗争。帝国委员会的活动》，利奥·施泰恩编，共二卷，柏林1956年版。在第一卷的导言中，列举了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全部较新的文献。——原编者



第一章

混乱的一年

現代工人运动沒有任何資產階級的幻想。战斗的无产阶级不 513
付出努力就什么也得不到；無論是最小的或者是最大的，都必須一
步一步地去爭取；經過种种混乱以后，它的道路才能通到既定的目
标。反社会党人法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着一个新的任务；因此
它必須試驗着、摸索着寻找新的道路，而且不能每次都立即找到正
确道路。只是随着党的进一步发展，党的摸索阶段才相应地縮短；
在它进入一生中的第二个重要时期的时候，內部混乱不再是持續
了十年，而仅仅是一年了。

1878年10月21日，在帝国公报上公布了反社会党人法，并
立即开始查封社会民主党的报纸、著作、协会的活动。列奥波特·
雅科比的詩集《天亮了》开了禁令的先声；掌握了在全德国执行这
个法令的权力的警察总监馮·馬戴，仿佛想用一种輕薄的談諧来
嘲弄自己似的。党的四十七种政治报纸，只有两种幸免，一种在紐
伦堡，一种在奧芬巴赫。它們及时地更改了报纸名称，报纸的言
論也特別謹慎，而别的报纸連这些手段也沒有生效。想用沒有色
彩的报纸代替被禁的报纸的企图，也不是到处都能实现的，尤其在
柏林更是做不到这一点。同时，在党组织解散以后成立的許多工
人协会也被查封，除非它們在最后关头自动解散，除了少数例外，

所有工会都被查封，未被查封的、最著名的但也受到严重迫害的工会是印刷工人联合会。随着工会被查封，工会报纸也被查禁。主要打击在头几个星期就已开始，《前进报》、《柏林自由报》和《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这三家最著名的党报（总共约有四万五千个订户），头几天就遭到了死亡的命运。后来的几个月则是收集所有的落穗。截至1879年6月30日止，被禁止的有二百十七个协会、五个互助会、一百二十七种定期刊物和二百七十八种不定期刊物。

与这种大规模迫害的残暴性相适应的，是它的背信弃义。民族自由党人听信了俾斯麦和欧伦堡的花言巧语，相信他们“忠实地执行”法令，可是，即使人们对民族自由党人的目光短浅有所责难，政府的不守信用也不能因此而得到辩护。政府践踏了自己的完全的和不完全的诺言，不仅镇压社会民主党的“危害社会的活动”，也取消了属于党的一切，连社会主义的科学文献和工会组织及其已登记的互助会也没有幸免，它像扫蜘蛛网似的扫去了民族自由党人的“保护措施”。帝国委员会（关于它的“司法保证”争论了几个星期之久）实际上纯粹是墙上的影子戏；到1879年中期，一共发出了六百二十七项禁令，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三即使根据这个法令的精神和词句也是不能容许的，而帝国委员会只取消了其中六项大多数同资产阶级著作有关的禁令，如谢夫莱的《社会主义精义》和一家进步党报纸的一号；在社会主义文献的值得一提的作品中，帝国委员会只取消了对拉萨尔1849年在陪审法庭上的发言的禁令。

在讨论反社会党人法期间，社会民主党内部当然已经考虑到这个法令颁布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对剥夺工人阶级的权利的行动进行暴力反抗，简直是丧失理智，但是关于建立秘密组织的容易理解的想法也立即并且永远遭到反对。对于一个广泛而有力的人民运动来说，一切秘密组织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进行这种尝试，那

只能是向警察表示友好的行为。^①目前只有观察法令如何执行，别无他策。法令公布的当天，《前进报》就宣布，它愿意接受改变写法的“艰巨工作”，以适应法令的条款。

警察的实际行动当然超过了最坏的估计。神圣的私有财产的 515
先驱提供了一个消灭私有财产的启发性的范例。十六家合作印刷厂雇用的印刷工人、排字工人、送货员和编辑共有四百人，有二千五百名以上的工人和小行东以其少量积蓄和间接地由于有连带责任而以他们的全部财产参加了这些合作印刷厂。甚至最没有色彩的报纸，如《未来》也不让柏林合作印刷厂印了，因此它不得不立即解散；因为它能够把几乎所有的铅字都卖掉，所以社员们只损失了创办时投入的股本。对大多数合作印刷厂来说，立即解散就等于破产，而且立即撤出所有这些堡垒，对党也根本没有好处。用某种方式对付反社会党人法的计划，必须彻底实现；如果敌人的欺骗妨碍了比较缓和的斗争方式的使用，那就可以更加有力地使用比较严厉的斗争方式。许多党员以为，在第一阵风暴过去后，又可以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希望，在那以前，没有色彩的报纸（合作印刷厂企图利用这些报纸来维持自己的生存）会给受过锻炼的同志作“识别信号和身分证明书”。

同时也确实产生了一定的气馁现象。在最近几年，尤其是最后几个月的火热的斗争以后，原来绷得很紧的每条神经，现在自然而然地松弛了。由于感到自己毫无权利，这种气馁现象更加严重，此外经济困难仍然存在，处罚和迫害也层出不穷。并非所有至今

^① 梅林在这儿以及在后文若干地方关于暴力和秘密工作的说法，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对合法性的崇拜。正如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指出的，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为了保存现有的合法组织而牺牲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译者

曾經称职的領袖，都能适应更加困难的新形势，經常監視他們行动的密探使得最坚决的人一举一动也謹小慎微。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在10月19日被解散了。各种人事关系使得委员会这样彻底地放弃联系，这也許不是必要的，无论如何也不是人們所希望的。盖布身患重病；对社会党人的迫害每天震撼着这个思想高尚、感觉敏銳的人，在这种迫害的可怕的刺激下，他的心臟病迅速发展，否則他年輕的生命也許还能更长久地抵抗这种疾病；奥艾尔在不太久以前被派到柏林，去整頓《柏林自由报》的混乱的編輯部；不久就完全背叛了党的哈尔特曼缺乏必要的坚定性和謹慎。因此，当致命的打击从四面八方党襲来的时候，党沒有任何领导机构；因此在党的队伍中发生各种动摇和混乱，就不足为奇了。

俾斯麦举起对社会民主党进行最后的致命打击的拳头，促成了第一个好的轉变。11月28日，伤势已經痊愈的皇帝回到柏林以前不久，在柏林，沙洛頓堡和波茨坦市区以及特尔托夫、尼德巴涅姆和东哈費耳兰等区宣布小戒严，这是根据反社会党人法第二十八条的規定实行的。也就是根据該条四款中的两款：最可笑的一款是，沒有許可证不得携带武器（这只能引起各种滑稽的偶然事件），最可恨的一款是，警察有权驅逐他所不喜欢的任何人。第二天，以奥艾尔和弗里茨舍为首的六十七名党员接到了石印的出境命令，大多数人限期两天，其他人限期只有一天，很少几个人限期三天。馬戴最粗暴地駁回了所有請求延期的申請书。被逐出境的人們有許多人許多年沒有参加鼓动工作，許多人有一家小买卖，除了一个例外，所有人都有家庭。通过一张立即被禁止、但已經散发了几千份的保持着尊严的传单，他們向党员同志告别。他們指出，他們的第一句話和最后一句話仍然是：不要采取暴力行动，尊重法律，在法律的范围内保卫你們的权利。現在他們仍要求：安靜，不

要受人挑撥，我們的敵人一定会由于我們合法而毀灭。最后提出請求說：我們給家屬留下的錢只够买几天口粮，請不要忘記我們的妻子儿女！許多被驅逐出境者到汉堡和萊比錫去，另外一些人为了尽可能靠近他們的家属，定居在接近戒严区的馬尔克城市。

在柏林实行小戒严，是俾斯麦一切可鄙的背信行为中最可鄙的一件。民族自由党人只同意反社会党人法第二十八条用于最紧急的情况下，即一个地区受到社会民主党的鼓动的破坏，以致随时有可能发生暴动，应引用这一条文以防止真正的戒严。首先当时柏林沒有任何情况。反社会党人法的严厉条文在执行中沒有遭到任何反抗；也沒有一个柏林工人想做俾斯麦的游戏，挑起一次暗杀和暴动。甚至資產階級報紙也一致认为，缺乏可以使用第二十八条的一切实际前提条件；只有反动報紙結結巴巴地說了一些关于皇帝的“尊貴的脑袋”应该受到保护的尷尬話。当进步党人在普魯士众議院中由于这一措施質問欧伦堡伯爵时，伯爵也用这种說法为自己辯解。假如这不仅仅是一种借口，那么这个警察大臣就患了真正不可容許的愚蠢无知的病症。像奥艾尔和弗里茨舍这样的人，据說有进行暗杀的嫌疑，把这六十七人非法驅逐出境据說就能够事先防止謀刺活动，而不使这种活动成为事实！但是整个所謂“尊貴的脑袋”的謠言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不久以后，俾斯麦本人就在帝国議会承认，他的真正目的是要在社会民主党进行鼓动的所有主要地点实行小戒严。根据他的暗示，其他各邦政府好像还不敢执行这项劊子手的任务。他本人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諱言，他打算利用第二十八条使帝国議会处于困境。

但是，正如在柏林实行小戒严是他的可鄙的背信行为中最可鄙的一件那样，这一行动也是他愚蠢的暴行中最愚蠢的一件。他清清楚楚地向社会民主党指出，一次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斗争

正在进行，党一刻也不能休息。在党员一度有过松懈情绪的所有地方，现在他们又大批回到原来的岗位了。为被驱逐者及其家属而进行的募捐，把一个新组织的最初的几条线索连结起来。被驱逐者本人，还有他们的忍饥受饿的妻子儿女成了鼓动员，这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从未有过的鼓动员。坐过多年监狱，但没有皱过眉头的年老的战士常说，没有一种压迫手段像驱逐出境这样使他们义愤填膺，驱逐出境从根本上横暴地毁灭了他们的人的生存。

518 谋杀案发生后在广大人民阶层的观念中存在的对党的精神抵制，现在已经逐渐消失，这还不是受了重创的党从小戒严中得到的最小利益。在学校中就已经学过驱逐萨尔夫茨堡的新教徒^①是一件历史丑行的最偏狭的庸人，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他们敬佩的民族英雄追求大主教费尔米安的荣誉，他们不知不觉地开始对被迫害的无产阶级表示同情，拉斯克尔和进步党人路德维希·洛厄佛在他们的党员中募捐，向支援被驱逐者基金会提供了大量捐款；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只有交易所报纸的一个小丑尤利乌斯·施特腾海姆敢于嘲笑小戒严的牺牲者。

俾斯麦的愚蠢暴行还有一个重要后果。在巴黎住了一些时候的卡尔·希尔施被赶出了巴黎。在这种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小小的友好行为上，塞纳河畔和施普累河畔的公认的“世仇”一向是喜欢狼狽为奸的。希尔施打算回到柏林，那里正在发生的驱逐出境事件纠正他的错误想法。他到了布鲁塞尔，创办了《灯笼》，这是一家周刊，外形和风格都模仿罗什弗尔所编的《灯笼》。12月9日，莫斯特被从普勒岑寨释放出来，立即被逐出柏林。他迁居伦敦，在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的帮助下，出版《自由》周报。《灯笼》从1878

^① 1731—1732年，萨尔夫茨堡大主教费尔米安驱逐成千上万的新教徒出境，并没收了他们的土地。——译者

年12月中旬，《自由》从1879年1月初开始出版。

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突然有了两个国外机关刊物，它们在反动派施过肥的土地上长得相当旺盛。这两个周报都在外国出版自由允许的范围內，公开代表党的利益。把这些刊物偷运到德国去的活动，完滿实现的很少，但是俾斯麦迫不及待地方图摧毁社会民主党的这些新武器的事实充分说明，他多么害怕这些武器。邮政总局局长不得不发布一个把邮局职员贬为政治警察的帮凶的指令，这同宪法所保证的通信秘密是一个严重的矛盾，而这在暗检室的典型国家——德国当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3月，卡尔·希尔施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境。但是俾斯麦的苦恼并没有因此得到减轻，因为希尔施到英国后继续出版《灯笼》。《灯笼》的文章比《自由》显得有才华，写得也比较巧妙，但内容偏重在政治讽刺文字方面；《自由》在较大程度上具有党的政治报纸的性质，但由于它的出版者个人的特性，它远比《灯笼》主观和片面。莫斯特的乖僻的性格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以前就曾给党带来许多困难，制造了许多烦恼，但是由于司法和警察十年来对他进行种种的迫害，因此他相当激动和愤怒，这从心理方面是不难理解的，但是他的政治责任感却大大削弱了。由于他的散漫和性急，而认为没有必要就出版《自由》周报一事同德国的党领导取得一致意见。他辩白说，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党领导，这种说法只有从形式上看是对的；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中，始终有一个党组织，对于曾经当过议员的莫斯特来说，向党的议会党团求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

德国党现在面临着一个问题：它对这两家在外国出版的机关刊物应采取什么态度。《灯笼》小心地避免约束党或批评党，而《自由》则不断地要求实行革命策略。不过当时还不是“暴动意义”上的革命策略，而是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前所宣传的革命策略。莫斯

特想使《自由》同过去的《人民国家报》和《前进报》保持同样的笔调。同他在原则上取得一致（更不用说同卡尔·希尔施取得一致了）并不是不可能的，尽管这种一致由于他们（特别是莫斯特）的一意孤行而受到阻碍。可是德国党的领导集团根本不願理睬这两家报纸。他们把主要力量集中在通过明智的抑制，来消除在国民的中立阶层中培植起来的对社会民主党的不自然的憎恨，他们恐怕在外国出版的报纸的毫无顾忌的言论会增加这种憎恨。他们认为，俾斯麦依靠謀刺案生活，如果他失去了这种食粮，他就不得不投降。一家在外国出版的报纸的必要性和利益本来是无庸置辩的，可是他们却认为，现在创办这种报纸为时过早。它的第一个后果520 可能是新的迫害，党的大大缩小了的手段，已经不能充分支援被驅逐者和受到处罚的人。在长期的劳累的鼓动以后，党员同志大可耐心休整一下；已在无产阶级中散布、但还没有被人读过多少并在精神上消化了的无数的鼓动著作，还可以充分用来为社会主义宣传服务。

这种观点在1878年10月有其相对的理由，但在1879年2月就没有这种理由了。2月12日，在帝国议会开会时，俾斯麦为了彻底摧毁社会民主党，立即向帝国议会提出几个议案。俾斯麦不仅依靠庸人对社会党人的毫无道理的憎恨过活，因此社会民主党除了要争取中立的旁观者在精神上的同情外，还需要用别的武器来对付俾斯麦。事实上，群众又冲向可以同敌人进行正面斗争的战场。2月5日，由于进步党人毕尔格尔斯去世，在布勒斯劳第二区即该城的西里西亚贵族和富豪居住的西选区举行补选，在这次补选中，工人不顾警察压制一切竞选宣传，不顾警察禁止他们发传单和解散他们的集会，不顾完全非法地逮捕他们的候选人克雷克尔，征集了五千一百七十五票。克雷克尔进入复选后虽然遭到失

败，但所得票数却增加到七千五百四十四票。2月27日，在薩克森选区瓦尔特海姆—德伯耳恩的一次补选中也取得了类似的光輝成果，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这次补选中得了四千三百二十二票。

到复活节休假为止，帝国議会的討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的辯論的余音。俾斯麦想补做当时他还没有做的事情，即把社会民主党排挤出帝国議会。他立即在他的門拱上扯起两条绳索：一条是，帝国議会應該批准作为柏林的被逐者而参加帝国議会會議的弗里茨舍和哈賽尔曼由于违犯禁令而受处罚，第二条是，帝国議会的惩戒权應該扩大，帝国議会可以开除发表无礼言論的議員，可以剥夺他們的被选权，并把这些无礼的言論从打字記錄中删掉。帝国議会既不同意第一点，也不同意第二点。甚至民族自由党发言人也振振有詞地反对这种自我褻瀆。不过他們这样做与其說是为了原則的利益，甚至为了被迫害的社会民主党的利益，倒不如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久以后，在另一件事情上，他們就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同情是多么廉价的貨色。关于第二十八条的实际应用，應該每年向帝国議会做报告，而这个“保护措施”在第一次試驗中也烟消云散了。人們让一个社会民主党議員发言，然后不仅民族自由党人，而且連进步党人和教皇全权主义者（除了少数例外）也都贊成保守党的关于結束討論的提案。在普魯士众議院的質問中，菲尔肖夫胆子大一点，他說，警察不能把“善良的革命者”同謀杀国王的罪犯等量齐观。可是，从此以后俾斯麦就嗾使半官方的暴徒对付“革命的”进步党，因此这时“不屈不撓的人們”小心翼翼地對最粗暴地濫用反社会党人法表現緘默，以便为改头換面而装扮成“一切党派中最保守的党”。

社会民主党議員中，倍倍尔于3月4日对所謂“封口令”发了言，李卜克内西于3月17日就柏林的小戒严发了言。倍倍尔非常

幸运地击退了高贵的俾斯麦，俾斯麦曾经以所谓“侮辱”他本人的罪名，用印好的起诉书，把成千上万的人，甚至养老院里的老太婆都送进了监狱，可是现在他带着痛苦的神情说，作为联邦议会成员的他必须十分谨慎，因为他没有议员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侵犯这种人民权利对这样一种人是合适的，他不仅有无限制的诽谤自由，而且也真正地利用这种自由，如果一个被他诽谤的人打算对他起诉，他就立即在军官制服的掩护下进行英勇的退却。李卜克内西的演说符合于德国党领导人的策略。李卜克内西无情地粉碎了总结报告中的一些空洞言词，然后说，如果他正式否认党员同志在国外写的东西，他就是一个胆小鬼，但是党同这些东西绝无共同之处，可以说许多有影响的党员不赞成创办《自由》和《灯笼》。

522 党要遵守反社会党人法，因为它是最严格的意义上的改良政党，而暴力革命行为根本是一种荒谬的事情；白拉克的无视这一法令并不意味着，党不遵守这项法令，而只是肯定了这一历史事实；党没有被这个法令镇压下去；白拉克后来对自己发言的非议会的形式表示遗憾，而他，李卜克内西也不能表示同意。^①

李卜克内西的这一发言促使伦敦共产主义工人教育协会发表了一个不是由莫斯特本人、而是由柏林的一个老党员米尔克起草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中说：“必要的，也是可以实现的，不是在反社会党人法统治下的谨慎的策略，而是一种反对这一法令的灵活

① 李卜克内西的这一软弱的演说受到恩格斯的强烈指责。参阅1879年7月1日恩格斯致约·菲·贝克尔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54—355页——译者）。此外还可参见1879年6月16日，恩格斯致F. L. 埃尔哈特的信；1879年6月26日，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载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卡·考茨基和其他人的信》，莫斯科—列宁格勒1933年版，第178—182页。——原编者

的策略。幸而还有一些国家允许言论自由，而且在德意志帝国周围也没有砌起围墙。而且只要人们勇敢、坚决，即使有围墙也能越过。在国内不能进行任何宣传，也还可以从国外进行文字宣传。”备忘录的其他一些理由更不充分，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些部分作这样的解释，仿佛这里推荐以俄国虚无主义者为榜样的一种秘密结社和议会的弃权政策。《灯笼》立即表示反对这一点，虽然它也表示它在许多方面是同意备忘录的意见的。《自由》虽然对这一抗议声称，它既不想宣扬一种秘密组织，也不想宣扬议会的弃权政策，但是它完全有这样做的可能。莫斯特开始谈论“新党”的问题，他用越来越没有和解余地的态度，对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议会代表。

但是，关于今后的策略的协议日益成为必要。复活节休假以后，帝国议会开始讨论有名的“财政改革和经济改革”。帝国议会成了俾斯麦、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这三个高贵的同盟者谈判如何分配剥削消费的群众所得的份额的交易所。经过长时间的讨厌的讨论以后，大工业家掌握了铁和纺织品关税，大地主掌握了粮食和牲畜关税，俾斯麦掌握了财政关税，这一有趣的事件给人民带来的是各种生活资料价格上涨和一亿三千万马克的新税。这时突然发生了巨大的政党变动。受到挫折的民族自由党人让他们的党员在所有经济问题上自由决定：一部分人仍然同进步党人一起留在自由贸易主义的旗帜下，另一部分人转为保护关税论者。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立宪保证”，也不愿让帝国议会的收入批准权完全化为乌有；因此俾斯麦不得不同教皇全权主义者结成一伙，教皇全权主义者满足于“联邦保证”、满足于把一切盈余拨给各邦以及——作为令人愉快的附加物——将进行文化斗争的文化大臣法尔克免职。这不会使像俾斯麦这样的大人物感到烦恼；只要能够买到这些便宜货，不仅到卡诺莎去是值得的，而且在分立主义面前表示敬

意也是值得的。

无论是没有色彩的报纸或者是从前的鼓动著作，都不能帮助工人在这种混乱状态中找到正确出路。而且议会讲坛也显得是个过小的扩音器。在争论新关税税率的几个星期中，社会民主党议员尽管多次报名，几乎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他们根本不能畅所欲言地阐明自己的观点。由于凯泽尔开始倾心于几项工业保护关税，^①他们的处境更加困难了。同时大城市的工人群众日益向前迈进。5月22日，当布勒斯劳东区的议会代表赖因德斯逝世的时候，布勒斯劳的工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接着在两次选举战中把哈森克莱维尔选为他的代替人。不多几个月中，布勒斯劳无产阶级五次表现出最明显的生命力的标志；毫无疑问，假如柏林、汉堡、莱比锡，总之是运动的最大中心的工人有了同样机会的话，他们也会同样坚决行动起来。相反地，在马尔克选区柯特布斯—施普累姆贝克进行的一次补选中，社会民主党选票大幅度下降。分裂的危险大大增长了；进步的无产阶级可能接受不可估计的《自由》的领导，不够成熟的无产阶级可能沉溺于没有色彩的报纸。

这时《灯笼》的态度也变得比较激烈了。尽管它忠实于党，反对莫斯特，但是它并不諱言，倘若在德国不犯严重的错误，就不可能发生伦敦的事情。它说，没有一个组织没有机关报；如果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不起作用，那么就创办新的机关报，但是不要长期犹豫不决，因为现在已到紧要关头。它指责凯泽尔的保护关税的跳跃，并且令人信服地指出新关税税率的普遍危害性，而这种新税率

① 凯泽尔的态度一再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参阅1879年9月19日恩格斯致弗·阿·左尔格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3—364页。——译者）。还可参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倍尔的信》，柏林迪茨出版社1958年版，第31—33、43、44、48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德国史》第2卷，第1291页。——原编者

的情况也确实是这样。这家周报刊登了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这封信反对莫斯特說，要么开始战斗，要么停留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基础上，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可是这家报纸也发表了一封“来自柏林”的信，信中說，有人以为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扎了很深的根，能够經受几年的外部平静，而且缺乏一切物质联系也无关紧要，这种信念同舞台效果一样，决不会有什么实际成就；也许还有第三种办法：坚毅的态度，利用德意志帝国国内外的形势进行防御或攻击。

馬克思和恩格斯终于也对这种混乱状况进行了干预。赫希柏格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仍像以前那样是党的忠实朋友；只要有可能，他就帮助和支持党，在他看来，他的财产也就是党的财产。但是他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他死抱着这种希望：启发和诉諸統治阶级名人的正义感，为社会民主党争取这些人物；他希望党尽量使这些分子能够順利转变，更多地强调党的经济纲领，进一步把党的政治的革命传统推到次要地位。于是1879年复活节，他让人从布鲁塞尔向德国的官吏、法学家、教师寄了一万本謝夫莱著的《社会主义精义》，按照同样的精神，他创办了几种新的科学刊物，以代替已被禁止出版的《未来》，在莱比锡用R. F. 賽弗特博士的化名出版《国家学研究》，在苏黎世用路德維希·李希特尔博士的化名出版《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在莱比锡不定期出版的那家杂志没有受到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它主要研究实际的社会政策，用代表工人阶级真正利益的国际工人保护立法来同保护关税的幻像——保护本国劳动相对抗。苏黎世的年鉴没有这样順利，尽管它小心谨慎，也很快遭到禁止。1879年夏天出版的第一年度的上卷包括格罗伊利希和福尔馬尔的几篇論文、几篇书评和許多关于现代文明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报道，大部分都是优秀的作品，同《未来》的立場相比，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但是这一期里还刊载了一篇以“批評的警句”面貌出現的特別的論文《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作者是赫希柏格和卡·奥·施拉姆；作为赫希柏格的文学顧問迁居瑞士的爱德华·伯恩斯坦被认为是第三个作者，不过他只做了一些不重要的补充。如果說，社会民主党在受到最严重的压迫的时候，对自己进行批評本来就是危险的和困难的，那么这篇論文就更沒有足够令人滿意地进行这种批評。到現在为止的鼓动方式受到了严厉批評，这种批評并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更談不到考虑全面了。文章提醒人們不要进行“关于未来国家的无益爭論”，但它不是根据排除一切空想的革命行动的精神，而只是根据資产階級—改良主义实践的精神，文章最后还強調說，如果牺牲了許多力量和家庭幸福的鼓动工作，應該用不同的办法取得显著成績的話，那就有必要爭取出身于有财产的和有教养的階級的許許多多拥护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白拉克等人的一封通告信中反对这种見解；他們要求，即使容許这种見解在党内存在，居于領導地位的人也不应发表这些見解。^①

苏黎世的年鉴当然不适合成为党的指导刊物，但是它現在同《灯籠》和《自由》并列，代表第三种策略方針，而不发表党的适当的意見。在国外出版党的正式机关报的必要性，不应再遭到反駁了，反对这个計劃時間最久的盖布也看清了这一点。他本人沒有能够看到这个新报的出版。8月1日，他的苦难結束了；据資产階級报

^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話是：“如果有理由暫时还容忍他們，那么我們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們，而不要讓他們影响党的領導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們分裂只是一个時間問題。而且这个時間看来是已經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們留在自己队伍中，我們是完全不能理解的。”（《給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89頁。）——譯者

紙的估計有三萬名漢堡工人排成長長的行列為他送葬，他的老友在他的敞開的墓穴旁邊宣誓，學習這個值得紀念的人的精神，不倦地繼續工作。

黨報的出版地點定在蘇黎世，瑞士工人運動在那裡有自己的印刷所，而且也具備發展這一事業的最有利的條件。《燈籠》已在6月底停刊，因為卡爾·希爾施自己知道，他所選擇的政治諷刺文形式不能滿足黨的需要。莫斯特越來越陷入毫無意義的革命遊戲之中，根據上述的一切，《自由》就更不能被指定為正式機關報了。9月28日，在蘇黎世出版了《社會民主黨人，講德語國家的社會民主黨的國際機關報》的試版。^① 526

這家報紙承認自己是反社會黨人法的產兒。它說，黨員同志在德國出版的沒有色彩的報紙，雖有其他各種優點，但是不能代替從前的黨報；它們不得不避免對資本主義社會組織進行任何批評，甚至最輕微的批評，資產階級報紙有時還稍微坦率地評論社會制度或國家制度，而那些報紙如果不冒立即被沒收的危險，就連這點起碼的坦率也不敢有。《社會民主黨人報》在原則上和策略上以哥達綱領為基礎；它說，作為一個始終如一的真正的革命黨——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它將為逐步教育和組織群眾而努力，並反對一切表面上是通向目標的、實際上是愚蠢和有害的革命遊戲。雖然它不在德國黨和奧地利黨的權力範圍之內，但是它打算在形式上儘可能避免觸犯普通法，但這也無損它在事業上的果敢行為。

這樣一來，難堪的束縛就解開了，黨的隊伍中又響起了經過考驗的老戰鬥口號：全綫前進！

① 關於由創辦蘇黎世《社會民主黨人報》引起的、在這個報紙存在的頭幾年一直進行的政治爭論，參閱恩格斯：《致倍倍爾的信》第25頁以下，第50頁以下。此外還可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德國史》第2卷，第1284—1287頁。——原編者

第二章 新的進軍

一 維登宮的檢閱

527 《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它的試刊上就記載了党在薩克森邦議會选举中所取得的重大成就。

拉薩尔鼓动的发生史充分說明，为什么社会民主党的竞选活动首先集中于根据普选法进行的选举，即帝国議會选举。但是，随着党的成长壮大，党也在不妨碍一切原則考虑的情况下，怀着就可能就夺取新的行动和斗争場所的不可摧毀的欲望，开始参加各邦邦議會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納稅限額选举。这种欲望只有在不可能取得任何独立的成就的場合（如在普魯士邦議會选举中）才受到抑制。在德国中小各邦，有时形势比較有利，这种形势常常得到利用，并且往往取得胜利，在薩克森王国也是如此。薩克森的市区代表中，有許多社会民主党人。为了更換第二議院中的三分之一的議員，薩克森邦議會每二年选举一次，参加这一选举的社会民主党人也漸漸增多，1877年，格里米乔人就把弗賴塔克律师作为第一个社会民主党議員送进了薩克森邦議會。無論如何，在反社会党人法公布以前，对参加納稅限額选举不太重視；可是，1879年9月10日，当薩克森邦議會进行改选，特別是在1878年帝国議會选举时

党遭到失败的莱比锡郊区、开姆尼茨、茨维考等地区进行改选时，萨克森党员决定考验一下自己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的帝国议会选举人，大约有三分之二由于纳税额限制而不能参加邦议会选举，虽然如此，李卜克内西和普特利希⁵²⁸律师仍然分别在莱比锡郊区西半部和茨维考当选。就是在社会民主党候选人落选的地区，所得的票数也比较多，尤其是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唯一可能存在的单线联系的秘密组织，显示出优越性。选举前三天，政府和资产阶级政党还完全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意图。事实上，它们也预感到这是一场奇袭，警察当局接到了立即镇压社会民主党的一切选举运动的最严格的命令；为了先表示一下它的爱国的英勇气概，它查封了德累斯顿、开姆尼茨和格劳豪的三家报纸，这三家报纸丝毫也没有违犯过反社会党人法。但是奇袭完全成功了。这年秋天，一个星期日的清晨，几百个党员从选举运动的各个中心四散开来，同一天傍晚，每个选举人都拿到了社会民主党竞选宣言和选票。只有在警官济普德腊特像一个土耳其总督一样进行统治的开姆尼茨，有二十个人（其中有帝国议会议员瓦尔特希和维麦尔）在折叠竞选宣言和选票时受到袭击，被用一根绳子捆成一束雪茄那样，带到警察局去。由于连表面上的犯罪事实也不存在，他们立即又被释放了，只有候选人瓦尔特希被拘留到选举结束为止；由于这一非法行动，开姆尼茨“法律和秩序”的胜利也就得到了保障。

李卜克内西和普特利希在进入萨克森邦议会时进行的忠诚宣誓，虽然只是一种空洞的仪式，但在党内也引起一些骚动。且不谈莫斯特的恶毒攻击，就连卡尔·希尔施也因此而同哈森克莱维尔进行尖锐的斗争。不过这一争论很快就停止了。有产阶级使国民的权利和义务的实现，依存于背诵一些浮夸的词句，劳动阶级一刻

也不能因此而受到迷惑；莫斯特本人在参加薩克森国家同盟时，也做了完全相同的忠誠宣誓。一件悲惨事件很快而且也很彻底地表明，工人阶级在薩克森邦議會中有自己的代表是多么有利。11月27日，李卜克内西刚在德累斯頓邦議院里有力地譴責了对薩克森矿工的危害公共安宁的剝削，12月2日，茨維考布里肯貝克矿井的一次可怕的爆炸就夺去了八十九个人的生命，这完全是剝削工人的資本的过失，虽然通风設備发生了故障，它仍然不肯停止采煤几个小时。在这个惊人的灾难的影响下，一周以后社会民主党在馬格德堡的一次帝国議會补选中取得很大成就。它的候选人菲勒克在初选中得了四千七百二十一票，在复选中得了七千三百十二票。随后，在埃斯林根的市区选举中，选出的七个参議員里有五个社会民主党員，在格劳豪一梅朗内和曼海姆的市区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也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普法尔茨小城兰布莱希特，一貧如洗的織工再一次占領了市議會。当然他們不得不再度退却，因为被选入市議会的十五个工人，受到他們的剝削者立即解雇的威胁；可是，既然社会和国家的拯救者的“胜利”比失败更为可耻，那么对他們來說还有什么荣誉可言呢！

这时《社会民主党人报》开始了它的澄清思想和集合队伍的活动。瑞士党員赫尔特尔为編輯部和出版社作画，赫希柏格以一貫的牺牲精神給起初只能亏本的报纸提供了財政保证。但是，《社会民主党人报》从一开始就是全党的机关报，而它也應該是这样。同德国党的紧密联系，使它沒有遭到变成流亡者报刊的危险。第一年，該报还存在理論上的某种不确实性；可是当党内还存在这种情况时，該报就已經不再存在这种情况了；起初，斗争的不可避免的必要性，把一切理論推到次要地位。报纸的語言是严肃而庄重的，在必須正确地指出可耻行为的特点时，肯定說了一些不客气的话，

但却毫无庸俗的嘲骂。

人们指责《社会民主党人报》一开始就为为党效劳的伪誓辩护，这种指责完全是捏造。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党员易卜生由于所谓的伪誓罪被陪审员宣告有罪，法院判了他三年惩役，理由是他用虚假的证词庇护一个由于散布违禁出版物而被告的朋友。我们所以说“由于所谓的伪誓”，是因为易卜生被判刑是完全无辜的。撇开这一点不谈，《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哈森克莱维尔写的一篇论文中也没有一个字表示同意伪誓（假如有人做了伪誓的话）；这篇文章只是揭露当时盛行的良心压迫，迫使一个人要么出卖朋友，要么向法庭做伪誓；文章要求对在这种冲突中蹉了交、违犯了法律的人表示人类的同情：“在我们看来，这个人不是罪人，而是殉难者。”过去席勒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来写他的《失去名誉的罪人》的；由此就构成了对这种为党的利益而作的伪誓的辩护，这只证明说这种谎话的人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堕落。

至少从表面现象上看，《社会民主党人报》做得不对的地方是，它不应把相当大的篇幅用在清除党内长出的杂草上。这是没有很大意义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劲风很快就把麸皮同麦粒分开，把哥达合并党代表大会后参加党的迅速胜利的行列的不稳定分子吹掉，甚至是有好处的。有些久经考验的同志疲惫地扔掉了手中的武器，甚至当警察迫使他们二者择一——要么眼看着自己和自己的家庭遭到毁灭，要么成为背叛自己事业的叛徒——的时候，他们却受了警察的诱惑，这件事是更为可叹的。但是这些情况也在许多不怕牺牲的忠实行为中消失了，敌人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的被开除出党者的名单的欢呼，只是证实党坚决在自己的队伍中保持铁的纪律。真正危险的却是莫斯特在混乱的第一年中赢得的影响。听伦敦的《自由》周报的话的，不都是最坏的、最落后的

分子，也有勇敢倔强的人，他們受的压迫越厉害，他們就越听这个报纸的话。1879年11月，柏林又实行了小戒严，并且继续用于迫害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在那里，莫斯特争取到一部分信徒，在柏林的被逐者中，也产生了一种容易引起一切猜疑的激动情绪。因为警察禁止为被逐者募款，所以募款只得秘密进行，捐来的钱也只得秘密分配，由此产生了种种口舌和摩擦。莫斯特把这种募款叫做鄙俗的行为。自从由于党的机关报在国外出版而使他失去一切埋怨的严肃理由以来，他就完全走上了迷途，他警告工人不要参加选举，他颂扬赫德尔和诺比林的谋刺行为，他用不干不净的钱致力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革命的”党。打开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道路，往往是令人不愉快的、同许多琐碎的私人争执有联系的任务，但无论如何是一项必要的任务。

一般说来，《社会民主党人报》十分机智地胜任这项任务。尽管警察善于偵探，尽管在德国各地进行了千百次住宅搜查，尽管邮局检查信件，《社会民主党人报》仍然日益深入德国无产阶级之中。在这场小战中，同为被逐者募款结合在一起的组织的新线，编成一种织物，马格德堡的一个国家检察官早在1880年就抱怨过，也许能在个别孔眼上把这种编织物拆开，但是不能把它撕破。吃不饱饭和受轻视的无产阶级表现为现代生产力和交通力的真正主人，无产阶级利用这个武器能够不太费劲地战胜历史上早已过时的警察统治。任何事情都可以学习，寄送《社会民主党人报》或其他被禁止的著作，有时被中途截住，但是不久“红色战地邮局”就准确而及时地进行工作，在这个邮局面前，正式的国家邮局的被作了广告式的夸张的“智谋”可以心平气和地升起降旗。除去《社会民主党人报》而外，散传单也是一件有效的鼓动手段；在禁令下达以前，传单通常已经散发过了。当德累斯顿警察局禁止倍倍尔对他的选民

作口头报告时，他就利用一份传单做了这个报告，在一个星期日早晨七点到九点，七百人巧妙而迅速地散发了三万份传单，当警察赶到时，只抓到其中的几份。

工人们很快就对自己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有了信心，因而他们学会了像猫戏耗子那样，戏弄他们的迫害者。1880年2月，米尔豪曾的警察局督察卡尔腾巴赫想从一个苏黎世党员嘴里了解《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送方式，这个党员假装同意，他把这位救国者532和跟随他的警探赶到比利时边境，而这时一大批违禁印刷物却越过了瑞士边境，而且他还把警察给他的罪过钱交给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金库，帐上记的是从“德意志帝国的尖鼻子和长耳朵”那里收到的。一个月后，兰道的税务局扣留了一大捆东西，这捆东西是从福腊耳堡的一个小地方送到法兰克尼亚的一个美因河畔的小城的，据说是废纸，但是在这些废纸里藏着一包《社会民主党人报》。税务员为自己的收获感到骄傲，把报纸藏到地下室里，可是第二天早晨报纸却不翼而飞了，这包报纸又安然到达收件人手里。与此同时，在德国国内，马格德堡的警察也受到有趣的戏弄。一个爱国的书商在警察同意下，用《社会民主党人的胜利或在德国建立共和国的理想，一个党的朋友们的看法》这个诱人的题目，出版了一本红色封面的书。这本著作用激进的言词开始，然后迫不及待地介绍服从警察的思想。可是很快就出现了另一本著作，外形同第一本完全一样，书名相同，引言也相同，但内容却是讽刺反社会党人法的。在有势力的警察当局的帮助下，这个著作销售了约二万五千份，两个月以后，警察才发现自己帮了谁的忙。这时警察也没有了主意，是连自己的拙劣作品一起禁止呢，还是让私货同时流通呢？困难的窘境使警察的模糊的感觉变得敏锐起来，1880年5月9日，马格德堡的王国政府下令说，粉红封面的著作是警察许可的，

浅紅封面的著作是警察禁止的。也就是可以讀德意志帝国公报，不可以讀喜尔达地方的官报。

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因为这些有趣的玩笑而忽视了形势的严重性。警察当局通过有效地使用无限独裁的物质权力，来弥补自己道义上的一切失败，1880年春天，俾斯麦向帝国議會提出一个議案，要求把还有一年有效期的反社会党人法再延长五年。这个世俗人沒有戒严已經不能进行統治了，而用加富尔的名言來說，有了戒严，任何蠢貨都可以进行統治。

533 俾斯麦曾經断言，反社会党人法一定会取得美好成果，而事实表明这种成果是不存在的。据說由于社会民主党鼓动引起的困难状况，在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受到镇压以后，几乎比从前更不能忍受了。1879年和1880年之交，这种困难状况达到了頂点。根据資產階級报纸报道，在德国許多地方，如施派札尔特、图林根、薩克森矿区、上西里西亚，甚至还有严重的饥荒。加之冬季奇寒，春天又鬧水灾。可是，既然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并没有因此被摧毁，那么至今还信仰救星俾斯麦的貧苦人民就把眼睛睜得更大了。像他們这些被折磨得要死的人，加倍敏銳地感觉到财政关税和保护关税这两个新吸血鬼的厉害。实行保护关税不但沒有使产业工人工资增加，在可能的情况下，工资反而降低了；由于工会組織遭到破坏，在这一方面，工人們也无力抵抗了！农村无产階級受到了耕地警察法和森林警察法的启发，普魯士富豪代表机关怀着不可遏止的利欲，通过这两个法令，吞下了穷人們从森林旁边的古老的公有地还能得到的越橘和松針。在这种情况下，像俾斯麦这样一个明白的政治家，除了实施戒严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他在1880年春季會議上，要求帝国議會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并使明年滿期的七年軍事預算繼續生效，同时增加平时兵員两万

五千六百十五人。

軍事議案被保守黨—民族自由黨多數派毫不躊躇地通過了。個別民族自由黨人對軍國主義的欲壑難填確實有些非議，可是毛奇的劍響了几下，他們很快就啞口無言了。俄土戰爭以後，三帝同盟受到一次不可挽救的打擊；奧地利和俄國在東方問題上的對立的利益發生了尖銳的衝突，不管俾斯麥在七十年代，尤其是在柏林會議上，多么熱心地維護俄國的利益，沙皇仍然抱怨忠實的藩臣忘恩負義。歐洲列強的新組合使德國、奧地利、不久還有意大利，同俄法兩國的同盟處於對立地位。現在兼併亞爾薩斯和洛林的苦果成熟了。越來越多的軍事要求最有力地證明社會民主黨在色當戰役所執行的政策的正確。政府斷言，為了準備反對“兩條戰綫”，反對法國和俄國，這些軍事要求是必要的。不倫瑞克執行委員會在它的宣言中所預言的正是這一點。倍倍爾從相同的立場出發批評軍事提案，同時也不諱言，社會民主黨也準備反對外國的侵略欲望，保護祖國的土。他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詳細論證了受到莫斯特、但也受到個別忠實的黨員攻擊的觀點：有國際思想的社會民主黨並不是沒有祖國的，祖國是處於外國統治之下，或者外國侵略者奪取了德國的一塊土地，這對社會民主黨並不是無關緊要的，無產階級為了能夠大力進行解放鬥爭，也需要民族獨立。這是 1859 年，馬克思、恩格斯和拉薩爾所運用的舊觀點，在德國黨的初期，拉薩爾和施韋澤也代表這種觀點，只是在北德意志聯邦的混亂年代中，才在某些地方變得模糊不清。

政府的反社會黨人提案，無論是關於柏林實行小戒嚴的總結報告，還是要求把反社會黨人法延長五年的法律草案，其內容無非是一些干巴巴的毫無意義的詞藻。同下一個十年中提到帝國議會來的所有類似提案一樣，是一個模子做出來的，馬考萊有一次把這

个模子作为一切坏政府的邏輯，归納成一条公式：“如果人民騷动不安，那么实行自由的时机还不成熟；如果人民安安静静，那么人民沒有要求自由。”俾斯麦体系要么說：反社会党人法使无产阶级安定下来，因此这个法令必須延期；要么說：反社会党人法还没有使无产阶级安定下来，因此这个法令更需要延期。1880年以来，一切反社会党人提案的“論据”都在这两个天才的观点之間，像吃醉了酒似的左右搖摆。也許制定这些議案的樞密顧問在吃早酒时的确擲了一回骰子，要决定他們的詞句應該适合哪一种类型，無論如何，这些文件同事态的具体发展沒有任何联系。资产阶级的独立的机关报很快就声明，刊载这种东西是不值得的，一种历史著述更不可討論这种問題。1878年，对反社会党人法的許多拥护者來說，这个問題还帶有种种思想意識和道义上的成分，而到了1880年，这个問題早就成为一个仅仅根据实际阶级斗争的需要而决定的、單純的权力問題了。

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准备延长这个法令的有效期。民族自由党人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不是延长五年，而只延长三年半，即到1884年9月30日为止，警察根据第二十八条拥有的放逐权，不应波及参加立法机关會議的該机关成員。政府同意了这两点；稍稍縮短期限，对政府沒有有什么关系，它以违犯禁令罪对弗里茨舍和哈賽尔曼的迫害，这时也已被法院駁回。全体民族自由党人中，只有拉斯克尔一个人絕對反对延期；当时拉斯克尔已經是一个垂死的人，他認識到自己的政治罪恶，并企图贖回自己这一部分罪过，他老老实实地說，政府违背自己的諾言，粗暴地濫用委托它对付社会民主党的权力。他的党内同志用一句沒有良心的話，来掩飾这令人不快的供状，他們說，除莠草的时候，难免要把好苗也一起拔掉。

在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中，教皇全权主义者現在已經安下心

来，他们不会受到非常法的迫害了，他们也准备延长非常法的有效期，只是为了做出爱的假象，他们要求做一些“减轻”。文特霍尔斯特老人要求，小戒严只限在柏林一地实施，不要禁止为被逐者募款，选举集会不应受该法令限制以及其他等等。政府及其保守党一民族自由党多数派不接受这一要求；改邪归正的“帝国敌人”应当乖乖地接受一切考验；十四个教皇全权主义者也准备这样做。因为赞成法令的多数派已经充分得到了保证，所以进步党人就可以再一次充分享受自己的立场坚定的激烈言论了。

社会民主党議員中，瓦尔特希在一讀时的发言很好，很有力量。敌人說，社会民主党仿效当时正处于全盛时期的俄国无政府主义恐怖，要想进行“暴力”革命，瓦尔特希反駁这种謠言說，在武器日趋完善，现代軍国主义已经形成的情况下，使用街垒和类似手段的旧式革命，已经由于純技术的原因而不可能进行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按其出身和目标來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党派，因此也执行完全不同的策略。倍倍尔也对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表示了类似的态度。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利用修正案参加了二讀，当然其目的只是，能有充分的时间发言，从各方面揭露可怕的警察統治。正如一个民族自由党发言人所說，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的提案是这样写的，在接受这些提案时，只剩下蝸牛壳，而蝸牛已经不見了。哈賽尔曼在三讀时发了言，总的說来并不拙劣，但却用了一些拙劣的挑畔言詞：他对他的一些同事否认同俄国无政府主义者有任何共同之处表示遺憾，他承认有共同性，議會空談的时代已成过去，行动的时代开始了。然后政府的提案以一百九十一票对九十四票通过。

哈賽尔曼为自己的革命宣言所选择的时机，沒有比这一天更不利的了，这天，剝夺德国工人阶级权利的法令被延长了好几年。

自从 1876 年哥达代表大会以来，哈赛尔曼坚持他的反对派的、搞阴谋活动的立场，如果他不向工人的“长满老茧的手”献媚，就看不出他有什么原则。他作为《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精神领导人所获得的明显功绩，使他得到许多工人集团的爱戴，尤其是在他个人活动的地区，柏林和爱北斐特—巴门更是这样，但是他并没有组成哈赛尔曼派。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他的帝国议会同事们想了种种办法，吸引他为了党的利益毫无保留地参加工作，可是由于他多疑而拘谨，他们的努力没有效果。相反地，他却煽动党内出现的一切不和，议会党团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即与其进行这种秘密的中伤战，还不如公开决裂。现在哈赛尔曼自己与党决裂，并自愿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死人，那就更好了。

他的顽固的分裂活动似乎使他的政治眼光变得完全模糊不清了；否则他从 1880 年上半年进行的一系列的补选中一定会看到，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是不打算用政治行动换取“行动的宣传”的。3 月 2 日，奥艾尔在格劳豪—梅朗内以八千二百二十五票对七千二百八十八票当选，代替了因重病辞去议员职位的白拉克。这个选区当然是党的老地盘，但是恰恰当时在这个选区中经济困难状况十分严重，要克服这种困难的破坏影响，就需要吃不饱饭的织工具有崇高的精神力量。这些勇士中有许多人为了不失去选举权，而放弃了社会的一切救济金。4 月 15 日，在柏林第二区进行的一次补选看来并不怎样顺利，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在这次选举中只得了约三千票，比发生谋杀案的那一年减少了一半。可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柏林，每个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人都有被立即驱逐出境的危险，那么这个结果也是十分光荣的了。一家保守党报纸甚至也用怀疑派的问题压抑了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关于小戒严的“降福”作用的欢呼声，这家报纸问道：“社会民主党毕竟还得了三千

票，如果自由党或保守党处在社会民主党的情况下，会得到多少票呢？”如果说这是一个小小的缺损的话，那么4月27日，哈尔特曼在汉堡第二区当选就出色地弥补了这个缺损，那里的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个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在第一仗中就打败了六千四百五十一个进步党选举人和三千五百八十三名民族自由党选举人。这是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新占领的第一个选区；当帝国议会正在讨论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问题时，忠诚的老汉堡提出了这个明确的抗议。胜利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不顾对一切竞选宣传的镇压，不顾逮捕选举委员会成员和扣押选举基金，不顾甚至没收要求选民检查选票的普通传单。只有一个阴影落到这个美好的胜利上；同一天，白拉克吐血而亡；同盖布一样，他还没有活到四十岁。

对党的内部状况来说，这次选举也有很大意义。哈赛尔曼在 538
汉堡出版几种没有色彩的周报，既然他在别的地方开始他的“行动”，那么在汉堡也应该这样做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这一点，甚至只敢片断地在自己的报纸上刊载自己的激烈言论，并且只用旧方式继续进行阴谋活动，但是，自从他不得不公开行动以来，他的中伤已经失其本身的毒素了。他的党羽完全消失了，这个大革命家成了普鲁士密探的没有主见的玩物。有一个叫诺伊曼的，据说是柏林的“社会革命家”，在往伦敦途中来见哈赛尔曼，哈赛尔曼交给这个假朋友一篇十分激烈的论文，托他带给《自由》周报。后来听说诺伊曼多半是个密探的时候（事实上他就是一个密探），哈赛尔曼和他的帮手即曾经当过家庭教师的卡尔·施奈德认为，与其在德国工人中间丧失一切威信，不如赶快离开德国。他们的逃亡得到另一个密探即染上维希曼的鼓动和支持，维希曼是根据阿尔托那警察局局长恩格尔的指示行事的，因为恩格尔很怕哈赛尔曼，以致

誤用这位“行动的人”去偵查外国的无政府主义党。哈賽尔曼先到比利时，后到英国，最后到了美国，到处贊揚帮他逃走的人是一个忠誠的同志；維希曼成了《自由》周报的受到尊重的記者，从外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那里得到最机密的报告，他很快就把这些报告送给了恩格尔。柏林的两个被逐者即瓦工克尔納和木工費恩从右边襲击党的背面的企图，也像哈賽尔曼的革命宣言那样得到悲惨的下場；他們刚刚傾心于“社会改革家”俾斯麦和施特克尔，就成了被处决了的人，他們不但不能組成亲帝国的工人改良党，甚至找一个第三者打一場亲帝国的工人改良的斯卡特牌^①也找不到。

5月，进行了同莫斯特取得協議的最后一次嘗試。原定这时在菩登湖畔的罗尔夏赫举行一次秘密的党代表大会，莫斯特以代表的身分带着柏林和格里米乔的委托书到瑞士参加这次大会。由于警察发现了大会的筹备工作，因此大会不得不延期举行，这时莫斯特就在瑞士城市里进行鼓动。他在苏黎世同那里的党员进行了深入的討論，一致通过了一个決議，決議要求双方停止一切私人攻击，实事求是地解决实际的意见分歧。可是，莫斯特回到伦敦后，却又否定了这个協議，繼續进行煽动。工人們很快就对这种煽动像对哈賽尔曼的激烈言論那样感到厌恶。6月，在柏林第五区（在謀刺案发生的那一年，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区得了三千六百十五票）进行了一次补选，党认为在这个区絕无当选的希望，所以就示威性地放弃了竞选，莫斯特被他的拥护者提为候选人，仅仅得了二百零三票。在柏林党员中，存在种种不滿情緒，小戒严的痛苦折磨使他們很容易接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策略。但是他們都是久經考驗和鍛炼的党员，不会不全面地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一切宗派

^① 三个人玩的一种德国牌戏。——譯者

主义活动，他们是决不会干的。

经过筹划的代表大会，于8月20日至23日，在苏黎世州的奥辛根附近、离军用公路不远的古维登宫举行。有五十六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他们大多来自德国各地；此外还有在瑞士、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以及两个奥地利党员和两个瑞士党员出席了大会。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寄来许多贺信和表示支持的信件。虽然《社会民主党人报》从6月20日起一再要求派代表参加大会，但是地点和时间的秘密仍然没有泄漏，因而四天的会议没有受到任何干扰。莫斯特和哈赛尔曼没有到会，在五十六名与会者中只有三个“社会革命派”，一个莱茵区的代表和两个柏林代表。

代表大会的八次会议引起许多激烈的意见冲突，可是最后还是趋于一致。对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第一年所犯的錯誤进行批评，现在只有历史意义；一部分人对领导人的极其困难的处境和沉重的责任可能没有适当的估计，而另一部分人则提出一个问题来夸大事實：群众不干，领导人能干什么呢？但是一年来所执行的策略，从原则上来说是无可非难的。人们不再遵守反社会党人法，而是不顾这种法令并且违抗这种法令，用旧日的方式继续进行旧日的鼓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用自己的独立的力量夺回被剥夺的权利，毫无疑问，无产阶级的死敌想用生锈了的锁链缚住无产阶级的巨大躯体，无异于想以手遮天。

于是代表大会决定修改哥达纲领，党不再只用一切合法手段，而要用一切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承认帝国议会党团是党的领导，《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党的正式机关报，通常每年举行一次党代表大会，但至迟每三年举行一次，各地的组织工作由该地党员负责，出于宣传和鼓动的考虑，参加帝国议会、邦议会和市议会的选

举,特别是为 1881 年的帝国議會选举开展最普遍、最有力的宣传。各选区的党员不論人数多少,一律独立行动,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但在复选中一般都应弃权。在复选时弃权是七十年代哥达代表大会遗留下来的老办法;资产阶级反对派政党的軟弱态度,促使这个決議通常只不过是一紙空文;如果竞选的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中的比較进步的一个,只要有一点当选的可能,在一般情况下,他都可以期望得到社会民主党的选票。

党的国际立場也由几个決議作了决定。代表大会对于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解放斗争表示同情,虽然由俄国情况决定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对于德国的情况是不适合的。代表大会决定,派代表参加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定于 1881 年召开的国际代表大会。在一个对美国情况很有了解的代表的鼓励下,几个比較有名的党员将在下届帝国議會选举以前,为了募集救济基金和选举基金,在美国做关于德国的政治状况的公开报告。

541 在党内糾紛方面,代表大会决定把哈赛尔曼和莫斯特开除出党。三个“社会革命派”代表弃权,但是他們也只提出一些表面的理由,因为他們認識哈赛尔曼和莫斯特耍的花招。特别是对賬目进行了仔細的审查,結果证明对浪费党的金錢的一切指控都是毫无根据的。从反社会党人法实行之之日起到 1880 年 8 月 1 日止,收入三万七千三百一十馬克,为了各种救济,支出了二万七千六百五十馬克,地方上所用的錢沒有計算在內,这笔錢至少也达到上述数字。

如果說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一年以集合队伍的信号結束,那么它的第二年就以对集合起来的队伍的檢閱結束。队伍已經整装待发,它的旗帜在队前向着新的胜利飄揚。

二 决定性的斗争

作为对汉堡选举和維登代表大会的答复，俾斯麦进行了蓄謀已久的打击。1880年10月28日，在汉堡—阿尔托那及其周围地区，即在有六十万居民的二十平方德里的地区实行小戒严。汉堡市議会长期不肯表示同意；当时这个大商业城市的资产阶级同为了执行保护关税政策而推动汉堡参加关税同盟的俾斯麦十分不和；对俾斯麦来说，在打击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同时，也打击頑固的资产阶级，当然是加倍的乐事，不久以后资产阶级也的确放下了武器。

汉堡工人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俾斯麦，维护城市的自由港地位，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的头两年，汉堡工人沒有受到过多折磨，这一点主要应该感谢这种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說，他們就沒有受到种种压迫。《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同《前进报》和《柏林自由报》一样很快就被禁止。可是，还在反社会党人法公布以前，汉堡合作印刷厂的领导人即卢卑克人亨利希·迪茨就为了保护《汉堡—阿尔托那人民报》不受警察迫害而接办这个事业，通过创办 542
《审判报》防止了最初几次打击，該报由布洛斯、卡尔·希尔曼、奥尔登堡（后来还有奥艾尔）任編輯，很快就拥有一万二千个訂戶。这家报纸态度謹慎，在汉堡沒有出事，但在阿尔托那，前四十二期接連被警察沒收。普魯士警察把它看做是被禁的《人民报》的繼續，在警察同为每天的面包而奔走的阿尔托那的报販之間酝酿着一場延續数星期之久的战争，阿尔托那警察机关向兩級法院对报販提出控訴，結果被告的报販获得了胜利。迪茨由于报纸被沒收曾向阿尔托那警察局长恩格尔提出抗議，这位正直的基督徒回答說：

“您雇用柏林的被逐者，这就够了。”4月27日的汉堡选举表明，汉堡警察的天鹅绒手套里也藏着利爪，但是它也表明，汉堡工人决没有采取暴力行动。因此没有任何使用第二十八条的前提条件；在汉堡及其周围地区实行小戒严无非是一种恶毒的报复行为。

小戒严的执行方式也是十分恶毒的。立即有七十五人接到了被驱逐出境的命令，其中有六十七人是有家眷的，几个月后，又有三十人被逐出境。平纳只克的旅馆老板法尔一年以来就患肺病卧床不起，他请求延期出境也遭到拒绝。法尔不得不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被运出境，这是最地道的普鲁士基督教的一个片断。汉堡的被逐者中有奥艾尔、布洛斯、迪茨、哈特曼、卡尔·希尔曼、卡佩尔兄弟、奥尔登堡、普腊斯特、莱麦尔；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到了美国。迪茨、奥艾尔和希尔曼到了哈尔堡，继续出版《审判报》，可是1881年3月30日这个报纸就被禁止了，表面上是因为发表了一篇谈俄国警察统治的文章，实际上是因为该报反对汉堡加入关税同盟。虽然约翰奈斯·韦德主办的《公民报》马上代替了它的位置，但是正如迪茨请一个资产阶级专家委员会计算的结果表明，两年半以来的压迫和迫害，使汉堡的事业损失了十万马克。不久小戒严扩展到哈尔堡城和管区，这个避难所也被封闭了。

543 汉堡的放逐使党损失了许多老战士；哈特曼、卡尔·希尔曼、奥尔登堡和卡佩尔兄弟退出了运动。可是团结的队伍一刻也没有动摇。1881年3月30日和31日，当帝国议会讨论关于柏林和汉堡小戒严的备忘录时，甚至资产阶级报刊也承认，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从来没有像这次表现得这样勇敢。奥艾尔和倍倍尔的演说受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赞扬是当之无愧的：不让步，但也不作幼稚的威胁，不诉诸善良的心，也没有戏剧式的叫骂。这正是俄国恐怖主义者刺死沙皇亚历山大，对社会党人的新的恐惧在德国庸人中

抬头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发言人无视一切由于恶人得到恶报而产生的廉价愤怒；他们认为不能把俄国革命者的策略用于德国，但是他们为这种策略的正当权利作了辩护，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党派的代表在议会这样做过。奥艾尔最后说：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我们准备应付一切，倍倍尔说：在这一斗争中，你们的武器将像玻璃碰到花岗石上那样碰得粉碎。

在联邦议会的会议桌上，新任的普鲁士警察大臣、后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冯·普特卡默第一次同社会民主党议员见面，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普特卡默就像迫害“煽动者”时期的科采布、康普茨和乔珀一样臭名昭彰。他是一个毫无历史知识和经济学知识的容克，在普鲁士官僚的毫无意义的例行公事中度过了一生，受过最普通的警察手段的训练，唯一的长处就是具有某种演戏的才能，会发出许多豪言壮语，虽然懊丧地意识到，在这些大话背后没有任何东西。他恭维社会党人的战地邮局说，它善于“用真正恶魔般的技巧”把《社会民主党人报》偷偷运到德国，他拉来一个大引文口袋，此后他在每次关于反社会党人的辩论中都把它打开，当作他的政治智慧的唯一源泉。当然他提不出在柏林和汉堡实行小戒严的理由，甚至这种理由的影子。虽然如此，帝国议会仍然满足于听取了备忘录的内容；俾斯麦懂得他可以向资产阶级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现在他终于不得不在发生谋杀案那年选出的帝国议会的最后 544
一次会议上提出“积极的改革”。而在头三次会议上，彻底研究了旧普鲁士的当兵、纳税、箝制言论等问题；如果说在最后一刻还没有使用什么障眼法，那么在1881年的改选中就使用了。工人意外灾难保险法草案就是俾斯麦对受奴役的、吃不饱饭的群众的赠礼。他想用帝国银行对一切意外灾难保险的办法，来代替可怜的赔偿责任制，这个赔偿责任制不过是使企业主能够逃避对他们雇用的

工人的意外灾难进行赔偿。保险费用，企业主出三分之二，工人出三分之一，有一个条件是，年薪不超过七百五十馬克的工人，由国库负担其应付的三分之一。但是由于失去工作能力而得到的意外灾难保险，应在事件发生后第五个星期才付给，在这以前由疾病互助会负担。在提案的理由中列举了许多对工人表示友好的词句、“社会主义的动机”、基督教和入道。在帝国议会中讨论这个议案时，俾斯麦还做了一件多余的事情，他表现出一种蠢惑的姿态，只要一开口，就大言不惭。这个人刚刚使几百个工人家庭成为他的暴政的牺牲者，现在却又为无产者和必然慢慢饿死在垃圾堆上的老工人洒下了伪善的眼泪。

现在可以看出，即使人们只把他比做迪斯累里或路易·波拿巴，也是对他估计过高了。他激起了整个资产阶级反对自己，却没有争取到一个工人。他的民族自由党卫队在1880年夏天就已经分裂了，被大大“激怒了的自由贸易论者”脱离了民族自由党，以分离派的名义执行自己的政策。但是保护关税派的资产阶级也不同意“社会主义试验”。交易所巨头极力支持保护关税政策，而且已经在一次新的小型的股票诈骗中嚐到了这种政策的甜头。交易所对迫害犹太人一天比一天热心。施特克尔及其基督教社会鼓动在
545 工人那里碰壁以后，他就以美好的本能投身到小资产阶级排犹主义的鼓动中去，现在至少在柏林召集了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信徒。俾斯麦目光短浅，给这种没有前途的喧嚣提供善意的保护。1880年6月，当施特克尔攻击他的亲信犹太人布莱希勒德的时候，这位世俗人当然就想把这位路德第二“也像其他社会民主党人那样”逐出柏林，这个企图没有实现，因为皇帝不愿离开他的“武士”，只把施特克尔斥责一顿了事。可是俾斯麦并不公开反对排犹鼓动，反而让它感恩报德地欢呼万岁，他完全不认识，对他来说，可怜的骚

动者的最热情的尊敬决不能同犹太金融资本家日益增长的愤慨相提并论。这个狡猾的阶级开始搔他最怕痒的地方。它顽固地和长期地烦扰着那位很瞧不起自己的亲切的父亲而却相信这个狡猾阶级的善意的皇太子，直到他嘟囔出（或者据说嘟囔过，因为这句话从来没有得到证实）“当代的丑闻”等类的話为止，后来所有资产阶级报刊都把这句话当作人类精神的最美丽的花朵，用来反对排犹太主义的护法神俾斯麦。

意外灾难保险法好像是使资产阶级的大量增加的怨恨溢出来的一滴水。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社会主义”比俾斯麦所想的要认真得多，它把办理意外灾难保险的帝国银行看作是夺去私人投机的整个保险事业的开端，把国家补助看作是使资产阶级要求全给自己的一部分国家贷款给与工人阶级的尝试。受到这样沉重打击的德国资产阶级，表现出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从来没有显示过的胆量，它英勇地下定决心在下届选举时，把它的天才的英雄整一下，以惩戒他违背职守的越轨行为。

可是工人们立即看穿了俾斯麦的把戏。李卜克内西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反社会党人法的制定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然而盲目赞同资产阶级对意外灾难保险法的诅咒，也不合乎党的利益。党在击退社会主义假兄弟的同时，不可被自由贸易派假兄弟所笼络。甚至在排犹—亲犹的蛙鼠战中（在这一战争中，工人们可以最先保持中立），工人们立即采取了超党派的坚决而明确的立场。他们没有丝毫理由倾心于金钱犹太教，可是，难道他们可以因此而受基督教德意志的奸商政策的迷惑吗？这种政策无非是最高级的金钱犹太教，并且受到施特克尔的全力辩护。1881年1月，当柏林和布勒斯劳的警察让工人稍稍自由一些，希望他们参加排犹活动的时候，许多大会提醒“所有城乡工人

注意形形色色的所謂人民之友的欺騙陰謀”。工人們不應積極參加與他們毫無關係的排猶運動，在帝國議會選舉中只選反對一切非常法的候選人。隨後在柏林和布勒斯勞再度最嚴格地禁止工人舉行大會。

社會民主黨帝國議會黨團從同樣卓越的立場出發，理解俾斯麥的意外災難保險法。^① 它從工人階級的利益出發，比資產階級反對派尖銳和切合實際得多地批判了這個草案，同時也揭露了這個反對派的弱點。社會民主黨發言人用諷刺的口吻指出，正是那些自由黨人，他們過去最熱心地擁護調節貨幣流通的資本家的帝國銀行，現在卻最激烈地反對調節意外災難保險的、可以說是無產階級的帝國銀行。這個銀行有其不可抹殺的優點，因為它比私人保險公正，形成一個巨大的監督機構，以便採取防止意外災難的保護措施，這正是一切意外災難保險的主要目的。社會民主黨議員也表示反對國家補助，不過其理由同自由貿易派迥然不同。他們以資產階級經濟學所承認的、不可辯駁的事實為依據，即意外災難保險屬於生產費用，因此只應由企業主負擔。國家不應給企業主送禮，當然工人階級更不應這樣做，如果在兩者之間進行選擇，當然國家補助比工人有義務繳保險費還是較小的禍害。議會黨團在一系列的修正案中詳細表述了自己的觀點，不言而喻，這些提案都遭到否決，這件事又一次證明，只有社會民主黨議員才是工人利益的有經驗的和熱心的代表者。資產階級政黨滿足於把帝國銀行和國家補助當作對資本主義神聖精神的致命打擊而一筆抹殺，並且把草案向壞的方面作了修改，以致聯邦議會認為不可實行而加以

^① 1881年3月30日，奧古斯特·倍倍爾在帝國議會做了一個社會民主黨人論意外災難保險法的最好的演說。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大加贊揚。（參閱恩格斯，《致倍倍爾的信》，第57頁）。——原編者

否决。

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对俾斯麦的“社会主义”转变的一般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党的理论上的不确实性。意外灾难保险法被解释为俾斯麦对社会民主党的投降，这种解释从鼓动方面来说是有用的，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从理论上来说至少是一种误解。也就是认为不是俾斯麦掌握了社会民主党，而是社会民主党掌握了俾斯麦，他抓住社会主义牵引绳游泳，利用他的提案把一个楔子的尖端打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组织，这个楔子的粗头必然也将打进去。可是俾斯麦根本没有想到这么远；他的草案既不想离开而且也没有离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毫无疑问，当时在这一方面有人说过许多有问题的话，但是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实际上完全正确的态度相比，这些话是不重要的，后来有人为了一有可能就在党内制造一些混乱，而把这些话加以夸大。

1881年6月27日，帝国议会会议闭幕以后，在莱比锡市和县实行了小戒严。3月间，普特卡默就已经表示要这样做，只是同汉堡市议会一样，德累斯顿政府也反抗了一个时期。这里也没有任何使用第二十八条的理由，社会民主党的老迫害者、至今也相当粗暴地使用了反社会党人法的警察署长吕德尔辞了职，大概是因为他不适合于现在要求他干的刽子手职务了。第一批发出的莱比锡的驱逐出境命令没有柏林和汉堡那样多；有三十一个人，即六个单身汉、二十五个有家眷的人接到了这项命令，其中有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哈森克莱维尔。当然不久又发出了二十二张命令，尤其是正在举行萨克森邦议会选举的莱比锡郊区的东半部被驱逐出境的人最多。可是恐怖手段没有生效；选举倍倍尔，是莱比锡工业村 548 对强加于它们的暴力的勇敢顽抗的证明。

在被驱逐出境的人们中，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区议会

員特別多，在萊比錫县的二十五个鎮共有七十六人。他們之中任何人也沒有想到在施忒特里茨、童貝克或福尔克馬尔斯多夫进行血腥的暴动；他們都是勤勉能干的人材，根据他們的政敌——区长的证詞，他們在执行职务方面是无可非議的；他們中間有个別人曾經在普法战争中获得铁十字勳章。采取这一項令人憤慨的措施的真正原因，是俾斯麦企图像在柏林和汉堡所做的那样，削弱社会民主党鼓动的主要中心萊比錫的力量。倍倍尔同李卜克内西一起定居于戒严地区的边境博尔斯多夫村，当他进入薩克森邦議會以后，要求諾斯提茨—瓦尔維茨大臣答辯时，这位柏林暴力政策的助手只知道說一些不伦不类的話，随后資產階級盲从的多数派就急忙通过結束討論的提案，拯救大臣免遭更严厉的懲罰。

竞选斗争在盛夏和初秋进行得十分激烈。資產階級政党“以危害公共安宁，特别是危害各居民階級的和睦的方式”互相挑撥，假如反社会党人法同法律还有一点关系，那么从法律上說，这些資產階級政党都該受反社会党人法制裁。可是最大的挑撥者就是俾斯麦本人。这次他的目标不再是早已軟化的民族自由党人，而是进步党人和分离派，他指責后者是“共和主义者”，这个不怀恶意的集团用一种恐惧、悲慘的姿态，十分可笑地进行抵抗。

然而俾斯麦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摧毀社会民主党的新队伍，从他的立場來說，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如一个爱国的教师所歌頌的那样，他通过自己的儿子們“降格到人民的地位”；这些很有前途但无才能的年輕人中的一个在柏林一次喧囂的大会上声称，畜犬規定比小戒严更难忍受，为此，柏林工人恰如其分地对“帝国飼犬童”的父亲进行了痛斥。阿道夫·瓦格納以俾斯麦的特派員的身分在各省旅行，他答应工人，只要工人願意相信“世俗人”的“社会主义”，烟草专卖就是“无产者的世襲領地”。瓦格納在他竞选的

四个选区中遭到彻底失败，这些博学之士发挥了智力和道德同样高超的作用，理应得到这种报酬。

俾斯麦信赖赤裸裸的暴力甚于一切蛊惑伎俩多多。在戒严区，不断有人遭到驱逐，社会民主党的竞选传单遭到没收，尽管它们的内容都是平常的，工人的选举大会普遍遭到禁止。散发社会民主党的传单，甚至只散发选票的人都要遭到逮捕，被拘留起来侦查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在选举前的几个星期中，这种完全非法的逮捕不下六百起之多。警察得到资产阶级许多帮助，资产阶级虽然在其他方面与政府敌对，但在破坏社会民主党竞选这一点上同政府是完全一致的。它散布谣言说，选举社会民主党人的选区，就有实行小戒严的危险，甚至造谣说，投给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每张选票都是废票。尤其是萨克森资产阶级制作陷阱的才能是无穷无尽的，无产阶级在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时，就掉进这些陷阱里。资产阶级在施托貝克—施内貝克出售八开纸大小的选票，这种选票由于大小与普通选票不同很容易识别，在莱比錫郊区它出售用带有水印和毛边的麻纸做的选票，为了防止仿造，把仅仅一个工厂有的这种纸全部买来，在格劳豪—梅朗内，“爱好秩序的”区长把处于半饥饿状态的織工所欠税款转给贫民救济基金会，把这笔欠款称做付给欠款人的救济金，这样一来，就有很多工人失去了选举权。在这个选区里，警察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能耐，在整个选举期间，它把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置于自己的严密监督之下。奥艾尔在乡村里经常被一个警察跟着，在城市里被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跟着，从早到晚离他只有十步远。后来“法律和秩序”取得胜利的萨克森选举，至少有六次由于施加了空前的压力，甚至遭到帝国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的反对。

但是工人们知道应该怎样做，他们决心勇敢地经受反社会党 550

人法的总考验。弗里茨舍和菲勒克根据维登代表大会的决议在美国所做的演说旅行，给社会民主党选举基金带来了一万三千马克的捐款。此外，无产阶级群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优势敌人的一切暴力和诡计。火热的战斗意志推动他们克服一切障碍勇往直前；当弗里茨舍和瓦尔特希在选举前不久迁居美国的时候，人们对这两个将近二十年始终站在斗争前列的最老的党员进行了最严厉的批评。许多老领导人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成为反社会党人法的牺牲品；一些新人接替了他们的职位，这些人是自然而然地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在几个月以前还没有一点名气，可是他们也能胜任最困难的任务。关于“被诱惑的群众”和“轻率的诱惑者”的牺牲品之类的鬼话，从没有象在这次选举中被摧毁得这样彻底。

10月27日，党在初选中获得三十一万一千九百六十一票。虽然比谋刺案那一年的选举少得十二万五千一百九十七票，但是没有一个敌人想到利用这个差额来反对社会民主党。三年来被用各种暴力手段驱逐、压迫、迫害的社会民主党仍然得到了三十多万票，换句话说，反社会党人法就等于没有发生作用。《泰晤士报》驻柏林记者向伦敦报道说，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成果使“上层人士和最上层人士”惊惶失措。恩格斯却高兴地从伦敦写道：“无产阶级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现得如此出色。”^①

在初选中只得到一个议席，从萨克森人民党时期就参加了运动的一个老战士即园丁施托尔在茨维考—格里米乔取得了胜利。可是“秩序维护者”善于窃取胜利，他们非法地宣布一批社会民主党选票为废票，以致在这个选区中还要举行一次复选。社会民主党总共参加了二十二次复选。在复选中得到选票最多的是三个戒

^① 1881年11月30日，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28页。

严区：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汉堡第二区和阿尔托那、莱比錫市区，这三个地方从来还没有受到这样有力的围攻，柏林戒严区三万零 551
一百七十一票，汉堡—阿尔托那戒严区三万零八十七票，莱比錫戒严区一万七千零六票。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首先举起大旗走在前面的布勒斯劳，在它的两个选区的复选中，保持了同样的荣誉。其次，还在其他两个普鲁士省会汉诺威和馬格德堡参加了复选，在莱茵区是工业中心爱北斐特—巴門和佐林根。在薩克森王国的格劳豪—梅朗内、施托貝克—施内貝克和莱比錫郊区，敌人的卑鄙的选举策略稍稍占了上风。除去在莱比錫市区和茨維考—格里米乔而外，还在德累斯頓旧城、弗賴貝克、米特魏达和重要的开姆尼茨参加了复选。在中德小邦中，罗伊斯长系被占领了一半。在美因茲、法兰克福、哈瑙、奥芬巴赫的复选中，美因部表现得十分出色，在巴伐利亚，它的主要工业中心紐伦堡发生了动摇。

失去的选票中，大約有三分之一是在薩克森王国失去的。自从謀刺案那年的选举以来，薩克森王国大約丧失了四万票，几乎正好回到 1874 年的数字。可是損失的这一部分票，不是因为死亡或有人背叛而造成的，而只是因为被捕和受伤而造成的；那些穷人中的最穷的人，他們暂时被饥饿弄得筋疲力尽，被饥饿的鞭子击潰，又都重新前进了。在西里西亚失去六千票的原因差不多也是这样的。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运动发生了更大的变化，比如在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1874 年以来，那里的社会民主党选票数不断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即由四万四千九百三十三票降到一万四千一百零九票，在普鲁士邦的易北河东諸省和美因河北的小邦也是这种情况。与此相反，虽然南德諸邦的警察統治早就同它的普鲁士和薩克森的榜样进行了有效的竞争，南德仍然像美因部那样保持着优异的成绩。假如选举的总結果还没有把票数損失推到次要地

位，那么南德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和运动集中于大工业区这两点就补偿了票数损失。恩格斯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于自己所处的经济地位而具有革命性的阶级，现在成了党的核心，这个党平均地分布在全德国，现在它才是一个民族运动。^①

552 资产阶级对它从前的崇拜对象真正提出了警告。进步党人和分离派中，共有一百多人进入了帝国议会；保守党—民族自由党多数派和保守党—教皇全权主义者多数派都被打碎了。可怜的俾斯麦惊慌得不知所措，他东奔西走，力图为复选挽救还可以挽救的东西。他谈到，作为一个主张立宪的人，他想向进步党—教皇全权主义者联合内阁让路，并且立即任用了它的一个犹太商人，以便向他显示，他的心经常为以色列人民而跳动。可是他也抱怨，资产阶级以怨报德；他说，他根据资产阶级的要求制定了反社会党人法，以致工人阶级对他怀恨在心；他对这个法令丝毫不感兴趣，他宁愿今天而不愿明天放弃这个法令。同时阿道夫·瓦格纳同施特克尔伙同一气，向柏林的社会民主党人提出一项政治买卖：如果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哈森克莱维尔声明，他们承认政府实行改革政策的意图是对工人表示友好，他们确实愿意同社会改良的政党和睦地为改善经济状况而共同工作，他们希望通过有力的社会改革来战胜革命，那么瓦格纳、施特克尔及其一伙就答应在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的复选中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反对进步党候选人，在一定情况下，赞成废除反社会党人法。

即使这个谈判不是在俾斯麦事先已经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无论如何它在俾斯麦那里也得到了意味深长的反应。半官方主要报纸为此帮腔说，由于对社会党人的迫害，资产阶级在它的经济上

^① 1881年11月30日，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0页。

的宿敵工人階級那里找到了政治同盟者，工人階級在經濟方面的令人不快的要求，資產階級一如既往力图加以粉碎。相反地，反社會黨人法妨礙工人評價政府改善他們的狀況的善良意圖。這對於資產階級是一種適意的處境——只要這種情況繼續下去。人們可以從政府的政治家觀點中期待政府通過滿足工人的正当要求，實現社會主義思想的健康核心，然後反社會黨人法就是多餘的了。生意不可能做得更坦率了。

李卜克內西、倍倍爾和哈森克萊維爾作了符合黨的榮譽的答覆。他們拒絕了一切選票買賣；他們寧願要三萬張光榮地得到的選票，也不要三十萬張買來的選票；他們不能贊同政府以頒布反社會黨人法開始的經濟政策，增加和提高必需生活資料的間接稅、增加軍事負擔以及類似的遠非對工人友好的措施。正如他們對意外災難保險法的態度最後表明的那樣，他們從沒有拒絕認真研究政府的改革建議，並根據工人的利益加以修改，但是他們必須拒絕同反動的、因此是與人民為敵的政黨進行共同的事業。說他們要想進行暴力革命，這純粹是一種任意的假定；他們經常聲明，均等的、徹底的和完全的改革能夠防止革命，否則革命就是我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的必然後果；對於不以他們的意志和力量為轉移，而以他們的敵人的意志和力量為轉移的事情，他們不負責任。這個勇敢的聲明的作用是很大的；保守黨商人宣布他們的人在選舉時棄權，雖然如此，在複選中，倍倍爾在柏林第四區的選票由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票上升到一萬八千九百七十九票，哈森克萊維爾在柏林第六區的選票由一萬零六百二十九票上升到一萬七千三百七十八票。進步黨候選人在柏林第六區以五百六十九票之差得勝，在柏林第四區只以五十一票之差得勝，同時這些不屈不撓的人們的種種選舉陰謀還起了十分值得質問的作用。

除此而外，党在复选中是比较顺利的。自由党指责保守党大量支持社会民主党候选人，总的说来，这是捏造，虽然在个别选区并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自由派思想家仅仅为了表示在道义上厌恶共产主义“分配人”，在复选中砍掉了自己的手指，惯于统治的保守党决不这样盲目。在复选中进入战斗的，基本上都是受到初选结果鼓舞的新工人群众。社会民主党共得十三席：布勒斯劳第一区（哈森克莱维尔）、布勒斯劳第二区（克雷克尔）、汉堡第二区（迪茨）、佐林根（里廷豪森）、美因兹（李卜克内西）、哈瑙（弗罗默）、奥芬巴赫（李卜克内西）、纽伦堡（格里林伯格）、米特魏达（福尔马尔）、弗赖贝格（凯泽尔）、开姆尼茨（盖泽尔）、茨维考—格里米乔（施托尔）和罗伊斯长系（布洛斯）。李卜克内西接受了奥芬巴赫的
554 委任，美因兹在补选中失去，因此社会民主党议员就以十二人之众进入帝国议会。

作为立法者的功绩的反社会党人法在它的第三年末尾就成了一张破纸。困难的日子还会到来，不过最大的困难已被克服了。

三 无政府主义的幽灵

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胜利也清除了对党所采取的策略的正确性的最后怀疑。反社会党人法的执行十分严厉，好像要粉碎一切似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怀疑又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德国首都的两个选区，即第一区和第五区，甚至站在选举斗争之外，因为那儿当选的希望最小，莫斯特在那里又有比较多的拥护者。正好与竞选同时，第一个叛国案在莱比锡帝国最高法院审理，这个案件揭发了“社会革命派”的行动完全没有希望，并鼓励每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用一切政治手段反对俾斯麦体系的腐朽的警察制度。

莫斯特被开除出党以后每况愈下了。他表面上拥护无政府主义方针，但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他并不属于这一派。《自由》的内容从第一行到最后一行都是没有意义的狂怒，莫斯特在1880年秋天为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写的鼓动著作《反对自由的策略》，虽然没有使用这样愤怒的语言，但只是一团混乱。比利时人达佛是蒲鲁东和巴枯宁的一个有教养的学生，他本人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和平无害派，并企图用这种思想影响莫斯特，他用他那蹩脚的德语谈到这个著作时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这完全是一本雅各宾主义的、而用布朗基主义即布朗基的思想加以缓和的小册子。”“布朗基主义”也不是莫斯特本人的产品，而是在密探诺伊曼带到伦敦来的那篇《自由》的论文里，哈塞尔曼给他提的词。

莫斯特把这篇论文印在他的小册子的末尾，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小册子的实际的依据。文章说：“我们没有想到向德国工人推荐‘密谋把戏’，利用秘密的中央领导机关等等，因为这只有利于秘密警察的隐蔽活动。可是，如果在熟悉的圈子里，每十个或二十个熟识的朋友集会，而不通过会员名单、章程等等提供迫害的根据，如果这些自由组成的小组热情地通过语言和文字传播革命思想，如果他们经常同军队里的朋友和同志保持接触，如果他们每个人终于自己设法弄到一支好后膛枪，那么我们就可以十分有效地组织起来。四千名这样组织和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者集合在首都柏林，相应数量的社会主义者集合在主要工业区——毛奇就不容易破开这个核桃了。”哈塞尔曼在到美国去以前，把他的一小撮拥护者的通信处交给了莫斯特。其中主要有法兰克福和达姆斯塔特的几个工人，莫斯特马上同他们取得联系，并把他的朋友达佛介绍给他们。1880年11月，达佛到德国去，为他打算建立的通讯社寻找通讯关系，同时也为了在近处看一看德国的无政府主义。结果他

大吃一惊，他所找到的只是几个精神落后、政治模糊的工人。

普魯士警察并不像无政府主义思想家那样短視。它比較正确地解释了莫斯特的殘暴的豪言壯語，急忙把他裹在一个密探之网中。密探諾伊曼以莫斯特的心腹人的身分坐在《自由》的发行部里，而密探維希曼和沃尔弗則从阿尔托那为該报写通訊。他們利用这一“写作”活动追求种种目的：他們指摘汉堡的“有共和主义思想”的警察对社会民主党寬大，他們誹謗社会民主党議員是欺騙黨員和窃取他們的錢財的人，他們給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描繪了一幅十分可怕的图画，末了（但不是最后），他們为普特卡默的大引文袋提供丰富的材料。比如維希曼在俄国沙皇被刺死以后写道：“但願同样的事件使我們从所有暴君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日子不再遙远！我們感到遺憾的只是，沒有同时給其他坏蛋付出他們应得的报酬。”这还远非“最社会革命的”发作。誰不理解普特卡默的“道德上的厌恶和最深刻的憤慨”呢！只是由于有这种情緒，他才敢于想到他的引文袋里的这些珍宝的。后来，沃尔弗和維尔曼利用他們的“写作”能力轉而反对自己的恩主。沃尔弗向普魯士警察机关提供了他的“回忆录”索取世界文学中的最优秀的杰作往往也得不到的那样多的稿费；他被柏林法院在严格禁止旁听的情况下以勒索罪判处一年徒刑，被从普吕岑塞释放出来以后，又在阿尔托那以所謂侮辱皇帝罪被捕，第二天早晨发现他吊死在監獄里。維希曼在被阿尔托那工人揭发以后，警察就不願再給他津貼了，因为現在他对警察已經沒有什么用处了，这时維希曼就开始喋喋不休。这样，关于这两个流氓的情况，人們就知道得更詳細了；不言而喻，他們只是一帮密探中的很小一个部分，反社会党人法頒布后，这帮人就被派出来，秘密进行卑鄙活动。

这佛还没有到德国以前，德国所有警察机关就已經掌握了他

的相貌說明書了，法蘭克福的警察也知道莫斯特在美因部的幾個擁護者。這半打可憐蟲在法蘭克福、達姆斯塔特和其他幾個地方組成“小組”，並不是為了購置好後膛槍，而是為了共同訂閱《自由》，為莫斯特募款；他們也的確把整整五個馬克寄到倫敦。他們的最大功績在於，1880年10月18日到19日的夜間（皇帝訪問法蘭克福前不久），散發了幾百份違禁的傳單。領導法蘭克福及其郊區的政治警察的警察顧問盧普夫自己承認，他認識散傳單的人，但是他不抓他們，卻收買裁縫霍爾施為密探，取得“密謀者”的信任。當然盧普夫警告他的“心腹人”不要積極參加謀殺計劃和顛覆計劃，任何警探活動的愉快的開端都是這樣，但是他也使用屢試不爽的警察方法，不是付日薪，而是付計件工資，根據“揭發”出來的事件的“重要性”付工資。霍爾施是一個慣竊，他不贍養人口眾多的家庭，卻把自己的罪惡錢花在一些淫蕩的女人身上，當然他需要錢，需要很多的錢，每天都報告“比較重要的”消息：準備謀殺盧普夫本人，在達姆斯塔特或埃貝斯塔特舉行秘密的代表大會，討論武裝暴動問題。1880年12月1日，盧普夫收起漁網；五十多人在法蘭克福及其周圍地區被捕，達佛在奧格斯堡，莫斯特的幾個朋友在柏林也同時被捕。被捕者中有被盧普夫一起放進去的霍爾施，據說是為了保護他不受社會黨人報復。盧普夫因此而犯了根據德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條應判懲役的罪過，這件事似乎沒有進一步使這位法律的謹慎的維護者感到憂慮。

在法蘭克福，人們就把一些普通罪犯放進被捕者的牢房里，偵探他們的情況，不久所有被捕者都被解到柏林，在那里人們繼續使用這個巧妙的方法。警察局長施蒂爾弗里德伯爵對主要對付達佛的詐欺破產者施涅采爾說，如果發現了重要的東西，那麼一千馬克，甚至一萬馬克都不成問題，預審法官霍爾曼答應這個愛國者通

过特赦给他减刑。被捕者也严重抗議霍尔曼记录他們的供詞的方式。他們之中的許多人在經過长时期待审拘留以后，被释放了，因为連一点該受处罚的行为的迹象也找不到，在巨大的打击后两个半月，起了疑虑的霍尔施也对預审法官說，他希望获释，因为他根本不是罪犯，而是一个大爱国者。卢普夫在同一天写了三封信回答霍尔曼的詢問，他在信中虽然承认霍尔施的密探活动，但是由于他的“心腹人”积极参加“密謀”，他对他们有所怀疑，同时他又說，把霍尔施当做证人加以审讯，“至少”是使他“感到不快”的。預审法官觉得这种关系太微妙了，他释放了霍尔施。

在这几个月中，人們利用这件大叛国案为反社会党人法服务，1881年10月10日到21日，对这个案件进行了审判。站在帝国最高法院的被告席上的还有十五个人：十一个南德人、三个柏林人和达佛。关于以霍尔施为首的叙述有罪事实的证人，甚至《馬格德堡报》也說：自从最凶恶的反动时期以来，有过这样一个案件嗎？在这个案件的证明被告有罪的证人中有这样多令人討厭的受过惩罚的坏蛋、公开的警探。警察顧問克呂格尔还特別证明达佛有罪，他叙述了被告的經歷，达佛立即一点一点地予以駁斥。他向这位柏林的警察天才嚷道：“請看，这就是你們的技术和科学”，他在糾正了克呂格尔的几点次要的叙述以后，最后說：“这只是为了证明，他根本什么也不知道。”克呂格尔說他的“心腹人”可以为他的話作证，但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不能說出他們的名字；警官們起誓，为霍尔施、維希曼和沃尔弗这些牛鬼蛇神按“重要性”得到計件工資的报告作证，在这一案件中，这种光荣办法由旧普魯士的过去轉入新德意志的現代。

以“图謀叛国”罪进行的控告，当然落得一場沒趣。被告者中有一部分人散发过违禁印刷物，因而违犯了反社会党人法，也許由于

这些印刷物的内容还违犯了某几条有伸缩性的刑法条文，但这一切都不是准备叛国活动。即使被告人真的受了间谍霍尔施的诱惑，计划谋杀卢普夫和准备举行秘密代表大会，这也不是什么准备叛国活动。最高法院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它却宣布九个被告（其中有达佛）有罪，共判他们十九年惩役，“图谋叛国”这个罪名是由于被告按照莫斯特的意旨行动而得出来的。据说莫斯特策划叛国活动，想用暴力颠覆现代社会，还想用暴力改变德意志帝国的宪法。撇开别的一切不谈，这个判决是以一个严重的司法谬误为根据的。援引的德国刑法第八十六条，是逐字逐句从普鲁士刑法中引来的，1864年，普鲁士邦高等法院还毫不犹豫地宣判拉萨尔无罪，并清清楚楚地指出，根据这一条的意义和词句，一种叛国活动，必然是时间、地点、情况都很明确的实际行动，而不是一般的、某时、某地将以某种方式实现的意图。在德意志帝国最高法院所要判决的第一个叛国案中，在不正确地解释刑法方面，已经胜过了曼托伊费尔创立的普鲁士邦高等法院。 559

就是在资产阶级集团中，这个判决也引起严重注意。因为承认德意志帝国的最高法院在政治性刑事案件的第一次尝试中，就对九个按照控告的精神完全无罪的人判决剥夺公权的惩役，是不合资产阶级利益的，所以自由派报纸就用颂扬帝国最高法院的办法摆脱困难，因为帝国最高法院宣布证人霍尔施是不可信的，同时对警察阴谋暗示了（而不是表示了）轻微的谴责。可是当几家比较大胆的报纸敢于根据帝国最高法院的权力比较尖锐地指责卢普夫时，他们就因侮辱一个（如普特卡默在帝国议会所说），“非常杰出的、没有任何嫌疑的官吏”而被控并被判苛重罚款。

虽然无辜被判刑者是值得无限同情的，但是这个案件也向工人清楚地指出，“社会革命派”策略会得到什么结果。莫斯特本人

也被英国法院判了十六个月强迫劳动，因为他大概用同普魯士警探維希曼同样的笔調，表达了对于刺死沙皇的看法。《自由》不能在伦敦立足了，它在瑞士找到了避难所。1882年，它在沙夫豪曾的印刷商威廉·比雷尔处出版；印刷費用由細木工施勒德尔—布伦瓦尔特付給，根据苏黎世警察机关的无庸置辯的确定，这个人为柏林警察当局服务，他經常带着炸药箱，就像一个推銷員带着他的样品箱一样。

第三章 問題和答案

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一个时期包括該法頒布后的头三年。在这 560 个时期中党的胜利反抗分成三个阶段均衡地不可抗拒地增长着。該法的第二个时期延續了四年半，也分成三个大致相等的阶段。这是“溫和的实践”，即不仅试图用鞭子，而且也试图用糖果制服社会民主党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用暴力的办法不能实现的事情，要想用收买的办法实现。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从 1881 年秋天皇帝的告諭起，到 1883 年春天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止，即从皇帝对无产階級提出問題到无产階級給皇帝作了答复为止。

一 皇帝的告諭

1881 年 11 月 17 日，以皇帝的告諭这一庄严形式出現的一篇御前演說，揭开了新帝国議会的幕布。

其中說，仅仅压制社会民主党的越軌行为是不够的，还必须促进工人的实际福利。意外灾难保险提案将在根据过去的討論修訂以后重新提交帝国議会，并以广泛組織产业工人疾病保险儲金会的提案作为补充。但是由于年老或殘废而不能工作的人也需要国家比現在更多的照顾。更紧密地联合基督教人民生活的实际力

561 量,以及在国家的保护和促进下以合作社形式团结这些力量,将使人们能够解决国家权力单独所不能同样解决的任务。但是,同时还必须使用更重要手段,而已经开始的税收改革的实施,指出了由帝国间接税开发丰富的收入源泉的道路,这样就可以废除沉重的邦直接税,免去地方自治机关的负担。这样做的最可靠的办法是烟草专卖和加重酒税,这种努力不仅不是为国库打算,而且也不是反动打算。

事实上,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国家文书”纯粹是俾斯麦的狼狽伎俩。他被资产阶级尤其是无产阶级打得浑身疼痛。他一方面痛恨资本主义利益,一方面又答应“基督教人民生活的”这种“实际力量”成立一种新的组织,许可这种力量插手在国家不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的“社会改革”中。他还想通过对年老、有病和遭到不幸的工人的照顾,使无产阶级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健康强壮的工人带来的可怕痛苦。他力图从这两个阶级那里开辟丰富的收入源泉,这样,他就可以一如既往地做政治局势的支配者。政府根据同样的精神想出了一个提案,这个提案想把工业法规往回修改,一半按照行会的意图,一半按照警察的意图,为的是笼络小资产阶级,以加强政府的力量。

最近一个时期俾斯麦的实际政策就在这个范围内演进。一有机会,他就表示反对法律上的工人保护,从而向资本主义利益提出他的行为端正的进一步保证。在这一方面,他并不是伪善,因为他对工厂立法的憎恨是完全真实的,尽管他企图用来论证这种憎恨的话是不真实的,稍稍受过教育的自由贸易派早就对这些话感到惭愧了。《地方通讯》在执行不触犯资本这个任务时走得这样远,以致它在1882年9月向大吃一惊的社会人士宣布,“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于爱惜资本;如果国家主要从大资本那里取得自己的需

要，那么它就会毁灭一切文明的最大的物质杠杆。由于这种过分有损名誉的“誤解”，这个半官方报纸一星期以后不得不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施特克尔和阿道夫·瓦格納这两个“亲爱的兄弟”压下排犹主义的怒火，对“犹太人”拉薩尔和馬克思进行幼稚的攻击，据说他們誹謗勤劳努力、大公无私的工厂主是懶惰的剝削者，但却小心翼翼地給剝削的真正发源地——投机商业蒙上了面紗。为了让工人听到新的救苦救难的消息并相信它們的真实性，人們在語言和文字方面給予他們較大的自由。可是为了給这些消息以科学的尊严性，洛貝尔图斯被任命为这些消息的宣誓证人。假如这个最可怜的人听到这样濫用他的名义，他在坟墓里也要不安。魯道夫·迈耶尔完全按照他的老师的精神行动，他从国外针对反社会党人法和俾斯麦的經濟政策提出了有力的抗議。可是誰怀疑洛貝尔图斯会从九泉之下祝福这个博爱的时代，就要受到阿道夫·瓦格納的叱責：洛貝尔图斯曾經說过，国民經濟必須变成国家經濟，而且这一点恰好已得到了光輝的实现。

新帝国議会的第一次會議，办理了經常性的事务。因为社会民主党已經表现出是一个真正的力量，所以它的議會党团（虽然只有十二个人）在帝国議会里受到同过去完全不同的对待。过去习以为常地对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冷酷无情的現象沒有了，它的发言人可以充分发表意見。所有資产階級政党都开始販賣“工人福利”。自由派提出了一个修改賠償責任法的議案，事实上这个議案的目的只是維持私人投机的工人保險，可是为了爱的假象，不得不建議对那个失敗的法令作真正的修改；教皇全权主义者為修訂工厂立法而質問政府；只有从瓦格納到施特克尔的保守党人，除了建議重新采用强制的劳动簿以外，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办法。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乐意尽力把資产階級对工人的友誼引向正确的

方向。它提議要求政府废除一切非常法，現在純粹由激烈反对一切非常法的人們組成的帝国議會多数派，本該欢迎这个提案，因为
563 这个提案是适应政治形势的。可是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多数派并不趁热打铁，却大搖大擺地从旁边走过去；任何資產階級政党，甚至进步党和人民党也不願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提案；为了凑足提出一个独立的議案所必需的十五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个人民党人和两三个进步党人。后来这个議案被擱到一边去了。

这次在討論申述柏林、汉堡、萊比錫实行小戒严的理由的年度报告时，由哈森克萊維爾和布洛斯担任党的发言人。他們不像九个月以前的奥艾尔和倍倍尔那样順利；他們的一些意見，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引起热烈而尖銳的爭論。但是他們总是成功地阻碍了普特卡默的恶作剧。用抱怨掩盖自己的失敗，正是这个自命不凡的人的作风。他說，哈森克萊維爾沒有从“大的方面”理解問題。不足之处是，他还没有像老荷馬歌頌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功績那样，歌頌霍尔施和卢普夫之流的警察的可耻行为。

在 1882 年春季會議上，帝国議會討論了“重大問題”。俾斯麦对烟草专卖作了过分的贊揚，甚至在順从的联邦議會中只以三十六票对二十二票通过。俾斯麦不害怕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正如歌德談到勇敢的騎手和好雨时所說，到处受欢迎。俾斯麦說，社会主义已給国家带来多么巨大的幸福啊！农民的解放是社会主义的，为了实行铁道法和水上法而征用私人財產是社会主义的，整个济貧事业、义务教育、筑路工程也是社会主义的。用社会主义作口号的这种不可置信的游戏，如果不是其他更坏的东西，那么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可以寬恕的，那就是班貝尔格尔和类似的自由派哲士对这一点极表同意，以便“为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反对“社会主义的”烟草专卖。社会民主党議員插进来說：“請您說正确：是为

了資產階級的剝削”。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的主要发言人是福尔馬尔，他的卓越的处女演說給烟草专卖的資產階級贊成者和反对者指出了道路。草案以二百七十六票对四十三票遭到否决。

584

同时政府提出了一个疾病保险法和一个意外灾难保险法。两者有紧密的联系，因为同第一个草案相比，意外灾难保险在更大程度上轉由疾病互助会負責；規定等待期不再是四个星期，而是十三个星期。俾斯麦放弃了办理意外灾难保险的帝国銀行；代替它的将是企业主的企业合作社。但是他坚持百分之二十五的賠償費由国家補貼。这仍然超过資產階級所能容忍的程度。帝国議會首先討論疾病保险提案，这个提案除了把1876年的互助会法加以普遍化而外，沒有很大意义。一个由受过工会鍛炼和政治鍛炼的工人組成的委员会本应在一周內就妥善地制定好这一法令。可是帝国議會这样混乱，以致委员会开过无数次会，問題还是沒有解决。对于資產階級政党來說，尽可能小心地阻止工人成立新的組織，是最重要的；虽然疾病保险法还没有通过，可是會議已經不能再开下去了，为了不再从头开始，會議沒有閉幕，而休会到下一个冬天。

1882年12月，帝国議會复会。这次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不願像过去那样让資產階級政党在关于反社会党人法第二十八条滿期的辯論中幸免于难了；它提出一个決議案，要求帝国議會声明，延长柏林、汉堡和萊比錫的小戒严是沒有道理的。福尔馬尔用一篇重要的演說揭开了辯論的序幕，这篇演說所得到的反应就是，“我們是胜利者，你們是失敗者”的自豪的叠句。普特卡默作了軟弱无力的答复，他誦讀了从大引文袋中拿出来几个片断；据说在柏林、汉堡和萊比錫进行放逐，是因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关于帝王神权的异端言論或者用使資產階級伪善不愉快的方式写了关于婚姻和家庭“自由”的文章。使尽一切空洞的热情，普特卡默

也沒有能把資產階級政黨引誘出來；於是他就進行絕望的掙扎，極口稱贊“大胆的”無政府主義者是較強的工人黨，用“我喜歡莫斯特甚於喜歡你們”這張王牌，揭露了他的警察的美麗靈魂的一切可愛的秘密。

這時資產階級很想結束辯論。可是不管情況好壞，他們不得不背誦他們的死刑犯人判決詞，因為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威脅說，要用查點議員法定人數的提案來回答結束討論的提案。人民黨人克爾的發言相當大膽，除他以外還有進步黨人文特，他是漢堡的一個教員，公開表示自己是共和主義者。在邦議會選舉中剛剛遭到俾斯麥的沉重打擊的普魯士進步黨人，雖然沒有敢公開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決議案，但是他們的發言軟弱無力、毫無內容。狡辯家亨內爾又羞羞答答地提議加重普通法以代替反社會黨人法，忠實於國王的愛國者歐根·李希特爾激烈反對他的同黨文特的共和主義自白。分離派用形式上的遁辭來掩飾自己，教皇全權主義者的發言人文特霍爾斯特也是這樣，他甚至對這種低下的角色感到羞愧，竟然作出可笑的威脅，要用寶劍砍倒社會黨的決議案。波蘭貴族地主察爾林斯基的態度更為可悲，他表示準備將工人的“錯誤行為”報告警察。唯唯諾諾的保守黨人和民族自由黨人對普特卡默的所有意見一概表示同意，只有施特克爾做了一件多余的事情，他要求，如果可能就加重反社會黨人法。社會民主黨的決議案在進步黨和人民黨的反對下遭到否決。

事先，格里林伯格還用堅定的動作扯碎了普特卡默的詭辯的蜘蛛網。他尖銳地指出上層階級的姘頭制度，一針見血地駁斥了吹捧資產階級婚姻和家庭的尊嚴的偽善言詞；然後他舉出俾斯麥的一個兒子為例，這位公子當時勾引了一個已婚的婦女，而在父親的威脅下，又以他的種族所特有的英勇氣概拋棄了那個被引誘的

妇女，回到父亲的乐园里去。认为自己的尊严受到侮辱的俾斯麦家族立誓对格里林伯格进行可怕的报复，根据由柏林发出的一个急电，紐伦堡合作印刷厂出版的一种普通的工人消息年报立即被禁。这样，这个印刷厂就面临破产的邊緣，可是只有傻瓜才会以为用这种手段可以吓倒像格里林貝格这样一个人。这位紐伦堡工人的領袖是天然的丈夫气概的化身，經過鍛炼，成为議會斗争中的卓越战士。他对工人立法的一切問題都很熟悉（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經常准备而且能够切实地考查无产阶级从这个政府手里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在扯碎反社会党人法的罗网方面，格里林貝格也不后人。他对那些臭名昭彰的为二十文錢效劳的密探特別有兴趣，这些人白天黑夜釘着社会民主党議員寸步不离，甚至一直釘到帝国議会的房間里。有一次，当格里林伯格为这种不光彩的行动質問政府时，普特卡默偷偷地溜走了，国务秘书伯提希尔用最无辜的表情对大家說：我什么也不知道。格里林伯格說，如果这种丑恶行为不停止，他就要亲自让一个密探躺在議會桌子上，他是一个說到做到的人；胆小的密探不止一次在他的铁拳面前迴避了。

如果說资产阶级反对派中有一部分人勉强譴責过濫用第二十八条，那么 1883 年 1 月 11 日，当人們終於討論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废除一切反社会党人法議案时，这一部分人也几乎完全跌倒了。分离派制造口实說，在同一个議案中处理各种不同的法律材料是不相宜的，几乎所有“一切非常法的原则上的反对者”都在这条岔道上偷偷溜走，带头的是进步党獒犬欧根·李希特尔和教皇全权主义的狐狸文特霍尔斯特。甚至人民党的机关报《法兰克福报》也报道了社会民主党的“失败的会战”，似乎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期待通过他們的議案，立即废除教会非常法和社会政治非常法似的！其实，它所要求的以及它所能要求的只不过是，帝国議会的多数派

对反社会党人法正式表示所謂厌恶而已。李卜克内西在申述社会民主党議案的理由的卓越演說中說：“我們站在原則的基础上，我們要求你們也站到這個基礎上來。誰投票反對我們的議案，誰就表示自己是非法的原則上的擁護者。”把資產階級反對派放棄原則，看作是一場“胜利的會戰”，這是一種已經十分嚴重的精神混亂。

俾斯麥利用反社会党人法实际所達到的，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受到削弱，而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受到削弱。“不屈不撓的人們”都得了政治家躁狂症，力圖用最滑稽的跳躍掩蓋內心對心愛的錢櫃的惦念。

二 哥本哈根代表大會

自從 1881 年帝國議會選舉以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內部力量不斷得到加強。黨像過去那樣堅強地存在着——這種意識鼓舞着工人羣眾，福爾馬爾和倍倍爾已經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對總的說來是否寧要非法而不要普通法的問題進行了小小的論戰。福爾馬爾認為，對這個問題應該給予肯定答復，而倍倍爾卻提出一系列有根有據的反對意見。

目前這個爭論還不切實際；對於現實來說，只要使黨的發展不受反社会党人法約束就行了。現在黨在國外有一個強大的國外哨所，使黨有充分的活動自由。1880 年秋天，在瑞士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在奧耳頓的一次代表大會上同他們的瑞士同志和平地分開以後，組成了一個鞏固的組織，出版《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瑞士聯合印刷廠和人民書店也變為德國黨員所有。這個企業由一個能干的專門人材、瑞士印刷工人孔采特擔任技術領導，德國黨在那里有五個

代表。这五个人是：从1880年秋天起领导《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工作的爱德华·伯恩斯坦，負責发送的尤利烏斯·莫特勒，过去在德累斯頓进行鼓动工作的商人海尔曼·施留特尔任书店經理，列翁哈特·陶舍尔任印刷厂的工长，理查·費舍任排字工长。

自从伯恩斯坦领导編輯部以来，在出生的头一年有时有些搖摆不定的党机关报用一种适应对党的种种迫害活动的敏銳性，遵循一条坚定不移的方針。这个报纸是否有时在使用一些非常有力的愤怒的語言的同时，做了不必要的事情，也許是一个問題；后来伯恩斯坦本人有一次坦白承认，由于远离祖国，受到流亡气氛的包围，他在論战的形式上受了同莫斯特的《自由》竞争的影响。可是問題仅仅在于，正如恩格斯致伯恩斯坦的信中所說，主要使用譏諷和嘲笑能不能比用最激烈的愤怒的語言更使敌人受到伤害。此外，用《社会民主党人报》曾經用过的最有力的詞句对付德国的警察制度也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德国工人的非常坚决的主张。1881年底，当哈森克莱維尔和布洛斯在帝国議會中使用了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否定的詞句时，人們对中央机关报的风格展开了热烈的爭論，这一爭論以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几乎完全一致的判断結束：越有力越好！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包括哈森克莱維尔和布洛斯在內借此机会又一次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是党的正式机关报，同时議會党团只作了不言而喻的保留：議會党团不是对每一篇文章或每一个詞句都負有責任的。

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发行部里，莫特勒作为“紅色战地邮局局长”表現了他旧日的組織才能。在历史上从沒有成功的事情，現在十分方便和可靠地實現了，这就是把流亡者的一种遭到禁止的报纸（传播这种报纸要受到严重处罚，它的道路被一个大邦的警察部队所占領），每周准时送到这个大邦的最偏僻的地方，每次都有

几千份。当然只是有了现代的生产条件和交通运输条件，人们才能获得这种史无前例的成果。据说《社会民主党人报》被塞在中空的大蛋糕、瑞士干酪、南瓜、石膏像、圆锥形糖块里，越过德国边境，这些都成了童话国度里的东西。现代的运输工具和现代技术已使这些对大量运输完全不适用的陈旧方法成为多余的了。把报纸偷运到帝国国内还不是最困难的事情。更重要得多的，是进一步散发，在个别地方还要送到订户和读者手里。这就需要一批精明强干、绝对可靠的党员，假如不是大量招募受过现代生产方式的锻炼、从现代无产阶级的团结中汲取力量的忠诚战士，《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不可能完成它的历史任务，散发传单也不能成为党的日益锋利的武器。这些勇士中的每个人都用事实证明了他们不怕牺牲和忠于信仰的精神，甚至人类最高贵的情欲——荣誉感也没有减弱这种精神，因而它更加无瑕地放出光辉。无名战士们知道，“没有一支歌曲，没有一本英雄史诗集”宣扬他们怎样小心谨慎地履行了为本阶级所承担的义务。

德意志帝国的官方警察尽管作了最大的努力，也不能突破这种密集方阵。仅在柏林一地，三年内人员定额内的政治警察官员增加了九倍，那些为了保卫最神圣的财产而获得计件工资的无数密探尚不包括在内。这帮人在瑞士也到处皆是，虽然他们很容易钻入无政府主义的秘密团体，可是他们准被社会民主党组织碰回去。警察使用卑鄙的手段，拷问贫穷、受迫害、忍饥挨饿的工人，直到他们甘心充当叛徒为止，不过这种方法也不起作用了。如果一批违禁印刷物偶尔“被抓住了”，立即又有一批补上这个缺额，不用很久，叛徒的名字就列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黑榜上，一切诽谤都是白费气力。

1882年11月，当苏黎世的党员抓住密探施米特以及他的“官

方”通訊的時候，他們得到了一個主要捕獲物。施米特是德累斯頓的一個詐騙破產者，受到法院的通緝，根據現行條約，如果德國官廳要求引渡，瑞士當局就必須引渡這個罪犯。可是這個有虔誠習慣的敬神的國家沒有提出這個要求，却利用這個騙子手在蘇黎世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中做密探。施米特建議用毒針進行謀殺，並募集謀殺基金，僅僅這一點就足以使人懷疑他想進行偵探活動。有幾封親熱的密信揭露了他的本來面目，這幾封信是德累斯頓的刑事顧問韋勒爾和警察局長鮑爾以及警察局督察卡爾騰巴赫同这个人所共知的罪犯（也就是他們的“心腹人”）來往的信件，有一部分信的收信人寫的是米爾豪曾郵局的一個高級職員的名字。從這些信件中也可以看出培養密探的方式，但並不妨礙對所有警察的“心腹人”發出莊嚴的警告——不要慫恿犯罪。預支的大量報酬激發了這個密探的欲望以後，他就被飢餓的繩索套住了，上面指示說，以後只有他報告“重要的事情”，才能再給他錢。這個密探的一切活動都沒有促成“重要的”謀殺事件，這並不是這個笨蛋的過錯。他被趕出蘇黎世以後，回到德意志帝國，這時不用再屈從於警察的更高權力的法院以詐騙破產罪判了他四年懲役刑。

這時《社會民主黨人報》已經轉入攻勢，它設計了一種“罪犯簿”，利用它來揭發了德國警察的腐化墮落。僅在愛北斐特—巴門就有六個迫害社會黨人的警察因此而倒了大霉，市長抱怨說，沒有人再願擔任這種危險的救國職務了。為了彌補這個缺陷，從外地派來了“久經考驗的力量”——阿爾托那的警察局督察員厄爾施萊格爾和一個同謀者，可是他們也不得不很快從符佩爾塔耳退却，因為他們想引誘柏林的一個被逐者做密探，而这个人却立即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公布了他們的毀人的信。同時幾個在貝爾格—馬爾克工業區的無產階級中潛伏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密探也被揭

露了。

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被摧毁了，可是，现代文明，即联合、训练和组织工人阶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若不遭到废弃，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就是不可毁灭的。由于有了这个机构，就有千百种迅速取得谅解的办法，而无须采取等级森严的秘密组织这种危险的、损人不利己的手段。在现代工业的大工厂实行的任何共同工作日、各种形式的社交团体、任何教育协会、读书会、吸烟俱乐部、舞蹈俱乐部、到郊外和森林的一切远足、下班后的任何散步，都是对警察摧毁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一切努力的嘲弄。根据各地的情况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善于对各种形式的攻击进行胜利的反抗的组织，只有在它为了保证无产阶级享有同其他阶级相同的权利，不得不保持秘密的时候，才是秘密的。正因为如此，这个组织在精神上是不可战胜的，正如它在经济上不可摧毁的那样。

这时俾斯麦由于对政策作了新的改变，他也不得不给工人群众比反社会党人法最初几年较大的活动范围。应该让工人群众说话，不过只是为了对他的“恩惠”表示感谢，咒骂把他们“引上歧途的人”，以及恫吓资产阶级。俾斯麦追求同样的目的，但却想使警察的专横变一变样子。偏狭的俾斯麦妄想用这种办法抓住工人。事实上，工人们一面向俾斯麦表示感谢，一面立即占领了让给他们的、仍然摇摆不定的每一寸土地，但是这种感谢并不是俾斯麦所要求的那种感谢，而是他应该得到的那种感谢。

1882年，工人运动得到新的发展。反社会党人法也没有能够把它完全镇压下去。1880年春天，柏林木器工人进行了这个法令颁布后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工资斗争，从这一年年末起，也成立了一些同业协会。更早一些，差不多在老工会报纸遭到禁止以后不久，

就出現了一些行业性报纸。比如哥达的博克为鞋匠創办的《閻钟》，汉堡的《新木工报》和《造船者信使》、萊比錫烟草工人的《工会會員》等等。后来八十年代初期引人注目的、一定程度的工业繁荣，給工会运动以有力的推动。

1882年3月，当鍍金工人艾瓦德为了討論一份向政府申述工人疾苦和願望的請願书而召集柏林同业协会的董事开会时，这种协会已有十八个之多。由这些协会中产生了柏林工会总委员会，为法律上的工人保护进行了热烈的鼓动。在討論請願书的第一次工人大会上就作出決議：不向政府而向联邦議會提出請願书；不經過俾斯麦，請願书也会在工人階級的議會代表那里找到有力的支持者。在以后的大会中，人們用暴风雨般的欢呼声欢迎哈森克萊維尔、弗罗默和其他社会民主党帝国議會議員，这些大会更加明显地表现了鼓舞柏林工人的精神。艾瓦德仍然采取了十分謹慎的态度，进步党报刊用已經被人忘記的自由貿易派的陈詞濫調对請願书进行的恶毒攻击，自然而然地促使艾瓦德首先同进步党进行清算。于是施特克尔及其同伙有几个月之久希望能够掌握运动；他們甚至决心向随时准备解散工人集会的警察进行攻击。

当然美梦不长。1882年和1883年之交，当保守党把它关于采用强制的劳动簿的提案公之于世的时候，有階級觉悟的工人冷靜沉着地把进步党人的无力的抗議推到一边，并用正式文件譴責了反动的攻击。在两次有很多人出席的大会上，柏林工人把“无产階級希望采用劳动簿”这种說法叫做有意識的謊話，并且宣称这个提案的制定者理应受到所有工人的蔑視，并成为历史的罪人。从伦次布克和威廉港到紐伦堡、慕尼黑和斯图加特举行的大約一百个工人集会做出了类似的決議。当施特克尔及其同伙出現在工人面前的时候，一陣笑声把他們吓跑了。这时警察知道自己应该怎么

办了,1883年2月15日,柏林工会总委员会遭到控告,因为同业协会作为政治性协会通过它们的联系违犯了結社法。

尽管采取“温和的实践”,对社会民主党的迫害并没有停止。柏林、汉堡和莱比錫的小戒严在滿期的那天,又合乎規律地延长了有效期,从这三个戒严区驅逐出境的活动不断进行,警察任意决定解散工人集会或者允許它們召开,查禁印刷物和协会的行为从沒有停止,每当工人认为有必要麻煩“帝国絞架委员会”的时候(很长时间以来,只有在某些例外情况下,才有这种事),这个接受申訴的委员会在执行它的“司法保证”方面仍同过去一样可笑。叛乱案、叛国案、侮辱皇帝案、挑撥案和其他伸縮性很大的案件仍然层出不穷。工人们一刻也不能忘記,他們在多么危險的状况下生活,这就是“温和的实践”的实质。如果人們說,司法总是落后于警察,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帝国最高法院尤其不是这样,自从第一次大叛国案以来,它的政治判决就日益墜入无底深淵。只能說,虽不是所有法院但有許多法院在反社会党人法頒布后的头几年采取了某种慎重的态度。不少判决使人回想起謀刺案发生的时期,比如从1880年7月到1882年1月,在德累斯頓对九十名党员判了十八年徒刑,但是在許多情况下,警察机关向法院所作的告发遭到駁回,比如到1881年年底为止在柏林被警察告发的三百五十九名社会民主党人中只有二十六名受到法律惩处。

虽然面对着俾斯麦的新策略党很快就找到了正确道路,但是在党的队伍中产生了一种需要,即在一次新的代表大会上,对維登代表大会以来种种混乱事态采取毫不含糊的态度。虽然沒有什么原則性的意見分歧,但是策略上的意見分歧还是有的,尤其在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場的爭論中表現得十分明显。此外还必须为下届帝国議會选举做准备,根据維登決議,至迟三年必須召开一

次代表大会，而現在第三年已經开始了。1882年8月，帝国議會議員和一些可靠的骨干在苏黎世举行了三天會議，彻底討論了党的总情况，决定来年春天召开一个普遍的代表大会。1883年1月4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要求在2月底以前选出代表，然后再向代表发出通知。虽然从事情的性质上看，有许多人都知道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時間，但是德国警察却完全被矇騙过去了。根据警察顧問克吕格尔的命令，由密探組成的一条警戒綫占領了从林島到巴塞爾的瑞士边境；然后在德国報紙上出現了在諾尔登举行代表大会的消息，这时克吕格尔急忙赶到伦敦，在那里才知道，代表大会已在哥本哈根举行并已閉幕了。警察只能用这种办法来表示 574 它对这一彻底失败的狂怒：它在基尔和諾伊閣斯特尔把几个回国的代表（其中有两三个帝国議會議員）非法拘留了几小时。

从3月29日到4月2日，代表大会在七次會議中完成了它的任务，使六十名代表人人滿意。据一个从1872年以来参加了历届党代表大会的黨員說，以前各届党代表大会，从沒有像这次代表大会具有这样广泛的代表性。党的总的情况是十分令人滿意的。在德国国内，从1881年8月5日到1883年2月28日，各募款处共收入九万五千馬克，此外，为了各种目的向苏黎世寄去二万零七百二十九法郎。在三个戒严区，党的精神最为突出，黨員的牺牲精神最伟大，党报的传播最广。理查·費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情况作了报告：自从維登代表大会以来，訂戶数增加了三倍，報紙不但可以弥补开支，而且已經能够开始偿还預借的款項。

下一次帝国議会选举的領導由帝国議会党团担任，議会党团有权增加領導选举的人員，有权为处理事务設置附属委員會。它接受了这样一个任务：起草一个一般的竞选宣言，并为防御官厅和統治階級的非法侵犯而写了一个指令式的小册子。参加选举的目的

不是取得尽量多的議席，而是取得尽量多的选票，因此取消了正式选区，建議在有党员的地方进行最活跃的竞选宣传。选举中的原則立場仍以維登決議为准；有人提議在两个資产階級候选人进行复选时絕對弃权，这个提案以二十四票对三十四票遭到否决。在尽量多的选区提出著名的候选人的方式，應該废止；所有候选人都不但必須无条件地承认党綱，而且也有义务参加由党的代表机关的总決議而产生的一切行动。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場，总的說来得到贊同，在对个别問題作了深入的說明以后，帝国議會党团的总的态度也得到贊同。代表大会在一个特別決議中要求党“勇往直前”，反对对統治階級的迫害作任何让步，反对幻想官厅寬大。关于德意志帝国的所謂社会改革，代表大会一致声明，它根据統治階級前此的态度，既不相信这个階級的真誠意图，也不相信它的能力。相反地，代表大会深信，所謂社会改革不过是一种把工人引上邪道的策略手段。可是代表大会认为，党和它的議會代表有义务在討論一切針对人民的經濟狀況提出的建議时（不管提建議人的动机如何）有力地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不言而喻，这时一刻也不放弃各項社会主义要求。

这就是无产階級对皇帝的告諭的明确而坦率的回答。

第四章

科学的收获

在哥本哈根，人們还通过对一个人的悼念完成了一项可悲的⁵⁷⁶义务，这个人四十年来用他伟大的思想推动了两个半球的无产阶级运动。卡尔·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十年，不得不同重病作斗争；他的妻子和长女在他以前逝世；这个伟大的生命庄严而令人悲伤地告終了。可是这个生命不是像萊辛或費希特的生命那样，在沒有希望的黑夜里熄灭了，而是在好轉时期的朝霞中熄灭的。德国工人阶级前进中的胜利，使卡尔·馬克思的暮年增添了光輝。

恩格斯接替了馬克思遺留下来的工作，他还为国际无产阶级不倦地工作了十二年之久。他根据馬克思留下的手稿出版了《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正如第一卷分析了工厂的机构一样，第二卷和第三卷分析了办事处和市場的机构。可是这两卷就其內容而言，不像第一卷那样深刻而直接地干預工人运动；只有有理論修养的讀者才能掌握这两卷所介紹的丰富的新知識。恩格斯根据莫尔根的研究和馬克思的准备工作，但基本上作为独立著作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則比較通俗一些。它弥补了《共产党宣言》的世界历史观中的一个大缺陷，通过揭示人类的史前史，給科学共产主义提供新的根据。可是恩格斯在生前最后十年所完

成的丰富著作中的大部分，都是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实际需要服务的。他在无数的文章、书信和谈话中，向各国工人党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由此产生的一切劳累，他都看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必须立即实现的义务。如果说他的一生比起马克思来稍有逊色，那么现在生气勃勃的老年就给了他丰富的，正如他本人以大思想家的真正谦虚所说的，过分丰富的报酬。

他的反杜林的著作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最初几年的斗争的喧嚣声中，开始慢慢在一些清醒的头脑中发生作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时期，恩格斯为了概括地说明一下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把《反杜林论》的最重要几章编成一个通俗本出版了，这本书的发行量很大，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不久又译成有工人运动的各国的文字，发生了类似的作用。赫希柏格的几种科学杂志停刊了，虽然特别是《苏黎世年鉴》在后来的几卷中表现出进步的发展；只要党必须为它的政治生命进行斗争，它就把一切理论推开。1881年选举后，现代工人运动的奇异的活力，更加要求进行科学积累工作。即将进行长期战争的军队，需要兵工厂和武器库，以便修理旧武器，制造新武器；在维登，人们就已经考虑建立党的档案机关，在哥本哈根，更为强调地作出了决议；施留特尔是党的档案的非常机灵的保管人。

在这方面，也同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反社会党人法使它的制定者的盲目期望不能实现。自由贸易派有理由抱怨，被迫害的社会主义成了一支“大军”，大家都向它献殷勤。当然这时产生了许多单纯的假象，俾斯麦在社会主义面前鞠躬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榨取群众充实国库的一切措施或资产阶级牟利的一切手段，一旦由国家执行，都被颂扬为社会主义。可是任何玩这个火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资产阶级学术界中还有一点科学良心的人，都对这种阴

謀表示憤慨。許多年輕的研究人員发表了論德国无产階級生活状况的有功的著作；其中的一些人，如艾曼紐尔·汉斯·查克斯和施納佩尔—阿伦特坦率地承认，他們受到恩格斯和馬克思的鼓舞。对受資本主义剝削的家庭工业的历史发展和典型性质作了深入观察以后，查克斯描述了图林根地区，施納佩尔—阿伦特描述了陶努斯山区的五个自治村；它們的图象是經過仔細研究，用把科学研究人員同学术界的仆从分开的創造力描繪而成的。可是这些仆从同洛貝尔图斯做的游戏是对双方都不利的。洛貝尔图斯始終是一个硬木桩，向他求教的青年学者在他身上栽了跟斗；沒有节操的野心家宁願立即沉沒在俾斯麦的沼泽里，因为他們认为洛貝尔图斯可能比馬克思坚决，而俾斯麦又比洛貝尔图斯坚决得多，然而真正有才能的人則靠科学共产主义的平地挽救自己。尤其是开姆尼茨人麦克斯·席佩尔通过他論現代貧困和現代人口过剩的处女作，提供了一本有价值的著作，很快就学会掌握唯物主义历史观。 578

科学共产主义只能拯救官方学术界中的最有才能的后起之秀，正因为它是官方的学术界，不能离开資产階級階級国家的基础。不多几年，还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德国大学就成为階級統治的工具。一个出身于老民主主义家庭的科尼斯堡青年康拉德·施米特想以私人讲师的身分写一本著作，用純思辨的理論形式，极有見識地論述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个問題，这时到处都有人給他指出，一个“馬克思主义者”在德国高等学校里是不能存身的。即使沒有这个机会，社会民主党也知道，在資产階級社会中科学自由不过是一句空話。它早就在自己的陣营中建立了科学的兵工厂。根据良好的习惯，它从自己最迫切的需要出发；它的苏黎世中央机关报成了它的第一个理論研究場所，自从德国工人报纸得到一些活动自由以来，这个报纸的任务就改变了。

579 現在首要問題不是激發被追逐、被壓迫和被迫害的工人的鬥爭熱情，針對反動的迫害狂發表革命言論。另一個任務躍居首要地位，即阻止官方社會主義蠱惑的把戲，向黨闡明社會和國家中的經濟動向和社會動向，對被人誤解的口號（如“對自由貿易派進行鬥爭”）作正確的解釋。這個口號曾經起過好的作用，也可以再起好的作用，可是當時有可能使德國工人階級同占統治地位的剝削階級中的最危險的分子結成危險的鬥爭同盟。德國的工人報紙以必要的公開性討論所有這些問題時，就不可避免地立即遭到反社會黨人法的迫害。因此《社會民主黨人報》在一組很有教益的論文中，粉碎了社會王國的童話，粉碎了施特克爾和瓦格納之流的空洞的欺騙，以及認為任何“國有化”都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步的愚蠢看法。報紙指出，當國家掌握在工人的最凶惡的敵人手中的時候，社會民主黨的經濟任務不是加強國家的影響，擴大它的權力範圍，而只是促進和維護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在目前情況下，有階級覺悟的無產階級必須把它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奪取政治權力和政治權利方面。

愛德華·伯恩斯坦適于做《社會民主黨人報》的革命工作，至少也同樣適于做這種解釋工作。他出生于柏林一個貧窮的猶太人家庭，父親是安哈爾特鐵道上的火車司機，伯父是《人民報》的政治領導人，伯恩斯坦本人是在一個精神上受到鼓舞同時也令人鼓舞的環境中長大的，在這個環境中，各種不同的政治、宗教和社會的利益混雜在一起。他的父母的經濟條件只允許他在文科中學讀到取得服一年兵役的證書的程度為止，然後他在一家銀行里工作了十二年。1872年，愛德華·伯恩斯坦經過長期摸索後參加了社會民主黨，立即成了實際的鼓動員，是當時柏林愛森納赫派中最熱心的一個。他具有這一派的理論上的模糊性，同杜林和赫希柏格發

生了亲密的关系；1878年和1879年之间的冬天，当他学习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时候，他对科学共产主义才有了了解。1880年秋，他到伦敦旅行，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相识；回到苏黎世以后，他暂时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后来领导这个编辑部达十年之久。⁵⁸⁰

伯恩斯坦善于使这个报纸保持全党的机关报的地位，同时也给这个报纸确定了坚定明确的方针，这个方针可以适应各种策略要求，而不违反原则。在十年的日常政治斗争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上，至少在所有重大问题上，《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误入歧途。伯恩斯坦从担任鼓动员时期以来，就熟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条件，不会对它们认识不清，而是彻底而缓慢地创造这些条件，他是一个喜欢思索的人，甚至带有轻微的怀疑的色调，与其说过高地还不如说过低地估计了对手方面的权利，他不是为斗争本身而喜爱斗争，他经常愿意参加一切有益的讨论。由于恩格斯的劝告，伯恩斯坦通过自己对《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领导，对德国工人阶级的理论教育工作的贡献，至少同对德国工人阶级的实际训练的贡献一样大。

《新时代》给这种理论教育作了补充，这是一个学术性月刊，从1883年1月起在斯图加特出版。迪茨被逐出汉堡—哈尔堡以后就回到斯图加特，由赫希柏格手里接受了已经变为赫希柏格所有的莱比锡合作印刷厂的烂摊子。在自从谋刺案时期以来实行了相当出色的警察统治的士瓦本，迪茨也碰到许多麻烦，可是他的新事业没有完全遭到毁灭。

卡尔·考茨基担任《新时代》的编辑工作，他生于布拉格，出生于一个国际的艺术工作者家庭，他的祖父是波兰人，祖母是捷克人，外祖父是意大利人，外祖母是德国人，父亲是著名的画家，母亲由于写过许多优秀的社会小说而博得名声。由于出生于捷克，卡

尔·考茨基很早就被德国同学对他的歧视推到了反对派之中；他在梅耳克的本篤会修道院里受过一段教育，在那里他认识了僧侣制度，并对它深为痛恨；后来巴黎公社的起义和失败对他发生了重大影响。七十年代中期，当他走进大学时，他就决心把一生献给党的事业。他最喜爱的专业是历史，此外他还热心地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主义（起初根据法国资料）。他从那里接受过来的空想社会主义、他对达尔文主义的精确了解和阿尔伯特·朗格对他的影响，促使他写成论未来国家中的人口问题的第一本著作。当赫德尔漫无目标地放了几枪的时候，这本著作正好印完。反社会党人法使奥地利工人运动受到损失，这个运动进行过几次冲击后就萎缩了，于是就慢吞吞地跟在德国工人运动后面跑，其处境比后者本身更坏；莫斯特在奥地利无产阶级中找到一个收获较多的人员补充基地。考茨基经过多次努力，也没有能在故乡的土地上找到进行同他的才能和喜好相适应的活动的必要场所。1880年1月，当赫希柏格邀考茨基到苏黎世担任他所办杂志的撰稿人的时候，考茨基才找到了用武之地。同伯恩斯坦一样，考茨基也是通过对杜林和恩格斯之间进行的争论的研究，抛弃了理论上的不确实性的残余。赫希柏格选择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做自己的文字助手，是有眼力的，他只是忽略了，他们不是像他一样作为博爱主义者到党里来的，而是作为谋叛者到党里来的。两个人很快就超过了他；他们同他分开的时候，彼此间私人感情仍然很好，但是他们在原则上是很坚决的。

在考茨基主编期间，《新时代》从一开始就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建立的统一的世界观。但是并没有任何煽动和排他的意思，因为这是同马克思主义没有共同之处的。决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一般地是人类的最后结论，考茨基只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中可以说出它的最后结论。一种世界

现在被战胜以前，一定在历史上经历过兴盛时期，尽管这种世界观内在的真理是相对的，这种相对真理仍然位于根本不能逻辑地思考问题的混乱的绝对虚伪之上。考茨基通过多方面的学习，完全摆脱了为了互相吹捧而彼此拉拢的文人的传统的虚荣心，考茨基在他辛辛苦苦地写成的一些著作中，用无情的批评，把具有历史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同堆积在他周围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垃圾区分开来。他比伯恩斯坦更乐于接受恩格斯的忠告；从1884年起，他在伦敦领导《新时代》。

这个月刊把它的重点放在历史研究和经济研究方面，而路易·582 菲勒克在慕尼黑出版的《劳动权》周刊，则主要研究实际的社会政策、工人保护法和工会组织问题。1882年以来，菲勒克就在巴伐利亚的首府力图建立一个党在德国国内的令人鼓舞的政论中心；他利用《南德邮报》和在莱茵河到普累格河之间的许多地方出版的内容大同小异的报纸，创造了一个小小的报纸网，反社会党人法常常使它受到损害，但并没有把它摧毁。这些报纸的精神上的领导人是布鲁诺·雪恩朗克，他是一个图林根的青年，在德国大学里学了这些大学可以教人的东西和许多它们不能教人的东西，他是一个敏捷活泼的劳动者，光辉的才能和丰富的学识使他不致使笔战浅薄化。

在狂风暴雨中，党的科学文献走过了黯淡的开始阶段，成长壮大了，这是超过七十年代思想水平的一个重大进步。如果我们把考茨基的受到欢迎的《资本论》第一卷摘要同莫斯特的相应的拙劣作品（十年前这个作品可以在党内通行无阻）相比较，就可以对这个进步作出评价。资产阶级智慧的租用者以为他们能够用关于“热狂的模仿者”的种种谰言把这个幼芽压死；仿佛狂妄无能的模仿时期不是在旧市场上失去理想的阶级的绝对必然的遗产似的。

第五章

鞭子和糖果

583 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二个时期的第二个阶段也延續了一年半的时间，即从1883年春天到1884年秋天，皇帝提的問題和无产階級的答复在这个时期的第一阶段在原則上完成了的事情，在第二阶段則在实际上完成了；俾斯麦搞他的“社会改革”，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对此作了回答。

这一阶段反社会党人法的执行情况，同前一阶段差不多完全一样，只不过是鞭子下得更慢一些，糖果分得更多一些。对柏林工会总委员会的控告沒有产生恶果，艾瓦德和他的同志被判处輕微罰金，同业联合会並沒有被查封。1883年，当柏林工人第一次参加地方自治机关选举时，沒有受到很大阻撓。这个选举虽然也是按三級选举制进行的，但同邦議會选举有所不同，那就是各階級都选举自己的代表。普特卡默神气活現地回答进步党人的不体面的抱怨說：“如果第四等級在地方自治机关选举中共同合作，以便能够申訴他們的一定的疾苦，那么誰給我們权利，把这些人置于反社会党人法第一条和第九条之下呢？这样做，就是明目张胆的违法行为。”自从1884年1月以来，工人的报纸《柏林人民报》也能每天出版了。^①

^① 《柏林人民报》的第一期所謂試版，不是在1884年1月，而是在1884年3月30日出版的（參見爱德华·伯恩斯坦：《柏林工人运动史》第2部，1907年柏林版，第210頁和第128頁）。——原編者

可是，另一方面 1883 年在柏林有四十六次工人集会被解散，而 1884 年甚至有八十次工人集会被解散。同首都相仿，鞭子和糖果的政策在全国执行。

工人对这种政策的反应，同俾斯麦和普特卡默的愿望是完全相反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指出这种政策的特点说，政府要想驱使工人先作为绊脚石反对自由主义，然后，如果他们碰了壁，便又俯首贴耳。可是，正是这种反复无常、随心所欲的统治比一贯执行的、虽然还很严酷的迫害，更使工人气愤。对于一个无情的敌人，人们至少可以对他的诚实表示尊重。“可是，如果敌人不是力图消灭我们，而是想收买我们，如果他剥夺我们的权利，使我们的家庭遭受贫困，并不是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目的是不道德的和有害的，而是因为我們不被他們收买，那么我們的憎恨不仅更加强烈，而且除了憎恨还有鄙視：我們鄙視俾斯麦及其仆从，我們鄙視他的严酷，我們更鄙視他的宽大。”在社会民主党的传单上，下面两句话成了流行語：他的糖果——我們鄙視，他的鞭子——我們粉碎。

那位被諂媚者团团围住的“世俗人”，絲毫也不了解工人們的这种語言。他仍然希望，利用施舍的社会主义爭取“被引入歧途的群众”，利用奸細的挑撥使“罪惡的首領”陷入絕境。他把資產階級反对派推入左右为难的境地：要么利用“瓦解活动”进行共同事业，从而在本階級面前身敗名裂；要么对反社会党人法不管不顾，从而失去群众的一切信任。如果資產階級反对派能像有階級覺悟的无产階級那样立場坚定，那么俾斯麦这时就失败了。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二个时期的第二阶段的中心問題，就是資產階級反对派是否坚持立場。

一 救济穷人和奸細挑撥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以后，帝国議會终于完成了疾病保险法，虽然俾斯麦为了使意外灾难保险法在議會通过，又发布了一个皇帝告諭，但是帝国議會再一次把这个法案推到一边去了。直到1884年，这个法令的第三个草案才获得通过，这个草案放弃了国家补助，其他方面也是按照大工业家的指示制定的。政府和帝国議會为了完成几个“社会改革的”法令，用了整整一个立法时期，很难說，这些法令中哪一个法令更不完善。

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在这乏味的討論中采取了哥本哈根決議規定的立場。从原則上說，这些法令同社会改革沒有任何共同之处。它們也沒有接触到現代工人問題中的任何一個問題，而是在救济穷人这方面打圈子，早在現代工业出現以前，即自从产生穷人的階級社会出現之日起，這個問題就存在了。把济貧工作的偶然的改善冒充“社会改革”，是資產階級方面也早已指出过的两面手法；十年前，阿尔伯特·朗格写道：“为了維持和巩固工人对上层階級的依賴或精神上的从屬地位，而对工人状况进行少許物质上的改善，凡具有这种傾向的一切政治措施都应遭到唾弃。”而疾病保險法和意外灾难保险法，恰恰具有阿尔伯特·朗格所說的“絕對遭到唾弃”的傾向。它們不是“社会”改革，而是乞食改革，因為它們想用保护有病或遭到不幸的工人不致求乞的可疑許諾，把工人階級再置于資本的压迫之下。对于德国工人來說，这方面的一切自我欺騙早就被排除了，社会民主党議員曾經預言，按照它們的制定者的意图而制定出来的这些和类似的法令，对革命的工人階級不会发生任何影响，此后十几年的經驗证明了这个預言是正确的。

可是，只要资本主义社会的济贫工作根据情况可以做得好些，也可以做得坏些，就不排斥一种实际的合作。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把自己放在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上，它主张，意外灾难保险应该是企业主的事，他们不应让国库或工人自己出钱，疾病保险是工人的事情，他们不向国家也不向企业主恳求施舍，而只要求对社会所有其他阶级都是理所当然的事：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的疾病保险金。社会民主党发言人这样明确地详细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专门知识远远超过了资产阶级政党和政府的发言人，然而他们的建议仍然遭到否决。

对统治阶级来说，改进济贫工作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他们所关心的是，端上一碗只能看不能吃的菜来迷惑工人，使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且尽可能还要他们付钱。即使在最无能的官僚中，也不是完全没有能干的人材，做最后必须由每个统治阶级做的事情。对工人保险真正有所了解的几个普鲁士商业部的枢密顾问，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把工人保险办得合理一些，枢密顾问洛曼更是这样。他迫切要求国家对工厂进行严格的监督，要求企业主有义务立即公布他们的企业中发生的所有意外灾难，要求颁布技术保护条例。事实上，这是认真实行意外灾难保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可是正因为如此，“它们给工业添了麻烦”，就使俾斯麦感到嫌恶。他尽量压制刚刚露头的国家对工厂的监督，让普鲁士商业部拟定的、关于企业主报告意外灾难的义务的法令草案和一个专家委员会拟定的很不坚决的保护条例，从联邦议会里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官方的“社会改革”的实质，不可能再暴露得更清楚了。政府和帝国议会的资产阶级多数派以最不适当的方式，把疾病保险和意外灾难保险结合起来，以便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一官僚的奇怪组织，在这个组织中，官吏和企业主的权力大，工人的

权力小。自从现代工人问题出现以来，具有社会改革精神的“合作组织”，无论何时何地都被看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在进行剥削的资本中发现了“人民生活”及其“道德基础”的“实际力量”（皇帝的告諭庄严地谈到这些词句），并在官僚庇护之下，为这种资本建立一个新的组织，这就是俾斯麦的划时代的功绩。

倘若社会民主党議員因此而受到欺騙，那么他们就为了几个銀币出卖了无产阶级的不可放弃的权利。他们既反对疾病保险法，也反对意外灾难保险法，俾斯麦一再企图借此使他们处于困
587 境，可是连一个工人也没有上他的当。由于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反对按照警察和行会的观点把工业法规往回修改而对它进行的指控，也没有达到目的。自由贸易派的一切表面的和实际的弊害，都抵不上落后的警察统治的大弊害，并且德国工人阶级从来就不喜欢要靠帮工和学徒的汗水养活自己的頑固的手工业行东。

正当德国社会民主党日益成长壮大，超过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时候，德国的无政府主义日益受到挑撥分子的欺騙。这并不是因为德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完全由流氓和吹牛家，或者只是由落后的工人组成的；其中也有热情性急的人，他们犯了从心理上可以解释的、在政治上害处很大的錯誤，即认为只有用暴力才能打退对工人阶级的暴力镇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真正危险，恰恰存在于霍尔斯坦的木器工人内弗这样一些人的身上，他们随时准备为了自己的信念牺牲自由和生命。他们的忠实可靠的性格使他们获得了工人的信任，而他们的热狂的狹隘性使他们接受了奸細的慫恿。然而无政府主义宣传没有能在德国工人中广泛展开。莫斯特自从被从英国监狱释放以后退居紐約，在那里也出版《自由》，写的文章比过去更狂妄，对德国工人更不发生影响。无政府主义者的金庫仍然空虚，因为进行无政府主义战斗也需要錢，所以“社会革命派”策

略的一种新形式——卑鄙的图财害命得到发展，这个形式立即得到打进来的警探的細心照料。

早在1882年7月，維也納的鞋厂厂主梅尔施塔林格就被无政府主义者用哥罗仿麻醉过去，搶走了一千古尔登^①。在这个罪行的聪明的主謀人中，有一个叫霍策的，逃到了美国，而奥地利政府并没有要求引渡他。奥地利政府担心，霍策不会被引渡，因为他所策划的搶劫是有政治背景的，可是华盛顿政府解除了奥地利政府的顾虑，它表示願意引渡这个普通罪犯，可是多瑙河畔的救国者仍然疑虑重重。到了1883年秋天，即在苏黎世举行的一次无政府主义代表会议以后，图财害命的策略才得到更大发展。参加这种活动的有：西里西亚的鞋匠施特尔馬赫（《自由》在瑞士出版期間，他曾任該报編輯）和两个奥地利人——装訂工人卡梅雷尔和木器工人庫米茨，但也有奸細施勒德尔—布伦瓦尔特和另一个德国警探机械匠考夫曼。图财害命的案件接二连三发生：10月22日杀害了斯特拉斯堡的药剂师林哈尔特和一个哨兵；10月29日，在法兰克福警察大楼进行了爆炸；11月21日，杀害了斯图加特的銀行家海尔布隆納尔；終于，12月15日，在維也納枪杀了警官赫卢貝克；1884年1月10日，为謀財而杀害了票据經紀人艾泽特和他的两个儿子；1月25日枪杀了警探布洛希。

这些罪行的主犯沒有完全查出来。在法兰克福警察大楼进行的沒有发生很大損害的爆炸，可能是正直的卢普夫的一项私人娱乐。可是庫米茨、卡梅雷尔和施特尔馬赫参与了大多数的罪行，这是人所共知的。当施特尔馬赫在維也納受审时，无政府主义策略又出現了另一种变形。施特尔馬赫曾給米尔豪曾的警察局督察卡

^① 货币名，一个奥地利的古尔登等于二馬克。——譯者

尔腾巴赫和驻伯尔尼的奥地利公使写信，表示自己愿意充当密探，并不是打算真正执行这一职务，而是为了用这种方式骗钱，他的同志也同意他这样做。施特尔马赫一直到上绞架态度都很倔强，死的时候仍然坚信自己的事业，可是，既然一种事业的界限已经完全湮没在最卑鄙的罪行和最低劣的密探行径之中，那么这种事业又能产生什么结果呢！施特尔马赫被处死以后，在瑞士出现了许多要求为他报仇的恐怖的招贴，这些招贴是德累斯顿的洋铁匠魏斯张贴的。当这个小流氓因此而在利斯塔尔受审时，他也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德国警探。他的揭露使米尔豪曾的警察局督察卡尔腾巴赫得了一场致命的中风症。这个可怜的爱国者在为神圣财产进行的斗争中也倒了大霉。与此同时，苏黎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揭发出德国警探弗里德曼，他常在无政府主义的集会上慷慨激昂地声称：我们的皇帝，我们的皇帝应该上绞架。

1883年秋天，在爱北斐特—巴门发生了另一批无政府主义“行动”。这些行动的领导人排字工人奥古斯特·赖因斯多夫，他出生于莱比锡郊区，1877年就因进行无政府主义阴谋活动，被社会民主党开除出党。很长时间以为他是警探，其实他不是，他也没有像卡梅雷尔和施特尔马赫那样从事卑鄙的犯罪活动，可是他仍然不失为一个按照警察的喜好活动的阴谋家。他周围有五六个信徒，他们几乎全是不成熟的青年，他就指使这些人进行爆炸谋杀活动。这种活动进行了三次，没有伤害一个人，在最重要的一次尝试中，爆炸的也不是硝化甘油炸药。患了严重的肺病躺在医院里的赖因斯多夫把鞍匠卢普施和排字工人屈希勒尔派往吕德斯海姆，打算在9月27日，趁德皇及其随从为尼德瓦尔德的德国女神纪念碑揭幕时，把他们炸死。据赖因斯多夫自己说，这个远征队的经费大部分都是警察供给的，这种说法所以没有在文书上肯定下

来，只是因为捐了可疑的四十馬克的織工帕尔姆不但沒有受到控告，反而出庭作证，他对經費来源一句話也不肯說。帝国最高法院对这个在案件結束后就公然为警察效劳的“证人”的宣誓未加考虑。謀刺的方式十分幼稚，以致沒有留下任何痕迹。虽然如此，这个謀刺行动是怎样被“发现”的，为什么平时不断宣揚“社会党人的謀杀”而在“发现”这一謀刺事件后沒有大肆宣揚，这一点后来在帝国最高法院审判时，仍然沒有弄清。

如果由于帝国議會反对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因此不得不解散它的話，进行巨大的选举欺騙，看来是不利的。为了給延长該法的有效期限制造必要的情緒，密探們提供了足够数量的謀刺案件。

二 太子党和它的瓦解

反社会党人法于1884年9月30日滿期，不多几个星期以后，⁵⁹⁰帝国議会的委任期限也到期了。俾斯麦企图利用这次會議来实现自己的計劃。半年前，3月里的一个美丽的早晨，当自由思想党出人意外地出現在角力場上的时候，他的这个企图得到了一个新的动力。这个党是由进步党人和分离派秘密組成的，而这两派中的任何一派都认为，征求选民的意見的努力是沒有价值的。这个党的意义当然不是一个秘密，对俾斯麦來說，尤其不是这样。这个新党首先受到皇太子的祝賀，因此好挖苦的人就立即称它为太子党。当时年近九十的皇帝不久于人世，皇太子希望有一个自己即位时可以依靠的“自由派大党”。

可惜，这个大党本身除去依靠“自由派”的皇太子以外，沒有任何支柱！1881年以来，自由党反对派执行了一种无比軟弱的政策。

甚至南德人民党也是这样，这个党同心胸狭窄的进步党人的区别，最多只是它更会说空话而已；在这两个党内，必要时能够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姿态出现，并受到真正的党的领袖嫉视的人，是屈指可数的。分离派无非是“被激怒的自由贸易主义者”。这个反对派的唯一功绩也就是，反对进一步提高关税率，分离派甚至对新财政关税问题也不是很有了解的。新党的纲领代表了活动资本的阶级利益，并用自由、国民福利等等一般词句装饰门面，为了有面奏皇帝的资格，进步党人取消了他们的旧纲领中的最进步的几条，或者加以修改，使得对王朝毫无损伤。进步党的选民对此发出了一些怨言，党的领袖为了安慰选民，提出保证说，分离派美人在结婚时带来了值钱的嫁妆；新联盟的盟员将不赞成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

591 自由思想党的纲领中确实写着：不论任何人任何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而且一切还有一点远见的自由党人都想废除反社会党人法，这也不是不可置信的。在资产阶级的有教养的阶层中，已经有人为这个“不幸的法令”叹息；只有时髦哲学家馮·哈特曼公然赞扬这个法令的“教育作用”，哈特曼想用自己的例子证明，黑格尔死后五十年，资产阶级哲学的确已经腐朽透顶了。谁也不能要求自由资产阶级，为了革命的无产阶级而损害它的觐见资格，可是反社会党人法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堕落，使它受的害处最大。非常法给它带来了损失，却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利益。如果它要想保持觐见资格，如果它要想给皇太子提供一个可靠的支柱，它就必须尽速取消这个“不幸的法令”。

俾斯麦十分殷勤，在这个新党刚成立不久，他就请它走上了这条道路。他要求帝国议会把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再延长两年。3月20日和21日就对他的提案进行了第一读，同时还对继

續在柏林、漢堡和萊比錫實行小戒嚴的問題進行了辯論。政府當然把無政府主義者的罪行當作主要王牌，其實應該對這些罪行負責的只有政府自己。倍倍爾說：“只是因為有了反社會黨人法，所以才可能產生無政府主義者，反社會黨人法的製造者也就是無政府主義行動的製造者。”哈森克萊維爾、格里林伯格和李卜克內西也根據同樣的精神發了言；他們毫不費力地指出，當代歷史的每個內行的觀察家都知道，社會民主黨不但不贊助罪惡的無政府主義，反而是防止無政府主義的可怕蔓延的唯一堤壩。普特卡默拖出那個裝滿引文的大口袋，來反對社會民主黨本身，可是他從這個無窮無盡的寶庫中，除了拿出從倍倍爾《婦女和社會主義》一書中摘出的而且還加以歪曲的幾段引文而外，變不出任何別的東西。甚至忠實的《國民報》對這件事也發了牢騷。這家報紙認為，既然在頒布反社會黨人法時，某些事情已被固定下來，那麼就不應禁止倍倍爾在他的著作中進行的抽象推論的嘗試。俾斯麥就天主教會是否對社會民主黨進行堅決抵抗這個老問題，同文特霍爾斯特進行了爭論。亨內爾認為反社會黨人法的害處是，資產階級政黨忘記保持彼此間的“一定聯合”以反對共同的敵人——社會民主黨。太子黨的这个供狀，並沒有使自己非常光榮地成為“反动的一幫”，資產階級反對黨沒有干脆反對政府的草案，却把它推給一個委員會，這就是改變主張的第一步。儘管如此，第二天祝賀皇帝八十八歲誕辰的帝國議會代表團還受到了嚴厲的責備，聽到這樣的威脅：皇帝將把否決政府提案看作是對他個人的打擊。假如人們過去對俾斯麥的意圖還有任何懷疑的話，那麼現在這種懷疑就不存在了，如果帝國議會不屈服，謀刺案那年的選舉就要重演。

在這種預示下，委員會的會議形成了一場十分卑鄙的戲劇。文特霍爾斯特提出了自己的“修正建議”，這些建議可能使警察感

到高兴，因为他们可以比过去更多地摆脱法律的束缚。亨内尔主张加重普通法，这就使无产阶级逃出狼窝又入虎口。这些只要颁布非常法他们就“坚持反对”的人，现在想方设法要赞成这个常常遭到诅咒的法令。进步党人走了一步比较巧妙的棋，他们提出了神秘的尼德瓦尔德谋杀案，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政府的选举计划，可是他们没有就这件事对密探的挑拨行为进行有力的批判，反而提出了炸药法，恐怕这是现代国家的立法所做的最不合理的行为。所有恳求和悲叹足以使石头人动心，可是普特卡默接受了俾斯麦的最严格的命令，他简单地宣布：注意，先生们，这里是障碍，你们跳吧！

他们确实跳了。半官方的选举机器已经完全开动起来，太子党经不住这种压力。这个党的内部斗争在蒙森写给他的科堡选民的一封信中忠实地反映出来。这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在这封信里用值得赞扬的敏锐眼光不仅指出反社会党人法是没有用处的，而且也指出这个法令是非常有害的，可是最后却说：如果政府坚持这个法令，我也赞成，一切祸害都落到它的头上。教皇全权主义者中有三十九人、自由思想党人中有二十七人改变了主张；因为欧根·李希特尔对和平还没有信心，所以他就叫他的助手奥托·海尔梅斯给从前的进步党人写信说，你们在帝国议会里参加表决是不必要的。这些信件的原文具在，海尔梅斯也承认这些信是他受李希特尔之托而写的。如果李希特尔为自己寻找借口说，撤销命令不是“根据党领导的命令”进行的，那么这种说法就同普特卡默的说法同样高明：普特卡默说，没有一个密探是“根据政府的命令”培养起来的。仿佛这些事情任何时候都是官方所作的！如果这两位“伟大的政治家”希望为自己的热烈的誓言找到深信不疑的公众，他们对于人类轻信的扩张能力一定有独特的理解。此外，李希特尔还

为他的二十七个党员临阵脱逃辩护，正好像一个女子硬说自己还是一个处女，因她只生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孩子。他说：一次不能算数，将来我们一定更坚决地反对应该诅咒的非常法。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可是由于他们动摇不定，他们从来没有能够对这个法令作出决定。5月10日，关于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两年的议案以一百八十九票对一百五十七票通过。

在二读和三读的会议中，阴谋的实质明显地暴露出来。俾斯麦声嘶力竭地向太子党挑起激烈的战斗，刚刚毁灭了自己的党的前途的李希特尔同样激烈地回答说，下次选举将保证自由主义的前途。两只好斗的公鸡只是附带地谈到反社会党人法，可是俾斯麦趁此机会扔出了劳动权的诱饵，说普鲁士邦的法律保证无产阶级享受这种权利。德国的教授们立即写关于矛盾的意味深长的论文，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对这件事只是表示鄙视；它提出了一个讽刺性的提案说，希望俾斯麦尽快提出一个实现劳动权的法律草案。社会民主党议员一向保持自己的尊严，坚持实事求是地参加辩论，在这些辩论中，剥夺工人权利必然为同反社会党人法和社会 594
主义毫不相干的个人的和政治的权力问题作卑劣的幌子。他们仅仅驳斥了敌人們的事实上的虚伪，三读结束时，通过李卜克内西宣读的一个声明，确定了事实。

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延长以后不久，资产阶级反对派提出、普特卡默雅致地加以美化的炸药法也通过了。刚才还明争暗斗的多数派各党，现在齐心协力地反对社会民主党对它们共同的拙劣作品的批评。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因为它不能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它在投票时弃权。哈森克莱维尔代表议会党团发表了一个声明，他在声明中确定这个奇怪的法令是不能接受的，至于政府想用什么办法制服它自己培养的无政府

主义,那是政府的事。大家知道,炸药法没有触动无政府主义犯罪分子一根毫毛,却使许多无辜的工商业者遭到不幸。

如果说太子党曾经希望利用自己在政治上受屈辱,至少挫败俾斯麦的竞选活动,那么它在这一点上也犯了错误。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限的提案通过以后,俾斯麦就已经打出了一张新王牌——殖民政策。在这以前,他是这个政策的坚决反对者。1871年3月,謠传俾斯麦想取得法国殖民地来补偿军费,俾斯麦说:“我不要任何殖民地。殖民地只能起供给基地的作用。对于我们德国来说,这种殖民地就像没有衬衫的波兰贵族家庭的绸面黑貂皮衣服一样。”七十年代的危机以后,资本主义集团中产生了一种殖民热狂,而俾斯麦仍然置若罔闻。这种殖民热狂的目标是农业殖民地,为的是通过有组织的移民,防止所谓社会苦难的主要源泉——人口过剩,同时保证德国工业有新的富裕的购买者。俾斯麦不听这一套,有一次他在帝国议会中说,“我不赞成移民,在我看来,一个把自己的祖国当作一件旧上衣扔掉的德国人,已经不是德国人了”。人们怎么能够要求这个经常是所有狠心的地主中最狠心的易北河以东的容克,赞成没有产业的雇农移居国外呢?移民必然使农业无产阶级的工资上涨。可是现在,当资产阶级为商业殖民地,即为最严重的剥削的新场所开始宣传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1884年4月,俾斯麦令人惊奇地打电报给驻开普敦的德国领事,叫他把一个不来梅商人在西南非洲的居住地安格拉·贝昆纳置于德意志帝国保护之下。同时他派总领事纳赫提加尔乘德国军舰到喀麦隆和多哥去,在那里升上德国旗帜。然后半官方的和甘心效劳的报刊就用一切高压造成班贝格曾怀着嫌恶的心情嘲笑过的“射击比赛的情绪”。事实上,俾斯麦使太子党的几块柱石

(一方面是大船舶业、大商业,另一方面是啤酒桌上的庸人)发生了动摇。他在帝国议会中说,王室的商人应该管理那些帝国花了很少的钱就得到的新殖民地。这样就打消了庸人对自己的钱包的顾虑,俾斯麦用一番讽刺话激起了庸人的经常存在于饭桌以外的无限的事业欲,他说,到现在为止,德国人是闭门不出的人,他们在图林根山上会餐,把背脊朝着海。这时自由党反对派所培养的民族陶醉感并没有反抗。

当太子党不敢原则上反对殖民政策的时候,它的处境就更恶劣了。它是一个地道的资本家政党,每只资本主义公猫嗅到利润的气味,都高兴得咪咪叫。这是它的不可消除的本性。班贝尔格和李希特尔仅仅指出,俾斯麦的殖民政策是一项不利的买卖,赚不了钱,却要花很多本钱,不能增加民族光荣,反而减少民族光荣,使帝国的对外政策受到许多“责难”。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可是1884年夏天,这股冷水不能使昏昏沉沉的庸人清醒过来。俾斯麦的交易所朋友布莱希勒德之流拿出几百万马克,建立剥削新殖民地的公司,无数的雇佣文人用美丽的词藻描写了据说埋在非洲沙漠和泥沼中的无穷无尽的宝藏。这样就在大资产阶级,特别也在小资产阶级中引起一种醉意,仿佛一个新的滥设公司欺骗的时期又开始了似的。

在这次竞选中,俾斯麦没有提出烟草专卖和类似的口号。他 596
热中于社会改革和殖民政策,反对所谓要使德意志民族失去这种光荣地位的卖国的自由思想。保守党人唱着同一个调子,自由思想党建立后、在海德尔堡会议上断然投靠政府的民族自由党人也是这样。自由思想党的竞选策略已经够可怜的了,为俾斯麦制造热狂的煽动者的民族自由党的竞选策略却更加可怜。太子党没有以牙还牙,它没有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打倒俾斯麦!而只是悲哀地

呻吟：我們是这样善良的爱国者，人們怎么可以叫我們卖国賊呢！这个党的許多領袖，如福尔肯貝克預定今后也投票贊成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这就給了这个党以致命的一击。它失去了四十个議席，其中有三十个以上为老保守党所得。民族自由党人得到了叛徒应得的報酬，从猎获物中只得到很少一点，同一个巴結的奴仆所得到的酒錢相仿。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給保守党一教皇全权主义者多数派鋪平了走进帝国議会的道路。

这不是俾斯麦的全部希望，因为除了保守党一教皇全权主义者多数派以外，还没有形成保守党一民族自由党多数派。可是一个保护关税的多数派已經形成了，因为老皇还平安无事地活下去，所以进行了第二次襲击，取得了更好的成績。无产阶级的坚定、勇敢的态度使容克地主受到沉重的打击，资产阶级只要撞他一下，他就倒了，可是资产阶级不但沒有撞倒容克地主，反而被快垮台的容克地主弄得完全垮台。这是三月革命后在德国常常发生而且今后还要常常发生的事情。

三 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取得的胜利

10月28日是社会民主党的胜利日。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后不久，倍倍尔在汉堡第一区的一次补选中获胜，因而在这个立法时期結束时，社会民主党議会党团就有了十三人。在改选中，社会民主党共得二十四个議席，五十四万九千九百九十票，比1881年多二十三万八千零二十九票，由总票数的百分之六点一上升到百分之九点七，对党來說所得票数更为重要。

竞选的准备工作是根据哥本哈根決議进行的。議会党团成立了一个中央选举委员会，由奥艾尔、倍倍尔、格里林伯格、哈森克莱

維爾和李卜克內西組成。散發了一百五十萬份競選宣言，取得了很大效果；宣言用不多的篇幅指出，保護關稅論者、行會擁護者、殖民狂人以及其他庸醫（不管他們叫什麼名字）的療法，都不能醫好病態社會，只有採取科學共產主義指出的途徑，社會才能恢復健康。宣言使用了明確、平靜、令人信服的语言，毫不誇張，但也不含糊。揭露了一切非法的選舉陰謀的指導性小冊子也起了很好的作用；而且現在工人對反社會黨人法已經習慣了，不那麼容易被人吓呆了。

在這次選舉中，工人們沒有受到像 1878 年和 1881 年那樣嚴重的壓迫。在投票檢查中，帝國議會對於同一切法律概念毫不相容的、令人憤慨的警察專橫行為感到有點羞愧，並採取了一些措施防止將來發生類似情形。帝國議會決定，由社會民主黨人申請舉行的選舉集會，甚至在申請時提到有社會民主黨員在這個集會上發言，也不應用反社會黨人法禁止這種集會。此外，帝國議會還在營業法規中加上這一規定，即選票不是反社會黨人法中所說的印刷品。這樣就撤銷了帝國最高法院的一個判決。因為普特卡默會令人動心地抱怨說，缺乏一種手段來禁止利用選票進行選舉宣傳，之後帝國最高法院就宣布選票是反社會黨人法上所說的印刷物。當然許多警察機關不理帝國議會的決議；如果在一個有資產階級法律習慣的國家，工人在 1884 年選舉中所受到的警察壓迫和其他壓迫，仍然是一種極端專橫的行為；可是按照普魯士—德意志的概念，社會民主黨的宣傳是一種自由的活動。

同過去一樣，社會民主黨的競選活動在三個戒嚴區取得的勝利最大。在初選中取得的新勝利中，有五個是輝煌的：柏林第四區（津格爾），得二萬五千三百八十六票，漢堡第一區（倍倍爾），得一萬二千二百八十票，漢堡第二區（迪茨），得一萬四千二百七十六

票，阿尔托那（弗罗默），得一万零二百六十六票，莱比锡郊区（菲勒克），得一万五千二百三十八票。柏林的六个选区共得六万八千二百七十五票，汉堡的三个选区和阿尔托那共得四万六千五百五十票，莱比锡市区和郊区共得二万四千九百一十四票。在柏林，施特克尔和瓦格纳的社会蛊惑使出了一切欺骗伎俩，在汉堡，所有工人集会都受到阻止，在莱比锡，沒有一份报纸是用一种起码的公正态度对待工人的。人们不知道，誰应该受到嘉奖，《社会民主党人报》用赞扬的口气写道，应该受到嘉奖的是德国西北部的密集方阵，帝国首都北部和东南部的坚强堡垒和莱比锡市区和郊区的社会主义工人营。

在主要选举中获得的其他四个议席分布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的党的老根据地：格劳豪—梅朗内（奥艾尔）、茨维考—格里米乔（施托尔）、开姆尼茨（盖泽尔）和罗伊斯长系（布洛斯）。此外，党参加了二十四次复选：在柏林第六区和汉堡第三区（即这个大商业城市的郊区），在莱茵区和萨克森的旧根据地：爱北斐特—巴门、佐林根、德累斯頓旧城、奥尔巴赫—赖辛巴赫，在七个普鲁士的地方中心：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科尼斯堡、马格德堡、卡塞尔、汉诺威、基尔，在三个北德或中德小邦：不伦瑞克第一区、哥达、罗伊斯幼系，在美因部的五个选区：法兰克福、达姆斯塔特、奥芬巴赫、美因兹、哈瑙，最后在南德的三个选区：纽伦堡、慕尼黑第二区和法兰克福—施派耶尔。

在许多地方，参加复选的是资产阶级候选人，党必须采取抉择。从前的选举多次表明，虽然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一般建议在这种场合放弃投票，可是哪怕是资产阶级左派的一个比较像样的候选人参加复选，社会民主党员的战斗热情就控制不住。这次中央选举委员会也不得不向这种潮流让步；10月30日，中央选举委员

会发表了一个宣言，作了这样的规定：敌对党派进行复选时，社会民主党員只有当敌对党派的候选人是下述人物时才参加投票，这些人坚决、明确地表示有责任投票反对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限，反对加重刑法，反对侵犯或限制普选权，反对延长立法时期，反对采用劳动簿，反对新关税和新生活必需品税。 599

复选在11月中旬结束。社会民主党在复选中得了十五个议席：柏林第六区（哈森克莱维尔）、布勒斯劳第一区（克雷克尔）、布勒斯劳第二区（哈森克莱维尔）、马格德堡（海涅）、汉诺威（迈斯特尔）、佐林根（舒马赫）、爱北斐特—巴门（哈尔姆）、奥尔巴赫—赖辛巴赫（凯塞尔）、不伦瑞克（布洛斯）、哥达（博克）、罗伊斯幼系（勒迪格尔）、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萨博尔）、奥芬巴赫（李卜克内西）、纽伦堡（格里林伯格）和慕尼黑第二区（福尔马尔）。哈森克莱维尔在布勒斯劳第二区，布洛斯在不伦瑞克就职。在补选中，柏林第六区（普方库赫）和罗伊斯长系（维麦尔）都保住了。党丧失的选区有：弗赖贝格、米特魏达和哈瑙；夺回的老选区是：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阿尔托那、格劳豪—梅朗内、奥尔巴赫—赖辛巴赫、莱比锡郊区和爱北斐特—巴门；第一次占领的选区有：不伦瑞克第一区、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哥达、汉诺威、马格德堡、罗伊斯幼系和慕尼黑第二区。

虽然社会民主党领导选举的机关在复选中尽可能支持自由思想党人，但是遭到失败的太子党却力图用自己的特殊方式缩小工人党的选举成果，这个党硬说，社会民主党在复选中得到保守党和民族自由党的支持。当然其目的首先是要冲垮自由的坚固堡垒即太子党；除了由于“背叛”而外，欧根·李希特尔在他的政治生活中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多的打击（如果人们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在1884年的复选中，在许多选区，如汉诺威、马格德堡、慕尼黑第二

区，民族自由党人、甚至保守党人投了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的票，这是事实。《科隆日报》也說，在某些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議員同进步党議員相比，是較小的禍害，馬格德堡警察局长也說了类似的話。不管由此得出什么反对民族自由党人或保守党人的結論，但是不能不考虑到，这样就貶低了社会民主党在竞选中取得的胜利。即使这个議席或那个議席是由于反动派的未經請求的、不受欢迎的帮助得来的，也远不能消除社会民主党議席数和得票数之間存在的明显的不成比例的情况，这种情况当时存在，以前和以后也經常存在，并且自由思想党英雄同“最阴險的反动派”的同盟不断地制造这种情况。在1884年的复选中，假如社会民主党在某个地方，用某种方式向反动党派献媚，那么它才做了有失体面的事。但是这种事情从未有过。

相反地，在这些复选中，“反动的一帮”的沒有主見是令人吃惊的。在李卜克內西同一个民族自由党人竞选的奥芬巴赫，民族自由党散发了一份传单，那上面写道：“杀人犯赫德尔、諾比林、卡梅雷尔、施特尔馬赫的名字带有敌人即社会民主党的特征，社会民主党公开宣布，它的道路是从鮮血和死尸上通过的，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可是，在迈斯特尔同汉諾威王党分子布呂埃尔竞选的汉諾威，民族自由党人却恭順地跟着社会民主党人跑。他們宣称，迈斯特尔“本来”是俾斯麦的“社会改革”的拥护者，虽然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宣言中說：“民族自由党，这个沒有节操的党、政治伪善的党死了，而且已經腐爛了……它仅仅是一群小丑……德国的反动派所以变得如此强大，应该归功于这个党的可怜的怯懦和沒有节操……帝国議會至今制定的社会政治法令（疾病保险法和意外灾难保险法）十分恶劣，以致我們的代表不得不投反对票……今天政府和保守党人所实行的国家社会主义純粹是一种騙局。”尽管如

此，民族自由党人仍然把迈斯特尔当作俾斯麦的“真正的”拥护者，投了他的票，这样人们就可能怀疑，是更应该敬佩这些绅士的厚颜无耻呢，还是更应该敬佩他们的爱真理的精神。可是这种怀疑也适用于自由思想党—人民党的报纸，这些报纸面对这些事实，大谈所谓“反动派和社会民主党”的同盟。

比如《法兰克福日报》为它热爱的、但已无可挽救地失败了 601 宗纳曼发表了一个竞选宣言，这家报纸在它的本地消息中用赞扬的口气谈到这个宣言时说，这个宣言是由法兰克福工商业界、法律界的最杰出的代表发出的，这些人大部分属于民族自由党，也有一部分属于保守党和教皇全权主义者党。在这一号的政治评论中，报纸又厚颜无耻地说，“保守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本来就是兄弟，他们追求同一个目标，同甘共苦，是一对可敬的兄弟。”《社会民主党人报》对这种说法作了尖锐的批判，它说，这家商业报纸大概估计到，只有傻瓜才读它的政治评论。

人民群众开始厌恶资产阶级政党的行为，这是 1884 年选举的明显的特征之一。如果我们查一查关于选举的官方统计，就可以看到，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前，工人运动已经深深扎下了根的地方，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数都大大增加了。在萨克森王国，以十二万八千一百二十四票达到了 1878 年的水平，在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在美因邨，在不伦瑞克和汉诺威，在萨克森省，在西里西亚和图林根，都得到了同样好、甚至更好的成果。即使在小资产阶级或小农观点占统治地位的地区，红旗也开始重新在风中快活地飘扬着。

这样一来，回溯到德意志帝国成立的最初几年的一种发展又重新开始了。这种发展被反社会党人法的突然冲击和资产阶级社会蠢惑的诱骗所打断，只有现代大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一开始就对这种打击和诱骗进行同等程度的坚决反抗。如果社会民主党的宣

传现在又在工业扫帚还没有扫平的土地上前进，那么同十年前相比，情况已经有利得多了。人民群众的失望比七十年代初期更彻底、更持久。他们领教过资产阶级医治社会贫困的药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自由党的自由贸易制度和反动的行会制度，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他们之中的最健全、最能干的阶层开始认识到，
602 只有社会民主党的根本疗法对他们有所帮助，或者至少看到，一切受苦人和被压迫者只有在这个原则明确并忠于原则的党身上，找到可靠的支柱。不仅保守党的和自由党的欺骗已经完全失效，而且教皇全权主义者的欺骗也开始失效。为了掠夺群众，文化斗争越是堕落，中央党的内在反动性质就暴露得越明显。恐怕没有一个选举结果像教皇全权主义者的要塞科伦和慕尼黑受到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袭击而动摇这样引人注目了。

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均衡地克服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因此这种宣传的扩展就更有重要意义。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在勃兰登堡、梅克伦堡、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打退了封建容克地主，在巴登和维尔腾堡打退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在亚尔萨斯—洛林，社会民主党得了三千一百一十一票，民族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从曼海姆到科尼斯堡，横穿整个帝国，几乎已经形成了一条党的连续不断的哨兵线。德雷斯巴赫在曼海姆得了五千多票，不久以后在一次补选中以约七千票进入复选；他和另一个同志当选为市议会议员，在市民委员会中，有十六名社会民主党人代表第三等级。对科尼斯堡根本没有抱什么希望。根据1882年的职业调查，同所有大城市中比较起来，这个城市的工业最少，而独立的小企业却得到特殊的发展。到1878年为止，科尼斯堡的社会民主党主要由几个受约翰·雅科比影响的、激进的思想家组成，而绝大多数人又都受到反社会党人法的迫害。1881年选举时，社会民主党在这里只得了二百八

十四票，这支小小的队伍是钳工师傅果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集結起来的。果道由于参加社会民主党，被东部铁路工厂开除出厂；他到别的地方找工作，也因同样的理由遭到拒絕，結果他只得当小行东，亲身体会到小手工业的一切痛苦。他善于用动人的言詞教育不是它自己的意向而是苦难把它推进去的那个階級。资产階級的学术界的先鋒战士不如这个真正的无产者，他虽然患了无产者 603 病，身体日益衰弱，可是他仍然充滿了求知的欲望。現在党在科尼斯堡已經得到四千三百四十九票，这首先是他的功劳。

可是，资产階級政党的不可遏止的分化日益把一切历史任务（解决这些任务是资产階級的历史使命）轉嫁到有階級觉悟的无产階級的寬肩上，这个事实在任何地方都沒有在德意志帝国的第二大邦——巴伐利亚表現得这样清楚明白。从德国社会民主党产生之日起，它在巴伐利亚就有拥护者，可是，在巴伐利亚有一支利用合法手段发展队伍的全党的一个側翼，却是 1884 年选举以后的事。

四 占領巴伐利亚

反社会党人法在巴伐利亚虽沒有完全按照柏林的方式执行，可是一开始就是雷厉风行的。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是天生的殘忍而不是阴險的打算，如果阴險的打算也起了作用，那么它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溫和的实践”的高級权术，而是别的东西。慕尼黑的可以說是自由派的內閣，为了使自己成为有精神病的国王的不可缺少的、卓有成效的赤色幽灵馴服者，对繼續不断地迫害社会党人十分关怀。同时柏林和慕尼黑之間还有一定程度的冲突，菲勒克在巴伐利亚首府就善于为自己的政論工作利用这种冲突。巴伐

利亚政府根据下述原则来看待菲勒克向巴伐利亚以外的德国各邦发行的内容大同小异的报纸，这个原则是：圣弗洛里安，请您保护我的家，去烧别人的房子吧；可是当巴伐利亚政府查禁了威胁它本身的《南德邮报》的时候，帝国委员会却违背它的其他实践，取消了这个禁令。

在莱茵河左岸的普法尔茨，反社会党人法一度完全蹂躏了工人运动。工人运动的一切活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除了由曼海姆组织的夜间散发传单这一活动外，工人运动没有其他鼓动手段。可是
604 这种强有力的地下工作很快就表现出最令人高兴的效果。1882年，埃尔哈特由曼海姆迁居路德维希港，普法尔茨成了一个独立的鼓动地区。1884年选举运动中，当普法尔茨无产阶级试图通过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夺得集会权时，有八百名士兵被派往路德维希港，可是由于工人采取了既坚决又冷静的态度，挑起一场血战的企图没有得逞。相反地，工人们在法兰肯塔尔—施派耶尔选区（路德维希港就在这个选区内）以四千八百二十二票进入复选，“进行惩罚的巴伐利亚人”不得不夹着尾巴逃跑了。从此以后，普法尔茨的运动不断发展。

在莱茵河右岸的巴伐利亚，纽伦堡—菲尔特仍然是三个法兰克尼亚行政区的运动的中心。当然主要是一块受到波涛四面拍打的岩石，而不是一个四通八达的大网的汇合点。国家的官僚、自由思想党的地方上的警察和一些无政府主义分子这个可爱的三人小组，使纽伦堡的工人过着痛苦的生活。因为这些工人是格里林伯格式的硬骨头，所以他们立场坚定，可是对他们来说，即使只在法兰克尼亚本地求得进展，也是十分困难的。1884年2月，格里林伯格企图把上法兰克尼亚的被最可怕的实物工资制剥削得一贫如洗的家庭编篮工人组织起来，首先在施派耶尔成立一个编篮工人的

同业协会，可是上法兰克尼亚政府赶快令人难以置信地歪曲法律，宣布这个协会是一个政治协会，作为一个政治协会，它就不能吸收未成年者和妇女参加，而且不能同其他协会发生联系；这样，編籃工人对他們的剝削者的非法行为的合法的反抗就被官厅镇压下去了。可是对手无寸铁的工人的这种令人气愤的迫害，間接地为社会民主党做了最有效的宣传，不久社会民主党在上法兰克尼亚的編籃工人中有了几千个拥护者；向其他法兰克尼亚选区进攻，甚至向紐伦堡附近的中法兰克尼亚选区进攻，更为困难，因为那里居民的生活条件、工业和城市的缺乏、尖銳的宗派矛盾以及其他情况，很少能給像紐伦堡工人那样的現代大工业的高度发展的无产阶级提供結合点。

在士瓦本行政区，可惜奥格斯堡沒有或者还没有起紐伦堡在法兰克尼亚行政区所起的作用。奥格斯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說明如果工人阶级再一次从社会主义認識的高地跌落下来，它就要付出多么巨大的代价。曾經用有力的打击战胜过巴伐利亚上院的社会民主党的重鎮，变成了最可悲的工业城市。每个工厂都有互助会、消費合作社和儲蓄所，工人工資低微，完全受他們的剝削者控制；一个被开除的工人，在其他地方也找不到工作。工人们感觉到自己是无产者，但是他們也具有受到有計劃的压迫、被占統治地位的工业剝削的人民阶层的缺点；他們把力量完全消耗在庸俗的娱乐中，消耗在彼此間的喧嘩、叫嚷中，而对他們的上司却不敢显示自己的力量。不过奥格斯堡的最糟糕的时期已經过去了；一千五百五十张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毫不含糊地表明，紀律和毅力重新在奥格斯堡无产阶级身上觉醒，現在又很快加强了。

可是，不是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地区，而是老巴伐利亚地区即上巴伐利亚、下巴伐利亚和上普法尔茨行政区能够成为把南德最

大的邦投进社会民主党群众运动的漩涡的杠杆。这些地方养育着古老的德意志民族中的比较起来最不沮丧的民族，并且最明显地带有作为农业区的巴伐利亚邦的性质。事实上只有慕尼黑及其周围地区有大工业，就在那些地方，手工业也相当兴旺，还有几个中等矿，此外，在小城市和农村，工业的萌芽刚刚露头，渐渐出现了锯木厂、水泥厂、铁工厂、造纸厂等等。剩下的就是农业和林业，除去范围不大、政治上没有力量的大地主以外，主要是中农和小农。这里没有受到普鲁士容克地主那样的巨大灾害，并不是从法国革命以后才是这样，而是从中世纪起就是这样，在中世纪教会就是最大的封建主，人民的古老经验证明，在主教权杖下比在容克的鞭子下生活得好些。上巴伐利亚的贵族大多是由修道院理事会会员形成的，当巴伐利亚公爵很早就威胁上巴伐利亚贵族，农民对贵族怀有正当的、彻底的不信任的时候，贵族就更难得势了。同贵族地主一样，大资产阶级也没有占有优势；自由主义纯粹是一个脱离农村居民的“有教养者”的党。反犹太主义者也找不到市场，因为犹太高利贷还没有严重地剥夺农民；反犹太主义宣传最多在居民点和市场的最偏狭的小市民之中得到一些响应。天主教会具有决定性影响。

老巴伐利亚的人民群众生活比较富裕。他们还没有见识过资本主义仆从的唯一造福的节约福音，他们收入的任何增加都立即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收入的差别较比资本主义发达的德国为少；过奢侈生活的人较少，一贫如洗的人也较少，很少有阶级仇恨，彼此也没有隔阂和矜夸。老巴伐利亚的特点同这一点是有联系的，这个特点是，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力量、倔强、顽固、事业心不强、完全没有利欲、劳动热情平常、喜欢享受、没有一点奴才气。这是一个真正的农民阶级，没有钻牛角尖的举动和神秘的思辨，对理论

几乎没有兴趣，很少有受形式教育的欲望。在这些群众中，宗教起着习惯和艺术的作用，在政治方面，他们是坚强的感情民主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以柏林为榜样的“强有力”的政府是不能得势的。巴伐利亚的官吏远不像普鲁士官吏那样拘谨和恭顺。对社会党人的疯狂迫害，同这一点也不矛盾；这种迫害仅仅证明，巴伐利亚工人也不是慕尼黑政府在其间来回摆动的推动力量之一，慕尼黑政府是经不住真正有力的冲击的。

同奥格斯堡一样，慕尼黑的年轻的工人运动也被教皇全权主义的洪水所淹没，在这个邦首府，为了使精神错乱的路德维希国王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社会党人恐怖，警察当然用最大的压力进行工作。对有阶级觉悟的工人进行的法律诉讼和警察处分层出不穷，警察局长米夏埃尔·格雷特组织了一个不体面的告密系统，这样大胆地把他的密探的最冒险的发现放到自己的职务宣誓之中，以致各界（甚至资产阶级也是这样）送给他“发伪誓的米夏埃尔”这个亲切的外号。因为靠这个邦的其他地方来援助首府，暂时还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党内认为慕尼黑在很长时期内已经失去了，这样，1884年社会民主党在慕尼黑的两个选区中所得的大量选票就更使人惊奇了。 607

这个可喜的转变的功劳，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于福尔马尔。他是道地的老巴伐利亚人，在一个官吏和军官家庭长大，十五岁上就长得体格健壮，十六岁当了少尉，二十一岁在普法战争中受了重伤，躺在病床上过着无聊的生活。当严肃的科学研究先把他引向民主主义、然后正确地引向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已经走过一段不平凡的生活道路了。福尔马尔在身体恢复健康后，立即献身于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工作。反社会党人法颁布时，他在茨维考监狱里服了一个很长时期的徒刑，在那里他写了一本论社会主义孤立国的

著作。这个篇幅不大的著作在理論上有許多毛病，可是它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明了福尔馬尔到处結合实际情况的傾向。因此他不大适合担任在国外出版的党报的編輯（《社会民主党人报》創刊的第一年，他曾任該报主編），但在帝国議会的实际斗争中却幸运地找到正确道路。他的关于烟草专卖問題的著名演說是党的第一个議会声明，这个党在资产階級以所謂社会改革掩盖階級利益冲突的混乱状态中，采取了完全无可非难的明确立場。

可是，1883年，福尔馬尔为了領導巴伐利亚的鼓动工作而回到慕尼黑时，他才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他考虑到，在慕尼黑机械地执行适用于大工业无产階級的策略，不会得到很大效果，在老巴伐利亚其他地区則不会得到任何效果。他沒有否定党的原則立場，却力图使这种立場适应巴伐利亚的特殊情况。他始終完全忠于社会民主党綱領，他把宗教同党派斗争区别开来，可是，正因为如此却更加明显地揭露了教皇全权主义者把宗教和政治混合起来的行为，以及个别教士和整个教会充当政治和社会的压迫者的事实。他在着重对巴伐利亚出生的感情民主派发生影响的同时，也竭力让这个民主派自己教育自己。

深入了解农民的疾苦也不违背党的原則和綱領，而且通过这种了解，社会民主党的鼓动才能深入巴伐利亚人民群众。当然这里必須在下述两种农民之間划一条明确的界綫，一种农民是靠他的几个奴隶和雇工的汗水养活自己的，就像行东靠他的几个帮工和学徒的汗水养活自己那样；另一种农民是自耕农，他們同現代无产者的区别只是，他們还占有可怜的劳动資料。有階級觉悟的无产階級同第一种农民，就像同行东那样沒有什么联系，而后一种农民却是它的最亲密的同盟者，巴伐利亚的农民階級中，有十分之九是这种自耕农。严格遵守这条必要的界綫，經常需要許多实际的

本領和机智，但是任务困难不能成为放弃任务的理由。中央党的愚蠢和不忠实越是彻底地医好自耕农的病（正如自由思想党的愚蠢和不忠实使自营的小行东明白了自己的处境那样），这个任务就越需要解决。

于是社会民主党的鼓动一直深入到一个古老的农业邦的最后一个角落。一般說来，老巴伐利亚各省最明显地带带有巴伐利亚的特点，而在这些省中，以上巴伐利亚、在上巴伐利亚中又以帝国議会选区罗曾海姆—米斯巴赫—特尔茨最明显地带带有这种特点。这个选区幅員广闊，人口稀少，沿着蒂罗尔边境，从瓦尔辛湖直到基姆湖。它几乎沒有工业，只有一个城市和几个集市点，甚至居民較多的村庄也沒有几个。大部分地方荒无人烟，住所分散，同时每个农家或小村落的所有耕地都在住所周围。有許多地产自古以来（从十六世紀以来，更远甚至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紀），根据文书记載，就属于同一个家庭，尤其在上伊札尔塔尔和荒凉的雅亨劳以及湖边地区，有許多田庄本来是貴族的庄园。在这个选区中，即在这个高山牧場生活、农村私刑和偷猎制度的主要地区中，保守傾向和习惯深深扎了根；从理論上說，沒有一个地方比这里对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更为不利的了。可是这个选区曾經是党在巴伐利亚的最好的选区。 609

占領巴伐利亚成为整个发展的最突出的标志，这个发展是德国历史的产物。如果人們要說明，为什么所有受苦的人民群众的健康的力量都开始聚集到社会民主党旗帜的周围，那么人們就必須說明，为什么大工业、資本主义生产、現代資產階級社会在德国这样迅速发展，以及为什么政治进步不能同社会进步保持同样的水平，为什么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落后和衰老的階級手里，为什么資產階級的許多阶层这样懦弱和怠惰，小資產階級这样胆怯和不和。

在这些前提条件下，就发生了现在发生的事情。当拉萨尔想把所有无产者都聚集在以大工业无产阶级为先锋队的社会民主党内的时候，他已经预见到这一点，他只是过高估计了历史发展的速度。

这样，德国社会民主党就面临新的困难任务。每当党胜利地进入小农和小资产阶级居民阶层中的时候，它就碰到这种危险：仍然被传统的成见束缚着的新入党的分子企图夺取党的领导权，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这样，他们刚刚理解了初步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马上就想指挥这一斗争。恰恰在德国，在这个典型的小市民国家，在工业发展强制地、大量地消灭小市民阶级的时候，某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兴起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社会主义虽然承认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把所有生产资料变为社会财产的要求是正当的，但是它说这个要求只有在实际上不可预测的遥远的未来才能实现，因此现在就依赖单纯的社会补救工作，在一定情况下甚至赞同最反动的所谓“提高劳动阶级”的努力。这种社会主义经常在德国工人的健康的判断力面前遭到失败；社会民主党的党员虽然具有平等权利，但是从它的历史性质上看，它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党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党。它的历史核心是，就其整个阶级地位来说是革命的、现代大工业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是党的卓越战士，没有这个坚强的不可摧毁的支柱，党的纲领就不能实现。因此无产阶级在党内虽不能享有不民主的特权，但是它应该享有同它的才能和力量相适应的地位。如果说历史发展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一个大乐队，那么小笛子也同低音大提琴一样有发声的权利，可是必须由现代工业无产阶级演奏低音大提琴，因为只有它才能胜任。

资产阶级政党怀着憎恨的本能看到，从某些观点来看，占领巴伐利亚也有它不利的一面。它们有几个星期之久幻想社会民主党

“回心轉意”，对于社会民主党选票增加这一事实，它們聊以自慰的是，至今团结一致的党可能发生新的深刻的分裂。这种分裂也确实是在1884年产生了。可是资产阶级高兴得太早了，它們的希望以通常的失望而告終。1884年选举的结果給党提出的問題，对党来说实际上不成其为問題。如果有意識地堵塞党的日新月异的生活的源泉，就是走向宗派主义的第一步。党任何时候也沒有想到这种慢性的自杀；党感到自己充分具有巨大的、原始的生命力，不用害怕由于使新分子服从党原来的伟大目标而产生的斗争和爭論。毫无疑问，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地区的党，同大工业无产阶级人口地区的党，外表上有些不同。人們只要比較一下两个最大的中等邦，就立即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在薩克森，“两个民族”之間的鴻沟日益扩大和加深，而格里林伯格和福尔馬尔在巴伐利亚成了該邦最受欢迎的人，成了各种居民阶层的有求必应的顧問和助手。可是党的统一对党的各个部分都同样重要，而且是它們的最高利益；离开树干的任何树枝都将枯死，成为枯木，只能給政治和社会的反动派生炉子。 611

在巩固的、不可摧毁的党的范围内，实际工作中的和策略上的意見分歧不会成为分离和破坏的因素，而只能成为令人鼓舞和振奋人心的因素。^①这些意見分歧在1884年选举后立即出現，而且反复出現，今后也还会反复出現，可是它們只是表明，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它由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生活中誕生，随着自己的任务的增加而成长，它恪遵詩人^②的告誡：成熟就是一切。

① 在1884—1885年的党内爭論中，恩格斯对于加强党的革命派有过重大貢獻，对党內的一切改良主义傾向和资产阶级傾向，进行了尖銳的批評。參見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第99—100、107—108、109—110頁。——原編者

② 指莎士比亚。——譯者

第六章

結束的开始

一 言論和行动

612 对社会民主党“回心轉意”所抱的希望，使反社会党人法第二时期产生了第三阶段，这个阶段又延續了一年半的时间，即从1884年秋天到1886年春天为止。

俾斯麦在取得不完全的选举胜利以后，就尽力从新帝国議會这只檸檬里榨汁水，推行殖民政策，进行保护关税的新掠夺，同时，如果帝国議會不同意国家去掏人民的腰包，就按照波拿巴式的全民投票的榜样，准备一次新的竞选。1884年圣诞节，他就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第一次发了一頓小脾气，但却得到了可喜的成果，德国庸人同过去一样很容易就上了当。俾斯麦仍然估計有可能煽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而他坐收漁人之利，这一点是較难理解的。为了自私的目的力图收买报刊的掌权者，往往自己也終于相信他們的雇佣文人的謊話，俾斯麦也是这样。半官方报纸希望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变成“馴順的家畜”，满足于工人保险的“稀牛奶”，这个希望在俾斯麦1884年11月26日的演說里得到反应。俾斯麦在这篇演說中希望社会民主党还得十二个議席，他称社会民主党是“一个十分有益的因素”，沒有这个因素就不可

能有至今在社会改革方面取得的适中的进步。甚至普特卡默也对“被引入不很革命的軌道的”党，装出一副尽量友好的面孔，变换花样說，反社会党人法的矛头只指向无政府主义集团，这个集团为了直接用暴力推翻現行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当然，当扮演新角色的尝试只能引起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发笑的 613 时候，普特卡默就又采用了刚刚停止的悲壮声調，庄严宣誓說，1885年1月，他的亲信之一、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的密探头目卢普夫就是死在社会民主党磨快了的匕首之下的。

1884年12月，帝国最高法院对神秘的尼德瓦尔德謀刺案作了最后判决，但并没有揭开盖在上面的面紗。八个被告中，有三个人被判无罪，两个人被判长期懲役，三个人——賴因斯多夫、屈希勒尔、卢普施被判死刑。屈希勒尔和卢普施請求减刑，結果卢普施也减为終身懲役，而屈希勒尔心惊胆战地走上了处刑台。可是賴因斯多夫拒絕請求减刑，他不是以一个政治殉难者的态度，但是心情十分平靜，唱着快活的歌度过了他的最后一天，行刑前他高呼：打倒野蛮制度！

在这以前，卢普夫已經成为自己的杀人行为的牺牲品，这个謀刺行动没有密探参加，所以警察没有能够发现主犯。它只是收集了一些理由不充分的間接证据，控告鞋匠帮工利斯克，这些证据只能說明，利斯克可能知道这件事，但是絲毫也不能說明这件事是他干的。虽然如此，法兰克福陪审法庭却判利斯克有罪，結果利斯克被处死刑。他死得有丈夫气概，他的咒罵使他的控告人——国家檢察官弗雷塞进了瘋人院。普特卡默却让普魯士邦議會根据一条特別的法律作出決議，卢普夫的继承人可以不折不扣地領到卢普夫的全部薪金；在俾斯麦—普特卡默的时代中，能让哪个比在可怜的罪恶活动中丧命的密探头目更体面的英雄在政府里享受这样好

的待遇呢！

当时小小的瑞士用使人惭愧的方式，向强大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指出，怎样才能把无政府主义幽灵赶走。据说有人计划爆炸伯尔尼的联邦委员会大厦，这个计划促使瑞士联邦的总检察长对瑞士的“无政府主义阴谋活动”进行侦查，调查结果是：无政府主义运动（只要能谈得上是这种运动）正在“迅速衰落”，莫斯特正用他疯狂的煽动手段，使工人日益强烈地反对“行动的宣传”，目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阴谋活动完全是由于德国和奥地利残酷迫害工人而引起的。“非常法把无政府主义鼓动员赶到我们这里来，使他们在我国进行反对他们祖国的活动。”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没有警察就不能生活，所以警察始终是资产阶级的警察；于是瑞士把十二名无政府主义鼓动员驱逐出境，除去考夫曼和魏斯这样的德国密探以外，也有内弗这样的诚实的无政府主义者。可是联邦检察官提出严重警告说，不要用引起无政府主义危险的手段，即压制政治自由来消除无政府主义危险，瑞士警察在这一方面的做法同德国警察恰恰相反，同样在发现无政府主义的组织的技巧方面也与德国警察大不相同。德国警察不能防止真正的行刺，而在人为地制造行刺方面却很熟练。

俾斯麦的社会政治言论和社会政治行动之间也有类似的关系。他在1884年11月对社会民主党所作的柏拉图式的爱的声明，是从很快就完全变了调子的双簧管里吹出的可爱的序曲。同1881年一样，1884年社会民主党选举胜利也唤起资产阶级的良心，而且这种胜利越大，这种作用就越强。教皇全权主义者不仅提出质问，而且还提出修订工人保护立法的议案。他们要求禁止星期日劳动、限制女工和童工，给成年的男工规定每天最高劳动时数。其他资产阶级政党也提出了类似的议案，只有太子党甚至不愿

表面上触动一下无限制的资本主义剝削，更不用說认真反对这种剝削了。在这一方面，它同俾斯麦是情投意合的。

就像唐·吉訶德用馬刺踢他的罗辛南特^①那样，这个世俗人也用馬刺踢他虛弱的自由貿易派駑馬。他在社会政治方面的驚人无知在不得已时可以为他辯护，比如他发表在理論上和实际上遭到千百次駁斥的意見說，縮短劳动時間就必然引起减少工資，可是当他說規定每天最高劳动时数損害工人利益时，他的惡意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他說，比如規定每天劳动十四小时，那么至今对工人每天劳动十小时或十一小时就已經滿意的企业主，也要让工人劳动十四小时。这种可悲的謬言甚至使資產階級政党感到輕微的战栗，又只有太子党欢喜得发抖地接受了天才政治家的有利的思想。从前的进步党人欧根·李希特尔声称，“帝国首相先生”說得这样合情合理，他可以依靠不屈不撓的人們的核心部队，从前的分离派分子鮑姆巴赫問，关于童工有什么好談的呢？霍亨索伦的子孙也应该学习手艺啊。可是公正的人們也应该承认，以路德維希·洛厄佛和年迈的菲尔肖夫为首的自由思想党少数派开始反对过分无耻的追逐利潤的行为。 615

俾斯麦沒有实现法律上的工人保护，相反地，1885年3月13日，他在帝国議會討論殖民政策的會議上，树立了培养百万富翁这面旗帜。他說，布莱希勒德和汉泽曼这些人也是可以要求保护他們财产的人，甚至是德国人；“我希望，我們能够立即在国内多培养几百个百万富翁”。正如俾斯麦一年前在普魯士邦的权利中发现了“劳动权”一样，現在他以老霍亨索伦的重商主义政策为依据，“十九世紀的海克立斯”虽然比他当时的教养落后几个世紀，但是

^① 唐·吉訶德所乘馬名。——譯者

他始終处在自己的教养的最高水平上。实际上，他的培养百万富翁是从基佐的 *Enrichissez-vous* [你們发财致富吧!] 抄襲来的，只是他缺乏基佐的个人的大公无私。在新帝国議会的第一次會議中，他提出了1879年的保护关税的放肆行为的再版；因为狼已經餓了六年，所以它們就貪婪地冲向消費的群众。谷物稅增加了两倍，木材稅增加了一倍，牲畜稅和烧酒稅提高了，許多工业稅也提高了。在“社会改革”的旗号下开始的會議，以富人普遍掠夺穷人而結束，正如社会民主党議会党团发言人奥艾尔所說，以“对劳动人民的掠夺”而結束。

二 議会党团和党

616 这个議会党团第一次强大到能在帝国議会中独立行动。它忠实于党的传统和維登決議与哥本哈根決議，它把議会活动的重心放在宣传鼓动方面，但是它也順便利用了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可以利用的东西，而对资产阶级議会政治的功能不抱任何幻想。它沒有参加所有委员会，沒有参加預算委员会，因为它必須一劳永逸地反对軍事国家的預算，但是它参加了許多委员会，如在其中可以保护工人阶级的重要利益的請願委员会和投票检查委员会。

議会党团对于會議的三个主要問題自然而然地表示了态度。它坚决反对新的保护关税的魔女酒宴，而用一个范围很广的工人保护法草案，把资产阶级政党提出的修訂工厂立法的陷于困境和已經失敗的要求，提高到現代文化的高峰。它的草案的要点是，成年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少年工人八小时工作制，禁止星期日劳动和节日劳动，不可避免的情况除外，禁止儿童和妇女在上部建筑和地下劳动，禁止夜間劳动，对容許的例外要作明确规定，星期五付

一周的工資，規定最低工資，建立由帝國勞動局監督勞動狀況的、範圍很廣的、分門別類的體系，建立勞動局、勞動議會和仲裁法庭。這個草案不是每一點都是無懈可擊的，在要求規定最低工資這一點上也是這樣，這個問題在黨團內部已經遭到激烈反對，可是總的說來，草案出色地向資產階級政黨指出，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上進行的明確而徹底的社会改革是個什麼樣子。這個草案當然受到普遍的歡迎：在人們長時間叫囂社会民主党用這個草案拋棄了它的“革命空想”以後，草案的每個實際要求都被以“革命空想”的罪名否決了。

社会民主党議會黨團像反對關稅政策那樣，反對殖民政策，而且不僅反對無利可圖的殖民政策，還反對工人負擔費用、資本家享受利潤的一切殖民政策。除去幾個小預算項目而外，俾斯麥開了 617 殖民政策的第一張帳單，要求每年支用四百四十萬馬克，以補助建立和維持同東亞、澳洲、非洲的定期郵船聯系的費用。這一事業是委託企業主辦理的。只要這個要求對殖民政策起促進作用，社会民主党議會黨團就一致反對。可是這時在以奧艾爾、迪茨、弗羅默、格里林伯格為代表的黨團的多數派同以李卜克內西、倍倍爾、福爾馬爾為代表的少數派之間產生了一種意見分歧。^①多數派認為，政府建議開辟的某些輪船航綫，同殖民政策沒有關係，而只為各國人民的國際交通服務，從而促進和平事業，這也是符合無產階級利益的。少數派並不反駁這種基本觀點，却認為德國商船隊沒有補助金就已經壯大了，因此人們應該讓納稅人置身於局外，補助金會產生不健康的稅率，它同俾斯麥的“經濟改革”是有關聯的，因為它引起一種骯髒的競爭；通過國家補助來促進貿易往來，將會

^① 恩格斯對航運補助金問題提出了重要的策略建議，參閱恩格斯：《致倍倍爾的信》，第 103—106 頁和第 118 頁。——原編者

招致新的危机。多数派考虑了这些看法，它试图挫败俾斯麦在航运补助金方面的一切阴谋诡计。

德国同东亚和澳洲的贸易有十二分之十一操在汉堡手中，而不来梅只大量输入稻米，俾斯麦想给不来梅轮船公司补助金，这样必然严重损害汉堡的商业，从而严重损害汉堡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德国最大的轮船公司不来梅轮船公司可以立即用旧船组成一支大商船队，而汉堡轮船公司如果要开辟一条新线，就要造新船，这样当时成千上万的吃不饱饭的造船工人就会有工可做。从这种考虑出发，多数派决定赞成开辟东亚线和澳洲线（萨摩亚群岛线除外），为了贯彻对殖民政策的立场，反对开辟非洲线和萨摩亚群岛线，可是多数派表示赞成的条件是，雇用的船只是第一流的新轮船，而且必须在德国船厂里制造，如果这个条件遭到否决，或者帝国议会赞成多数派所否定的航线，他们就反对整个提案。这两种情况都发生了，帝国议会原封不动地通过了俾斯麦提出的议案，于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一致投票反对整个航运补助金案。

在议会党团内部没有发生原则性意见分歧，对一个实际问题的不同判断，没有导致投票时的实际分裂。可是这个插曲在党内引起激烈争论，这是反社会党人法存在期间党内出现的最激烈的争论。苏黎世党员首先起来反对议会党团多数派，《社会民主党人报》也同他们的看法一致，接着伯尔尼、伦敦、布鲁塞尔、哥本哈根的同志，以及德国国内的莱比锡、罗斯托克、科尼斯堡的党员也跟着这样做。3月20日，议会党团发表了一个声明，其中指责这些攻击是“完全不适当的”，党报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反对对它的內容负责的议会党团；“不是报纸决定议会党团的态度，而是议会党团监督报纸的态度”。这个声明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引起了新的攻

击，法兰克福的同志最激烈地反对“独裁处理”，反对革命工人运动不可陷入的“議會主义泥坑”。幸而議會党团和党报很快取得了一致意見；4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和平协定：議會党团承认，《社会民主党人报》不是它的私人报刊，而是并且应该永远是全党的机关报，編輯部則同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党的統一和行动能力，議會党团在非常法的战争状态下担任领导期間，一旦做出一定的決議，应该绝对依靠全体同志的支持。这样当然还远不能使激动的情緒平靜下来；内部爭論甚至繼續在資產階級报刊上进行；几个月以后这场风波才又平息。

双方都表现出敏感和过分激动，这同爭論的真正对象是完全不相称的。議會党团少数派把航运补助金当作俾斯麦计划的一部分加以反对，而多数派在反对提案以前，先把它放在批判的坩堝里考查，也是无可非难的。像社会民主党这样一个非常文明的党，有一切理由培养在資產階級社会的土地上就可以成长的文明的萌芽；因为所有这种萌芽在这个社会中都带有資本主义性质，所以資本主义利益同文明利益之間的正确界限很难划分；在航运补助金問題上同北海波罗的海运河問題上一样，这条界綫是不容易看清的，虽然北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开凿起初也只为資本主义利益和軍事利益服务，但是不久以后議會党团就表示贊同这一工程，并没有因此引起党内的反对。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多数派及其历史权利上的立場和議會党团所否決的決議，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尷尬的妥协。东亚綫和澳洲綫（薩摩亞群島除外）的航运补助金将补偿企业主按契約規定向目的地的定期航行所造成的損失。这些船只必須完成邮政工作，在旅途中必須保持最低速度。除了規定的中間港而外，不能停靠其他港口，而过去作为貨运航綫，可以不管航行時間长短，停靠

每个发貨或收貨的港口。

这时候經驗表明，旧的运貨航綫增强了，而在艰苦条件下开辟的受补助的德国邮政航綫，却不是經常都获得利潤，但是間接地对于貿易和交通发生了有利作用，特别是对于各国都利用和称頌的旅客运输起了有利作用。构造精良的船只、优秀的船員、充分的物质供应吸引了全体国际公众的注意。

迪茨在二讀时預言，同建筑铁路初期的情况相似，补助金作为利息保证是不够的。根本談不到什么由于稅款而得到加强的“骯髒竞争”。补助金仅仅是对任何一条航綫过去和現在都沒有自願承担的特殊工作的报酬，而邮政航綫由于国际竞争已經成为必要。大西洋彼岸的交通和我国两大航綫沒有补助金而得到发展，是由于移民的垄断而实现的，只有移民給投下的資本提供可靠的保证。同航运补助金有关的真正的殖民航綫，不久就开辟了，相反地海軍根据地的換防士兵則用邮船运送，过去这些士兵有一部分必須花很多錢用外国船运送或者用运输船直接运送。过去和現在英国人給大英輪船公司，法国人給法国邮船公司，奥地利人給奥地利輪船公司也支付类似的补助金，可是德国邮政航綫打敗了所有竞争者。

此外还要考虑造船問題。过去几乎所有到美洲去的船只都是英国制造的。虽然施泰廷的伏尔康造船公司进行了在自己的造船厂打破英国专利的試驗，但是結果不佳，只有一个可靠的收获：英国人减低了他們所造的船的定价，以致一个私人企业主不在英国用便宜价錢买好船，却在德国用高价买有問題的产品，他就是一个傻瓜。英国的船价减低很多，使欧洲大陆的造船业不能同它竞争。这时德国造船业发生了危机。木船制造逐漸停頓，而铁船的制造由于沒有訂貨而不能发展。船塢里空空蕩蕩，在北海和波罗的海港口大約有两万名造船木工沒有工作可做。虽然在施泰廷、卢卑

克、汉堡、不来梅港建立了造铁船的船厂，但是它們只能造小船，大船要由英国船厂制造。

只有国家的强制能够有所帮助。社会民主党提議投入受补助的航綫的所有船只都应是在德国船厂制造的新船，这个提案遭到否决，而且从帝国議會多数派的立場来看，也必然遭到否决，因为如果通过这个提案，受补助的各綫的开辟就要推迟很长时间。俾斯麦了解这种情况，他在二讀时宣称，社会民主党提案的思想是值得贊揚的，不过它用現在的形式是不能通过的。但是他願意在联邦議會中主张，在受补助的航綫上行駛的所有新船都必須在德国船厂制造。保守党根据这个精神立即提出的議案被通过了。不来梅輪船公司可以使用第一流的旧船，但必須在德国船厂制造新船。这样一来，德国造船业得到了意外的发展，代替从前两万名吃不飽飯的造船木工，今天却有了几十万必須組織起来用斗争来爭取、而且也正在爭取他們的利潤份額的工人。

关于航运补助金問題的實際內容就談这些。此外，这个問題只是同它有关的激烈而无聊的爭論的机緣而不是原因。有人說，反社会党人法的“铁箍”使社会民主党結成一个整体，这是自由主义的廉价的一半正确的言論；同它水平相当的是另一种言論，即认为暴力手段不能鎮压精神运动；德国自由主义常常以巨大的热情宣揚的它自己的历史，最能清楚地說明这种說法的相对的正确性。使社会民主党团結起来的，不是反社会党人法而是别的铁箍。的确，为了使这个法令失效，这个党更紧密、更牢固地团結起来，但是这种力量来自党的历史存在条件，而不是来自殘酷的压迫，如果这种压迫也能起一定作用，那么它只能起破坏作用和造成混乱的作用。它究竟发生什么作用，要看被它压迫的階級的本质而定；它对間接有关的資產階級起削弱和麻痹的作用，对直接有关的无产阶

級則起了使它激动和发怒的作用。关于航运补助金問題的爭論，議會党团和党之間的巨大摩擦，就是在已經延續了七年的生死存亡的斗争中必然自发产生的过分激动的一种征兆。

反社会党人法要求議會党团担任党的领导，要求德国唯一可以自由讲话的地方——帝国議會讲坛具有资产阶级議會制度本身不能要求的重要意义。議會党团沒有犯任何严重錯誤；还在 1884 年选举以前，它毫不留情地把不遵守党团的严格紀律的年迈的里廷豪森开除出去。1887 年选举以后，党团更积极地参加議會工作，只做它不能不做的事情；欧根·李希特尔抱怨党团在帝国議會里“疲疲沓沓”，这就最确切地表明，党团同議會迷毫不相干。一定的意見分歧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經過选举战的十分紧张的工作以后，議會工作沒有成果引起了失望，这种失望在 1881 年选举以后，甚至早在七十年代的卓有成效的选举以后就以类似的方式出现了；另一方面，尤其是在反社会党人法对工人的压制最厉害的地方，却不断产生这种忧虑，即議會党团可能为了取得某些成就，而同资产阶级政党关系过深，并在議會活动中堕落下去。恰恰是党的最宝贵的财产——最老、最忠诚的党员，保卫着党的至上的独立性；虽然在薩克森邦議會中已有五个社会民主党員，1885 年春天又有两个社会民主党人进入黑森邦議會，但是当弗罗默和哈森克萊維尔主张参加普魯士邦議會选举时，他們却遭到了頑强的反抗。

議會党团在帝国議會中提出的工人保护法很少受到反对，可是也引起党内种种摩擦。八十年代的經濟状况是一种慢性的蕭条，它被在这个十年的初期、中期和末期发生的个别波动所中断，也就是說，每次都出現工业的較大繁荣。这些复兴中的第一个复兴的标志就是新罢工运动和工会运动，反动派对这些运动沒有完全置之不理，但是一般說来沒有能够把它镇压下去。八十年代中

期，当工业繁荣掀起一个較大的浪头时，运动正有力地发展着；发生了多次罢工，1885年，几乎所有行业又都有了工会組織，一部分是地方联合会，一部分是中央联合会，总共有八万多會員。这些組織通常是在罢工中自发产生的。比如雕刻工人的联合会是在柏林一次失败的罢工中产生的，木器工人的联合会是在斯图加特的一次罢工中产生的，卡尔·克洛斯十分英明地使这次罢工以胜利告終。当然在建立工会联合会的时候，必須十分小心，为了使官厅找不到任何干涉的借口，对組織形式进行了种种試驗，中央联合会的所在地最好选在有較大結社权的小邦中，裁縫設在汉堡，烟草工人設在不来梅，手工业工場工人設在格腊，五金工人設在曼海姆。随着保險法的頒布，工会联合会失去了一个有力支柱，可是工人在迫切希望成立組織的情况下，也善于把坏事办成好事，他們紛紛成立了疾病互助会法允許的自由互助会；1885年这种互助会的會員有八十七万四千五百零七人，为五年前的十四倍。

这一年，女工运动也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分散性的发动以后，经历了它的第一次高潮。它甚至已經取得了一个小小的实际成果；当政府要想对縫衣服的綫課稅的时候，柏林現成服装业女工提出强烈抗議，以致帝国議會首先決定調查內衣制造业和現成服装业女工的状况。尽管政府进行的調查非常表面，也很不充分，但仍揭发了这个广泛剝削妇女劳动力的領域內的令人吃惊的情况。这次調查展开了在整个經濟发展过程中一个代替另一个的各种不同生产方式和經濟形式的五色繽紛的样本图卷。同时并存的有：手工业、家庭工业、商人資本、血汗包工业^①、股东和工厂主、大

^① 血汗包工业(Schwitzmeisterschaft)——来源于在英国流行的对某些中間人的一种称呼“Sweater”(榨取工人血汗的雇主)一詞，这些中間人从大企业包下工程，然后以尽量少的工資雇工完成，从工人們的血汗中榨取利潤，因此叫血汗制度。——原編者

中企业、为国际市场生产的出口公司、满足乡村和地方需要的商号、根据订货劳动的小企业，手工和机器、工厂車間和作坊、地窖和閣樓中的活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对妇女劳动力的敲骨吸髓的剝削，以致官方报告人也相当坦率地承认，得不到家庭支持的女工的唯一选择就是餓死或者卖淫。这幅可怕的图画对于官方的“社会改革”沒有发生任何影响，而为了解脫大地主和大工业家的“困境”，俾斯麦有許多事情要做。

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保护法在工会运动和罢工运动中更加振奋人心了。有五十万人签名的請願书要求帝国議會通过这个法令。同任何一次火热的斗争一样，在这些斗争中也产生了許多超过目标的希望。1885年以关于航运补助金問題的爭論开始，而以李卜克内西同菲勒克之間关于正常工作日的意义的激烈論战結束。菲勒克幻想正常工作日会或多或少地吸收一部分产业后备軍，而李卜克内西中肯地指出，尽管正常工作日是无产階級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大阶段，但它不能根本医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禍害。反社会党人法在这里也制造了人为的对立。《社会民主党人报》出于正当的理由，对工会运动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而《劳动权报》也出于正当的理由，过分专门注意工会运动。于是两家报纸之間产生了某种对抗，这又引起赫希柏格和卡·奥·施拉姆再一次企图貫徹他們对現代工人运动的特殊观点。

赫希柏格为殖民政策的口号所迷惑，在《劳动权报》上表示贊成征收交易所稅，条件是其收入用于建立工人生产合作社。《社会民主党人报》立即否定了这个建議，但并没有因此而忘記赫希柏格对党的功劳。1885年夏天，赫希柏格去世时，党报发表了充滿感激心情的悼詞。同企图攻击“馬克思主义的教条”的施拉姆的冲突比較激烈。当考茨基在《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篇論洛貝尔图斯的一

部遺著的完全适当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文章以后，施拉姆就挑起了一场完全多余的爭論；遭到恰如其分的駁斥以后，施拉姆还在菲勒克的出版社里出版了一本論洛貝尔图斯、馬克思和拉薩尔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里为了換換花样，他又大捧拉薩尔，当然用的是假如拉薩尔本人活着一定会坚决拒絕的方式。《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一組卓越的論文駁斥了这个小册子，施拉姆利用議會党团中的一些人对党报的余恨而进行拙劣的投机，但并没有改善自己的处境。他同这时与菲勒克分手而成为《新时代》的一个热心的撰稿人的雪恩朗克也发生爭吵，結果第三次被人駁倒。 625

尽管有許多策略上的意見分歧，党沒有再从辛辛苦苦地攀登上去理論認識的高峰上蹶下来。相反地，它以矯健的步伐在被它占領的高地向前迈进。《社会民主党人报》在社会民主党文庫中收集了較老的社会主义文献的杰出作品，而迪茨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国际文庫中展开了新的社会主义研究。現在，当謝夫萊开始胡說什么“社会民主党沒有前途”的鬼話时，也許能使一些忧心忡忡的資產階級分子安下心来，可是在党内，他所起的作用无非是，党了解了謝夫萊的《社会主义精义》一书的弱点，而十年前，甚至五年前，党对这本小册子还是十分贊賞的。

三 俾斯麦的失望

尽管 1885 年党内发生的策略上和理論上的爭論被資產階級报纸所利用，来欢呼“社会民主党的分崩离析”，但是这些爭論沒有使实际的天才俾斯麦长期受到迷惑。有一次菲勒克把所謂“右翼”的綱領归納成三点要求：废除反社会党人法、无条件的联合自由、按英国的榜样制定工厂法，对俾斯麦來說，这比公有制甚至更可

怕，因为这些要求直接威胁着他心爱的利润。原来防止“革命暴行”只是反社会党人法的表面目的，而实际压制工人阶级才是它的真正目的！俾斯麦的思想家头脑渐渐认识到，以为德国工人阶级会被任何一个容克用鞭子和糖果打倒的想法是多么愚蠢。

626 “温和的实践”仍然继续，但是新的阴谋诡计的苗头已经露出来了。半官方报纸十分凶恶地攻击每次罢工，自由互助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阻挠，由于取缔五金工人联合会，反社会党人法第一次深入干涉同业联合会运动。在布勒斯劳，警察查封了西列西亚印刷厂，说它是一个联合会，实际上它是克雷克尔私人的财产，帝国委员会毫不犹豫地批准了没收这个印刷厂的财产的十足非法的行为。在比雷菲尔德甚至实行了几天大戒严，因为一个缝纫机厂的罢工工人被他们的“给面包的人”所激怒，在后者的住宅前面示威。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警察局长迈耶尔命令他的部下用闪亮的刀去砍给一个勇敢的社会民主党员送葬的人，没有任何理由，完全出于兽性。在这次可怕的墓地屠杀事件中有三四十人受伤，甚至最懒散的庸人也被激怒了；迈耶尔和他的几个同伙受到控告，最多被判三个月监禁。与此同时，阿尔托那的雪茄烟工人屈克尔哈恩因为在许多场合下散布《社会民主党人报》而被判三年半监禁。不仅如此，皇帝还立即赦免了迈耶尔和他的同犯，以免人们对这个著名的“法治国家”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除此而外，现在俾斯麦也开始要求司法做警察不能给他做的事情。为了祝贺俾斯麦七十诞辰，进行了一次为了某种崇高的民族目的的普遍募捐，在这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贫穷的工人也被爱国的企业主榨去几分钱，可是，等到凑到两三百万马克的时候，俾斯麦就伸手拿了一大半，把他祖先卖掉的世袭地中的一部分再买回来。当这位天才命令对自由思想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帝国议会

員进行一系列的訴訟，以便根据普魯士邦法律中的一項腐朽条文，把他們从党的金庫領到的日薪当作“有失身分”的收入而夺去的时候，俾斯麦的崇拜者尚且为俾斯麦侵吞捐款一事感到羞愧。但是，这些案子中有七件在一审里被宣判无罪，另一件对当时被拘留 627 在基尔和明斯特尔的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代表进行了几年的案子也遭到失敗。帝国檢察官拒絕了以叛国罪对那些代表起訴的企图，向一些地方法院对秘密結社进行的控告也沒有得逞。薩克森司法大臣阿貝肯終于使开姆尼茨(1883年，福尔馬尔曾住在那里)的国家檢察官唯命是听，可是开姆尼茨的法院却不听他的話。开姆尼茨地方法院反而宣判所有九名被告一律无罪，因为人們提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人进行刑法意义上的秘密結社。

1885年11月，帝国議會举行第二次會議，俾斯麦不久就同帝国議會爭吵起来。首先是因为以充实国庫和装满容克地主腰包为目的的烧酒专卖。原浆烧酒不在专卖范围之内，应保证生产者得到每一百公升三十五馬克(最低三十馬克，最高四十馬克)的平均价格，而市場价格每一百公升仅为二十四馬克。在后波美拉尼亚庄园里每月能出九万公升烧酒的烧酒商俾斯麦的例子就可以說明，这个措施給容克地主带来多少利潤。但是，帝国議會的多數派对于討厭的专卖感到不如意，因为这个議案沒有通过的可能，所以連容克也不敢投贊成票，他們由于害怕憤憤不平的公共輿論而徒劳地做出这种丑行。1886年3月27日，烧酒专卖提案在帝国議會由于除三票外全部反对而遭到否决。

同时帝国議會必須对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作出决定，一些情况表明，俾斯麦很想借此机会立即废止这个法令。可是，如果他真有这个意图，那么他不久就会相信，資產階級反对党在这个問題上沒有任何对抗情緒。他們并不是沒有越来越感到反社会党人

法令人不能忍受；甚至像格奈斯特这样的民族自由党人也公开談到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必要性！可是《社会民主党人报》說得对，
628 它对所有这些議論冷冷地評論說：当反社会党人法像火似地烧着統治階級的手指的时候，它們就会废除它，而在这以前，它們是不会这样做的。資产階級反对派得了老年人的精力衰退的病症；当时班貝尔格尔看到永远朝气蓬勃和敢于斗争的社会民主党就用羡慕的口气說：他們是有信仰的啊！自由思想党人非常高兴，因为这次他們可以不受責备地发表他們长篇的陈詞濫調了，而教皇全权主义者則滿足于用他們的“修正提案”的震耳欲聳的炮声把延长这个法令所需要的援軍轰走。騙术已經欺騙不了任何人了；同平常一样，“修正提案”飞到桌子下面去了，同平常一样，政府答应把它建議延长的期限縮短了两三年。

因为实在制造不出重大的政治事件，所以政府也就以能够得到的为滿足了。普特卡默只从大引文口袋里拿出一件小小的法宝——《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一篇用历史的真实性評論普魯士國家的女圣人——路易絲王后的文章，此外就着重談到虽然不在德国、但在比利时发生的工人騷动，俾斯麦則試圖歪曲倍倍尔关于俄国状况的十分中肯的言論，似乎德国社会民主党宣揚杀人。因为俾斯麦提出，馬克思有沒有“培养杀人犯”并派来杀害他——伟大的俾斯麦，是值得怀疑的，所以馬克思的活着的两个女儿公开声明：在她們的父亲看来，俾斯麦只是一个可笑的人物，至多还是无产階級革命的有时很可利用的非自願的助手；认为像馬克思这样的人可能从事“培养杀人犯”的工作的恐怖小說式的想像再一次表明，馬克思多么有理由只把俾斯麦看作是虽然十分狡猾、但却非常愚蠢的普魯士容克，他完全沒有能力理解任何伟大的历史运动。3月31日，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被以一百六十九票对一百三十七票

延长两年，即至 1888 年 9 月 30 日为止。

资产阶级反对派使俾斯麦—普特卡默政府幸免于难，可是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却是不好说话的。在关于小戒严到期的辩论中，津格尔揭发了一个密探——警察伊林，他化名机械师马洛夫混进柏林的一个工人协会，企图在这里通过粗暴地侮辱皇帝、散发无政府主义印刷物，通过挑起爆炸谋杀事件而起破坏作用。普特卡默用来掩饰过去的密探活动的一切美妙借口，这次都没有发生作用；伊林—马洛夫是编制内的公务人员，他奉了上级的命令，直接违反结社法，化名在反社会党人法允许存在的工人协会中进行特务活动。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他有企图犯罪的嫌疑，这种嫌疑由于许多的确凿的证人而成为绝对的事实。

人们理解，普特卡默为了减少这一揭发的份量而装作十分傲慢的样子，正如一个自由思想党议员所称呼他的，纯粹是个戏子。可是，他坚决让遭到不幸的现存制度支持者支配国家的进行仲裁的权力手段，国家检察官不得不以诽谤罪控告伊林—马洛夫的原告——作家克里斯滕森和瓦工别尔恩特；在两级的法律审判中，这个密探的官方上司热心为他辩护。根据他们的宣誓证言，这个密探是一个最无可非难的高尚人士；他们宁可采取不够慎重的态度，也不能让伊林—马洛夫受到一点委屈。因为，他们怎么能够指挥这样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去干那种必须从早到晚说谎、说谎还是说谎的工作呢！他们津津有味地谈到伊林提供的“有价值的材料”，而伊林本人至少暴露出了一些小小的缺点：他在自己的经典报告中经常把马克思和莫斯特相混。正直人士的整个生存决定于这些无知之徒的谰语，这件事也给资产阶级世界一个深刻的印象。只有由地方法官巴尔迪修斯任庭长的陪审法庭还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判处两个被告六个月监禁；在高级法院面前，由于人们提出一大批

反对伊林的证明材料，整个官方机器陷于崩溃，被告被宣判无罪，因为他们所说的全是真话。可是这时普特卡默仍然坚持到底，并给已被法院定罪的密探以令人“惊异的满足”，发给他普通荣誉奖章，对于不久以后，在进行类似活动时被揭发的警官纳波拉也是这样。

630 虽然如此，当社会民主党敢于触动打了官方印記的密探的时候，对俾斯麦—普特卡默政府来说，发酸了的“温和的实践”的牛奶已经凝成烈性的毒药了。尽管在公开的场合还显出英雄气概，而在自己的寂静的小屋里，政策的执行人也承认同1881年秋天的赤裸裸的暴力方法已经破产那样，1886年春天的收买办法也同样破产了。

第七章

反社会党人法的垂死挣扎

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三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时期，同第二个时期⁶³¹一样延续了四年半，而且也分为三个阶段，只是每个阶段的时间并不相等。从1886年春天到1888年春天是非常法垂死挣扎的时期，在这段时期里，被无产阶级的有力的手抓住了腰带的怪物又蠢动了一次；从1888年秋天到1890年秋天是它最后崩溃时期，随着它的崩溃，俾斯麦的整个体系也就瓦解了；这中间德国皇位更替，弗里德里希皇帝在位九十九天。

反社会党人法垂死挣扎的情况同一般的垂死挣扎没有什么不同。《国民报》用自己的方式在1886年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反社会党人法的执行方面没有什么原则，但是政府的个别措施表明，它对选择手段是漠不关心的，在大动荡的前夕，现存制度的代表人物常常表现出这种漠不关心。这家民族自由党的报纸特别谈到俾斯麦力图利用司法界来做警察所作不到的事。毫无疑问，从资产阶级立场看来，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而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头几年，官方裁判的比較慎重的态度又对它倾泻了格陵兰的阳光以后，那就更不容易办到了；倍倍尔有一次说，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可是司法同警察毕竟还不是一个东西。现在重新向最广泛的人民群众说明阶级司法的本质，肯定就是由于最不可靠的利益，动摇根据

一句名言而来的阶级统治的最坚强支柱。但是，在警察暴力和警察的收买行为都不可挽救地失败以后，绝望的制度体现者还有什么办法呢？

632 倘若說在第三次延长反社会党人法有效期以后接踵而至的盲目的暴力打击还有其内在意义，那么后来俾斯麦就揭露了这种意义，他說，在他看来，社会党人問題只不过还是一个“軍事”問題。这正是《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看法，它在1886年春天一再說，残酷迫害的新风暴将引起无产阶级起义，以使用大量放血的办法使中了风的制度还能苟延残喘一个时期。

一 反罢工令和秘密結社案

4月11日，普特卡默的反罢工令頒布了，一个月以后規定，在柏林举行公共集会須經警察当局批准，再过了一些时候，又禁止在柏林和阿尔托那公开散发印刷品；这样一来，第二十八条的所有四項全权在帝国首都变得活跃起来了。在所有戒严地区，驅逐出境的活动得到新的高涨；在馬尔克地方的小城施普雷姆堡也实行了小戒严，因为应征入伍的新兵用唱工人馬賽曲来回答一个警察走狗的粗暴行为。

最能說明官方“社会改革”的特色的，莫过于对工会运动的第一次暴力冲击了。反罢工令本身没有什么新鮮东西；这个命令只是促使警察机关注意，在暂时容忍同业联合会以后，現在又开始压制它們了，在頒布反社会党人法以后立即得到遵守的实际方針必須恢复起来。伪善地要求尊重工人的联合自由，这同俾斯麦和欧伦堡在討論非常法时答应尊重工人的联合自由时的伪善保证，是同一种貨色。反罢工令立即得到肆无忌惮的实现。为了破坏建筑业工

人的春季运动，柏林瓦工的領袖們被驅逐出境，虽然他們同工人政党沒有絲毫关系。瓦工联合会和建筑业工人出版委员会被解散了。三个女工联合会和所有工人地方联合会（警探伊林—馬洛夫就是在一个地方联合会里被揭发出来的）也遭到同样的命运。5月，在柏林有四十七次集会沒有获得批准，其中有三十三次是工会集会；瓦工和木工成年不能开会。柏林是这样，凡有工会运动的地方也都是这样。

资产阶级看到警察的这种暴行，掩盖不住內心的滿意。只有个别有見識的大工业家表示反对；相反地行会师傅对于迫害工会感到十分高兴，尽管一个建筑业行会会长的代表团曾向普特卡默毫不含糊地为反罢工令递交了請願书。当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由于这个命令而在帝国議會中提出質問时，只有它的发言人讲话，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资产阶级反对派方面，班貝尔格尔“希望”这个命令不致扼杀联合自由，而只要反社会党人法存在，文特霍尔斯特就认为这个命令不是违法的。这一来，普特卡默更为得势，他誹謗那些靠工人的汗水“养肥”自己、“用口腔追求工人們辛辛苦苦挣来的几文儲金”的鼓动家，然后他宣称，在每次罢工的后面，都有革命这条九头怪物在窺视。这句名言并不像表面上看来那样愚蠢，因为罢工的确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小学校，但是，普特卡默当然不是从历史心理学观点这样說的，而是从低級警察观点和资产者剝削观点这样說的。他认为联合权的成果是“极为可怜的”，他把这种权利的价值称作“十分可疑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对这一切都一言不发，甚至《法兰克福报》也說，警察国家一天比一天得到发展，帝国議會應該負很大一部分責任。

事实上，警察国家的确得到了发展。因为根据过去的經驗，只用反社会党人法不能制馭工会运动，所以还必須用种种司法手段

来扼杀它。首先，营业法規所包含的反对罢工时的越軌行为的弹性条文被尽可能地加以扩大；根据这个条文作出的判决，1886年不下一百七十九起，而1882年只有五起。在这个条文不能再扩大的場合，就用刑法典中关于严重暴行、关于强迫、关于要挟的条文⁶³⁴来作补充；帝国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是这些行为的頂点，这个法院认为教唆不遵守解約預告期限而停止工作，应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条，即教唆“不服从法律或合法規章”罪处理，即使未遂，也可判二年以下监禁，而根据一百一十一条，教唆违法行为未遂只判一年以下监禁。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煽动别人同企业主解約的工人被判二年监禁，而教唆杀人和搶劫的罪犯才判一年以下的监禁！此外，人們还企图把工会当作所謂的保险机构（根据一条刑法条文，需要經過国家机关批准）置于警察监督之下。尤其必須忍受德国大多数結社法都有的、禁止政治团体彼此联系的規定。由于法院宣布法律上的工人保护問題是“政治”問題，工会的“政治”性质就被简单地制造出来。例如阿尔托那的一个木工联合会为依法調整劳动時間問題向帝国議會請願，从提出同样請願书的汉堡的一个木工联合会那里拿了几张写請願书的紙，后来警察就以通过拿写請願书的紙同另一个“政治”团体“发生联系”这个美妙的理由而封閉了阿尔托那的木工联合会。国家檢察官建議判該会理事每人四星期监禁，虽然地方法院只判了每人三十馬克的罰金，但是它也证实警察的結論是正确的，最后一級的帝国最高法院也是这样做的。

以上所述虽然沒有說明对工会运动的所有迫害的特点，但已經說明了一些特別出色的迫害行动的特点。尽管如此，还没有能够消灭工会运动，这应该归功于工人的值得敬佩的毅力和坚韧性。他們确实不比英国工会逊色，英国工会从来没有必要同这种在文

明国家从未有过的障碍进行斗争。当然对工会运动的狡猾迫害也起了有力推动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向前发展的作用；阶级国家的官厅处理问题显然是不公平的，同样的事情，它们准许企业主联合会做，而工人联合会做了，它们就要追究；企业主最严重地违反联合法和结社法，它们故意不管，而工人的甚至最谨慎小心的举动总会受到新的迫害。这种行为播下了不和的种子，由这些种子里产生出反抗的人。

同对付工人阶级的经济组织一样，司法也协助消灭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半官方报纸用极为明显的威胁口吻来回答第一审对日薪案的宣告无罪的判决；然后它十分满意地报道了第二审宣告有罪的判决。帝国最高法院也取消了开姆尼茨秘密结社案宣告无罪的判决，并指示该案由弗赖贝格地方法院重新审理，事先帝国最高法院对结社的定义作了这样的解释，以致蒙克尔律师可以在弗赖贝格的法官面前说，幸亏帝国最高法院解释，“结社”必须同“公共事务”有关，否则每个家庭都有被认为是刑法典上所說的结社而受处罚的危险。

1886年8月4日，弗赖贝格地方法院根据刑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判处奥艾尔、倍倍尔、佛罗默、乌尔利希、菲勒克和福尔马尔各九个月监禁，迪茨、海因采尔和弥勒各六个月监禁。这条法律规定，参加一种结社，其目的和活动系利用非法手段阻碍行政管理措施或法律之执行者，处一年以下的监禁。因为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情况的报告，一致同意了报纸的总的立场，所以据说被判刑的这些人通过一种“可以推定的行为”，参加了违禁的结社，这种团体的存在虽然没有得到证明，但是法院假定它是存在的。

弗赖贝格的判决引起了工人运动各大中心的许多秘密结社

案。这些案件本身同反罢工令一样沒有引起人們新鮮的感觉。在弗賴貝克判決以前，也就是在八年左右的時間內秘密結社案件共有二十四起，其中六起宣告無罪，十起以停止審理而結束，而有八起（1880年在法蘭克福、1882年在慕尼黑和波森，1883年在施泰廷、1884年在布勒斯勞、1886年在慕尼黑、阿爾托那、奧格斯堡）宣告被告有罪。但從1886年8月初到1889年1月底，也就是在兩年半的時間內，就有秘密結社案五十五起，其中只有十起停止審理，八起宣告無罪，而有三十三起共二百三十六人以被判刑而告終，剩下的四起還是懸案。在這四個案子中，為首的是愛北斐特秘密結社案。這個案子經過長時間策劃以後，1889年年底，把八十七個人送上被告席。它的目的是要證明除了一個地方性的秘密團體以外，還有一個全德國的秘密團體，其最高領導就是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然後準備對議會黨團的全體成員發動一個秘密結社審判，作為整個戰役的頂峰。但是在愛北斐特案件中遭到可恥潰敗的不是黨，而是秘密結社案的體系。如果說所有這些案件所揭露的，無非是一種該死的特務制度把正直的工人送上了法庭，以使用巧妙地琢磨出來的對刑法典的解釋，為任何其他階級都可以隨便做的事情處罰這些工人，那麼愛北斐特的案件就揭露了這樣惡劣的狀況，以致溫和的自由派機關報也戰栗地喊叫：够丑的了！秘密結社案時期主要是由於這種道義上的反抗而衰落下去的，而不是由於愛北斐特地方法院的法律判決——雖然“嫌疑重大”，但是沒有證實德國有一個由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領導的總聯合——而衰落下去的。雖然如此，只有四十三名被告被宣告無罪，而四十四人因參加所謂地方秘密結社共被判十多年監禁。

除去秘密結社案而外，自從反社會黨人法頒布後常見的其他案件也增多了。1886年9月，一群朋友為被逐出萊比錫的舒曼同

志送行，有一根手杖上系着一块红布，四个便衣警察就冲进队伍要抢这块布。这几个既没有证明自己的身分也没有说自己是警察的捕吏，有两个被打倒在地，然而他们的宝贵的健康并没有受到影响。可是舒曼和他的朋友们却必须为所谓暴动负责，他们十一个人共被判十年半苦役和十二年半监禁。几个月以后，舒曼死在苦役牢里，被判刑者中有一个人成了疯子。曼托伊费尔在普鲁士反动时期所发明的、用长期的待审拘留虐待那些没有证据或证据很少的被告的老办法，得到了新的发展，而且不仅在普鲁士是这样。在汉堡的三件案子中，被告的待审拘留时间竟达十五年之久，后来有的被宣判无罪，有的被判徒刑，而刑期总共还不到六年。

反社会民主党人法这个怪物就这样抽搐着作垂死挣扎，而德国工人永远知道，阶级司法是怎么回事。

二 封斋节选举

这时俾斯麦必须决定，应该怎样对待帝国议会这只榨去汁水的柠檬。撇开其他所有问题不谈，皇位的更迭已经迫在眉睫。皇帝每天都有死的可能，如果皇太子执政，俾斯麦就必须有一个顺从的帝国议会多数派。

因为帝国议会在保护关税和反社会党人法问题上表现得服服贴贴，而用烧酒专卖不能进行竞选宣传，殖民政策也由于种种“责难”已经变得不体面了，所以俾斯麦只有一个手段欺骗选民群众，这个手段曾经帮助他达到第一次有效的“全民投票”的目的，这就是军事恐怖。1886年11月，即比实际需要早一年，他就要求延长1888年春天才到期的七年军事预算，同时要求把和平时期的兵员

增加到四万一千一百四十五人，軍事預算增加到二千三百万馬克。这个手段对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資產階級反对派很难避开它，因为无论是自由思想党人还是教皇全权主义者都被釘牢在七年軍事預算問題上。

可是，資產階級反对派害怕斗争，并立即退却。1887年1月，二讀开始时，它不仅贊成每一个人、每一文錢，而且还放弃了每年批准預算的原則，它只是沒有同意七年而只同意三年的新軍事預算。由于理所当然地担心到三讀时仍然可能产生这种反抗，因此
638 俾斯麦在对决定贊成三年軍事預算反对七年軍事預算的二讀进行了第一次表决以后立即解散了帝国議會，并定于封斋节——2月21日举行新的选举。

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当然不像資產階級反对派那样懦弱，它連“一个人、一文錢”也不同意。它像反对整个軍事預算那样，反对七年法案。可是，如果俾斯麦和資產階級反对派之間、政府和帝国議會之間发生爭執，它就支持資產階級反对派，使資產階級反对派得到多数，它坚持原則性立場，认为可以批准軍事預算的，是帝国議會不是政府。当斗争被挑起以后，它就起而应战，比資產階級反对派自己还要頑强地維護后者的权利。自由思想党人同平常一样扮演受迫害的无罪羔羊的角色，虽然他們举双手贊成俾斯麦的其他一切主张，但是狠心的俾斯麦甚至不肯答应把七年改为三年。教皇全权主义者只是由于党派策略方面的考虑，才維護資產階級議會政治的权利。不过他們的态度比自由思想党人强硬一些。当俾斯麦失去自制，做他在文化斗争中多次断定为国耻的事情的时候，当他要求教皇帮助他反对中央党，从而委任一个外国的最高掌权者做德国内部事务的仲裁人的时候，文特霍尔斯特甚至对接受了这个可悲的差事的教皇表示敌意。教皇全权主义者的領袖对于

现代议会制度没有任何偏爱。他把阿伦貝克—梅彭公爵領地^①的封建制度当作自己的政治理想。作为汉諾威的前任司法大臣，他有举行政变的丰富經驗。但是他也考虑到，像中央党这样一个天生的少数党不能让帝国议会的权利完全丧失掉，加之教皇全权主义者在积极参加俾斯麦的自私自利的经济政策以后，迫切需要装作“争取真理、自由和权利”的先锋战士，在天主教选民群众中加强威信。

另一方面，两个保守党同民族自由党组成了聚集在自己的旗手俾斯麦周围的卡特尔。这个卡特尔就是十年前开辟了反动时期的大地主和大工业家的联盟，其差别是，民族自由党大工业家及其不稳定的转盘政策完全屈服于保守党大地主。《十字报》发出了成立卡特尔的信号，俾斯麦用下面几句话非常正确地翻译了这个外来语，他说：东部的封建容克地主开进了帝国要塞，西部的自由派市民为此大吹喇叭。 639

由于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软弱，选举斗争一开始就不顺利。用“三年或是七年”这个浅薄的、不合原则的、不彻底的口号，很难动员广大选民群众。俾斯麦找到了一张吸引力大得多的王牌，即“战争还是和平”这个竞选口号。当整个警察机器为了破坏反对党的竞选宣传而开动起来的时候，整个官方和半官方出版机器就致力于把谎话一直散布到帝国最偏僻的茅舍里去，说如果反对党得胜，紧接着法国就要向现在裁减了军备的德国宣战。政府报纸发布了关于法国采购战马和准备战争、关于法国制造麦林尼特炸弹和纯三硝基酚炸药的假消息；为了给这种欺瞒以适当的强调，政府发布了禁止从德国输出马匹的命令。在2月这个很不平常的时期，许

^① 普鲁士奥斯纳布吕克行政区的一个小公国，有二千多平方公里土地，六万多人口。——译者

多預备队和后备軍被召集起来，用一种新枪进行练习。卡特尔的成員的表現沒有使他們的英雄丢人。他們散发了大量的地图，企图用捏造的文字和数字证明，法軍在德国边境集結，而沒有同样强大的德軍同法軍对抗。他們还散发了最刺目的年市风格的画片，上面画的是，法国兵虐待德国妇女，赶走牲畜，焚烧村庄的情形。《社会民主党人报》写道：“这不是选举，这是一种围猎，一种袭击，一种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压迫，一种最坏的拿破侖式的全民投票——只是更粗暴、更伪善、更有欺騙性，由于我們的容克階級的教育水平較低，就必然形成这种情况。小拿破侖不会做得这样拙劣和粗暴——法国人的平均文化水平不幸比我們高，所以就給小拿破侖規定了絕对的限制。”但是，卡特尔的爱国者正是对这种法国文化进行投机。假如他們不是正确地估計到法国資產階級的沙文主义者比他們自己要規矩和慎重十倍，那么从这次选举煽动中就会产生德法战争。

尽管俾斯麦时常談到訴諸恐怖在德国人心里决不会得到反应，談到德国人只怕上帝而不怕世上任何东西，但是他明白，他的专制統治的根子归根到底是德国庸人的盲从和胆怯，而他向这些乐于助人的保护者祈禱并不是徒劳无功的。由于害怕最后一条母牛可能被法国殖民軍搶走，他把最后几条公牛从家里赶出去；2月21日总投票数比过去任何一次帝国議會选举都多一百五十万票以上，封斋节的选举产生了一个卡特尔多数派。

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假定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可能想到这种行徑）当然嫌恶这种胜利。被盲目的恐怖赶到投票箱旁边去的政治上不成熟的选民群众是在风里摇摆的芦苇，甚至他們也沒有保证政府得到多数票。投票贊成卡特尔的是三百五十万票，反对它的是四百万票。假如議席的分配是按票数的正确比例进行的，那么

不管怎么样卡特尔在帝国議會中只是少数派。尽管皇帝和教皇反对，教皇全权主义者候选人比1884年多得了将近二十五万票，自由思想党人比1884年甚至至少得了两万多票。

可是，以充分的严格的原则性进行这一斗争的唯一反对党——社会民主党首先取得了重大胜利。它的候选人共得七十六万三千一百二十八票，占总票数的百分之十点一，比1884年多得二十一万三千零三十八票。在普鲁士各省，几乎在所有中小邦，运动都蓬勃发展，甚至在关于战争的謠言起作用最大的德国南部和西南部地方也是这样。只有在黑森和亚尔萨斯—洛林（在全德国只有这两个地区）社会民主党的票数没有增加，反而稍有减少。虽然如此，党必须承担最沉重的竞选负担，它必须像在1878年和1881年那样的情形下战斗。在战斗前夕，平白无故地在法兰克福及其周围地区实行了小戒严，其真正的目的是要控制前几次选举 641
中在反社会党人法压迫下表现得非常勇敢的美因部；为了一开始就散布必要的恐怖气氛，根据俾斯麦所吹嘘的“实际的基督教”的精神，第一批驱逐令在圣诞节前送到它们的牺牲者（其中有四个是有家眷的）手中。在选举斗争期间，虽经黑森政府长时间的反抗，小戒严还是扩大到奥芬巴赫，与此同时，施泰廷也实行了小戒严。施泰廷工人举行的一次选举集会被无缘无故地解散了，然后便衣警探在会场外面挑起了一场小骚动。武装力量的一次“果断的”刺刀攻击拯救了波美拉尼亚的首府，许多工人受了轻伤或重伤，一人死亡，然后驱逐令像雨点似的降落下来。可是新戒严区表现得不比老戒严区逊色；社会民主党选票的急剧增加，就是他们对压迫者的回答。柏林九万三千票，汉堡—阿尔托那六万五千票，莱比锡市区和郊区三万票，法兰克福九千票，奥芬巴赫七千票，施泰廷四千票，柯特布斯—施普雷姆堡四千票。社会民主党所得选票

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来自上述戒严区。在帝国的二十三个純城市选区中，党所得票数占它得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在这些次选举中，由于三个柏林工人即鑄銅器工人瑞恩、鉗工亨塞尔、鑄模工拉赫曼的牺牲，令人深为感动地体现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牺牲精神。他们三个人是夜间开过受托人会议后回家时，在斯潘道运河冰上行走，因冰破而跌落水中淹死的。

按照选票数，党本可得到四十个议席，可是事实上只得了十一个议席，而在1886年的一次补选中盖尔在施托貝克—施內貝克选区获胜以后，党在上届帝国议会中有二十五个议席。在封斋节选举中，除了在德累斯頓旧城参加过一次复选而外，所有薩克森选区一开始就丧失了。薩克森的热狂的秩序维护者所做的工作几乎比他们在1881年所做的还多，虽然所取得的成就要小得多。他们把一大批懶散的庸人拖到投票箱旁，但是并没有动摇1884年以来在全薩克森增加了两万人左右的社会民主党的队伍。在主要选举中党得了六席：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津格尔和哈森克莱維尔）、汉堡第一区和第二区（倍倍尔和迪茨）、阿尔托那（弗罗默）和紐伦堡（格里林伯格）。党必须参加十八次复选，除去在德累斯頓旧城外，还在柏林第三区、布勒斯劳第一区和第二区、科尼斯堡、柯特布斯—施普雷姆堡、馬格德堡、汉諾威、哥达、罗伊斯长系、汉堡第三区、卢卑克、基尔、格吕克施塔特、爱北斐特—巴門、佐林根、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和慕尼黑第二区参加了复选。

这次的复选具有特殊意义。如果说选区几何学保证了卡特尔的胜利，那么反对党在复选中的紧密团结就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损失，卡特尔多数派虽然没有完全被阻止，但是被限制在这样少的票数之内，使它成为不稳的和不可靠的。社会民主党中央选举委员会——格里林伯格、哈森克莱維尔、李卜克内西、迈斯特

尔和津格尔早在2月23日就要求社会民主党选举人，在复选中投那些确实对普选权和非常法表示了自己态度的资产阶级反对派候选人的票。教皇全权主义者也发出了复选口号：反对混杂！由于教皇全权主义者、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帮助，自由思想党挽救了不少议席，以致它还能以三十二人之众参加卡特尔帝国议会。可是这些不屈不挠的人们自己表现得同过去一样不可靠；把最卑贱的党的专制制度带到自由思想党内来的欧根·李希特尔不可能提出荣誉和理性所要求的复选口号；他可能害怕，这样就会损伤他这个失败选举的最可靠的组织者的声誉。在自由思想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竞选的柏林第三区和基尔，自由思想党人用最可怜的方式乞求卡特尔兄弟的援助；而在卡特尔同社会民主党人对垒的地方，他们公开背叛自己的事业转向卡特尔一边，在汉堡第三区、格吕克施塔特、卢卑克、马格德堡和科尼斯堡表现得最不像话。自由思想党人就这样送给俾斯麦大约十个选区，使得卡特尔多数派成为牢不可破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复选中仅仅在布勒斯劳第二区（克雷克尔）、爱北斐特—巴门（哈尔姆）、佐林根（舒马赫）、汉诺威（迈斯特尔）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萨博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俾斯麦又有了三年可以自由活动的時間，他像堂·菲力浦那样充分利用这个夜晚。卡特尔不仅一下子就同意他的七年预算提案，而且还同意他每年增加烧酒税一亿多馬克、食糖税約四千万馬克，此外还从納稅人口袋里为烧酒酿造者每年掏出四千万馬克，为制糖厂每年掏出三千万馬克的慰劳金。卡特尔把这次选举的盲目恐惧称作“国民精神的道德上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确达到了这样的地步：群众的掠夺者并非所想像的穿紅褲子的^①魔怪。

① 十九世紀的法国兵穿紅色軍褲。——譯者

三 圣加侖代表大会

有了一种光明正大的、坚定的政策，一切事情往往都能順利进展，因此社会民主党无须为自己議席减少而惋惜。在卡特尔帝国議會中，它可以因为有了——一个利用适当时机在人民面前揭露反人民阴谋的坚强哨所而感到十分滿意。关于参加議會事务的程度的爭論現在已經停止，因此党可以更紧张地集中力量抵抗俾斯麦制度的新攻击，并主动采取攻势。

只要秘密結社案的目的是破坏党机关报和党代表大会，这些案件就像其他所有案件一样，是徒劳无功的。在帝国最高法院批准了弗賴貝克的判決以后，議會党团就取消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正式机关报的性质，这样絲毫也不削弱該报的影响，它的讀者一个也沒有减少。1887年9月，議會党团同党内从前的帝国議會議員和党在邦議會中的議會代表共同发表了一个要求派代表参加每个同志都被邀請的一次代表大会的号召。当然，为了阻止伊林——馬洛夫之流参加，关于某些人能不能参加大会的問題，由代表大会决定。号召通知了議事日程并且明确指出，計劃中的討論并不违反德国的普通法。只是非常法的执行迫使人們采取特殊措施；因此地点和時間暂时不能公布。

这样就避开了弗賴貝克判決的所有圈套，俾斯麦——普特卡默的政策又一次陷入困境。甚至资产階級集团对他們的雇佣文人都非常鄙視，因为这些文人提出了这样的問題：既然代表大会討論的問題不违背普通法，那么代表大会为什么不在德国召开呢？倍倍尔給了他們一記响亮的耳光：“假如我們在我党的内部事务方面要依靠‘外来的恩惠’的話，那么我們宁可依靠一个外国政府的‘恩

惠’，也不依靠德国警察的恩惠。御用报纸和它们的操纵者可以记下这一点。”当然笨拙的德国警察这次也像过去一样，没有预先发现召开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时间。

10月2日至6日，代表大会在距圣加侖半小时路程的布鲁根附近的许伦威根啤酒厂里举行。参加大会的共有七十九人，其中七十四人是从德国来的。议会党团的总结报告指出，自从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以来，党的金库收入十三万五千七百四十八马克，此外还收到外国同志、尤其是美国同志和瑞士同志的五万二千九百零七马克，地方上的开支没有计算在内，可以估计地方上的开支比上述数字还要大好几倍。党像过去一样不屈不挠地反对它的迫害者；党代表大会的第一个决议就严厉谴责党员由于审讯和徒刑的威胁而逃走的行为。盖泽尔和菲勒克受到了同样严厉的不信任投票，因为他们由于不充分的理由，拒绝在召开代表大会的号召上签名。关于党的议会活动、关于党对政府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态度，也同维登和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一样作出了决议；只是对两个资产阶级候选人竞选的态度，代表大会根据封斋节选举的经验，建议绝对弃权。《柏林人民报》评论会议时说：如果说过去党内有一个“右翼”的话，那么现在已经没有了。

可是，党的无穷力量的最确当的证据在于，它在一切困难之中，着手领导国际工人运动。自从七十年代的大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害在所有文明国家都激烈增长，各个阶级的日子都变得很不好过，以致对于社会改革的必要性的一种强烈意识开始远远超过工人的范围而发生作用。日益明显的是，普遍实行保护关税不是减少而是增加那些祸害，卡特尔、康采恩和八十年代为了调节生产而组成的其他企业联合，事实上加强了压迫消费者和无产者的资本主义力量。在资本主义剥削面前，根据法律保护工

人阶级，是一种彻底得多的补救办法。这时也产生了种种幻想和许多虚伪言行，可是，在所有工业发达的国家，一股强有力的潮流正朝这个方向发展，这股潮流形成了一种国际性的转变，这是出于理所当然的原因，同时也因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先鋒战士（尤其是俾斯麦）经常谈到竞争国家的国际竞争和种种社会立法，虽然不是为了促进国际性的工厂立法，但却是为了阻碍本国的工厂立法。

1881年，瑞士首先倡议在这方面举行国际谈判，但是没有任何成果。此后到处都更加感到这种需要；关于这一点的最确实的证据也许就是，甚至德国的卡特尔帝国议会也在第一次会议中就要求修订德国工厂法。它遭到了俾斯麦的坚决反对，所有国家的法律上的工人保护也都碰到强有力的反对者。随着这种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就是很不可靠的人物也掌握这种思想，其中甚至包括像欧根·李希特尔和他的热狂的自由贸易派一伙这样的资本主义斗士。当他们完全肯定俾斯麦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让步的时候，就显得很想进行“社会改革的”蛊惑活动，这种经验就根本不用谈了。国际工人阶级把这个問題提到它的充分的高度，挫败顽固的敌人和半朋友或假朋友的把戏的日子更接近了。

这时候，国际工人阶级只要继承老国际的传统就行了，在老国际的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经常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国际一方面由于无政府主义，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工会的背叛而没落的话，那么现在在更高的基础上恢复国际的时机成熟了。无政府主义者646 到处遭到失败。像在德国和瑞士那样，在奥地利、法国、比利时、英国，无政府主义者里面也混杂着一些恶毒的内奸；1887年，正直的、大公无私的无政府主义者内弗被奸细特劳特纳尔、波伊克特和罗伊斯用卑劣的手段交给了德国警察，被帝国最高法院秘密判处十五年苦役。只有在美国，无政府主义发展成为一定的力量，但只

是因为它控制了一个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急剧增长的运动，其结果是使这个很有希望的运动长期陷于混乱状态。无政府主义报纸宣扬的暴力政策，使美国资本家能够进行在芝加哥干草市场上扔炸弹和卑鄙的司法滑稽剧的阴谋活动。八个无政府主义领袖中一个被判长期苦役，七个被处死刑。这些人在炸弹案中是无罪的，就像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诺比林的霰弹射击中完全无罪一样，可是由于他们的错误策略，美国工人运动被卷入德国工人运动由于它的正确策略已经胜利度过了的人为地挑起的憎恨和愤怒的大旋风之中。

另一方面，当英国国际市场垄断日益被德国、法国、尤其是美国的竞争所打破的时候，英国工会从偏狭的拘谨态度中惊醒过来。因此它失去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的地位，被粗暴地推回到国际无产阶级团结方面来。从八十年代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中可以一步一步地追索到这一点。比利时工人倡议召开的世界大会（德国党在維登曾决议派代表参加这个大会），1881年在庫尔举行，可是同四年前的根特世界大会一样没有显著成果。1883年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际工人会议几乎更没有收获；它最多只是通过毫无内容的决议而给了资产阶级一个唱起“社会主义道义上的失败”的廉价凯歌的好机会。这次会议完全由英国工会控制，除了它以外，几乎只有可能派^①有代表参加；这个法国工人党派的领袖保·布鲁斯甚至阻止邀请德国工人参加会议。而1886年也是在巴黎举行 647
的一次国际工人会议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各国工人党都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德国社会民主党由居住在巴黎的格里姆佩同志作代表，而腊科夫以伦敦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代表的身分出席会议。除去

^① 可能派——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法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原编者

德国、英国和法国以外，奥地利、匈牙利、比利时、瑞典、挪威和澳大利亚也派了自己的代表。格里姆佩对英国工会的政策进行了也许不很客气但却很巧妙的攻击，腊科夫给他有力的支持，于是引起了两天的热烈争论。在这次争论中，英国工会的七个代表表现了十分动摇的态度；他们终于没有赞同会议关于推动各国政府在八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制定国际工厂法的决议（否则这个决议就被一致通过了），表面理由是他们没有全权，他们声明在倾向上是同意这个决议的。一年以后，英国工会斯温西代表大会主动决定召开一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当然只限于工会而且还附有许可条件，这些条件使德国和奥地利这样一些有警察非常法的国家不能充分派出代表。

这时举行了圣加侖代表大会。它作了一个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决议，其重点在于毫不留情地谴责无政府主义策略；决议中说，在各国人民的历史上，可以说暴力是反动因素的时候甚至比它是革命因素的时候多，个人运用暴力不能达到目的，它反而是有害的、遭到唾弃的，因为这样做会伤害群众的法律感情。“我们要迫害者和驱逐者对被迫害者和被驱逐者个人的暴力行为（甚至极端的暴力行为）负责；我们把这种暴力行为的倾向理解为任何时代在类似情况下都会发生的现象，而现在拿报酬的密探为了反动目的利用这种现象反对工人阶级。”最后这句话使代表大会不致蒙受这样的嫌疑，以为它也具有资产阶级的恐惧心理；一个月以后，在芝加哥被判罪的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将要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倍倍尔、格里林伯格、李卜克内西和津格尔用德国工人的名义，打电报给伊利诺州州长，请求主持人道，而不顾普特卡默及其一伙恶毒地利用这个行动。大家知道，被判刑者之中只有两个人被改判为终身苦役，有一个人在被处死刑前自杀了，其余四个人则坚决而勇敢地死在绞

架上。后来，官方也承认他们是无罪的。

圣加侖代表大会把反对在英国工会中仍然经常出现的狭隘精神同反对无政府主义策略结合起来。代表大会委托党领导联合其他国家的工人团体，于1888年秋天召开一个普遍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目的是促使各国工人为实现国际工人保护法采取共同步骤，从而给现代无产阶级的国际性阶级斗争开辟一条新的道路。

四 驅逐令

1887年11月，当卡特尔帝国议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时，俾斯麦除了提出新的更高的军事要求外，还编了一条三尾鞭把选民打得皮开肉绽，使他们在封斋节那天任人宰割；面包税由三马克增加到五马克，立法时期由三年延长到五年，最后把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延长五年，并残暴地加重了某些条款。俾斯麦由于自己的反动的局限性现在已经到了连卡特尔帝国议会也不能控制的地步。只有在延长立法时期方面（这是对普选权的第一次攻击），卡特尔多数派乐意跟着他走；大多数民族自由党人为了工业的利益反对提高面包税，只是由于教皇全权主义者的援助，这个掠夺群众的新手段才能实现，相反地，无论是民族自由党人还是教皇全权主义者都不赞成对社会民主党的驱逐令，于是俾斯麦就骑虎难下了。

这个法令把对散布违禁印刷品的处罚最多提高了一倍，即由六个月提高到一年，为了社会民主党的目的进行的“业务性的”鼓 649
动将处二年以上徒刑。因为什么是“业务性的”，什么不是“业务性的”，完全由法官随意决定，所以利用这条弹性条文就可以把任何不受欢迎的社会民主党人先在监狱里关几年，然后再驱逐出境。因为对根据这项条文判罪的人和所有因秘密结社活动而被判罪的

人可以采取取消国籍的手段。对所有在国外参加促进社会民主党活动的会议的人也是这样。此外，对这种新制造出来的罪行，还可以处以徒刑。

这个提案干脆就是宣告反社会党人法破产。它企图用俄国皮鞭达到德国警察棍所没有达到的目的。根据反社会党人法第二十二條，可以限制专业鼓动員的逗留期限，这个可耻的武器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克里斯滕森因为犯了揭露奸細伊林—馬洛夫的“罪行”，像一只被追猎的野兽似的在德国东奔西跑。凱泽尔因为犯了在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中站在最右翼的罪过，建筑师克斯勒尔犯了参加建筑工匠的工会組織（根本没有参加政治鼓动）的罪行也都受到同样的迫害。可是这种迫害和驅逐活动在戒严区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更加有力地扩大了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制定驅逐令的理由本身承认，驅逐活动往往把鼓动扩大到在那以前还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接触到鼓动的地区。于是俾斯麦和普特卡默企图利用把所有有嫌疑的人立即逐出德国的办法，来挽救他們的政治家的智慧所造成的这种自杀后果。此外，驅逐令还把它最毒的鋒芒针对《社会民主党人报》，虽然这时帝国最高法院还惊人地发现，訂閱、甚至接收和保存几份《社会民主党人报》，就要被当作帮助散布或策划散布而受到懲罰，但是該报仍然发行一万份以上，而且每周非常准时地散布到全德国各地；这家受威胁的报纸諷刺說：“一切猛禽中最凶暴的猛禽自认无能同欧鳴^①进行斗争，欧鳴的无所畏惧的歌声使它十分恼火。”甚至保守党集团中也有人感到这个提案給德国的名誉带来耻辱。

普特卡默本人对胜利当然是很有把握的。自从封斋节选举以

① 一种鳴声优美的小鳥。——譯者

来，他对一种新的滑稽姿态，对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家的沉默的受难者的角色深感兴趣，这个思想家带着轻微的失望，但却有令人感动的耐心，容忍愚蠢的人民误解他的聪明的意图。每当社会民主党議員就反社会党人法的执行情况发言时，他就倚着身子懒洋洋地看着自己的漆皮靴，或者摸摸自己飘动的颊鬚，一句話也不說，就好像他那神的才智懶得同人的愚蠢較量似的。因此他也认为討論驅逐令是不必要的；他让社会民主党人占了先，这些社会民主党人立即把他从沉思地欣賞自己的漆皮靴的状态中惊醒，使他进入了作为救国者的最后的角色之中，这是瓷器店里的公牛的角色，正因为是最后一个角色，所以他不是装腔作势而是演得十分逼真。

社会民主党按照自己的好习惯采用了以毒攻毒的办法；它广泛揭露了俾斯麦—普特卡默政府不仅毒害了全德国，而且毒害了半个欧洲的收买活动和密探活动。《社会民主党人报》在1887年5月就揭露了把正直的内弗交给德国警察的可耻行径；这年年底，该报揭发出来的警探不下一打之多；在伦敦是作家薩克斯和破产的歌手罗伊斯，在巴黎是作家特劳特納尔、語言教师农納和作家奧貝文德尔（他曾是拉薩尔的最初的拥护者之一，后来时常参加奥地利工人运动），在苏黎世是木工施勒德尔和白啤酒店店主亨利希，在日内瓦是鑄工豪普特，在馬格德堡是作家施文哈根，在阿尔托那是染工維希曼，在汉堡是木工諾伊曼，在萊比錫是书商内貝尔。其中少数人，如奧貝文德尔可能满足于現代科采布之流的角色，而大多数人，如罗伊斯和維希曼，施勒德尔和豪普特都是最恶劣的进行爆炸和挑撥的特务分子。苏黎世黨員的巧妙而迅速的干涉，促使施勒德尔和豪普特供出許多情况；法院对被揭发的奸細进行的偵查，充分证实他們有罪，苏黎世警察长兼預审法官費舍受倍倍尔和津格尔的委托正式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伯尔尼的联邦委員

会把曾任巴登參謀將校的埃林堡从瑞士驅逐出境，多年以来埃林堡力图把社会民主党卷入叛国活动，結果沒有得逞。到那时为止，埃林堡被看作是一个沒有头脑的冒险家；被驅逐出瑞士以后，他就到了对他进行叛国罪偵查的卡尔斯魯厄軍事法庭，虽然他有很大嫌疑，但是軍事法庭沒有逮捕他；后来，当陷害社会民主党的瘋狂企图遭到失敗，偵查对他和他的保护人越来越不利的时候，他就順利地逃到国外去了。

倍倍尔和津格尔在帝国議會所作的对于进行挑撥的密探活动的揭发，粉碎了驅逐令。普特卡默的憤怒姿态使被揭露出来的丑行达到頂点。他好像神經錯乱地說：豪普特和施勒德尔当然不是什么高尚人士，可是沒有这些国家柱石，一个文明国家的政治安全一天也不能維持。普特卡默咒罵扯下密探的假面具的正直人士是“一伙无賴”，罵警察长費舍是“不值得信任的家伙”；他用一种外交行动威胁瑞士，为的是使瑞士想起它对邻近大国的义务。在昏迷状态中，他还有清醒的一刻，因为他老老实实承认，像瑞士那样的文明状态是不可想像的。毫無疑問，对封建野蛮的观念感到高兴，对現代文明毫无所知，这是普特卡默和俾斯麦的历史的不幸。可惜普特卡默又用捏造事实消除了这种減輕情节的調和作用，他說，社会民主党派出特务分子对他进行了突然襲击；不管他多么滿意地注視着他的收买活动的发展，他从来也沒有能够收买工人階級。他終於拿出全付力量，庄严宣誓，如果他在懲惡犯罪这个問題上不是問心无愧的話，他一定会慚愧得无地自容，这时整个会场都报之以冰冷的沉默；只有几个极右派的地方长官十分費劲地进出一个“很对！”。一种可悲的政策已經到了它可悲的尽头。

唯有两个保守党准备自己走进示众的囚籠。民族自由党人声称，他們非常願意同意把不加修改的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再延

长二年，而十分信赖卡特尔多数派的教皇全权主义者除了八个人以外，全都参加了他们过去为了延长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而提供的援军；这支援军的首领赖辛施佩格甚至又发表了一篇反对非常法的激烈演说。1888年2月18日，反社会党人法的有效期以一百六十四票对八十票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延长，即到1890年9月30日为止。

第八章

九十九天

653 过了不久，3月9日，威廉皇帝逝世，享年九十多岁，他的继承人以病篤之身继承王位。

弗里德里希皇帝不但不是什么天才，而且很难說是一个有才能的人，甚至还有严重的封建王公的意識，但是也感到一点現代精神的气息。他在即位詔书中自称是一个和平的人；如果后世的人能够称頌他的統治，說它造福人民，有利于国，是帝国之幸，他就感到滿足，至于带来荣誉的輝煌的丰功伟績，他是不关心的。当然这个詔书在个别地方可以有各种不同解释。它是由基督教保守派教授格弗肯执笔，并得到自由思想党对它表示无限忠誠的。当弗里德里希皇帝的寿命已經差不多是可以按日按时来計算的时候，自由思想党的国务活动家还在酒筵上不知疲倦地分配大臣席位。

俾斯麦虽并不这样愚蠢，但却更加阴險。一切王牌在他的手中；命在旦夕的皇帝或帝国議會中席位不足十分之一的皇帝党，对俾斯麦又能有什么損害呢？正像最了解情况的施托克尔所說的，俾斯麦“願意为了多病的皇帝的可以預見的短促的統治时期創造出一个稳定和团結的体系”，換句話說，一开始就阻止皇帝的任何独立行动，这就很少君主政治的意味，但从宮相的立場来看，却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俾斯麦并不以此为滿足。对于弗里德里希皇帝

的即位詔书中的现代精神，以及皇太子与太子妃几十年来对俾斯麦的虽然无力但很坚决的反抗，都需要进行沉重的回击。俾斯麦煽动带丝帽的爱国平民反对孤立无援的皇帝与皇后，与此同时在一次极尽人间卑鄙之能事的最丑恶的狂欢筵席上，他高兴地肯定了格弗肯的一个绝望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在这个人的生活中发现高尚思想的特征呢？ 654

俾斯麦的“稳定性”自然也扩展到弗里德里希皇帝所不满意的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的执行方面。同老皇威廉在世的时候相比，现在，俾斯麦继续迫害工人阶级的恶毒乐趣更大。弗里德里希皇帝执政时期外交政策的唯一行动，就是把《社会民主党人报》赶出瑞士。由于驻柏林的瑞士公使受到人身侮辱，由于驻伯尔尼的德国公使令人苦恼的叫嚷，而且也由于为了立即恢复德瑞通商条约而对瑞士工业的利益作了让步，因此伯尔尼的瑞士联邦委员会答应，于1888年4月把伯恩斯坦、莫特勒、施留特尔和陶舍尔等人逐出瑞士国境。借口是说《社会民主党人报》滥用瑞士的好客而发表了损害瑞士与一个友邦的良好关系的言论。关于这件事，瑞士的官吏奥托·朗克在为被放逐者举行的告别会上说得好：“在世界历史上，每当大事正在酝酿的时候，都会发生激烈争论。人民的幸福并不是阳光下结成的果实；不是的，它是在狂风暴雨中成熟起来的。”但是被驱逐者自己在《告瑞士自由与正义之友书》中宣称，人们没有证实，也不可能证实他们有任何称得起是违反普通法的行为，他们既没有图谋或恣意暴力活动或叛国活动，甚至也没有鼓励别人这样做。人们归罪于他们的事情，都是报刊发表言论范围内的事情，是瑞士宪法保障有充分自由的范围内的事情。驱逐他们的真正原因在于，《社会民主党人报》揭露了德国挑拨分子的卑劣活动，因此普特卡默进行报复。这次驱逐使瑞士降低身分，成为俾斯麦

警察的工具。

655 这次暴行引起瑞士一切公正市民的深刻愤慨和耻辱感。许许多多的人对被逐者表示同情，勇敢的孔采特站在瑞士市民的最前列，保证《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原来的精神与语调安全地继续出版。但是为了避免外部压力的假象，该报自1888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但是它的性质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一切完全和过去一样。俾斯麦和普特卡默对少数几个人发泄怒火，除此而外不过按照可爱的老习惯放了几声空炮而已。离开德国的战场更远了，但是这丝毫也没有减弱党机关报的作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三阶段，党的机关报的任务与第二阶段有所不同；德国工人运动的规模已经如此巨大，德国国内的机关报已经如此之多，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需要另设国外机关报。但是仅仅在一定的程度上，因为德国国内的工人报刊当时已处于千钧一发之际，随时有被封闭的危险。它们必须进行严格的内部审查，而且这种审查是最讨厌的，因为它不受蒙骗；也是由于德国统治者对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无情鞭撻感到理所当然的畏惧，德国国内的工人报刊才能得到有限的活动范围。为了使国外的党机关报尽可能地扩大基础，国内的工人报刊忍受了种种痛苦；反社会党人法存在一天，《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一天不能停刊。它在伦敦出版可以和在苏黎世出版同样好地完成当前的任务，尤其是密探比过去更害怕它：一个流氓还没有听到第一笔钱在他的口袋里叮当作响，“铁面具”就已经使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作为普特卡默的“成绩”，苏黎世的驱逐活动也同他的所有“成绩”一样是没有希望的，而且这是他的最后的“成绩”了。弗里德里希皇帝反对执行还在他的先人统治时期就制定了的关于延长立法时期的法令；他不愿把自己的名字同对最重要的人民权利的第

一次破坏结合起来。可是作为皇帝，他无权否认联邦议会和帝国议会批准的法令。他可以先在其邦议会立即仿效帝国议会的反动行动的普鲁士邦进行反抗，可是他在这里也是徒然地对军国主义的反抗进行斗争。当他执行普鲁士法令的时候，他只能通过一道叫普特卡默停止对选举的官方干涉的命令，来证实自己的良好意愿。那时在普鲁士众议院的一次投票检查中又一次发现这种干涉扩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范围。普特卡默用资产阶级反对派容许他惯用的含冤受屈的可笑的傲慢声调回答，可是这回他碰了钉子，6月8日他接到免职令。这一迅速的处置，使得全权的宫相小心谨慎起来；他没有把“连带责任”扩大到他最忠实的助手身上，而满足于用一次饕餮宴会来安慰遭到不幸的伙伴。一个星期以后，皇帝去世，使他摆脱了一切忧虑。 656

在弗里德里希皇帝统治的九十九天中，社会民主党保持着严肃、刚毅、可敬的态度。它既没有自由思想党的空虚的幻想，也没有卡特尔的可恶的反抗。在《柏林人民报》上发表的奥艾尔写的悼词，对去世的皇帝的好愿望作了公正的评价，但也尖锐地指出，即使这种愿望可以自由发展，它也有一定的界限；奥艾尔用一句可以抵得上自由思想党报纸的所有浮夸言辞的简单话，谈到当时孤单地受到俾斯麦的狂吠的党徒欺凌的“英国女人”^①：“这位至死忠诚和献身的妇女，不论她在宫殿还是在茅屋遇见我们，都永远是一个崇高的形象。”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不仅在它明确有力的政策方面超过了统治阶级，而且在统治阶级从来看作是自己的不可转让的财产的高尚意识方面，即在人类感情的真正心灵感受方面也超过统治阶级。

^① 指弗里德里希皇帝之妻维多利亚（1840—1901），她是英国女王维多利亚（1819—1901）的女儿。——原编者

第九章 总崩溃

一 什么事也办不成了！

657 当俾斯麦不再同一个九十岁的皇帝而同一个三十岁的皇帝打交道的時候，他的宮相地位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本人是个不高明的心理学家，在威廉二世皇帝登基时，他认为是“威廉时代”的再版。他把比自己所关心的更多的事情交给他的长子去做，他的长子大概是历史所提到的俾斯麦的所有亲人中的最无能的一个；官方报刊用几乎毫不掩饰的諷刺談到“俾斯麦王朝”同霍亨索伦王朝并存，正如从前卡洛林王朝同墨洛温王朝并存一样。

年轻的皇帝也暂时对俾斯麦表现得十分恭敬。帝国建立时，他还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反社会党人法颁布时，他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他是在所有官方机构都在为社会王国大吹大擂的时候长大成人的，他生活和活动在好像不会受到任何异端思想侵袭的精神气氛之中。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令人警惕的预兆，因为情况也可能发生变化。皇帝的老师枢密顾问欣茨佩特称皇帝是一个个性特别强的人，在他身上，容易化为干劲的韦耳夫王族的倔强性同与理想主义作伴的霍亨索伦王族的任性结合在一起，施托克尔在1888年8月就说，他用宫廷传教师的尖耳朵听见皇帝说过：“我让

老头儿再干六个月，然后我亲自执政。”可是，当1890年新年，皇帝請求上帝使他还能在許多年內得到俾斯麦的久經考驗的忠告的时候，差不多已經过去了三倍于六个月的时间了。在这段時間里他屢次拥护俾斯麦的卡特尔政策，冷酷地拒絕了忠誠的自由思想党紳士。

可是“俾斯麦王朝”被这种現象迷惑住了，而这正是不可阻擋的沒落的最可靠的标志。当格弗肯从弗里德里希皇帝的日記中发表了揭露“帝国創立者”中的“伟大英雄們”的英雄事业的所有破綻的片断时，俾斯麦不加思索地断言，根据威廉老皇的命令，日記的作者凡尔赛根本没有得知任何重要的事情，因为老皇害怕他的继位人进行叛国活动。俾斯麦的儿子給还活着的外交家莫里尔造了許多謠，这个粗野的英国人就在全欧洲面前譴責他是恶毒的誹謗者。与此同时，也是他的这个儿子在薩摩亞會議上使德国外交成为欧洲的笑柄，并且通过同瑞士的一項新貿易，使德国外交卷入一件欧洲丑聞之中。

正如猫离不开耗子一样，德国警察也离不开进行挑撥的奸細，尽管它由于不可救药的笨拙已經遭到多次失敗。米尔豪曾的警官沃尔格穆特偷偷去找巴塞爾的裁縫路茨，用恶劣的手段誘惑他，結果被这个忠实的党员在陷阱里把他抓住。沃尔格穆特写信慫恿他：“您就赶紧进行煽动吧！”，这是否定不了的，这位正直人士被捕了，在官方确定了他的罪状以后被逐出了瑞士。虽然瑞士联邦委员会把必要的自卫同对俾斯麦的不光采的效劳結合在一起，同时把路茨驅逐出境，但是这位世俗人却勃然大怒，他的儿子有几个星期之久正式地和半正式地对瑞士的庇护权，对“野蛮的瑞士”进行无礼的威胁，过去梅特涅和波拿巴之流在他們作恶最多的时期都沒有敢这样做。伯尔尼的联邦委员会恰当地拒絕了这位可笑

的吹牛家，尽管联邦委员会这时在其他方面也还没有按照可能和必要勇敢地保卫自己的正当权利。

在德国国内，普特卡默的后任普鲁士警察大臣黑尔富特执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情况同普特卡默本人相仿。担任过普特卡默的副国务秘书并且兼任帝国委员会主席的黑尔富特，有充分准备地接任了他的高贵职务。当然容克们把他看作是侵占容克职位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心怀不满，所以他力图表示一点官僚气派，可是他由此得到的，又由于自己的弱点而失去了。1889年3月，他甚至做了普
659 特卡默所不敢做的事情，他听任柏林警察总监马戴的后任冯·里希特霍芬根据反社会党人法查封了一家资产阶级报纸。自从八十年代的中期以来，《人民报》在更换了政治领导以后，用适合政治形势的坚定性代表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评论，它的言论没有顾忌，几十年来德国还没有一家资产阶级报纸敢这样做过。当它现在敢于反对对威廉老皇的讨厌的偶像崇拜的时候，它就犯了反社会党人法，被加上侮辱圣上的罪名，人们提出的优美动听的理由是：对死去的祖父的率直的历史评价，就是对活着的孙子的莫大侮辱。

可是，现在所有这些越轨行为已经走到了极端。俾斯麦专制制度的腐朽大厦到处都发出破裂、折断的声音，这个制度在十九世纪末期想用德国庸人在神圣同盟时期也不能忍受的方式进行统治。最可靠的支柱开始动摇了。1889年春天，俾斯麦向联邦议会提出的一个箝制舆论的文件，在这个一向很听话的机构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帝国委员会不仅使《人民报》，而且也使许多被禁的工人报纸得到自由；帝国最高法院在一百天的侦查拘留以后，停止了因叛国罪对格弗肯进行的诉讼；以侮辱圣上罪对《人民报》进行的控告，在各级法院都被驳回，慕尼黑的地方法院在一次秘密结社案

中遭到在奥艾尔的巧妙领导下的被告的迎头痛击以后，就把“做伪证的家伙”打发走了。甚至在对达佛和內弗的叛国审判中曾經出过很大力气的帝国最高法院法官米特尔施泰，也在大庭广众之間譴責司法的腐敗了，同样狡猾的老鼠——《国民报》也吹着同样的調子。教皇全权主义者的报纸《德国女神》說，什么事也办不成了，这句簡短而确切的話很快就成了一句流行語。

这时人們也已經看到卡特尔老鼠慌慌张张地在破船上东奔西跑。民族自由党人严肃地皺起他們的政治家的眉头，发现俾斯麦老了，而办《十字报》的一伙比較大胆的人，已經扯了俾斯麦的后腿。俾斯麦因此对容克阶级未来的有为人士、參謀总长瓦德西伯爵进行了粗暴的攻击，这种攻击所起的作用，无非是更加揭露了“标准区域”的混乱。卡特尔帝国議会在第三次會議中显得同样混乱。它批准了新的沉重的軍事負担，可是卡特尔多数派不再願意接近“社会大厦的頂层”。尽管受到种种高压，它也不同俾斯麦团结一致，通过比过去的保险法更费劲地补綴起来的老年保险法和殘废保险法了。誰也不相信官方的“社会改革”的魔力了。倘若不是一小撮封建的教皇全权主义者有怜悯之心，帮助組成微弱多数的話，这个法令也就失敗了。毫無疑問，资产阶级政党的反对大部分决非出于正当的动机，可是卡特尔爱国者在这方面比俾斯麦看得清楚，他們不再妄想这种施舍可以使工人阶级睡大觉了。

相反地，事情一天比一天明显，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不可阻擋的胜利进军，正是俾斯麦崩潰的最深刻的原因。正当资产阶级反对派同平时一样萎靡不振地不能指出时代的特征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却在大力准备对所謂当代的海克立斯进行毁灭性的时代判决。

二 二月二十日

在1887年的經濟反动以后，差不多与德国的皇位更替同时，出现了十几年来未曾有过的工业繁荣。它沒有使工人阶级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本質，却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为反对一种只能在兴衰之間的难以控制的眩暈状态中存在的社会制度而斗争。1888年11月27日，社会民主党帝国議会党团发出的一个号召中说：“时机对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利”。号召要求进行鼓
681 动工作，直到最偏僻的地区，党在下次选举中至少要得到一百万张选票和相应的議席。1889年2月24日，《柏林人民报》发表了柏林从未有过的工資斗争的消息。

不仅在德国工人界，而且在欧洲工人界也发生了朝气蓬勃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两件伟大的事实使得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在国际无产阶级的历史上永远值得紀念。事实之一是国际在更扩大的程度上恢复了。自从圣加侖代表大会以来，德国党领导就同英国工会和法国可能派进行了漫长的討論，终于定于1888年，后来又改为1889年召开一个名副其实的普遍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各国社会主义政党召开的，在审查委托书和确定議程方面有最高权力。尽管作了最大努力，德国党领导并没有达到它的直接目的，可是它的无私的热情間接得到了良好的結果。1889年7月14日，即攻克巴士底獄的紀念日，在巴黎举行了两个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其中比較有意义和重要的一个，是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倡議、法国馬克思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者实际准备的。这个代表大会的德国代表就有可能派召开的代表大会的全部外国代表那样多。它的参加者共有三百九十五人，其中法国代表二百二十一人，

德国代表八十一人，英国代表二十二二人，比利时代表十四人，奥地利代表十人，匈牙利代表三人，荷兰代表四人，俄国代表六人，瑞典代表二人，挪威代表三人，丹麦代表三人，瑞士代表六人，波兰代表五人，西班牙代表二人，罗马尼亚代表五人，美国代表五人，波希米亚、保加利亚、阿根廷和芬兰代表各一人。

这次代表大会同老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的区别在于，这次像动员一支大军一样，总参谋部作了准备工作。现在各国工人群众在过去在日内瓦、洛桑、布鲁塞尔和巴塞尔树立了标志的道路上，奔向共同的目标。资产阶级报纸责备代表大会没有详细讨论工人保护法的问题，代表大会用拉萨尔的话回答说：人们不再讨论这些问题，而是决定这些问题。代表大会声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地方，绝对有必要实行以八小时工作制为基础的有效的工人保护法，并要求各国工人根据这种精神，对他们的政府施加影响，特别是促使各国政府派代表参加仍由瑞士倡议于1889年5月召开的国际工人保护会议。代表大会还宣称，吸收女工参加工人队伍，是男工的义务；代表大会要求不分性别、不分民族同工同酬，要求不受限制的、完全的自由联合权和结社权。最后代表大会决定，每年5月1日，国际无产阶级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889年的第二个伟大事实，是启发了前此还没有接触工人运动的无产阶级广大阶层的阶级觉悟的普遍罢工运动。它的顶点是英国码头工人罢工和德国矿工罢工。^①5月中旬，举行罢工的矿

^① 1956年，卡尔·欧伯曼重新发现和发表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为《劳工领导者》写的论1889年鲁尔工人罢工的长期未发表的文章。卡尔·欧伯曼：《1889年的鲁尔矿工罢工。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篇未发表的论文的评论》。载《历史科学杂志》，1956年第2期，第335—342页。——原编者

工,在莱茵—威斯特伐里亚有九万名,在薩尔区有一万三千名,在薩克森王国有一万名,在西里西亚有一万七千名至一万九千名。教皇全权主义势力促使威斯特伐里亚的矿工,派他們的領袖施勒德尔、布恩特和济格尔到柏林去向皇帝求援。皇帝答应由官厅来审查罢工者的要求,可是,如果运动里掺杂着社会民主党的目的,那么他就不能向他們表示好意;在这种場合,他就要毫不容情地进行干涉,因为在他看来,任何社会民主党人都等于是皇帝和祖国的敌人。矿工派代表团去見皇帝,这件事本身是必然破坏,而且实际上也破坏了大罢工的一个錯誤步驟,可是它获得了重要的精神影响。一个可怕的命运使統治階級从倦怠的自滿状态中惊醒。相反地,卡特尔帝国議会在殘废和老年保險法方面所做的勉强的拙劣工作又有什么意义呢!席卷欧洲无产階級的巨大运动的气息,甚至也侵入这个帝国議会的郁悶空气之中。帝国議会一再回到扩大法律上的工人保护这个要求上。可是俾斯麦的回答仍然是冷冷的、僵硬的否定。

663 德国工人階級在进行許多工資斗争的同时,并没有忘記即将到来的选举,这次选举将第一次建立一个为期五年的帝国議会。还在胜利的前夕,党就由于哈森克萊維尔、凱泽尔、克雷克尔等人的死,失去了几个老議会代表,其中尤其是凱泽尔和克雷克尔尝尽了反社会党人法的最苦的滋味;哈森克萊維尔在柏林第六区的席位,克雷克尔在布勒斯劳第二区的席位,分別由李卜克內西和屈恩胜利地保持住了。为了給自己鋪平戰場,党在很大範圍內使用了一种新武器;它通过抵制,保证自己有开会的大厅,保证党的报纸在工人来往的場所到处都有基地。同罢工一样,抵制也是一种使双方受害的武器,它使工人自己受害的情况是有的,因为人們濫用了这种手段。但是总的說来,为了給工人階級創造同其他階級同样的光綫和空气,为了粉碎官厅和企业主企图阻止无产階級参加政治斗争

而施加的压力，人們完全合理地实行了抵制，因而取得巨大成就。

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也排除万难，欣欣向荣地蓬勃发展着。几乎每个月都有新的工人报纸创刊，有时也许太多了，但是党的著作不仅是向广的方面发展的。《新时代》使得自己的研究一年比一年深入，考茨基在国际文库中发表了論托馬斯·莫尔的著作，这是一本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的篇幅不多的书，它对宗教改革时期作了詳尽的評判，胜过了天主教和耶穌教的历史建筑师的大部著作；布洛斯給德国工人写了一部法国大革命的动人的历史；雅·施泰恩彻底清算了宗教一哲学的自由思想家集团的资产阶级不彻底性。現在，除了《新时代》以外，党还有两个优秀的周刊。席佩尔在柏林出版了《人民論壇》，同时还用《柏林工人文库》的名称，定期陸續出版受人欢迎的小册子。克拉拉·蔡特金通过在这个文库里发表的論妇女問題的杰出論著，显示出她是德国女工的最有才能的先鋒战士。雪恩朗克因为莫須有的政治犯罪服过长期徒刑以后，在紐伦堡主編《工人大事記》。他的監獄生活的成果是关于菲尔特地方制鏡业的塗水銀技术及其工人的研究，这个研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还有一点成就的唯一領域內，显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卓越观点，它的千真万确的說明，甚至促使慕尼黑政府进行緩慢的改革。

664

在文学的原野上也萌发了新芽。如果說资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特別在德国，是在艺术領域內进行决战的，那么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一开始就是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中实现的，这对它沒有任何損害。历史的发展要求这样。在十九世紀上半叶，几乎完全沒有經濟自由和政治自由，而在下半叶至少有了一部分；战斗的无产阶级直接同敌人斗争，不用再走艺术的弯路。可是在現代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例如所有造型艺术，音乐和戏剧)是完全以资本主义前提为基础的。只有在抒情詩和叙事詩中，无产阶级的阶级

精神才能体现出来，而在当时并不缺乏这种诗歌。

但是，始终只与文艺作伴，而不善于领导文艺。其实，无产阶级的“倾向艺术”比资产阶级的“纯艺术”更坦率、更真实，所谓“纯艺术”，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过，它只是一种反动的虚构，其矛头是指向资产阶级的伟大革命诗人，这些人从他们的阶级的意义来说，都是有“倾向性”的。自从为拉萨尔的早死而写的许多挽歌以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上缠绕着一个简单朴素的花环，“有的侃侃而谈，有的结结巴巴，有些诗幽静，有些诗粗犷”：奥多尔夫、哈森克莱维尔、佛罗默、盖布等人还在政治斗争的空闲时间推敲他们的大胆的诗句；其他一些人，如麦克斯·克格尔、列奥波特·雅科比、鲁道夫·拉凡特距政治远，距文学近，可是就是他们也不要开辟艺术的新纪元。正如他们之中的作品形式最完备的一个人所说，他们只希望表达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在不同阶段给他们带来的所有的愤怒，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欢欣，从内心里唱出几乎要使他们的胸部破裂的过多的感情；至于将来的文学史，是否把他们安置在它的许多部门中的一个部门里，这件事他们从未考虑过。

党在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前不久创办的一个文学性娱乐报纸受
665 了这个法令的间接影响停刊了。后来迪茨在鲁道夫·拉凡特和布洛斯的帮助下，通过《实话报》建立了党的文艺生活的新的集合点。《实话报》本来按其性质而论，是一种滑稽性报纸，小心翼翼地在不稳定的基础上活动，后来它的内容一年比一年丰富，获得了几十万读者，成为党的传播最广的报纸——一个在他有力的双肩上担负着党的一部分严肃工作的有朝气的快活的小伙子。除了这家报纸以外，慕尼黑的《南德信使报》也在蓬勃发展。其次还有党的年鉴，罗伯特·施魏舍尔在充实年鉴的文学内容方面有很大功劳。他是1848年的老革命者，中年流亡国外，生活在阿尔卑斯山

的簡朴而孤寂的农民群众之中，青年时代他就喜欢的詩歌成了他严肃的朋友，施魏舍尔始終忠实于青年时代的理想；在党的发展的重要的一天，即在1868年的紐伦堡代表大会上，他发表了一篇动人的綱領性演說，帮助大会取得了胜利；他同意古老的見解，一个完整的詩人不仅需要头脑和心灵，而且也需要有骨气。他給党的年鉴写了許多短篇小說和关于农民战争的优美的特写，这些作品形式优雅、明晰，具有真正的詩人气质，表达了坚定、刚毅的意志。

正当工人阶级充滿春天的創作欲望的时候，它的最可恶的敌人在他不愉快的冬天为这样一个問題絞尽脑汁：他怎样才能再一次制造一个言听計从的帝国議會。俾斯麦只能依靠波拿巴的全民投票生活，可是从哪里找到一次新的全民投票的新誘餌呢？不能使封斋节选举^①的鞭打重演，卡特尔帝国議会的每次會議，为了軍国主义而用群众的皮做了这样寬、这样长的皮带，以致連最大的牛轡也够用了。由于在薩摩亚會議上出丑，殖民政策的阴謀被揭穿了，同样，由于烧酒稅、砂糖稅及其礼品，以及由于资本主义卡特尔、康采恩和托拉斯的迅速增长，“民族經濟政策”的黑幕也被揭穿了。1889年，卡特尔、康采恩和托拉斯增加到九十五个，其中有二十个是在紡織工业方面，二十五个在金属工业方面；十一个国际性的鋁、銅、錫等的卡特尔不計算在內。甚至卡特尔的数目仅次于德国的美国，也只有六十二个卡特尔，德意志帝国在人为地抬高物价方面是世界各国之冠。这种抬高物价的行为是造成普遍不滿的一种有效手段，同时，它也夺去了“民族經濟政策”的最后的光輝。 666

自由貿易派不厌其煩地指責保护关稅政策是形成卡特尔的原因，这种說法虽然不完全正确，但是有很大一部分是正确的。事实上，

① 參看本书第六部第七章第二节。——譯者

卡特尔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由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产生的，同妇女劳动和童工相类似，卡特尔虽然具有资本主义形式的普遍危害性，但是它也包含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萌芽。自由貿易的英国也有卡特尔，它虽有最发达的大工业，但是卡特尔的数字只居第四位，即落后于实行保护关税的德国、美国和奥匈。如果说保护关税恰恰是培养最有普遍危害性的卡特尔的温床，那就对了。

因此，俾斯麦为一次新的全民投票，只有利用社会党人的恐怖，可是这样做也有种种困难。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有两个障碍，德国工人做梦也想不到，为了使得一种破产的制度又成为有支付能力的，而在小口径武器面前退却。另一方面，皇帝也不是没有受到自从他登基以来的历史发展的影响。他虽然嫌恶社会民主党，但是他觉得把资产阶级统治和容克地主的统治的所有缺点结合起来的一种政策，越来越不能可靠地保护一个现代君主国。他并不拒绝统治阶级中的头脑清楚的人物日益不可抗拒地产生的看法，即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恰恰迫切需要取消反社会党人法，在法律上实行工人保护。皇帝本人处处也受密探包围这一事实，可能使皇帝从社会民主党人在帝国议会的演说中听到密探活动的时候，也会反对反社会党人法。总之，既然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吓不倒社会民主党，那么用谋杀案选举那种恶劣行动也吓不倒皇帝。

船已经破了，可是俾斯麦还不想离开他长期以来所享受的肉锅。1889年10月，他在卡特尔帝国议会的第四次，也就是最后一次会议中，提出了一个企图使反社会党人法永远有效而不必再延长其有效期的法律草案，其中加强了“司法保证”，还有其他几点同样可笑的“减轻”。卡特尔多数派准备使这个法令永久化，只是民族自由党人希望取消第二十八条的警察驱逐权，以便使“减轻”稍微像个样子，而保守党人宣称，一种永久化的法令没有这种权力是不能

接受的。双方都装模作样。政府在申述制定驅逐令的理由时，曾經令人信服地說过，第二十八条的警察驅逐权，把社会民主党的鼓动传播到全德国，正是保守党人曾經悲叹，容克地主的剝削領域的安宁因此受到十分严重的威胁，这样事先就給他們現在的論断——沒有这种权能，社会和国家就不能存在——打上了印記。可是，自从驅逐令破产以来，驅逐活动事实上已經停止了（在柏林尤其是这样），因为这些活动对它們的主謀者的打击比它們的牺牲者还重；因此把正式取消这些活动吹嘘成一种“減輕”（为了这种“減輕”，就要永远忍受其余的反社会党人法），是民族自由党人的一种摆飾。尽管双方的伪善都很明显，这出喜剧仍然演到終場：在二讀时，民族自由党人坚持他們的“減輕”，以反对保守党人，随后保守党人投票反对“被減輕了的”法令。1890年1月25日，这个法令以一百六十九票对九十八票遭到否决，后来也沒有复活。

整整十年之后，俾斯麦的长子同保守党政治活动家黑尔多夫进行的一場爭論，充分說明了幕后的情况。海伯特·俾斯麦断言，他的父亲对于反社会党人法的垮台沒有責任；他曾經让保守党的一位領袖对保守党人說，他們可以投票贊成民族自由党所謂的“減輕了的”法令，但是这个委托沒有被执行或者沒有被正确执行。这种說法的虛假性一开始就是十分明显的，不过陷入窘境 of 保守党領袖也不願扮演俾斯麦的传奇的殉难者，虽然他只有严厉揭露自己的党，才能换取做一个正确的中間人的荣誉。因此黑尔多夫 668 公开声明，他和他的保守党朋友誠恳地請求俾斯麦向他們公开表示，他們可不可以跟着民族自由党人走，可是这个請求沒有得到明确答复，而只是——“不是沒有一定的保留和不肯定”——得到曖昧不明的囁語；为了使党的一种自然的、适合帝国和邦的利益的局面成为可能，鎮压社会民主党是最有利的戰場，他关心保持卡特尔

政策，甚于保持全部反社会党人法。

这几句简短的话说出了俾斯麦从颁布反社会党人法到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为止的全部政策；卡特尔政策，剝削人民群众是目的，而压制社会民主党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最有利”和“最自然的”手段。另一种表白同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即他关心目的，即剝削群众，甚于关心手段，即压制社会民主党。可是，对于希望得到具体指示的可怜的容克来说，这种微妙的话当然是有很多种解释的。后来，“減輕了的”法案在二讀时被通过以后，举行了一个各部大臣会议，俾斯麦在会上坚持，在帝国议会最后批准时，由政府拒絕这个法案。这次会议以后，俾斯麦又召见了老实的黑尔多夫，“非常拘謹和沉默寡言地”接待了他，保守党人提出，如果政府在三讀时发表一个声明，說它可以接受“減輕了的”法案，那么他们就投票贊成这个法案，俾斯麦对这个問題又一次拒絕給予明确的回答。沒有得到任何指示，于是保守党人就投票反对“減輕了的”法案，至于他們是不是像黑尔多夫十年以后所說的那样，完全是一个束手无策、仓皇失措的集团，或者他們心里是否知道“世俗人”的心意，这个問題可以不去管它。

无论如何，黑尔多夫的声明完全揭露了俾斯麦的计划。他既不要他只需点一点头就可以通过的“減輕了的”法案，也不要对民族自由党人稍施压力也可以得到的“未減輕的”法案。他把事情安排成这样，仿佛卡特尔帝国议会动摇了社会和国家的基础，而政府沒有任何責任，仿佛他不同意皇上为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破坏国本的煽动而拿起必要的防御武器；然后，假如俾斯麦的密探队像过去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实现了尼德瓦尔德謀刺案那样的阴谋，制造了必要的气氛，那么俾斯麦就对不順从的帝国议会做出一付悲哀的表情，宣布改选。如果人們考虑到，他不久以后說过，这个

时期他寻找一位坚决而冷酷的將軍，把社会民主党扼死在血泊之中，那么人們就会怀着恐惧的心情想到，为了赋予波拿巴的慣技以独特的冲击力，他会做出什么計劃。

碰到社会民主党的有力反抗，这次他也会像过去任何一次一样遭到失敗，不过事情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俾斯麦首先同皇帝发生了冲突。皇帝并不是要想废除反社会党人法。在1月24日的大臣會議上，他贊成接受“減輕了的”法案。但是他希望，为了定于2月20日举行的帝国議會选举，打起社会改革的旗号。2月5日，发表了两个圣諭，其中一个答应修訂工人保护法，尤其是限制劳动時間，另一个是安排召开国际工人保护會議。这两道命令都沒有內閣的副署，但是俾斯麦后来硬說，这两个命令是他由最初拟定的草案中摘出来的，特别是添加了国际會議这一条，仿佛是一个擋住皇帝的“人道的、对工人友好的热情”的篩子。这两道命令引起很大的重視，加强了对社会民主党有利的高潮，工人們正确地把这两个命令算作社会民主党的道义上的胜利。

这次由倍倍尔、格里林伯格、李卜克內西、迈斯特尔和津格尔組成的社会民主党中央选举委员会沒有发表选举宣言。委员会所发布的只是关于审查选举人名单、关于募集选举經費的实际規定，提醒工人注意敌人集会的捣乱，建議在领导竞选时严格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敌人的行动是对我們最有效的行动”。每个有阶级觉悟的工人都知道，什么事情是主要的。工人队伍严肃而沉默地向前迈进。他們决心进行一次艰苦的战斗，估計可以取得重大胜利，但是2月20日的胜利远远超过了他們最大胆的估計。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共得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九十八票，差不多占总票数的百分之二十，比1887年多六十六万四千一百七十票。党在普魯士王国一地所得的票数几乎等于三年前在整个德意志帝国所

得的票数，薩克森王国的票数接近二十五万，巴伐利亚王国的票数超过了十万。如果人們要想提到在这难忘的一天使无产阶级获得荣誉的每个德国地区，那么人們就必须把所有德国地区都列举出来。看一看社会民主党在那里或者获胜或者参加了复选的七十八个选区，要比列举选票数字更能表现出党的竞选胜利的伟大。

那么我們就可以說，社会民主党的五个构筑了許多堡垒的軍营控制了德国。第一个軍营包括易北河东容克地区的十七个选区。圍繞着柏林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第五区和第六区，有六个馬尔克选区組成了这个社会党人的巨大要塞的外堡，这六个馬尔克选区是：尼德尔巴尼姆、西哈費耳兰、曹赫一路肯瓦尔德、特尔托夫—貝斯科夫—施托尔科夫、奥德河畔的法兰克福、柯特布斯—施普雷姆堡，然后有两个波美拉尼亚的选区：施泰廷和郎道夫—格腊芬哈根，一个东普魯士的选区：科尼斯堡，三个西里西亚选区：布勒斯劳的两个选区和賴辛巴赫—諾伊罗德，是这个要塞的前进哨。党的西北部的軍营比这个东北部軍营还要强大一些，它有十八个选区；同古老的汉撒城市汉堡、不来梅和卢卑克的五个选区結合在一起的，有三个梅克伦堡选区：施韦临、罗斯托克、居斯特罗，四个什列斯維希—霍尔斯坦选区：阿尔托那、基尔、格吕克施塔特、弗伦斯堡，五个汉諾威选区：汉諾威、哈默林、哈尔堡、施塔德、格斯特明德，此外还有一个不伦瑞克选区。社会民主党的第三个軍营有二十一个选区，穿过德国中部；它的組成部分是薩克森王国的九个选区：萊比錫、市区和郊区、米特魏达、开姆尼茨、格劳豪—梅朗内、茨維考—格里米乔、施托貝克—施内貝克、奥尔巴赫—賴辛巴赫、普劳恩，五个薩克森省的选区：馬格德堡、哈雷、爱尔福特、瑙姆堡、卡尔貝—阿舍斯累本，五个小邦选区：两个罗伊斯、哥达、佐内堡、宗德尔豪曾和两个新普魯士选区：卡塞尔和馬尔堡。第四个軍营是沿着帝国西

部边界的十三个选区；两个威斯特伐里亚选区：比雷菲尔德和多特蒙德，五个莱茵选区：累内普—梅特曼、爱北斐特—巴門、佐林根、杜塞尔多夫、科伦，六个美因部选区：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赫克斯特、哈瑙、奥芬巴赫、美因兹、达姆斯塔特。最后，南部九个选区形成的第五个軍营使这条鎖鏈閉合起来：亚尔薩斯的米尔豪曾、巴登 671 的曼海姆、維尔騰堡的斯图加特、巴伐利亚的慕尼黑第一区和第二区、紐伦堡、菲尔特、克罗那赫和維尔次堡。

根据所得票数的比例，党本来可以要求七十八个选区；事实上，它只得到其中的三十五个。在主要选举中党在二十个选区获胜：柏林第四区和第六区（津格尔和李卜克内西）、汉堡第一区、第二区和第三区（倍倍尔、迪茨和梅茨格尔）、阿尔托那（弗罗默）、莱比錫郊区（盖尔）、米特魏达（阿·施米特）、开姆尼茨（席佩尔）、格劳豪—梅朗内（奥艾尔）、茨維考—格里米乔（施托尔）、施托貝克—施内貝克（宰菲尔特）、馬格德堡（博克）、罗伊斯长系（費尔斯特）、罗伊斯幼系（烏尔姆）、爱北斐特—巴門（哈尔姆）、佐林根（舒馬赫）、米尔豪曾（希克尔）、慕尼黑第二区（福尔馬尔）、紐伦堡（格里林伯格）。在复选中，党同平常一样，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布勒斯劳，高贵的自由思想党人在主要选举后一天，就轉到卡特尔一边去了。成为問題的只是，党在复选中必須在两个資产階級候选人之間作出选择时，它應該采取什么态度。圣加侖代表大会在封斋节选举的經驗的影响下决定，在这种情况下絕對弃权。可是現在社会民主党的选举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通过支持資产階級反对派，抵偿封斋节选举的大騙局，通过彻底粉碎卡特尔，給一切背叛反社会党人法的活动树立一个目标。明确的政治必要性战胜了一切形式上的顾虑，早在2月22日，中央选举委员会就发布了复选口号：打倒反人民的卡特尔，打倒要把反社会党人法永久化的人們！它要求党

員在資產階級政黨進行復選時，把票投給所有表示反對各種形式的非常法、反對任何刑法加重、反對任何破壞普選權行為的候選人。明確放棄其他黨的報答，強調指出，為了黨的利益，為了社會福利必須這樣做。工人羣眾的戰鬥意志早已準備好響應這個號召了。復選消滅了卡特爾，它在新帝國議會中只有一百三十五席，是沒有希望的少數派，保守黨—教皇全權主義者多數派也不可能組成。

黨在復選中僅僅獲得了十五個議席：尼德爾巴尼姆（施塔特哈根）、布勒斯勞第一區（圖曹爾）、科尼斯堡（舒爾采）、不來梅（布龍斯）、盧卑克（施瓦爾茨）、格呂克施塔特（莫爾肯布爾）、漢諾威（邁斯泰爾）、不倫瑞克（布洛斯）、哈雷（孔內爾特）、卡爾貝—阿舍爾累本（海涅）、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威·施米特）、美因茲（約斯特）、奧芬巴赫（烏爾利希）、曼海姆（德雷斯巴赫）和慕尼黑第一區（比爾克）。在黨的議會代表中，現在已經有許多在反對反社會黨人法的鬥爭中立過功的人了；少數人來自資產階級職業階層，如作家席佩爾和烏爾姆、律師施塔特哈根、教師孔內爾特、旅店主比爾克，大多數人來自工人階級，如雪茄煙工人布龍斯和費斯泰爾、木工約斯特和席克爾、白鐵匠梅茨格爾、排字工阿·施米特、石版印刷工威·施米特、鞋匠宰菲爾特。

2月20日摧毀了宮相俾斯麥的基礎；這一天被置於法律保護之外的社會民主黨召集的隊伍比任何資產階級政黨所召集的都大，這一天給俾斯麥的統治判處了死刑。在這危急關頭，罩在赤裸裸的自私心外面的一切騙人的外衣全脫掉了，俾斯麥不體面地離開了他以卑鄙手段所掌握的權位。這次，復仇的女神在完成她的任務以前，是會讓一個罪惡深重的人進入墳墓的；這位“世俗人”大吵大嚷地對自己進行報復，甚至他的最不可調和的敵人恐怕也想不出比這種報復更殘酷的手段。

第十章 清算

反社会党人法比它的制定者多活了半年，不过在这期間它已經 673
是氣息奄奄了。事实上，2月20日是德意志帝国历史上，也是
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这个阶段到現在还
沒有結束，而在它結束以前，不能对它作出历史評价。可是反社会
党人法的清算工作却属于本书范围之内，在反社会党人法存在的
最后几个月，党开始进行这一工作，并在該法废止后一年完成。

一 反社会党人法的結算

反社会党人法使工人階級遭受的牺牲，是难以尽述的。在这
个法令頒布后十年，《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提議发表一个备忘录，这
个备忘录應該发表所有禁令的精确統計，公布所有被驅逐者的姓
名，把所有遭到破坏的营业一一列举出来，叙述住宅搜查、逮捕、判
决的一切必要細节，給人工培植的告密制度和密探活动提供一幅
包罗万象的图画；可是当时就发现，这个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大地
方的最热心的党员同志也厌倦了，即使他們收集了一些材料，也是
范围太广，不可能收在一本相当方便易讀的书籍之内。

根据不精确的統計，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有一千三百种定期

的和不定期的印刷物和三百三十二个各种工人組織被禁。被从戒
674 严区驅逐出境的有九百人，其中五百人是家庭的贍养者；这九百人
中，柏林有二百九十三人，汉堡三百十一人，萊比錫一百六十四人，
法兰克福七十一人，施泰廷五十三人，施普雷姆堡一人；在奥芬巴
赫，黑森政府只驅逐不属于本邦的帝国公民。有一千五百人被法
院判处总数达一千年的監禁。如果說，所有这些数字还远远沒有
接近实际，那么它們本身也沒有充分說明下述情况：許多人的幸
福和生命遭到毀灭，許多殉难者被資本主义或警察的压迫手段从
自己的穷家里驅逐出去，进入了悲慘的流亡生活，过早地走进了
坟墓。

从前，3月18日的死者是通过詩人的嘴說話的，而反社会党
人法的牺牲者能够自己談論自己的情况；价格是高的，但是貨也是
真的。被反社会党人法的镰刀砍倒的任何勇敢而忠誠的人，沒有
一个是白白地倒下去的；即使从暗中死亡和毀灭的人的骨头里，也
产生复仇者。反社会党人法頒布时，党得了四十三万七千一百
五十八张选票，有四十二种政治报纸，工会組織有五万會員和十四
种机关报，而当反社会党人法废止时，党得了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
百九十八张选票，有六十种政治报纸，工会組織有二十万會員和四
十一种机关报。在圣加侖代表大会以后三年中，党的金庫收入三
十二万五千馬克；当战争結束时，党的軍費金庫还很充裕，大約还
有十七万二千馬克。

但是，反社会党人法带来的利益也同損失一样，不是用几个
虽然很光荣的数字所包括得了的。根据著名的辯证規律，量在一
定的点上起质的变化；党在十二年的斗争中，不仅壮大了，坚强了，
而且在存在的实质上得到更丰富的发展。它不仅斗争和鏖战，而
且也工作和学习；它不仅提供了力量的证明，也提供了精神的证

明。这是根本不能用数字表示的不可估量的成就，自从党十二年来胜利地经历了反对一个大国的所有权力手段的战争以来，党内的不可战胜的意识也是数字所不能表达的。群众是无产阶级英雄时代的主人公；这个时代特别伟大和崇高之处正在这里。 675

资产阶级政党徒然地企图证明，统治阶级自动放弃了反社会党人法，如果没有敌人的这种自动放弃，党就必须继续安安静静地戴着这付镣铐。对于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来说，这种说法根本不正确，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是正确的，那就是他们“自动地”认识到自己的失败。这部分人之所以放弃反社会党人法，是因为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把这支箭射回到这个法令的创始人的心口。当然，统治阶级还可以把反社会党人法保持下去，不过要用全面腐朽为代价，这种腐朽使得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可以瞧不起新德意志帝国。一位将军在自己的军队全军覆没以前，把这支军队撤出毫无希望的失败的战斗，人们可能说他这样做是有见识的，可是哪一个傻瓜恭维这样一位将军是胜利者，甚至是一位“自动的”胜利者呢？

资产阶级讽刺说，既然反社会党人法对社会民主党有好处，那么社会民主党为什么要这样激烈地反对它呢？这种讽刺是同样愚蠢的。越疯狂越好，这句话在一定意义上是完全正确的，可是这决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本意，将来也决不会是这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如果势必硬把事情推到极端，它愿意让自己的敌人占先。我们从丰腾诺阿^①战役中听到一个神话般的故事：一个英国军官向法国军官喊话：叫你们的兵士开枪

^① 比利时艾诺省的一个村庄，在土尔内东南，1745年（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期间），萨克森元帅率领的法军在此战胜库贝尔兰公爵统率的英荷联军。——译者

吧！对方回答说：我们从来不先开火。社会民主党也这样回答自己的敌人的挑战，但不是出于封建的礼貌，而是出于自己的解放斗争的深思熟虑的策略；只有当敌人硬要把事情推到极端的时候，党才能像它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所做的那样，利用“越疯狂越好”的政策，使自己得到最大利益。

当它进入战斗的时候，还是一个少年，躯体生长很快，脑子里还有不少幻想，当它归来时，已经是一个筋肉健壮、久经风霜的成年人，坚决、老练、明朗，比起任何最高明的人也不逊色。

二 老年派和青年派

676 当党结束战斗的时候，党内发生了摩擦，这些摩擦本身没有什么特殊意义，可是资产阶级报刊把它们夸大为一件重大事件。正是这些和善的教父给这次争论取名为老年派和青年派之间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产生战争名称，虽然这些名称是不恰当的。

问题的实质是，在一些大城市，如德累斯顿、马格德堡，尤其是柏林，产生了某种不满情绪。如果这种不满情绪有其严肃的背景的话，那么人们可以把它比之于久经战斗的老兵的情绪，他们在停战时不愿放下熟练而成功地运用的武器。恰恰在柏林，这种情绪是很可以理解的。过去党在任何地方的处境也不像在帝国首都这样困难，毫无疑问，在柏林有一支巩固而严密地组织起来的思想激进的同志的基本部队是有很大好处的，俾斯麦分子的一切暴力行动和收买活动首先在他們身上碰得粉碎。当然，这时也可能发出比需要的更尖锐的声调，尤其在柏林市区选举时常常发生争吵，不是经常给地方上的同志留下最好的印象。但是，如果说柏林的同志喜欢发牢骚，那么他们也确实很为难，他们担心由于反社会党人

法废止而产生某种軟弱化，現在，当党在帝国議會中的代表人数較多的时候，他們就更加担心，这是对党的真正关怀。对議會党团的模糊的不信任发生作用，正同 1884 年选举斗争以后的情况相似，在那次斗争中也得到了較多的議席。当时，由于航运输助金問題爆发了公开的斗争，現在由于复选和五一节問題也爆发了公开的斗争。

毫无疑问，中央选举委员会要求在复选中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这是违反圣加侖代表大会的決議的。可是这样做显然对党有利，絕大多数党员会毫无疑问地表示贊同，因而关于这个問題的爭論很快就停止了。而关于五一节問題的爭論却不这样簡單。在 2 月 20 日的令人鼓舞的影响下，許多工会的和政治性的工人大会决定，用停止工作来庆祝五一。巴黎并没有决定用这种方式开始庆祝五一的活动，而是由各国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庆祝的方式。現在无论如何德国无产阶级中也有很多人由于确切的理由，不贊成五一节普遍停工。工业繁荣已經过去，生意一天比一天清淡，五一节强迫停工的尝试可能引起严重的經濟冲突，甚至政治冲突，在当前情况下，这种斗争沒有胜利实现的可能。企业主和同他們情投意合的官厅正在等待机会，用工人在五一节的失敗夺去他們在 2 月 20 日的胜利；这种美妙的希望幻灭以后，卡尼格先的机关报《汉諾威快邮报》天真地承认，現在反社会党人法才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議會党团沉默的时间可能太久了。它被选举斗争弄得精疲力尽，似乎沒有充分估計到这个問題的迫切性；它打算在新帝国議會开会以后，立即对庆祝五一节問題作出決議，这个打算是不够的，因为帝国議會是不是在五一节以前召开，并没有确定，而事实上它是在 5 月 6 日才开会的。于是 3 月 23

日，一群柏林同志发表了一个号召，要求所有有强大的工人組織的工业城市在五一节普遍停工。这种擅自行动又使議会党团感到不快，不过4月13日，它还是在哈雷开了一个会，除一个人反对外，其他人一致作出決議，虽然不是无条件地劝止普遍停工，但在不經冲突不能达到停工的所有地方都进行劝止。这个決議无疑是正确的，假如不是已經有許多工人答应停工，并且由于资产階級报纸发表了后退就是“胆怯”的煽动言論而坚持停工的話，这个決議会受到普遍重視。尤其在汉堡进行了停工的尝试，可是在党的这个工会和政治方面装备最好的要塞，斗争也很艰苦而且損失重大。反对派指責說，假如議会党团不插手劝止，事情的进展就会比較順利，并以无产階級的伟大胜利而結束，这种說法本身是站不住脚的；而指責議会党团沒有及早劝止的說法却是正确的；但是無論如何这个爭論問題留下种种不和。

德累斯頓、馬格德堡和柏林的这些反对派分子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非常能干，但不善于言談和著述，因此几个年輕的作家就成了他們的发言人。就这一点而論，恩格斯正确地說这是“文学家和大学生騷动”^①，因为其中有一部分还很年輕的人使得关于若干具体問題的爭論，扩大为老年派和青年派之間的原則性斗争。他們之中有几个人，如鮑尔·恩斯特和鮑尔·卡姆弗迈耶尔是有天賦，有学識的，他們的錯誤只是，由于沒有政治斗争的实际經驗，因此对《共产党宣言》作了片面的、形式上的理解。其他一些人，如汉斯·弥勒和布魯諾·維勒要求作出更严厉的判決。弥勒幻想在党内进行小资产階級和无产階級之間的可怕的階級斗争，他完全模仿普特卡默的摘引方法（虽然目的是相反的），从反社会党人法的十二

^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90年9月7日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的信，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0頁。

年中，收集了杰出的或平常的黨員同志的許多口头或書面的言論，在這些言論中大概可以發現一點小資產階級激進的味道，把關於黨身上的“膿瘡”的有趣詞句同這一點結合起來。自由教區的教士布魯諾·維勒竟然提出這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指責：反社會黨人法給我們帶來的最壞的事情，就是腐化。

老一輩的黨員中，倍倍爾對這些年輕人展開了鬥爭。倘若他更多地從幽默的方面理解彌勒和維勒，倘若他不提“卑劣的”攻擊，而提“幼稚的”攻擊，那在策略上肯定就更正確一些。可是，如果這些侮辱使一個十二年之久在鬥爭的第一綫擔負重任的人感到憤怒，誰又能責備他呢？工人們更不責備他；在8月10日于德累斯頓⁶⁷⁹和8月13日于馬格德堡舉行的大會上，特別是在8月25日的柏林大會上，工人們以壓倒的多數表示擁護倍倍爾，反對彌勒和維勒，擁護老年派，反對青年派，使資產階級報紙心裡十分難受，它沒有因為老年派向“小資產階級可能派”轉變而高興，却令人奇怪地表明它對青年派的“革命”詞句很感興趣。

三 哈雷代表大會和愛爾福特代表大會

反社會黨人法廢止後，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新組織，制定新綱領。在哈雷代表大會和愛爾福特代表大會上解決了這兩個任務。

哈雷代表大會於1890年10月12日至18日舉行。整個大會顯得壯麗而莊嚴，有四百名代表參加了大會，十七位來賓傳達了奧地利、瑞士、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丹麥、瑞典和波蘭等姊妹黨的祝賀和敬意。關於新組織問題經過熱烈討論以後，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見。反社會黨人法頒布前存在過的那種聯合組織被放棄

了，因为撇开警察的阻碍不谈，党太庞大，不适合这样做。必要的集中由每年举行的代表大会以及每年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党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来实现；《柏林人民报》改名《前进报》，代替了光荣地赢得胜利自动停刊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各地方党员中选出的受托人，建立执行委员会同地方党员之间的联系。执行委员会由十二人组成，其中五人进行本来的工作，七人起监督作用。

反对派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人是印刷工人威纳尔，他举动笨拙，沉溺在琐碎的谰言之中。一个委员会研究了她的控诉，认为这些控诉毫无内容。在代表大会作出决定以后，威纳尔答应保持安静。直到1891年夏天也确实是这样。可是，后来福尔马尔6月1日在慕尼黑发表的演说，重新鼓舞了柏林和马格德堡的反对派。按照福尔马尔的见解，他在小农的巴伐利亚的卓有成效的活动已经褪色了；他决不是主张放弃党的最终目的，但主张把党的主要力量集中于继续进行法律上的工人保护、保障联合权、取消粮食关税等几个实际问题上。他认为：对不好的愿望报之以拳头，对善良愿望报之以慷慨！可惜，在俾斯麦垮台以后，统治阶级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善良愿望”。国际工人保护会议等于放了一声空炮，没有任何结果；在二月法令中宣布的关于营业法规的修订条款，甚至不符合对修订工厂立法的最起码的要求，而且含有对联合权的可耻破坏；俾斯麦的后任同俾斯麦本人一样顽固地抓住粮食关税不放。党内广大群众感到，福尔马尔的演说是一个严重的转变，这并不奇怪。

可是，更为严重的是，柏林反对派还向相反的方向突进。它在公开的集会上同倍倍尔和费舍发生了激烈冲突以后，就把自己的观点综合写在一份传单里，这份传单估计是裱糊匠维尔特贝格尔

写的，它得到一群經過考驗的工人的支持，作为大胆的抗議，无疑胜过弥勒和維勒的粗淺的声明。虽然如此，它却存在一个綱領性声明可能有的最严重的錯誤；它既沒有实际的措施，也沒有实际的重点。它的主要打击对象是党的議會活动，并且断言，只要党还年輕，并且是由无产者組成的，就談不到进行这种活动。沒有什么东西比这种断言更不正确了。足以說明問題的是，提出这种主张的人从党的全部历史中只能为这种言論找到一个证据，那就是李卜克内西在1869年所做的演說，李卜克内西本人早就认为这个演說是站不住脚的，而加以放弃，并且这个演說在发表的时候就不仅同拉薩尔和施韦澤的所建議的党的策略，而且也同倍倍尔和恩格斯所建議的党的策略是完全矛盾的。反对派的发言人试图依靠完全站不住脚的观点，結果沒有成功，于是就对党的領導进行誹謗。这正是資产階級报刊所求之不得的，它使这种含糊的指責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百倍的响应，因此党領導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在“不证明就撤回”的口号下向反对派分子提出挑战，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卫行动了；如果你們不能证明，但又不願撤回，那么你們就退党。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是在1891年10月14日到20日举行的。参加大会的代表有二百五十人，其中反对派刚刚一打。关于策略的辯論占了好几天時間。同自己收斂了不适时的攻击鋒芒的福尔馬尔取得了諒解，而同柏林和馬格德堡的反对派沒有做到这一点。这个反对派的每个代表都代表自己的立場，甚至維尔特貝格尔（更不用說威納尔了）也不能用自己的发言給人以比較深刻的印象。当为了审查他們的控訴成立了一个委員會的时候，他們两个人和三个馬格德堡的代表宣布退党；可是委員會仍然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并建議把維尔特貝格尔和威納尔开除出党，結果由代表大会以十

一票反对，其他一致赞成而通过。

这时反对派想組織一个独立的党，可是这个企图沒有实现。其中一小部分人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小集团；年輕的文人几乎全都回到資產階級世界，唯一的例外恐怕就是鮑尔·卡姆弗迈耶尔，他由于具有一切正直的和有教养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特殊坚定性，而投身于和平合作运动；青年派中的多数人又在党内找到了正确道路，十一年后这次斗争的創伤完全結了疤，因而1902年的慕尼黑代表大会撤消了开除維尔特貝格尔和他当时的同志的决定。

四 爱尔福特綱領

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的可喜的一面，是确定了一个新党綱。在
682 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党越是对自己的历史性质和历史目标有了清楚的了解，修改哥达綱領的必要性就表现得日益明显。在圣加侖代表大会上，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內西就接受了准备新党綱的委托。由于迫切需要实际斗争，这个任务沒有完成；当反社会党人法垮台，党又有了一些自由活动范围的时候，人們就更加热心地討論了这个問題。

討論中，沒有出現任何原則性的意見分歧，在反对派参加辯論时，也沒有出現这种分歧；大概大部分由鮑尔·卡姆弗迈耶尔执笔的一个馬格德堡草案，有一部分措辞比党执行委员会的草案甚至更为合式。还需要做的工作，基本上属于編輯性质；問題在于，要用最簡單明了的形式，概括党努力达到的思想境界，一方面从現代資產階級社会的历史发展中导出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任务、无产階級运动的最終目标，另一方面则要标出党在这个社会基础上的实际道路。这种对符合有階級觉悟的无产階級的策略，这个阶

級必須在当前的实际条件下进行斗争，但是只有它的最終目标是它在現代階級斗争的多礁的暴风雨的海洋上航行的可靠的罗盘。爱尔福特代表大会經過代表的深入討論以后一致通过的草案，是由考茨基起草的。

敌人說这是一种“綱領騙局”，因为“党的学者”为了給群众的强烈的破坏欲披上一件绚烂的外衣，才把爱尔福特綱領补綴起来。如果这是要說明，2月20日投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票的将近一百五十万选民并非人人都是社会民主党活动的忠实信徒的話，那么这就是徒劳了。《社会民主党人报》在最后几期中的一期上对此发表了中肯的意見，它說，比这更沒有意义的安慰是不可想像的。只要社会党人的选票不是对資產階級社会的无条件的不信任投票，那么这些选票就是对其計劃被所有資產階級政党描繪为典型的神經錯乱的“顛覆”党的无条件的信任投票。这种論证能为敌人爭得什么好处呢？这样，“綱領騙局”的一个方面預先就被取消了。

683

它的另一方面却是一个真正的騙局。新綱領中的每一句話，都是党自己在几十年的斗争中得来的，體驗过的；要詳細证明这一点，就等于从拉薩尔的《公开的答复》到爱尔福特綱領，把党的內部历史再說一遍。

第十一章

从一百五十万票到三百万票

684 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以后的十三年，同本卷所叙述的有它双倍长的一段时期一样，在历史上都是德国无产阶级不可阻擋地、沒有中断地走过的光輝的胜利道路。經過二十七年，社会民主党从起初聚集在拉薩尔的旗帜周围的少数人，发展到有了将近一百五十万帝国議會选举人，从那以后，又經過十三年，它就拥有三百多万帝国議會选举人了；1903年6月16日同1890年2月20日一样，是一个胜利日。

但是，前者并不同后者一样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它沒有推翻政治体系，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議會里是像过去那样只有五十八个議席，还是像現在这样有八十一个議席，这不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問題。加之，资产阶级世界沉溺在这样的可爱幻觉之中：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德累斯頓代表大会上破坏了6月16日的巨大胜利，彻底丧失了和群众中的威信。资产阶级世界終于比过去更相信大炮和其他武器，相信自己任意支配的政治权力；今天，威廉皇帝显得比过去的俾斯麦宮相更有权力，他想自己当元帅，当宰相，他不仅准备实行新反社会党人法，还不停地用武力威胁革命的无产阶级，他比任何人都厉害地咒罵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

因此还要用不多几笔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最后十三年的历史发展描述一下。

一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界政策

的确,威廉二世时期比俾斯麦时期前进了一步,但它不是欣欣向荣的资本主义的进步,而是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的进步。 685

大工业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开路先锋。它创造了比过去世世代代总共造成的还要大、还要多的生产力,它粗暴地摇撼着资产阶级社会的栅栏,它引起生产过剩的瘟疫,这个社会就在这种瘟疫中没落下去,用《共产党宣言》上的话来说,因为社会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商业规模太大,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回复到最简单明了的表现形式,即回复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只有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或者从文明回复到野蛮状态,这个斗争才会结束。欧洲资产阶级一认识到这种情况,它就毫不踌躇地采取抉择。它提出“后退,后退,堂·罗德里哥^①!”的口号,它抹去了旗帜上的自由贸易和和平的词句,在那上面写上垄断和战争。大工业的世界政策往回集中到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商业资本的世界政策上,集中到以侵略和保护为其顶点,夺取尽量多的销售市场,然后力图使这些市场尽量严密地同外界隔绝的世界政策上。

在所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中都有这种反动的现象,但是,它以典型的(可以说在历史上最站不住脚的和对人类的文化发展危害最大的)形式,出现在由于大工业而从几百年的卑下地位中

^① 西哥特人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个国王(710—711),711年与摩尔人作战时战死。——译者

拯救出来的国家即德国里。这种反动现象由于反社会党人法的颁布而出现，并在这个畸形儿身上比任何地方都更明显地打上了它真正的历史烙印。大工业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了最后的结论，激发了只有在更高形式的社会组织中才能发展的许多生产力，它给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礎，摧毁这个基础，是正在崩溃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政策的最有力的动因。人们已经不能像西班牙的菲利浦驱逐摩尔人和法兰西的路易驱逐胡格诺教徒那样把国内最热心生产的居民驱逐出去了，因为外国的财宝不能代替本国劳动的结果，大工业没有工人的有力的双手也不能进行。因此，人们为了使工人成为没有意志的工具，就钳制他们的言论；只有先把工蜂的刺拔掉，雄蜂才能长肥。

在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大工业在大危机的影响下，和反动阶级同于一件事。因此，它就得到了工业关税，同样，破产的容克阶级依靠农业关税和施舍，人为地得以维持生活，军事专制制度依靠财政关税，从尽管资产阶级帝国政党软弱无力、但仍很讨厌的议会监督中解放出来。在这种反动政策中，一个同另一个吻合在一起。但是，在俾斯麦统治时期，这种反动政策还没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作为易北河东的容克，俾斯麦对无限的舰队计划怀有不可克服的嫌恶心情，由于吞下亚尔萨斯—洛林很难消化，以致他做一切海外冒险的兴致全消失了。直到工人阶级开始从他手里抢夺反社会党人法，他只能利用波拿巴式的冒险的全民投票，使自己的统治从一次帝国议会选举勉强维持到另一次帝国议会选举的时候，他才勉强推行殖民政策，这种政策的微薄收益同开始推行这种政策时的大吹大擂成反比。

俾斯麦徒然地试图用现代国家的巨大权力束缚工人阶级，结果这个阶级却把他推下台，这个令人害怕的印象使统治阶级清醒

了一个时期。卡普里維政府做了种种从俾斯麦用侵略政策和保护政策开辟的不幸道路上折回来的准备动作。可是这些准备动作软弱无力，它們很快就碰到依靠走向崩溃的資本主义的世界政策为生的反动党派的不可調和的激烈反抗。这些政党合乎邏輯地利用一場无聊的社会党人恐怖推翻了卡普里維政府，虽然这些政党策划新反社会党人法的不断努力，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刚毅、明智的政策而不断遭到失敗，但是它們的侵略政策和保护政策却越来越肆无忌惮。在俾斯麦时期，德国的殖民政策以取得非洲的几块沙漠地和沼泽地为其开端，这些地方的整个貿易对于巨大的世界市場來說，只是一个次要的小哨所，而十年以后，德国殖民政策就面临着中国問題，即面临侵略最后一个大銷售市場的問題，这个銷售市場可为世界各現代工业国推銷产品，同时这个市場在自己内部具有发展本国的大規模工业的一切条件。同 1902 年圣诞节那几天，反动党派肆无忌惮地压制少数派，經由帝国議會通过的关税率相比，俾斯麦在反社会党人法保护下所实行的关税率上表現出来的保护貿易傾向，就显得非常微弱了。

这种反动的世界政策在帝国主义身上找到了自己的政治表現。正如专制主义是資本主义經濟开始阶段的特殊統治形式一样，帝国主义是資本主义經濟結束阶段的特殊統治形式。在历史上，专制主义出現在那种过渡时期，那时旧的封建等級走向沒落，从中世紀的市民等級中产生了現代資產階級，还没有一个正在斗争的党派能够控制另一个党派。专制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发展資產階級，专制主义的历史命运是被資產階級使自己成为不必要，因而专制主义在最后关头往往投入过去反对过的封建主义的怀抱，同它一起走向灭亡。帝国主义同这种专制主义完全不同，它作为进行統治的資產階級在已經严重地压抑着它的无产階級面前的最后救

星，出現在历史舞台上。因为通常資產階級只有很短的安安稳稳的統治时期，所以帝国主义的开端往往紧跟着专制主义的結尾；而在德国，它們两者則互相融合在一起，这个正直的橡树和菩提树的國家，有着同时在专制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阴影下生活的可疑的享受。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民族苦难，它使人想起馬克思在六十年前所說的話：德国善于把現代國家世界——它的长处德国沒有加以利用——的文明的缺陷和 *ancien régime* (旧制度) 的野蛮的缺陷——这些缺陷德国却大加欣賞——結合了起来。^①

e88 这个責任應該由德国資產階級來負。当它能够消灭专制主义的时候，它沒有学习英法两国資產階級对付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的榜样，采取果断手段。相反地，正当它有能力消灭专制主义的时候，它却彻底成为“拥护君主的”，它接受了对国王具有“真正的”、“确实的”、“不可消除的”忠誠的專利证。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它胜利的时刻，它已經感到无產階級群众前进的脚步碰到了它的脚踵，因为专制主义死亡的时刻就是共产主义誕生的时刻。德国資產階級奉行专制主义所常常奉行的自杀政策；为了换取一段苟延殘喘的时间，它放弃了本来的文明活动，投入过去所反对的敌人的怀抱。可是这样它也只是上了一艘經不住无產階級階級斗争风暴的木船。

帝国主义显得比专制主义有力量得多，但是支持它的力量却比专制主义少得多。如果說，专制主义給資產階級发展鋪平了道路，从而确实完成了历史上的先鋒作用，那么帝国主义只起为了保证有產階級的順利統治而阻止无產階級发展的历史上的宪兵作用。帝国主义的地位比专制主义似乎自由一些，自主一些，因为它

① 參閱卡尔·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2—463頁。

不再在两个阶级而在三个阶级之间保持平衡，不过这种假象是骗人的，因为它不再能唆使一个人反对另一个人，而经常只能唆使一个人反对两个人，也就是只能经常进行没有希望的举动，并且被迫不断改变方针。

对帝国主义来说，两个对付一个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假如它能够使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妥协并且压制工人阶级，它可能成为一个巨大的力量。可是在工人阶级经过了反社会党人法烈火的考验以后，它既不能钳制工人阶级，也不能把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长期结合起来，所谓的“集合政策”经常遭到失败就表明了这一点。另一个可能性是，帝国主义试图实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以反对容克地主，它并不是没有准备这样做，可是它始终只是在这条走上以后只能使自己成为废物的道路上，畏畏缩缩地走了几步。因此它一面曲折行进，一面装着仿佛它只要用手指点一下就能立即使几个洲根本改变面貌似的，而它在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之间的任何实际利益冲突中，都是孤立无援和束手无策的。

上升的社会主义的世界政策同没落的资本主义的世界政策，发生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但同它处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地位。现代无产阶级的智慧和行动力使大工业达到它的顶峰，逐渐排除了资产阶级的“精神领导”，现代无产阶级生来就反对这样一种政策，这种政策在大工业发展同反动阶级的利益发生冲突，给现代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提供救助的杠杆的时候，就阻止大工业的发展。德国工人通过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代表民族的利益，德国工人说：工人阶级越发展，越有知识，他们的生活越富裕，民族工业就越繁荣，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就越巩固；最彻底的社会政策任何时候都是最有成效的世界政策。

从现代无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很容易得出这种简单明了的

認識，因而無論是暴力或是詭計都不能使現代无产階級失去这种認識。要想在这个問題上欺騙德国工人的一切嘗試都立即遭到失敗，尽管这些嘗試是由脫离世俗的、本身并非沒有天賦的資產階級思想家誠心誠意地进行的。这些嘗試中最值得一提的一件是想使无产階級同帝国主义調和的民族社会宣传^①，經過七年的徒勞，这个宣传以它的代表者重新投入他們應該反对的資產階級的怀抱而結束。他們关于无限的舰队計劃^②的无限的雄辯都在工人階級的不可动搖的認識上像短暫的浪花似的碰得粉碎，这个認識是，炮舰政策和殖民政策同粮食關稅和反社会党人法有相同的历史的洗礼证书。

因此帝国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是不可調和的对立物。它們之間不可能有和平，甚至不可能有停战。但是，它們双方进行的斗争，不是两个同等地位的对手进行的、無論如何其結果还没有确定的斗争。从表面上看，而且在一段还不可估計的时期內，帝国主义可能占有程度不同的优势，可是，它的力量每天都在減弱，而它的死敌的力量却在增強。帝国主义吸尽了由于害怕生命財產遭到損失而委身于它的有产階級的政治骨髓，沒有一个階級有資產階級的

① 1896年，福音派神学家和自由党政治活动家弗里德里希·瑙曼(1860—1919)，創立了民族社会协会，旨在使德国工人脫离社会民主党，同資本主义国家“和解”。瑙曼拥护一种“社会的”帝国的思想，大力維護帝国主义实力政策(殖民地統治、扩张軍备)。瑙曼在他办的周刊《援助》和他的著作《民主和帝国》(1900)中，也为这些活动辯护。民族社会协会因为在德国工人中找不到拥护者而遭到失敗，之后，瑙曼和他的朋友就轉向資產階級党派政策。在以后几年中，瑙曼是自由思想联合党的領袖，并和弗里德里希·馮·帕耶尔一起是由这个党产生的进步人民党的領袖。——原編者

② 德国帝国主义者为了能够奉行帝国主义实力政策和取得“向着太阳的地位”，力图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1898年和1900年，关于舰队的头几个重大議案在帝国議會通过，1906、1908和1912年又接着頒布了其他的舰队法。——原編者

情况严重，因为它对自己最不忠实，而屈服于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在同样程度上加强沒有财产的阶级，首先是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政治坚定性，大工业无产阶级不断地看到自己的最不可轉让的切身利益，受到所有政治反动和社会反动的这个代理人的破坏。

帝国主义是唤起对政治还不关心的人民群众的特別有效的工具。帝国主义的历史存在条件給它規定的曲折政策，只能用使民族中的最广大阶层感到反复无常和不持久、从而起很大刺激作用的方式进行工作。这就已經大大动摇了它的威望，而对它的外强中干性质的日常体验，更加严重地动摇了它的威望。帝国主义觉得自己是个能用自己的雷电粉碎任何抵抗的神，而当許多信徒看到它的雷电不发生作用的时候，就走得无影无踪了，这一点是很容易理解的。当帝国主义自以为是一个創造者的时候，它就暴露出自己只是一个不能违背任何一个有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历史存在就是靠这些阶级的共同困难而得到的）而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創造物。

于是，从前专制主义收集起来的政治威信的資本，在帝国主义手里消失掉了。君主統治形式过去促进文明的性质消失了，这种統治形式的一切落后和过时的方面，加倍有害地和明显地显露出来了。在易北河东的野人的官僚、軍事和警察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千百种大大小小的禍害，使德国这个大工业国伤透脑筋。同英国或者法国、俄国、北美相比，德国的帝国主义政策大話說得多得多，而实际行动却少得多。帝国主义是至今出現过的統治形式中需要費用最多的，它不断地要求国民的生命、财产，它刺激沒有财产的 691
各阶层的群众，只是为了把他們从一次失望推入另一次失望之中。

如果說，一般說来，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訓練工人队伍，那么它的帝国主义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让这支队伍在火中操练。它每天都給革命宣传提供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不能理解历史联系、

常常很快就提出一个口号的感觉迟钝的资产阶级，企图用社会民主党的“侥幸”这个名词来说明这一点。这种“侥幸”无非是这一事实，即只有经济上和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能够对帝国主义的破坏作用进行有力的、不可动摇的反抗。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做不到这一点，即使它们试图戴上最顽强的反对派的面具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资产阶级最终都抱住帝国主义不放，因而走向灭亡。

的确，在这个理性变成荒谬、好事变成灾厄的颠倒了的世界里，当帝国主义可以起促进文明作用的时候，能够阻止它，而当它把民族拖上毁灭道路的时候，却必须听之任之，这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幸。反动容克进行了几年的阴谋活动，阻碍开凿运河的提案，却咬着牙赞成“可怕的舰队”；自由派资产阶级千方百计地推迟工人保护立法的小小的进展，但对使它自己惶惶不安的军国主义却毫不吝惜。有幸在帝国主义的阴影中扮演“模范”党的党的命运是最悲惨的。如果说，教皇全权主义至少在俾斯麦担任首相的最初阶段是唯一能够比较坚决和有力地进行反抗的资产阶级政党，那么在帝国主义时期，它就扮演了比民族自由主义在俾斯麦时期所扮演过的更可怜的角色。如果说民族自由主义曾经为了就其方式而言至少是一种历史进步的立法而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话，那么教皇全权主义党就不得不满足于一点最可怜的酒钱，而且就像哈因策法^①那样，这点酒钱也常常在它手里消

^① 1900年6月25日通过的帝国刑法典修订条款被称为哈因策法，因为这次修订是由于对一个叫哈因策的柏林的娼妓保护人的审讯而引起的。这个修订条款补充和加重了对奸淫媒介和纵容卖淫以及传播淫猥印刷物的刑罚。中央党和保守党在帝国议会辩论中企图把导致大大限制当时还存在的文学和艺术自由的若干规定，插到这个修订条款中去。但是，由于广大居民阶层，首先是艺术家和作家的抗议，特别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这一反动阴谋遭到失败。——原编者

失了。

因此所謂沒有祖国的社会民主党成为德国最爱国的政党，唯一爱国的政党，民族中还有政治生命力的部分越来越多地聚集在它周围。党的不断发展只能用这个理由来解释，而不能用任何其他理由来解释。自从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以来，党的发展越来越快，这就使那些幻想反社会党人法的铁箍被掙断以后，党就会瓦解的目光短浅的人們遭到失敗。对工人阶级的不断威胁和迫害，无疑有助于推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可是，即使这个吹风机停止給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火焰送风，它也会继续燃烧下去。它的真正燃料是一个腐朽的世界，只要人类的文明不灭，这个世界就必然在一場烈火中毁灭。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世界历史性沒落所造成的那些现象紛紛出現时，革命的工人运动成了稳定的极点。它一手拿斧头，一手拿鋤刀，不仅摧毁资本主义社会，而且也建設社会主义社会。在最近十三年中，它做了許多实际工作，这里只能简单地談一談这些工作中有最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件，即工会运动的兴起，現在工会运动终于使德国工人的經濟組織同他們的政治組織并駕齐驅了。

二 工会的十年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充分說明，为什么德国工会运动的发展比无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发展較慢。人們通常都把責任推在拉薩尔对工会的理解有缺点方面，可是，無論如何其原因比这要深刻得多。即使人們要假定不能假定的事情，即拉薩尔本人不認識时代的标志，只要德国工会具有較有力发展的历史前提条件，不管拉薩

尔当时在工人中的威望多么大，也远不足以阻止事件的进程。此外，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立场的距离并不像人们通常所估计的那样远。

马克思在反对蒲鲁东的论文中第一次谈到工会问题。虽然1847年，工会受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样的反对，但是马克思把工会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然产物。不过，马克思当时还没有认识到工会对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特殊的和独立的意义。他认为，工会对工业发展有巨大影响，虽然工会所起的作用无非是刺激发明机器来反对自己；此外，他把工会看作是无产阶级为了在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中进行政治斗争，而组织成阶级的初步尝试；他拿工会同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的同盟相比，在组成阶级的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按照自己的形象形成社会以前，资产阶级的同盟一开始也只是局部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1864年秋天（那时拉萨尔已经死了），马克思在国际的成立宣言中指出两件重大事实，说明五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的失败也有起补偿作用的特征，他虽然举出法定的工作日，但是没有举出工会运动而举出合作运动，因而根据他的看法，罗奇德耳的先鋒队^①就是比英国的机器制造者工会更重要的历史现象了，今天，一个社会主义者是很难同意这种看法的。《成立宣言》同拉萨尔的《公开的答复》一样，很少谈到工会问题。相反地，《宣言》说，合作运动“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垄断，但是它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受到全国的财力的支持，就能拯救群众，这种说法同拉萨尔的划时代的鼓动文件的说法近似。^②

① 1844年在英国工业城市罗奇德耳成立的消费合作社的名称。——译者

②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页。

馬克思和拉薩尔本人是这样，他們的拥护者在分开的队伍中行进期間也是这样。尽管拉薩尔厌恶工会，但是，他的拥护者一認識到工人群众自动地走上建立工会的道路，他們就不顾自己队伍中的反抗，首先着手建立工会組織了。人們肯定会說，他們犯过大錯誤，可是，1871年在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把建立和推动公共的生产企业作为工会的主要任务加以推荐的社会民主党的另一派，犯的錯誤恐怕也不小。即使总的說来，拉薩尔派对工会运动比較不关心，不理解，可是这个差别决不至于大到能对“为什么德国工人的工会运动比政治运动发展緩慢”这个問題起某种决定作用。

归根到底，这种現象是由德国历史的整个关联中产生的。同西欧的兄弟姊妹相比，德国資本主义是个晚生子；当德国资产阶级、从而德国无产阶级开始相当迅速地发展的时候，两者已經有了关于它們之間必然发生的阶级斗争的丰富历史經驗。其后果就是无产阶级有比較大胆的自信和比較远大的眼光，资产阶级則有較大的怯懦性和較窄的視野，由此产生的互相助长的影响則是，德国资产阶级放弃了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而工人阶级为了取得它在現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工会組織所需要的自由活动范围，必須集中自己的力量，投入这个斗争。最簡單地自我保存的欲望，促使无产阶级斗争把政治組織置于工会組織之上；假如它顛倒过来做，那么它为了在民族生活中成为一个力量，需要的时间就长得多。

它沒有顛倒过来做，而且根本不可能这样做。成立工会組織的欲望在現代工人阶级中扎的根很深，因而它經常企图生长新根，但是，由于反动官厅借助于落后的立法可以輕而易举地挫敗这些企图，所以工人們不断地趋向政治斗争。接着反社会党人法时期

695 到来了，反社会党人法之所以頒布，并不是因为統治階級害怕社会民主党放火烧它們的房子，而是因為它們想从工人手里夺得工人在資本主义社会中逐步爭得的不多的权利。即使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工会运动也經常不顾警察的压制而重新出現，当然，由于环境所迫，工会运动有时不得不接受一些同它的历史性质无关的任务。

这种情况对反社会党人法垮台后最初几年的工会运动的发展起了不利影响。尤其是关于組織形式的爭論（这也是非常法的一个后果）所耗費的精力和时间，超过必需或人們能够忍受的程度，这种爭論或多或少地排斥了應該为工会組織爭取过来的工人集团。此外又碰到經濟蕭条和企业主的强烈反抗，尽管在“社会王国”（实际上是企业主的国家），这种反抗表現得最为强烈。1890年，哈雷党代表大会对工会运动表示了最深切的同情，可是三年以后，在科伦党代表大会上，虽然对工会运动的正确性沒有产生怀疑，但对它的能力却产生了怀疑。这种怀疑产生于这种忧虑：在資本大量集中的情况下，工会注定是軟弱无力的；或者产生于这种顾虑：国家的工人保險使工会失去了极共重要的职能，以致它不能再存在下去。可是不久工会开始了新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充分证明工会是现代工人运动的一个必要环节，并使工会最終保持同政党并列的地位。帕尔烏斯在对工会这一繁荣时期的光輝研究中写的一段話是永远有价值的历史評价：“自从反社会党人法垮台以来，德国工人的最大功績是工会的发展。在最近十年的政治发展中，它对无产階級階級斗爭的重大意义是无与伦比的。”

696 工会巨大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九十年代中期到末期的工业繁荣。虽然工业繁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助于統治階級的帝国主义政策暂时苟延殘喘，但是工人階級十分热心地利用工业繁荣，不断

扩大工会組織，以致自从新世紀初以来重新发生的經濟危机也沒有能够再使工会陷于停頓。危机使工会的发展緩慢下来，但是沒有中断这一发展。

工会中央联合会的會員人数，由 1893 年組織在工会中的二十万多一点的工人，增加到 1902 年的七十三万三千二百零六人。有二十七种行业，参加工会的工人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有十五种行业，参加工会的工人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这些行业是：印刷工人、雕刻师、銅匠、手套工人、装配玻璃工、鋪石工、石版印刷工、碼頭工人、裱糊匠、造船木工和船厂工人、陶器工人、市政工人、瓦工、石膏胶泥細工、酿酒工人、鑄版匠和雕鏤匠、磁器工人、桶匠、鍍金工、制帽工人、装釘工人、五金工人、木工、画工、伐木工、鋪屋頂工和皮毛匠。随着會員人数的增多，工会的財政收入也增加了。1902 年，工会收入比 1891 年增加了一千万馬克左右，这个时期的支出增加了九百五十万馬克。1902 年，工会的总收入为一千一百零九万七千七百四十四馬克，总支出为一千万零五千五百二十八馬克，金庫存款为一千零二十五万八千五百五十九馬克。自从 1891 年以来，工会中央联合会收入六千二百二十八万七千七百四十三馬克，支出五千五百二十五万四千一百三十一馬克。

但是，产业工人中只有占百分之十四点四二的人組織了工会，因此在这方面还有一件重大工作要做。但是事件已經进入历史的潮流，今天，德国无产阶级的經濟組織扎下的根同它的政治組織同样牢固。同时德国工会发展較晚也有它好的一面，那就是避免了英国工会犯过的錯誤。的确，资产阶级的工人之友立刻努力在这些小麦中播杂草，当工人阶级的經濟組織在經濟繁荣的情况下大力发展，而它的政治組織却必須在弯路上停滞不前的时候，产生了一些竞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很自然的。这时往往对工会运动

697 作出过高的估价，而从前，当政治运动比工会运动发展迅速时，也常常发生过过高估计政治运动的现象。现代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不是工人阶级创造的，而是历史发展造成的，无论在实际上或原则上都很明显，工人阶级在现有条件下能够最有力地挥动的臂膀，自然也是本身比较有力的臂膀。

除去这些没有危险的、不可避免的小摩擦以外，工人的工会运动和政治运动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纠纷，并且已经作了充分的安排，使得将来也永远不发生纠纷。正如七十年代上半期已经表明的那样，九十年代下半期又一次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辉煌的发展对工人的状况也只能作很成问题的改善，而这种发展却使资本发了大财。从1895到1900年，德国金融市场上有价证券新发行额为一百十五亿马克（按行市价值计），这还远不是工业繁荣的这几年中德国资本的总增长数，因为积累起来的资本决不会全部经过交易所。同一时期，根据意外灾难保险显然比较有利的计算，工人的平均收入增加了还不到百分之十五，以致1899年为七百五十二马克整，每周工资还不到十五马克。而后来同七十年代工业繁荣时期一样，增加的这点可怜的收入又被物价普遍上涨在不同程度上抵消了。加之，收入增加只有一小部分是提高工资达到的，而大多是由更正规的上班和加班加点而达到的，以致增加收入也必然是以工业中的意外灾难的增加和绝对地或相对地加强剥削童工为代价的。

工人阶级的工会组织也不能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铁的结论。从1895年初到1899年底，德国工会从自己的金库中拿出五百二十五万马克支持罢工，此外，根据工会总委员会计算，还有自由募集的约二百五十万马克用于这个目的。如果估计工资损失（至少这是可以肯定的）为罢工救济金的两倍，那么那一时期的

698

罢工就使德国工人损失了二千五百万馬克左右。在整个罢工之中，自卫性罢工1895年占百分之四十六，1896年占百分之三十一·三，1897年占百分之四十二·九，1898年占百分之五十三·三，1899年占百分之四十五·五。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以上的罢工是在工业繁荣时期为了不使工人状况进一步恶化而进行的。甚至一次成功的自卫性罢工对工人来说，也不意味着他们的状况的改善，而部分胜利的罢工就是一种损失。1899年的罢工中只有百分之四十五·五导致工人状况的改善，其中百分之三十一·四以工人全胜结束，百分之十四·一以工人一半胜利结束。整个罢工中有一半以上没有改善工人的状况，有百分之二十一以工人状况的恶化而结束。有一条旧经验是，自卫性罢工给工人带来的损失比进攻性罢工要大得多，在九十年代下半期，这条经验也得到证实；自卫性罢工损失的百分比为进攻性罢工损失百分比的两倍。由此可见，一般说来，只有在商业状况特别好的情况下，以及在个别情况下，工会才能成功地进行罢工，而它决不能从自己方面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工会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在于，加强工人阶级的力量，以免工人阶级无条件地落入集中的资本正在增长的力量掌握之中。有一个工会运动的领袖在科伦党代表大会上认为，政治性的阶级斗争的教育作用同经济性阶级斗争的同一作用相比简直等于零，这是不正确的；但是，正确的说法是，工会运动发挥了现代工人阶级的许多才能和力量，这些才能和力量是它的政治运动用这种方式不能发挥的，而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胜利又必须发挥这些才能和力量。因此这两种运动必须互相补充，同任何其他大工业国相比，在德国较少有这种危险：工会会受资产阶级中的所谓工人之友的欺骗性诱惑。

699 帝国主义政策时刻注意给工会运动指出它在德国的唯一真正的朋友。惩役法^①的教训令人永志不忘；这个打击也是针对蓬勃发展的工会运动的，正如过去的反社会党人法的矛头是指向蓬勃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那样。在最繁荣时期，当工业、金融、房主、大地主大发其财的时候，资本恣意著名的社会改革的帝国反对工会，帝国向工人挥舞皮鞭，阻止工人為自己争取从普遍剩余中得到最起码的一份——实在可怜的一份。假如没有社会民主党，惩役法提案就成为法律了；就同过去常见的那样，假如工会运动没有工人的政治运动这个坚强的壁垒，这次工会运动也就被摧毁了。这些经验是不易忘记的，尤其在面包暴利^②的日子里更是这样。即使德国工人运动的两大支要想分道扬镳（它们当然不是这样），面包暴利也会把它们焊接在一起。如果由于提高粮食关税，辛辛苦苦地取得的成就一下子就被有产阶级中最反动的阶级窃取去了，那么工会在最严重的困难条件下，尽最大努力争取提高工资，又有什么用处呢？

工会不是政治组织，它的大门对各党各派的工人都是开着的，在罢工时，它不问罢工者的信仰如何，但是谁要是劝说罢工者，叫他们不必关心工人的政治运动，他就是想使他们看不到自己最重要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个人为了能够欺骗工人，而先学会自我欺骗，那就更危险了。

-
- ① 1900年，帝国议会否决了政府的一个法律草案，这个草案严重威胁着工会的罢工权，其中规定，如果为了抵抗罢工破坏者而设置罢工哨，将被处惩役刑。
——原编者
- ② 1902年，帝国议会中的反动的多数派提高了谷物保护关税，结果面包价格上涨，德国大地主发了财。1903年帝国议会选举期间，社会民主党为反对这种面包暴利而进行斗争，在选举中取得非常的胜利，每三个选民中就有一人投了社会民主党的票。
——原编者

虽然如此，德国无产阶级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之间的牢固联系，将来可能被解开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因为资产阶级雄辩的所有飘动的肥皂泡都在帝国主义政策的行动上碰碎了。

三 修正主义

党的敌人把党的分裂的更大希望寄托在关于所谓修正主义 700 运动的争论上，这一争论支配着好几次党代表大会，并产生了内容相当广泛的文献。当然这一争论丝毫也没能影响党的实际政策，而且，只要它没有显示出这种精神和力量，它就沒有任何历史意义。

正如过去的老年派和青年派之争这个名称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争这个名称，也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党内没有，也不可能有连马克思本人也不想当的那种马克思主义者；盲目相信老师的话，只不过是每个认识达到极限的最终真理的学派的悲惨命运。马克思主义并不知道任何这样的真理。它不是万无一失的教条，而是一种科学方法。它不是另一个个人能够提出另一套更高的理论与之对抗的个人理论；相反，它是思想领域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它由事物本身，由历史发展中成长，并随着它们变化而变化；因此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空洞的欺骗，也不是永恒的真理。同这一点完全相适应的是，那些善于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方法修正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得出的科学结论的，正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要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支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多地支配这种生活，马克思主义就是一切社会科学的结论，当然是真正社会科学的结论，对这种社会科学来说，重要

的是真正的認識，而不是美化的目的。誰要是想超过作为科学方法的馬克思主义，而又不願干脆回到資產階級世界，那么他不是陷入折衷主义，就是陷入怀疑論。当他用七拼八凑的材料建立一种新理論来同紙房子比賽牢固程度的时候，他陷入折衷主义，当他在馬克思的每个論点后面都画一个問号，或者也按照萊辛已經指出过的方法，用所謂常識可以接受的东西来同这个或那个論点对抗，而带着得意的輕蔑心情无視其他一切的时候，他就陷入怀疑論。

701 修正主义这只沒舵的船，就在那种折衷主义和这种怀疑論两个漩渦之間盲目航行。

修正主义的实质就是空洞无物。由于它不能正确地認識自己，所以它感到被大家誤解，不是沒有理由的；它純粹是迷雾，所以它必然不是有血有肉的。它不是从社会主义理論基础，而是从資產階級观念出发修正社会主义理論，它甚至被資產階級观念吓破了胆，什么也不敢說。馬克思主义用来研究当前现实的不断的批判，对馬克思主义來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对修正主义來說，却成了目的本身；修正主义为修正而修正，由显然害怕絕对的教条而无視一切相对真理。它的思想不彻底，当事物的邏輯刺中它的痛处的时候，它就抱怨缺乏“溫文尔雅的态度”。

因此，它从无，經過无，到无。从来还没有一个比修正主义更坏的預言家。当九十年代后半期的工业繁荣，促使“正統的”馬克思主义者深入和刻苦地研究馬克思主义关于危机的理論从而得到何等程度的修正时，修正主义直率地宣称，在一个較长时期內根本不可能产生过去那样的普遍商业危机，可是随后不久发生的危机及时回答了这个問題。当馬克思主义者高兴地欢迎工会的不断發展，但并不因此忽視以大得多的程度不断增长的資本积累的时候，修正主义却說工会的成就会逐步剝夺資本家階級。馬克思主

义者研究帝国主义政策的新形式，并且预言这种新形式将把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消耗光，而给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创造越来越大的活动范围，这时修正主义者却幻想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工人党，这个党必然在同仍然相当健康的资产阶级的联合中寻求自己的幸福，随后1903年的帝国议会选举和邦议会选举又一次及时作出了答案。

在这种情况下，修正主义在历史上引人注意的仅仅是这个问题：修正主义怎么会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产生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党的实际工作的负担过重，大大耗费了它的力量；党的发展迅速，使各个阶层的各种各样的分子进入党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702的转变，在社会主义思维方式变成他们的全部脑纤维以前，总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总之由于一系列情况，这些情况使曾经受到马克思赞扬的德国工人的伟大理论鉴别力一时减色了。

可是，尽管这种理论鉴别力在一种本身有益的和必要的发展的影响下也会减色，它远没有因此而消失。它同过去一样生气勃勃地存在于工人群众之中，最有力的证明是，修正主义在工人群众中从来未能站稳脚跟，它对工人群众的实际运动根本没有产生丝毫影响。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十分顽强，不会由于单纯的思潮而停止不前。在德国，修正主义从来不过是一种思潮而已。

这种思潮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所以也不会一下子就消逝。就这一点说来，修正主义可以夸耀说，即使在德累斯顿党代表大会以后，它仍然继续存在着。但是，当它面临存亡的问题时，又一次黯然失色了，它的许多代表人物通过一些喧闹的场面表示了对“温文尔雅的态度”的渴望，这些场面是用来掩护它的退却的，正如过去类似的场面也曾掩护过青年派的退却一样。在这以后修正主义只是苟延残喘了。资产阶级敌人由于对无产阶级群众运动不可救

药地无知，所以幻想社会民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在德累斯頓受到打击，可是这个幻想沒有实现；正如垂直照射的阳光往往使高山上的游客看不清地平綫一样，群众运动中的浮云在不可遏止的成就的子午綫高度上稍稍模糊了远景，而这些浮云終究被一直鼓舞着德国工人运动的早就存在的革命思想驅散了。

第十二章

回顾与前瞻

回顾十九世紀革命的工人运动，時間是相当短促的，一两个世代的時間在人民的生活中又有什么意义呢！虽然如此，这段短促的時問，已足以使它发展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如果說，它只要考虑胜利就行了，这也未免过甚其詞，因为最艰苦的斗争还在前面。在这些斗争中，它可能像过去那样遭到失败；当然，如果它在将来遭到失败，那么这些失败会比过去的失败更痛苦。但是任何失败，甚至最严重的失败也不能摧毁的，就是革命的工人运动本身。它成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支柱，魯道夫·迈耶尔談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时說得对：如果没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兴盛，就没有德国工业的繁荣，換句話說，如果德国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被击潰，德国就会从伟大的文明民族的舞台上消失，当然这种情况实际上是绝对不会产生的。

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群众性运动，就像一幅巨大的壁画一样，只能从一定的距离来观赏，如果有人用放大鏡来观察，就会觉得除了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斑点和线条以外，没有别的东西。鼠目寸光会使人迷失方向，今天讀到一个有名的资产阶级作家在不到三十年前写的一段話，感到多么奇怪，他說，人們对于一个在各处传道的德国天主教神甫不会加以鄙視和嘲諷，可是对于旅途中

在旅館里进行宣传的拉薩尔分子，加以这样的鄙視和嘲諷却是理所当然的！一个人如果能够从历史上来思考和判断，他就能够經常根据革命工人运动的伟大的历史关系来理解这个运动。当然，另一方面他也会感觉到：同这个巨大的世界轉折相比，个人是多么渺小！他追隨着潮流的胜利发展，但是对于潮流深处的事物，对于精神力与道德力，对于人类的高尚品质，对于通过千百万人的命运推动潮流前进的事业心和求知欲，只能产生一个肤浅的概念：对要想配得上“現代詩人”这个名称的現代詩人來說，这是最宝贵的资料的无尽泉源。

并不是說有階級覺悟的无产者因此而成为一个完人，让沒落的資產階級用“超人”的丑态，安于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墮落吧；工人运动是真正人道和純粹人道的运动。在資本主义对多数人无人道的状况下，怎么能产生理想的人呢！工人階級正努力从人类屈辱的深淵上升到符合人的尊严的生活，但是在这场斗争中发揚了真正人道的一切特点——資產階級的时髦哲学家尼采极力誹謗的特点：公德心、善良願望、体諒、勤勉、节制、謙遜、寬恕。虽非始終一貫，虽非普遍一致，虽然不是沒有障碍和累犯錯誤，但是一个人如果了解現代工人階級，就能認識一种巨大进步，这种进步对于人类文化具有比各种宗教的教条和各种哲学的学說重大得多的意义。

因此，資產階級煽动家所搞的政治是最卑鄙、最愚蠢的。但是，企图根据所謂伦理的理由用所謂伦理的手段来控制无产階級的階級斗争的那些善意的思想家們，在最順利的情況下也不知道干什么才好。仿佛这种斗争的依然具有挑畔意义的令人不快的反抗性，并不总是一种严峻而剛毅的美德似的，正如自願屈服于不体面的桎梏之下，是一种卑怯而懦弱的罪恶一样。

对于現代无产階級來說，是否应当进行階級斗争以摆脱雇佣

奴役的桎梏，已經不再成为問題，問題仅在于如何才能最迅速地使这种斗争取得可靠的結局。自从空想的社会主义消失以来，关于这方面的所有重大的怀疑也都消失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今天的策略，依然和过去《共产党宣言》所推荐的，以及后来拉薩尔的《公开的答复》結合德国的特殊情况所主张的策略相同。在资本主义社会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每年都产生新的任务，关于这些任务的解决，党内往往意見分歧。总是有一派主张更多重視革命的最終目的，另一派則主张更多地重視达到这种目的的实际方法，这是由事物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决定的。但是既然方法和目的之間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这种矛盾就产生出一种合力，促使党迅速前进。党在过去犯过錯誤，将来还可能再犯錯誤，但是世界上还没有一种力量能使它长期背离它的目的或使它长期迷失达到目的的正确道路。

有一些愚人正因为現代社会民主党已抛弃一切空想，于是大談特談其社会民主党人的“空想”，关于这种愚人还值得一提嗎？党感到滿意的是，它向粉碎雇佣奴役制迈进的每一步，也就是向建設共产主义社会迈进的一步。一般說来，这样才能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解放斗争，否則根本不能实现。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口袋里沒有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所以嘲笑它，这就同因为资产阶级的伟大先驱者粉碎封建桎梏时不能預知拥有輪船、火車和上千种技术奇迹的現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嘲笑他們一样。費希特过去确实是德国的思想最自由的学者，同时也是一切时代的最伟大思想家之一，他正好在一百年以前設計了一个资产阶级未来国家的图景，今天甚至容克地主和僧侶也认为是一个反动的空想而加以拒絕。因此过去摆脱封建桎梏不是资产阶级的空想，那么今天摆脱资本主义桎梏同样也不是无产阶级的空想，因为无产阶级一劳永逸地放弃設計一个无人能够預見的未来图景。

在这两种情况下，过去和现在都产生一种具有无情的威力的历史的必然性。真正不同之点仅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速度不同于封建社会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的速度，这种速度的差异好像机车和驿车的速度差异，而打破资本主义的桎梏，也就是打破束缚人类的最后一种桎梏。

现代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世界史上最光荣和最伟大的解放斗争，德国社会民主党率先进行这一斗争这个事实，可以洗刷德意志数百年的耻辱。

注 释

第 五 部

帝国的建立和社会民主党 (第 371—391 頁①)

除去各种党报以外,参考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建立时的暴力和经济》,载《新时代》第 14 卷上册,第 676 頁 (Engels, Gewalt u. Ökonomie b. d. Herstell. d. Deutsch. Reichs, NZ 14¹ 676)。今天,通过罗马尼亚国王卡尔的回忆录,1894 年柏林版 (Denkwürdigkeiten des Königs Karl von Rumänien, Berl. 94),可以知道俾斯麦要让霍亨索伦王族当西班牙王位继承人,是給波拿巴設的一个陷阱。窜改埃姆斯急电的意义較小,虽然用种种狡辯都不能取消这一窜改,但是它沒有引起战争。关于在凡尔赛发生的事件,見布施《俾斯麦及其一伙》,1878 年萊比錫版 (Busch, Bismarck u. s. Leute, Leipz., 78); 皇太子的日記,載 1888 年 10 月的《德意志評論》(Deutsch. Rundschau); W. 翁肯在一本紀念册上发表的威廉国王的信件;洛伦茨《威廉皇帝和帝国的建立》,1902 年耶拿版 (Lorenz, Kaiser Wilhelm u. d. Begründ. d. Reichs, Jena 02); 施蒂伯的回忆录;帝国議會关于凡尔赛条約的討論。国际关于战争的宣言,載馬克思《法兰西內战》。白拉克《不伦瑞克委员会》,1872 年不伦瑞克版 (Bracke, Braunschweiger Ausschuß, Braunschw. 72)。《萊比錫叛国案》,1894 年柏林版 (Leipziger Hochverratsprozeß, Berl. 94)。

財源茂盛 (第 392—403 頁)

濫設企业騙局:魯·迈耶尔《德国政界的濫設企业者和营私舞弊》,1877 年萊比錫版 (R. Meyer, Pol. Gründer u. d. Korrupt. i. Deutschl., Leipzig 77),这本书最精彩,最彻底地叙述了五十亿賠款时期的情况。格拉高《交

① 系原文书頁碼,检索时請查本书边碼。下同。——譯者

易所騙局和濫設企业騙局》，1870年萊比錫版(Glagau, D. Börsen- u. Gründungsschwindel Leipz. 70)；格拉高的事实叙述是可靠的，但是他的观点是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的和鄙俗的观点。《关于建筑铁路的报告》，载普鲁士邦議會印刷物。梅林《得救的米凱尔》，载《新时代》第12卷上册第801頁(Mehring, D. gerettete Miquel, NZ 12¹, 801)和《布莱希勒德的伙計(卡尔多夫)》，载《新时代》第16期上册第705頁(Bleichröders Kommis (Kardorff), NZ 16¹, 705)，此外关于报刊的种种参与，見《資本和报刊》一文。

文化斗争：恩格斯《德意志帝国建立时……》。

农业社会主义：《柏林評論》(Berliner Revue)；洛貝尔图斯《信贷困难和书信》(Rodbertus, Kreditnot u. Briefe)；魯·迈耶尔《解放斗争》(R. Meyer, Emanzipationskampf)。

讲坛社会主义：《1872年10月6日和7日爱森納赫會議的討論》，1873年萊比錫版(Verhandlungen d. Eisenach. Versamml. am 6./7. Okt. 72, Leipzig 73)。奥本海姆《讲坛社会主义》，1872年柏林版(Oppenheim, D. Kathedersozialism., Berl. 72)。阿·瓦格納《致奥本海姆的公开信》，1872年柏林版(A. Wagner, Off. Brief a. Oppenheim, Berl. 72)，这本书是对拉薩尔的棒击的不成功的模仿。布伦坦諾和施穆勒無論从历史上或論战上都代表讲坛社会主义；布伦坦諾《班貝尔格尔先生的“科学”貢獻》(Brentano, D. “wissenschaftliche” Leistung d. Herrn Bamberger)比較班貝尔格尔《工人問題》，1873年斯图加特版(Bamberger, Arbeiterfrage, Stuttg. 73)；施穆勒《法律和国民經济的几个基本問題》，1875年耶拿版(Schmoller, Üb. einige Grundfr. d. Rechts u. d. Volkswirtsch., Jena 75)，比較特賴奇克《社会主义及其建立》，1875年柏林版(Treitschke, D. Sozialism. u. s. Gründ., Berl., 75)。下列两本书典型地說明，同社会民主主义相比，讲坛社会主义是不足的：赫尔德《德国工人报刊》，1873年萊比錫版(Held, D. deutsche Arbeiterpresse, Leipz. 73)和赫尔德《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政策》，1878年萊比錫版(Held, Sozialism., Sozialdemokr. u. Sozialpolit., Leipz., 78)。

拉薩尔派和爱森納赫派 (第404—446頁)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和《人民国家报》。恩格斯《論住宅問題》，1872年

萊比錫版。《海牙代表大会上伦敦总委员会的正式报告》，1872年不伦瑞克版 (Offizieller Bericht d. Lond. Generalk. a. d. Haager Kongreß, Braunsch., 72)。《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1872年日内瓦版 (Les prétendues scissions dans l'Internationale, Genève 72)。《一个反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阴谋》，1874年不伦瑞克版 (E. Komplott gegen die Intern. Arbeiterassoz., Braunsch., 74)。卡·希尔施《巴枯宁先生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和实际的政治活动》，1872年萊比錫版 (K. Hirsch, D. angebl. soz. Theorien u. d. wirkl. pol. Bestrebungen d. Herrn Bakunin, Leipz. 72)。吕埃克《致约·菲·贝克尔的信》，载《新时代》第6卷第449页 (Rüegg, A. Briefen an J. Ph. Becker, NZ 6, 499)。恩格斯《卡尔·马克思》，载白拉克的《人民历书》，1878年版。《人民国家报》对海牙大会的讨论作了详细的报道。狄慈根《社会民主党的信仰》 (Dietzgen, D. Religion d. Sozialdemokr.) 和发表在《人民国家报》上的其他论文。卡·奥·施拉姆《国民经济学原理》，1876年萊比錫版 (C. A. Schramm, Grundz. d. Nationalökon., Leipz. 76)。李卜克内西《祝辞：知识就是力量，力量就是知识，为了防御和攻击》，1872年萊比錫版 (Liebknecht, Festreden: Wissen ist Macht, Macht ist Wissen, Zu Schutz u. Trutz, Leipz. 72)。白拉克《拉萨尔的建議》，1873年不伦瑞克版 (Bracke, D. Lassallesche Vorschlag, Braunschweig 73)。卡尔·希尔曼《实际的解放信号》，1873年萊比錫版 (Karl Hillmann, Prakt. Emanzipationswinke, Leipz. 73)。A. 布林格曼《德国木工运动史》，1903年斯图加特版 (A. Bringmann, Gesch. d. deutschen Zimmererbewegg., Stuttg. 03)。布林格曼和我对施韦泽的品格和活动的看法是一致的，但是他认为拉萨尔派比爱森纳赫派更有力地推动了工会运动，因此在这一点上同我发生争论。但是现在我不能相信这一点，而是认为布林格曼过分片面地从木工运动的立场来判断问题，的确木工运动同瓦工运动一样，在拉萨尔派那里得到特别有力的发展。弗兰茨《伯梅尔特先生和他对科学的歪曲》，1873年苏黎世版 (Franz, Herr Böhmert u. s. Fälschungen d. Wissensch., Zür. 73)，比较伯梅尔特《社会主义和工人问题》，1872年苏黎世版 (Böhmert, Sozialism. u. Arbeiterfr., Zür. 72)。施韦泽《致德国工人书》，1872年汉堡版 (Schweitzer, A. d. Arbeiter Deutschl., Hamb. 72)。朗格《工人问题》第3版。谢夫莱《社会主义精义》，1874年哥达版 (Schäffle, Quintessenz d. Sozialism., Gotha 74)。

特賴奇克《社会主义及其保护人》(Treitschke, D. Sozialism. u. s. Gönner)。

哥达合并代表大会 (第447—453頁)

《合并代表大会记录》，1875年莱比錫版 (Protokoll d. Einigungskongr., Leipz. 75)。馬克思《关于綱領的信》。伯恩斯坦《哥达綱領产生的经过》，載《新时代》第15卷上册，第466頁 (Bernstein, Z. Vorgesch. d. Gothaer Progr., NZ 15¹, 466)。卡·希尔施《党的报刊》，1876年莱比錫版 (K. Hirsch, D. Parteipresse, Leipz. 76)。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第454—483頁)

恩格斯《保护关税和自由貿易》(Engels, Schutzzoll u. Freihandel)。考茨基《德国和美国的关税政策》，載《新时代》第9卷上册，第161頁 (Kautsky, Deutsche u. amerik. Zollpolitik, NZ 9¹, 161)。关于反犹太主义和保护关税主义反动派的大量文献，我不詳細列举了。波辛格尔《国民經济学家俾斯麦》，1889—1891年柏林版 (Poaching, Bismarck a. Volkswirt, Berl. 89 bis 91)。庫阿尔克《德国工厂視察員外史》，1889年法兰克福版 (Quarck, Z. äuß. Gesch. d. Fabrikinspekt. i. Deutschl., Frankf. 89)。1876年和1877年哥达代表大会的记录。白拉克《打倒社会民主党人！》，1876年不伦瑞克版 (Bracke, Nieder mit d. Sozialdemokraten! Braunsch. 76)。(翁魯)《社会民主党，它对选民許了什么願，它想干什么》，1876年柏林版 [(Unruh), D. Sozialdemokr., was sie d. Wählern versprechen u. was sie wollen, Berl. 76]。威(廉)·施(普利特格貝尔)《同社会民主党进入懶人的天国》，1876年馬格德堡版 [(Wilhelm) Splittgerber, Ins Schlaraffenland m. d. Sozialdemokr., Magdeb. 76]。白拉克《自由派陣营的絕望》，1876年不伦瑞克版 (Bracke, D. Verzweifl. i liberal. Lager, Braunsch. 76)。李卜克內西《欧洲应当成为哥薩克的欧洲嗎？》，1878年莱比錫版 (Liebknecht, Soll Europa kosakisch werden? Leipz. 78)。H. 萊(維)《社会主义工人党应当成为土耳其的党嗎？》，1878年苏黎世版 [(H. L(évy), Soll die sozialistische Arbeiterpartei türkisch werden? Zür. 78]。莫斯特《資本和劳动》，开姆尼茨版 (Most, Kapital u. Arbeit, Chemn.)。莫斯特《古羅馬和独裁君主制的社会运动》，1878年柏林版 (Most, D. sozial. Beweg. i. alten

Rom u. d. Zäsarismus, Berl. 78)。莫斯特《社会问题的解决》，1876年柏林版 (Most, D. Lösung d. sozial. Frage, Berl. 76)。《未来，社会主义评论》，1877—78年在柏林出版 (Die Zukunft, Sozialist. Revue, Berl. 77/78)；1878—79年度还出了三期。《新社会，社会科学月刊》，1877—1880年在苏黎世出版 (Die neue Gesellschaft, Monatsschr. f. Sozialwissensch., Zür. 77 bis 80)，共出三十期。杜林《哲学批判史》(Krit. Gesch. d. Philos.)，*《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Krit. Gesch. d. Nationalökon. u. d. Sozialism)，*《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Kursus d. National- u. Sozialökon.) 都是七十年代在柏林出版的。恩格斯《反杜林论》。伯恩斯坦《反杜林论第三版》，载《新时代》第13卷上册，第101页。(Bernstein. Z. dritten Auflage d. Anti-Dühring, NZ 13¹, 101)。

反社会党人法 (第484—509页)

欧根·李希特尔《进步党和社会民主党人》，1878年柏林版 (Eug. Richter, Fortschrittsp. u. Sozialdemokrat., Berl. 78)。欧根·李希特尔《社会民主党人，他们想做什么，他们如何活动》，1878年柏林版 (Eug. Richter, D. Sozialdemokr., was sie wollen u. wie sie wirken, Berl. 78)。图恩《下莱茵的工业》(Thun, Industr. a. Niederrh.)。托特《德国的激进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社会》，1878年维滕堡版 (Todt, D. radikale deutsche Sozialism. u. d. christl. Gesellsch., Wittenberg 78)。施特克尔《宫廷传教师和政治活动家十三年》，1895年柏林版 (Stoecker, 13 Jahre Hofpred. u. Politiker, Berl. 95)。葛雷《福音派的社会运动》，1896年莱比锡版 (Göhre, D. evangel.-soz. Bewegung, Leipz. 96)。《前进报》中有关于谋刺案和白色恐怖的丰富资料，那里还载有马克思和布赫尔的论战，最近波辛格尔予以重印。特赖奇克《社会主义和暗杀》，1878年柏林版 (Treitschke, D. Sozialism. u. d. Meuchelmord, Berl. 78)。帝国议会关于两个反社会党法草案的讨论。

第六部

同第一版相比，第五部没有作重大修改，第六部至少没有作我打算为第二版作的彻底修改。

我在第一版(1898年)中谈到：“我的目的首先是，按照整个历史来叙述反

社会党人法时期。如果说宪章运动和工会运动、六月斗争和公社斗争有许多动人的英雄事迹，那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十二年的聪明、坚决、勇敢的斗争中第一次战胜了具有强大权力手段的现代国家。当我努力明确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事实时，当然详细叙述必然碰到许多困难……如果后来我能够把这些材料再加工一次，那么我的叙述就可以补充一些细节，对德国工人阶级来说，这些细节就其性质而言，值得赞扬的程度不亚于这十二年英勇斗争的伟大进程。”虽然如此，我还是放弃实现这个意图，因为我没有找到为了各方面都合适的所需要的充分材料。虽然在最近五年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对某一地点或某一时间的详细叙述，但是仅仅是一些片断，因此我认为，与其由于光明面和阴暗面分配不均，而搅乱整个时代的历史前景，还不如暂时保持一般的、但本身完整的图景。

但是，我在本书末尾对从爱尔福特代表大会到德累斯顿代表大会的历史发展作了一个概述。当然，这个概述只能是非常粗浅的，但是我希望这一（我不能说是阐述，而只能说是）示意，受到不少读者的欢迎。我近乎狂妄地明确反对这一点：这些示意不是想作最终的叙述，如果它们包含关于现在同过去的关联的一些指示，就足够了。

一个了解内情的人（伊格纳斯·奥艾尔）所写的回忆录为反社会党人法的头十年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十年以后，反社会党人法史的材料和注解》，1889和1890年伦敦版（Nach zehn Jahren, Mater. u. Gloss. z. Gesch. d. Sozialistenges., London 89 u. 90）。施默勒《反社会党人法颁布后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工会》，1896年耶拿版（Schmölle, D. sozialdemokr. Gewerksch. i. Deutschl. s. d. Erlasse d. Sozialistenges., Jena 96），施默勒是这一时期的工会运动史的勤勉而有学识的编纂者。《反社会党人法十二年》，1890年柏林版（Zwölf Jahre Sozialistengesetz, Berl. 90）一书，是教皇全权主义的新闻记者的一本轻率的著作。布朗特编（1882年柏林版）和阿茨罗特编（1886年柏林版）的《警察根据反社会党人法发布的禁令明细表》。察赫尔《红色国际》，1884年柏林版（Zacher, D. rote Intern., Berl. 84），《1883年到1886年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1887年柏林版（Sozialism. u. Anarchism. v. 83 bis 86, Berl. 87），《无政府主义及其支持者》，1887年柏林版（D. Anarchism. u. s. Träger, Berl. 87），克里特尔《社会民主党的

秘密机关报》，1887年馬格德堡版(Krieter, D. geh. Organ d. sozialdemokr. Partei, Magdeb. 87) 和类似的几本著作，都是毫无价值的警察出版物。我的主要資料来源仍然是在苏黎世和伦敦出版的十一年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帝国議會打字记录。关于这一时期党内历史的資料，奥艾尔《从哥达到維登》，1901年柏林版(Auer, Von Gotha bis Wyden, Berl. 01)；施留特尔为《紐約人民报年鉴》写的几篇論文和对1903年10月21日的回忆录，以及奥艾尔、倍倍尔、伯恩斯坦、莫特勒和津格尔等人的文章。

混乱的一年 (第513—526頁)

卡·希尔施《灯笼》，在布魯塞尔出版，从1878年12月15日到1879年6月29日出了二十九期。莫斯特《反自由的策略》，1880年伦敦版(Most, Taktik kontra Freiheit, London 80)，这本书收有《自由》初期最重要的論文。《社会科学年鉴》，1879年到1881年在苏黎世出版，两个年度分为三卷。《国家学研究》，1879年到1881年在萊比錫出了約二十期。我在第一版中談到維登党代表大会上的爭論时說：“毫無疑問，不是領袖而是群众挽救了局势。”我把这句话刪去了，因为这句话首先引起奥艾尔和倍倍尔的誤解，从字面上看，也許会引起这种看法：仿佛当时領袖們沒有尽到責任似的。这是不公平的，而我也沒有这种看法。我想說的只是，群众的本能通过領袖們的意見分歧找到了正确的道路。我认为，产生了这种爭論是沒有疑問的，这并不抹煞，所有領袖都尽最大的心力履行自己的义务，也不抹煞，他們之中有一部分人一开始就認識了正确道路。再說，我力图从各种不同的动向来描述反社会党人法的第一年，因此可以刪去这句总结性的話，因为其明确的形式可能而且已經引起了誤解。

新的进军 (第527—559頁)

(卡尔·施奈德)《社会民主党的后盾》，1890年柏林版[(Karl Schneidt), Die Hintermänner der Sozialdemokratie, Berl. 90]，这本书关于哈賽尔曼和莫斯特的背叛有一些值得注意的报道。《維登代表大会记录》，1880年苏黎世版(Protokoll d. Wydener Kongresses, Zür. 80)。金采尔《德意志帝国法院审理的第一件叛国案》，1881年萊比錫版(Künzel, D. erste Hochverratsproz. vor dem deutschen Reichsgericht, Leipz. 81)，根据速記手稿。

問題和答案 (第 560—575 頁)

《同社会民主党斗争中的德国秘密警察, 文书和揭露》, 1882 年苏黎世版 (Die deutsche Geheimpolizei i. Kampfe m. d. Sozialdemokr., Aktenstücke u. Enthüll., Zür. 82)。《反对柏林工会理事会的大案件》, 1883 年慕尼黑版 (D. Monsterprozeß gegen die Vorstände der Berliner Gewerkschaften, München 83)。施默勒《反社会党人法颁布以来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工会》, 1896 年耶拿版《哥本哈根代表大会记录》, 1883 年苏黎世版 (Protokoll d. Kopenhagener Kongresses, Zür. 83)。

科学的收获 (第 576—582 頁)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884 年苏黎世版, 1892 年斯图加特第三版。席佩尔《现代的贫困和现代的人口过剩》, 1883 年莱比锡版, 1888 年斯图加特新版 (Schippel, D. moderne Elend u. d. moderne Übervölker., Leipz. 83)。卡·施米特《根据马克思价值法则的平均利润率》, 1889 年斯图加特版 (K. Schmidt, D. Durchschnittsprofitrate a. Grund d. Marxschen Wertges., Stuttg. 89)。伯恩斯坦、考茨基、雪恩朗克在《新时代》和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

鞭子和糖果 (第 583—611 頁)

考茨基《奥地利的工人运动》, 载《新时代》第 8 卷, 第 49 页 (Kautsky, D. Arbeiterbewegg. i. Österr., NZ 8, 49)。《施特尔马赫案件》, 1884 年维也纳版 (Prozeß Stellmacher, Wien 84)。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 1895 年斯图加特第二十五版。福尔马尔《社会主义孤立国》, 1878 年苏黎世版 (Vollmar, D. isolierte sozialist. Staat, Zür. 78)。

結束的开始 (第 612—630 頁)

《瑞士的无政府主义阴谋活动, 联邦总检察长的报告》, 1885 年伯尔尼版 (Anarchistische Umtriebe i. d. Schweiz, Bericht d. eidgenöss. Generalanwalts, Bern 85)。卡·布朗《关于帝国法院审理的两大叛国案的报告和考察, 在群魔殿中》, 1885 年汉堡版 (K. Braun, Berichte u. Betracht. über

die beiden großen Hochverratsprozesse v. d. Reichsgericht, in Pandämonium, Hamb. 85)。庫阿尔克《德意志帝国的工人保护立法》，1886年斯图加特版(Quarck, D. Arbeiterschutzgesetzg. i. deutschen Reiche, Stuttg. 86)。《关于内衣制造和現成服装行业女工情况調查报告》，載德意志帝国議會印刷物中，雪恩朗克在《新时代》第6卷第116頁上曾对此加以評論。还可參閱K. 法兰克斯坦《德国大城市女工状况》，1888年萊比錫版(K. Frankenstein, D. Lage d. Arbeiterinnen i. d. deutsch. Großst., Leipz. 88)，《二十年的柏林女工运动》，1889年柏林版(Die zwanzigjährige Arbeiterinnenbew. Berlins, Berl. 89)。《劳动权》，1885年慕尼黑版(Recht auf Arbeit, München 85)。考茨基《洛貝尔图斯的資本》，載《新时代》第2卷，第337頁(Kautsky, D. Kapital v. Rodb., NZ 2, 337)。卡·奧·施拉姆《卡·考茨基和洛貝尔图斯》，載《新时代》第2卷，第481頁(C. A. Schramm, K. Kautsky u. Rodb., NZ 2, 481)，考茨基《答辯》，第494頁(Kautsky, E. Replik, 494)，卡·奧·施拉姆《給卡·考茨基先生的答复》，載《新时代》第3卷，第218頁(C. A. Schramm, Antwort a. Herrn K. Kautsky, NZ 3, 218)，考茨基《結束語》，第224頁(Kautsky, Schlußwort, 224)。卡·奧·施拉姆《洛貝尔图斯、馬克思、拉薩尔》，1886年慕尼黑版(C. A. Schramm, Rodb., Marx, Lassalle, München 86)。伯恩斯坦《一个道德批評家和他所批評的道德》，載1886年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第4至7号 and 第9号(Bernstein, E. moral. Kritiker u. s. krit. Moral, ZSD 86, Nrn. 4 bis 7 u. Nr. 9)，謝夫萊《沒有前途的社会民主党》，1885年杜宾根版(Schäffle, D. Aussichtslosigkeit d. Sozialdemokr., Tüb. 85)。詳細討論見《新时代》和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

反社会党人法的垂死掙扎 (第631—652頁)

关于迫害工会运动的情况，除去施默勒的著作外，尤其是《德国工人的联合权》一文列举了許多事实，这是瓦工宣传委员会致帝国議會的一份請願书，1889年汉堡版。倍倍尔《关于弗賴貝克判決的报刊評論》，1886年萊比錫版(Bebel, Preßstimmen über das Freiburger Urteil, Leipz. 86)。穆塞爾《反社会党人法和司法》，1889年卡尔斯魯厄版(Muser, Sozialistenges. u. Rechtspfl., Karlsruhe 89)。《圣加侖代表大会記錄》，1887年圣加侖版

(Protokoll über den Parteitag in St. Gallen, St. Gallen 87)。

九十九天 (第 653—656 頁)

关于普特卡默被免职一事还有另一种说法，据说是俾斯麦促成的，因为普特卡默是反对卡特尔的正统派反动集团的“未来成员”，或者俾斯麦怀疑他是这种人。这种关系多半不是以至今关于普特卡默被免职一事的一切已知情况为根据的。

总崩溃 (第 657—672 頁)

俾斯麦关于皇太子的日记的直接报告。俾斯麦的儿子和莫里尔的通信。从 1886 年 1 月到 1890 年 10 月，《人民报》由我任主编；我在 1889 年 3 月 9 日和 18 日写的文章（前者是导致查封该报的表面原因，后者是真正原因）是相当温和的，但仍受到包括《法兰克福报》、《自由思想者报》和《福斯报》在内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报纸的激烈反对。《证人席上的第一个非绅士（作伪誓者）》，1889 年慕尼黑版 [Der erste Nichtgentleman (Meineidsmichel) auf dem Zeugenstande, München 89]。《巴黎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记录》，1889 年纽伦堡版 (Protokoll des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kongresses zu Paris, Nürnberg 89)。奥尔登堡《莱茵-威斯特伐里亚矿工运动研究》，1890 年莱比锡版 (Oldenburg, Studien z. rheinisch-westfäl. Bergarbeiterbewegung, Leipz. 90)。考茨基《莫尔及其乌托邦》，1888 年斯图加特版。布洛斯《法国革命》，1889 年斯图加特版 (Blos, D. französ. Revolut., Stuttg. 89) 雅·施泰因《彻底和不彻底的自由思想家》，1889 年斯图加特版 (J. Stern, Halbes u. ganzes Freidenkert., Stuttg. 89)。克拉拉·蔡特金《当代的女工和妇女问题》，1889 年柏林版 (Clara Zetkin, D. Arbeiterinnen- u. Frauenfrage d. Gegenw., Berl. 89)。雪恩朗克《菲尔特制镜业涂水银技术及其工人》，1888 年斯图加特版 (Schoenlank, D. Fürther Quecksilber-Spiegelbelegen u. ihre Arbeiter, Stuttg. 88)。

清算 (第 673—683 頁)

汉·弥勒《社会民主党内的阶级斗争》，1892 年苏黎世版 (H. Müller, D. Klassenk. i. d. deutsch. Sozialdemokr., Zür. 92)。福尔马尔《论德国

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1891年慕尼黑版（Vollmar, Über d. nächst^e Aufg. d. deutsch. Sozialdemokr., München 91）。《哈雷代表大会和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记录》，1890年和1891年柏林版（Protokolle der Parteitage in Halle u. Erfurt, Berl. 90 u. 91）。考茨基和雪恩朗克《社会民主党的原则和要求，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年柏林版（Kautsky u. Schoenlank, Grunds. u. Ford. d. Sozialdemokr., Erläuterungen z. Erf. Prog., Berl. 92）。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的原则部分》，1892年斯图加特版（Kautsky, Das Erfurter Programm i. s. grundsätzl. Teil, Stuttg. 92）。一本可笑的反驳著作：阿·瓦格纳《社会民主党的新纲领》，1892年柏林版（A. Wagner, D. neue sozialdemokr. Progr., Berl. 92）。

从一百五十万票到三百万票（第684—702页）

本章的概述部分既不需要也不允许详细列举资料来源，我多次使用了帕尔乌斯的优秀著作：《工会和社会民主党》，1896年德累斯顿版（Die Gewerkschaften und die Sozialdemokratie, Dresden 96）和《商业危机和工会》，1901年慕尼黑版（Die Handelskrise und die Gewerkschaften, München 01）。

回顾与前瞻（第703—706页）

关于无产阶级在大工业发展影响下社会心理的转变，目前的材料较少而且非常分散。根据基督教社会主义观点写的著作：葛雷《工厂工人三个月》，1891年莱比锡版（Göhre, Drei Monate Fabrikarbeiter, Leipz. 91）。我同意席佩尔在《新时代》第9卷下册中关于这本著作所说的话：“在叙述中，许多事情被歪曲了，误解了，但也以令人惊奇的确信观察和反映了许多事情，不过，几乎全部都是值得一读的，有教育意义的。”在这一方面，有许多有价值的课题需要解决。

結 束 語

最后，我还要对写这部书时得到的許多帮助表示感謝。如果我要举出通过这个指示和那个证明給我帮助的所有人的姓名，那就得写好几頁；但是，至少我要特別提到奧多尔夫、倍倍尔、伯恩斯坦、迪茨、考茨基等通过自己的文章給我教益的人，或者像格里施、席佩尔和奧艾尔那样，經常热心地让我看到党的珍貴档案的人。对我特別有价值的，是对南德状况的詳細报道，我从芬茨处得知巴登的情况，从巴斯勒尔处得知維尔騰堡的情况，从格里林伯格处得知北巴伐利亚，从福尔馬尔处得知南巴伐利亚的情况，从艾尔哈特处得知莱茵普法尔茨以及个别巴伐利亚城市的情况，从加·勒文斯坦处得知菲尔特，从陶舍尔处得知奥格斯堡的情况。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如奧多尔夫、巴斯勒尔和格里林伯格已經与世长辞了，但是对我的著作給与有益帮助的所有人，包括我的最有力的推动者——本书出版人在內，都应受到我衷心的感謝。

弗兰茨·梅林

1903年12月于施泰格利茨—柏林

人名索引

(条日后系原文书頁碼, 检索时請查本书边碼)

a

阿貝肯, 克利斯提安·威廉·路德維希·馮 (Abeken, Christian Wilhelm Ludwig von 1826—1890)——薩克森邦司法大臣(1871—1890)。——627。

阿迪克斯, 恩斯特·弗里德里希 (Adickes, Ernst Friedrich 1811—1878)——不來梅港霍伊豪森的地主, 1867—1873年任帝國議會議員(民族自由黨人)。——456—457。

ai

愛爾維修, 克勞德·珂德里安 (Helvétius, Claude-Adrien 1715—1771)——法國哲學家, 機械唯物主義的代表人物, 無神論者; 法國革命資產階級的思想家。——444。

埃哈爾特, 弗蘭茨·約瑟夫 (Ehrhart, Franz Josef 1853—1908)——曼海姆的裱糊匠, 以後遷往路德維希港, 社會民主黨人, 1875年以前屬愛森納赫派, 1898—1908年為帝國議會議員。——435, 469, 604。

埃勒爾斯 (Ehlers)——不倫瑞克的鑄工, 社會民主黨人, 1875年前屬愛森納赫派。——377。

埃林堡 (Ehrenberg)——巴登邦參謀將

校, 八十年代在瑞士進行反對社會民主黨的活動。——651。

埃卡爾斯, 約翰·格奧爾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24。

艾瓦德, 斐迪南 (Ewald, Ferdinand 1846年生)——柏林的鍍金師, 社會民主黨人, 1883年為《柏林工人報》創辦人之一, 市議會議員, 1913年起任帝國議會議員。——571—572, 583。

艾瓦德, 格奧爾格·亨利希·奧古斯特 (Ewald, Georg Heinrich August 1803—1875)——哲學家, 東方學家, 聖經研究家, 格廷根七教授之一, 北德意志帝國議會與德意志帝國議會議員(屬漢諾威王黨)。——381。

艾澤特 (Eisert)——維也納的證券經紀人, 1884年被無政府黨人暗殺。——588。

ao

奧艾爾, 伊格納斯 (Auer, Ignaz 1846—1907)——社會民主黨人, 1875年以前屬愛森納赫派, 1890年起被選入黨執行委員會, 以後為改良主義者; 1877—1878, 1880—1881, 1884—1907年間為帝國議會議員。——410, 447, 449, 452—453, 465, 467, 470—471, 515—517,

537, 542—543, 549, 563, 597—598, 615, 617, 635, 656, 659, 671, 682。

奥貝文德尔, 亨利希 (Oberwinder, Heinrich)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650。

奥多尔夫, 雅科布 (Audorf, Jakob 1835—1898)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664。

奥尔登堡, 亨利希 (Oldenburg, Heinrich) —— 伦茨堡的排字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汉堡的《审判报》的編輯 (1879—1881), 以后退出工人运动。—— 461, 542—543。

ba

巴貝夫, 弗朗斯瓦-諾埃尔 (格拉古) (Babeuf, François-Noël (Gracchus) 1760—1797) —— 法國革命家, 空想的共产主义者, “平等派” 密謀的組織者。—— 480。

巴尔迪修斯 (Bardisius) —— 柏林陪审法院的区法院法官。—— 629。

巴伐利亚国王 (1864—1886) —— 見路德維希二世。

巴枯宁, 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維奇 (Bakunin, Michail Alexandrowitsch 1814—1876)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416—417, 419—420, 492, 554。

巴斯勒, 格奥尔格 (Basler, Georg) —— 社会民主党人, 七十年代为《南德人民报》的編輯。—— 469。

bai

白拉克, 威廉 (Bracke, Wilhelm 1842—1880)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372, 374, 377, 389, 421, 423, 429, 449, 470, 478, 501, 509, 522, 525, 537。

拜伦, 乔治·諾阿尔·戈登 (Byron, George Noël Gordon, Lord 1788—1824) —— 勋爵, 英国詩人, 革命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480。

ban

班貝尔格尔, 路德維希 (Bamberger, Ludwig 1823—1899) —— 政論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为帝国議会的民族自由党議員。—— 393, 401, 436, 507, 563, 595, 628, 633, 639。

bao

鲍尔 (Paul) —— 德累斯顿警察局长。—— 570。

鲍姆巴赫, 卡尔·阿道夫 (Baumbach, Karl Adolf 1844—1896) —— 佐内堡的区长, 1890年起任但泽市长, 帝国議会的进步党議員, 后为自由思想党議員。—— 615。

鲍威尔, 布鲁諾 (Bauer, Bruno 1809—1882) —— 唯心主义哲学家, 宗教历史家和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 487。

bei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373—374, 377, 381—382, 385, 387—391, 393, 401, 431, 434, 437, 447, 449, 452, 470, 479, 487, 504, 508, 521, 525, 531, 534, 536, 543, 547—548, 552—553, 563, 567, 591, 596—598, 617, 628, 631, 635, 642, 644, 647, 651, 669, 671, 678—680, 682。

貝克尔, 伯恩哈特 (Becker, Bernhard

1826—1882)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424。

貝克尔, 約翰·菲力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72, 415。

貝澤勒尔, 格奥尔格 (Beseler, Georg 1809—1888) ——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議員 (中間派右翼), 1874年起为帝國議會議員 (民族自由党人)。——496。

bi

华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20。

比尔克, 格奥尔格·約翰 (Birk, Georg Johann 1839年生) ——慕尼黑的旅館主, 1901年起經營印刷厂, 社会民主党人, 1890—1898和1903—1907年的帝國議會議員。——672。

比雷尔, 威廉 (Bührer, Wilhelm) ——沙夫豪魯的印刷業者。——559。

俾斯麦, 奧托·馮 (Bismarck, Otto, Fürst von 1815—1898) ——侯爵,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71, 373, 378, 380—383, 387—388, 393—397, 403, 412, 414, 434, 437—439, 441, 443, 455, 457—460, 463—464, 474—475, 480, 484—485, 489, 491, 494, 496—498, 500—503, 505—509, 514, 516—523, 532—534, 538, 541, 543—549, 552, 554, 561, 563—565, 567, 571, 573, 577—578, 583—584, 586—587, 590—596, 612—615, 617—618, 620, 623, 625—628, 630—632, 637—645, 648—651, 653—660, 662, 665—666, 668—669, 672, 680, 684—687, 691。

俾斯麦, 海伯特 (Bismarck, Herbert, Fürst von 1849—1904) ——侯爵, 奧托·馮·俾斯麦的长子, 外交家, 1886—1890年任外交国务秘书。——667。

bian

卞尼格先, 魯道夫·馮 (Bennigsen, Rudolf von 1824—1902)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03, 439, 457, 484—485, 490, 495, 677。

bie

別尔恩特, 弗朗茲 (Berndt, Franz) ——柏林的細木工, 社会民主党人。——629。

bo

伯恩斯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极端机会主义者, 恩格斯死后, 他试图修正馬克思主义。——447, 525, 567—568, 579—581, 654。

伯梅尔特, 卡尔·維克多 (Böhmert, Karl Viktor 1829—1918) ——資產階級經濟学家和統計学家, 苏黎世和德累斯頓的高等学校教授。——424—426。
伯提希尔, 卡尔·亨利希·馮 (Bötticher, Karl Heinrich von 1833—1907) ——普魯士大臣和內政国务秘书 (1880—1897), 1878年起为帝國議會議員。——566。

博克, 威廉 (Bock, Wilhelm 1846—1931) ——哥达的鞋匠, 1875年前属爱森納赫派, 鞋匠工会的创办人, 1884—1887, 1890—1906, 1912—1928年間任帝國議會議員, 1917—1922年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 以后又为德国社会

民主党人。——447, 571, 599, 671。
博伊斯特, 弗里德里希·斐迪南·馮 (Beust, Friedrich Ferdinand, Graf von 1809—1886)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87, 407。

波拿巴, 路易(拿破侖第三) (Bonaparte, Louis [Napoleon III] 1808—1873)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71—375, 377, 381, 387, 544, 639, 658。

波伊克特 (Peukert) ——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奸細, ——646。

bu

布恩特 (Bunte) ——社会民主党人, 1889年矿工罢工的领导人之一。——662。

布赫尔, 洛塔尔 (Bucher, Lothar 1817—1892)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94, 503。

布克尔, 亨利·托馬斯 (Buckle, Henry Thomas 1821—1862) ——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420。

布腊施, H. (Brasch, H.) ——社会民主党人, 1876年中央选举委员会的委員。——467。

布朗, 卡尔 (Braun, Karl 1822—1893)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01。

布朗基, 路易-奧古斯特 (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 ——法国革命家, 一些秘密团体的创始人; 1848年为法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人之一, 主张通过密謀組織用暴力夺取政权, 认为有实行革命专政的必要; 在獄中度过36年。——417。

布莱希勒德, 格尔森·馮 (Bleichröder, Gerson von 1822—1893)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95—396, 400, 545, 596, 615。

布伦奇里, 約翰·卡斯巴尔 (Bluntschli, Johann Caspar 1803—1881) ——瑞士法学家与反动政治活动家。——396。
布伦坦諾, 卢約 (Brentano, Lujo 1844—1931)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02, 411, 440。

布洛斯, 威廉 (Blos, Wilhelm 1849—1927) ——新聞工作者与历史学家, 属于社会民主党右翼, 1877—78, 1881—1884, 1890—1907, 1912—1918年間先后任帝国議會議員。——424, 470, 542, 553, 563, 568, 598—599, 663, 665, 672。

布洛希 (Blösch) ——維也納的警探, 1884年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588。

布罗伊尔 (Bräuer) ——阿尔托那的裁縫,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汉堡市全权代表。——384, 432。

布龙斯, 尤利烏斯·奧古斯特·弗里德里希 (Bruhns, Julius August Friedrich 1860年生) ——不来梅的烟草厂主, 社会民主党人, 1888年为《不来梅人民报》編輯, 1890—1893年为帝国議會議員。——672。

布鲁斯, 保尔 (Brousse, Paul 1854—1912) ——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法国社会党机会主义派(可能派)的领导人。——646。

布吕埃尔, 路德維希·奧古斯特 (Brüel, Ludwig August 1818—1896)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63—1868年供职于汉諾威邦的教育部, 汉諾威王党的帝国議會議員。——600。

勃魯姆, 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 ——资产阶级革命家, 法兰克福国民議會左翼的领导人, 参加維也納街垒战, 被俘后由軍法法庭处死。——

407。

cai

蔡特金, 克拉拉 (Zetkin, Clara 1857—1933) —— 663。

cha

察尔林斯基, 列昂·冯 (Czarlinski, Leon von 1835 年生) —— 波兰贵族地主, 1877—1884 和 1893—1918 年为帝国议会议员。—— 565。

查克斯, 艾曼努尔·汉斯 (Sax, Emanuel Hans 1857—1896) —— 社会作家, 维也纳高等农业学校教授, 也写过诗。—— 577。

查理一世 (Karl I 1600—1649) ——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 688。

da

达尔文, 查理 (Darwin, Charles 1809—1882) ——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 420, 442。

达佛 (Dave) —— 普鲁东和巴枯宁的学生, 无政府主义者。—— 554—558, 659。

dao

道克托尔, 贝恩哈特 (Doktor, Bernhard) —— 《法兰克福报》商业栏的编辑。—— 396。

de

德尔布吕克, 鲁道夫·冯 (Delbrück, Rudolf von 1817—1903) —— 1867—1871 年为联邦首相办公厅主任, 1871—1876 年为帝国首相办公厅主任; 1876 年以前拥护俾斯麦, 以后在帝国议会反对俾斯麦的保护关税政策。——

379, 381—382, 393, 459—460。

德雷斯巴赫, 奥古斯特 (Dreesbach, August 1844—1906) ——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 435, 469, 602, 672。

德鲁西, 卡尔 (Derossi, Karl 1910 年死) —— 杜塞尔多夫的制帽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1875 年前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以后当选为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后来渡美。—— 422, 452, 467。

德姆勒尔, 阿道夫 (Demmler, Adolf 1804—1886) ——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 470。

deng

登特勒尔, 鲍尔 (Dentler, Paul 1878 年死) —— 社会民主党人, 《柏林自由报》的编辑。—— 474。

di

狄慈根, 约瑟夫 (Dietzgen, Josef 1828—1888) ——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 420, 424, 450。

迪茨, 约翰·亨利希·威廉 (Dietz, Johann Heinrich Wilhelm 1843—1922) —— 斯图加特约·亨·威·迪茨出版社的创办人, 以后该出版社成为社会民主党的出版社; 1881—1918 年为帝国议会议员。—— 541—542, 553, 580, 598, 617, 619, 625, 635, 642, 665, 671。

迪斯累里, 本扎曼 (Disraeli (D'Israeli), Benjamin) ——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 544。

du

杜尔克, 阿伯特·弗里德里希·本诺 (Dulk, Albert Friedrich Benno 1819—1884) —— 作家, 1848 年革命的

参加者，以后为社会民主党人，著有戏剧、诗歌和无神论的作品。——461。

杜林，卡尔·欧根 (Dühring, Karl Eugen 1833—1921)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80—482, 577, 579, 581。

e

厄尔施莱格尔 (Öhlschläger) ——阿尔托纳警局的督察员。——570。

en

恩格尔 (Engel) ——阿尔托纳的警察局长。——538, 542。

恩格尔，恩斯特 (Engel, Ernst 1821—1896)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25。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 ——415—416, 418—421, 478, 481—483, 524—525, 534, 550—551, 568, 576—577, 579—581, 678, 680, 693, 700。

恩斯特，鲍尔 (Ernst, Paul 1866—1933) ——作家，八十年代末期短时间加入社会民主党，1890—1892年间为半无政府主义“青年”派的领导人之一。——678。

fa

法尔 (Fahl) ——汉堡附近的皮内堡市旅馆主，社会民主党人。——542。

法尔克，阿达尔贝特 (Falk, Adalbert 1827—1900) ——法学家，帝国议会自由党议员，1872—1879年为普鲁士文化教育大臣。——532。

法尔肯施坦 (Falckenstein) ——見福格尔·馮·法尔肯施坦。

法赫尔，尤利乌斯 (Faucher, Julius 1820

—1878)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87。

fei

费尔米安，列奥波特·安东·馮 (Firmian, Leopold Anton, Graf von 1679—1744) ——伯爵，1727年起为薩尔斯堡大主教，1731—1732年驅逐新教徒数千人并吞沒他們的财产。——518。

费尔斯特，卡尔·海尔曼 (Förster, Karl Hermann 1853—1912) ——汉堡雪茄烟厂主，社会民主党人，1890—1907年为帝国议会议员。——671—672。

费恩 (Finn) ——柏林的木匠，社会民主党人，八十年代脫党。——538。

费舍 (Fischer) ——苏黎世的预审法官。——651。

费舍，理查 (Fischer, Richard 1855—1926) ——社会民主党人，《前进报》編輯和印刷厂經理 (1893—1902)，中派分子，从1893年起任帝国议会议员，直到去世。——461, 567, 574, 680。

费希特，約翰·哥特利勃 (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76, 705。

菲尔肖夫，鲁道夫 (Virchow, Rudolf 1821—1907)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95, 412, 493, 521, 615。

菲勒克，路易 (Viereck, Louis 1851—1921) ——社会民主党人，慕尼黑《南德意志邮报》发行人，机会主义分子，1884—1887年为帝国议会议员，以后流亡到美国。——461, 529, 550, 582, 603, 624—625, 635, 644。

fu

富尔德 (Fould) ——銀行。——400。

富兰克林, 本杰明 (Franklin, Benjamin 1706—1790) —— 美国学者和政治家, 在美国独立运动中起过巨大作用。——440。

福尔肯贝克, 麦克斯·冯 (Forckenbeck, Max von 1821—1892)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36, 509, 596。

福尔马尔, 格奥尔格·亨利希·冯 (Vollmar, Georg Heinrich von 1850—1922) —— 退伍军官, 社会民主党人, 1881—1918年为帝国議會議員, 九十年代初期为改良主义思想家之一。——461, 472, 524, 553, 563—564, 567, 599, 607, 610, 617, 627, 635, 671, 680—681。

福格尔·冯·法尔肯施坦, 爱德华 (Vogel von Falckenstein, Eduard 1797—1885) —— 普鲁士將軍, 1866年任美因軍总司令, 以后为波希米亚总督, 1867—1871年为帝国議会议保守黨議員。——377—379, 388。

佛尔来因, 汉斯 (Wörlein, Hans) —— 紐伦堡出版商, 社会民主党人, 1875年以前属爱森納赫派。——424。

弗尔斯特林 (Försterling 1827—1872)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81。

弗兰茨, 雅科布 (Franz, Jakob 1846—1902)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24。

弗賴塔克, 奥托 (Freitag, Otto)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27。

弗賴塔克, 古斯达夫 (Freitag, Gustav 1816—1895) —— 德国自由派作家。——396。

弗雷米 (Fremy) —— 銀行。——400。

弗雷塞 (Frehse) ——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檢察官。——613。

弗里茨舍, 弗里德里希·威廉 (Fri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25—1905)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74, 381, 409, 453, 470, 476, 504, 516—517, 520, 535, 550。

弗里德里希二世 (弗里德里希大帝) (Friedrich II (der "Große") 1712—1786)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98, 456。

弗里德里希三世 (Friedrich III 1831—1888)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79, 381, 497—498, 545, 590—591, 631, 637, 653—656, 658。

弗里德曼 (Friedemann) —— 苏黎世的德国警察密探。——589。

弗里登塔尔, 卡尔·鲁道夫 (Friedenthal, Karl Rudolf 1827—1890) —— 大地主和工业家, 北德意志帝国議會議員, 以后直到1881年为德意志帝国議會議員(自由保守党人)。——382。

弗罗默, 卡尔·弗兰茨·埃貢 (Frohme, Karl Franz Egon 1850—1933)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53, 572, 598, 617, 622, 635, 642, 664, 671。

gai

盖布, 奥古斯特 (Geib, August 1842—1879)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77, 379, 423, 434, 445, 447, 449, 452, 467, 472—473, 515, 525, 537, 664。

盖尔,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卡尔 (Geyer, Friedrich August Carl 1853年生) —— 格罗森海因的雪茄烟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烟草工人》和《莱比錫人民报》的編輯 (1890—1895), 1886—1887和1890—1924年为帝国議會議員, 1917年以后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黨員, 1918—1919年为薩克森邦財

政大臣。——461, 641, 671。

盖泽尔, 布鲁诺 (Geiser, Bruno 1846—1898) ——社会民主党的新闻工作者,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女婿, 《新世界》杂志的编辑, 党的机会主义派的领导人之一, 1881—1887年为帝国议会议员。——424, 553, 598, 644。

ge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1749—1832)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563。

格弗肯, 亨利希 (Geffcken, Heinrich 1830—1896) ——法学家, 皇储弗里德里希·威廉的顾问, 1872—1882年为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653—654, 658—659。

格腊勒 (Gralle) ——不伦瑞克的木匠, 属爱森纳赫派, ——377。

格劳, 奥古斯特 (Grau, August) ——柏林的木匠,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383。

格雷特, 米夏埃尔 (Gehret, Michael) ——慕尼黑的警察局长。——606。

格里林伯格, 卡尔 (Grillenberger, Karl 1848—1897) ——社会民主党人, 1874年起任纽伦堡《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 1881年起为帝国议会议员, 改良主义者。——407, 420, 424, 553, 566—568, 591, 597, 599, 604, 610, 617, 642, 647, 669, 671。

格里姆佩, 海尔曼 (Grimpe, Hermann 1907年死) ——社会民主党人, 八十年代侨居巴黎, 以后迁居爱北斐特。——647。

格吕威尔 (Grüwel) ——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会计。——422。

格罗特考, 帕尔 (Grottkau, Paul) ——柏林的瓦工, 社会民主党人, 1875年以前为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 《柏林自由报》的编辑。——410, 423。

格罗伊利希, 赫尔曼 (Greulich, Hermann 1841—1925)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524。

格奈斯特, 亨利希·鲁道夫·赫尔曼·弗里德里希·冯 (Gneist, Heinrich Rudolf Hermann Friedrich von 1816—1895)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496, 627。

guo

果道 (Godau) ——哥尼斯堡的钳工师傅, 社会民主党人。——602。

ha

哈茨费尔特, 索菲娅 (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433。

哈尔姆, 弗里德里希 (Harm, Friedrich 1844—1905)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599, 642, 671。

哈赛尔曼, 威廉 (Hasselmann, Wilhelm 1844年生)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384, 420—422, 428, 431, 434, 437, 439, 445, 447, 451, 466—467, 475—476, 504, 520, 535—539, 554—555。

哈森克莱维尔, 威廉 (Hasenclever, Wilhelm 1837—1889)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374, 381, 385, 422—423, 431, 434—435, 443—444, 447, 452, 466, 470, 504, 523, 528, 530, 547, 552—553, 563, 568, 572, 591, 594, 597, 599, 622, 641—642, 663—664。

哈特曼, 爱德华·冯 (Hartmann, Eduard

von 1842—1906)——德国哲学家，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者。——487、591。

哈特曼，格奥尔格·威廉 (Hartmann, Georg Wilhelm 1910年死)——社会民主党人，1875年前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以后与哈森克莱维尔同为党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880—1881年为帝国议会議員，以后退出工人运动。——447、452、467、516、537、542—543。

hai

海尔布隆纳尔 (Heilbronner)——斯图加特的銀行家，1883年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488。

海尔梅斯，奥托 (Hermes, Otto 1838—1910)——柏林水族馆馆长，1873—1903年为柏林市议会議員，1881—1884、1886—1898、1907—1910年为帝国议会議員 (自由思想人民党)。——593。

海涅，奥古斯特 (Heine, August 1842年生)——哈耳伯施塔特的制帽工人，社会民主党人，1884—1887和1890—1893年为帝国议会議員。——461、599、572。

海因采尔 (Heinzel)——社会民主党人，1886年弗賴貝克案的被告。——635。

han

汉泽曼，大卫·尤斯图斯 (Hanseman, David Justus 1790—1864)——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00、615。

hao

豪普特 (Haupt)——日内瓦的德国警察密探。——650—651。

he

赫德尔，艾弥尔·亨利希·麦克斯 (Hödel, Emil Heinrich Max 1857—1878)——1878年5月11日謀刺威廉一世，8月16日被斩首。——492—497、509、531、581、600。

赫尔德，阿道夫 (Held, Adolf 1844—188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402。

赫尔特尔，奥古斯特 (Herter, August)——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创办人之一。——529。

赫卢貝克 (Hlubeck)——維也納警官，1883年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588。

赫普纳尔，阿道夫 (Hepner, Adolf 1846—1923)——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82、389—390、424。

赫希柏格，卡尔 (Höchberg, Karl 1853—1885)——新聞工作者，同情社会主义运动，企图把这个运动引向改良主义的道路，資助并出版一系列社会民主党的报刊杂志。——478—479、524—525、529、577、579—581、624。

hei

黑尔多夫，奥托·亨利希·馮 (Helldorff, Otto Heinrich von 1833—1908)——大地主，德意志保守党的創建人之一 (1876)，1871—1874、1877—1881、1884—1893年为帝国议会議員。——667—668。

黑尔富特，恩斯特·路德維希 (Herrfurth, Ernst Ludwig 1830—1900)——普魯士官吏，1888—1892年为内务大臣。——658。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91。

hen

亨利希 (Heinrich) ——苏黎世旅館主人, 德国警察密探。——650。

亨利四世 (Heinrich IV 1050—1106) ——1056年即帝位, 叙任权冲突后, 到卡诺莎去向教皇悔罪(1077)。——382。

亨内尔, 阿尔伯特 (Hänel, Albert 1833—1918) ——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1867—1888年为普鲁士众議院議員, 1867—1893和1898—1903年为帝国議會議員, 进步党领导人之一, 以后为自由思想党人。——464, 565, 592。

亨塞尔, 鲍尔 (Hensel, Paul 1856—1887) ——柏林的钳工, 社会民主党人。——641。

亨施, 奥古斯特 (Heinsch, August 1847—1878) ——柏林排字工人, 爱森纳赫派。——443—444, 473。

hu

胡登, 乌尔利希·冯 (Hutten, Ulrich von 1488—1523)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95。

huo

霍布莱希特, 阿尔图尔 (Hobrecht, Arthur 1824—1912) ——布勒斯劳市长(1863—1872)和柏林市长(1872—1878), 普鲁士财政大臣(1878—1879), 民族自由党的领导人之一, 1881—1884和1886—1890年为帝国議會議員。——485。

霍策 (Hotze) ——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

——587。

霍尔曼 (Hollmann) ——柏林的预审法官。——557。

霍尔施 (Horsch)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裁缝, 警察密探。——556—559, 563。

霍弗斯特腾, 约翰·巴普提斯特 (Hofstetten, Johann Baptist)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30。

ji

济格尔, 奥古斯特 (Siegel, August 1856年生) ——矿工, 社会民主党人, 流亡英国。——662。

济罗夫斯基 (Zielowsky) ——社会民主党人, 1869年起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 以后为爱森纳赫派。——466。

济普德腊特 (Siebdracht) ——开姆尼兹的警察局长。——528。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 ——法国历史学家和国务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1840—1848年操纵法国的内政和外交, 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615。

jia

加富尔, 卡米洛·本佐 (Cavour, Camillo Graf Benso di 1810—1861) ——伯爵, 意大利重要的政治家与国务活动家, 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与领袖, 资产阶级大地主, 1852—1861年为皮埃蒙特政府的总理大臣。——532。

伽利略, 伽利莱 (Galilei, Galileo 1564—1642) ——意大利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 赞同哥伯尼的世界体系; 后为宗教裁判所所迫害。——374。

jiao

教皇(1878—1903)——見利奧第十三。

jin

津格尔, 鲍尔(Singer, Paul 1844—1911)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98, 641—642, 647, 651, 669, 671。

ka

卡貝, 埃蒂耶納(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法学家和政論家, 空想共产主义者; 空想小說《伊加利亚旅行記》的作者(1842)。——487。

卡尔多夫, 威廉·馮(Kardorff, Wilhelm von 1828—1907)——德国大工业家, 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創办人, 帝国党的創立人与领导人之一, 1868—1906年帝国議會議員。——396, 400。

卡尔騰巴赫(Kaltenbach)——米尔豪曾的警局督察。——531, 570, 588。

卡梅雷尔(Kammerer)——奥地利的装釘工人, 无政府主义者。——588—589, 600。

卡姆弗迈耶尔, 鲍尔(Kampffmeyer, Paul 1864年生)——社会民主党人, 1890年属于半无政府主义“青年”反对派, 以后为修正主义者。——678, 681—682。

卡佩尔, 奥古斯特(Kapell, August 1854年生)——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10, 423, 447, 470, 475, 485, 542—543。

卡佩尔, 奥托(Kapell, Otto 1896年死)——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10, 423, 447, 542—543。

卡普里維, 利奧(Capriivi, Leo, Graf von 1831—1899)——伯爵, 普魯士將軍, 帝

国首相(1890—1894)和普魯士总理大臣(1890—1892)。——686。

kai

凯泽尔, 麦克斯(Kayser, Max 1853—1888)——德累斯頓的作家, 社会民主党人, 1878—1887年为帝国議會社会民主党党团右翼。——461, 504, 523—524, 553, 599, 649, 663。

kang

康普茨, 卡尔·馮(Kamptz, Karl von 1769—1849)——普魯士司法大臣(1832—1842); 积极参与迫害所謂煽动者。——543。

康普豪森, 奥托·馮(Camphausen, Otto von 1812—1896)——卢道夫·康普豪森(見第三卷人名索引)之弟, 普魯士財政大臣(1869—1878)。——459, 484。

kao

考茨基, 卡尔(Kautsky, Karl 1854—1938)——580—582, 624, 663, 682。

考夫曼(Kaufmann)——机械师, 在瑞士的德国警察密探。——588, 614。

ke

克尔(Köhl)——八十年代为帝国議會人民黨議員。——565。

克尔納(Körner)——柏林的瓦工, 社会民主党人, 八十年代脫党。——538。

克格尔, 麦克斯(Kegel, Max 1850—1902)——排字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1875年前属爱森納赫派, 1871年創刊滑稽報紙《坚果鉗》, 1882年創刊《南德信使报》, 以后編輯《实話报》, 写过很多詩歌。——664。

科赫 (Koch)——不伦瑞克的检察官。

——389。

科科斯基, 薩穆埃尔 (Kokosky, Samuel 1838—1899) ——社会民主党人, 1875年前属爱森纳赫派, 《不伦瑞克人民之友》的编辑, 以后为《前进报》编辑。——424。

克雷克尔, 尤利烏斯 (Kräcker, Julius 1839—1888)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520, 553, 599, 626, 642, 663。

克里斯滕森, 顏斯 (Christensen, Jens L.) ——社会民主党的作家, 八十年代末流亡美国。——629, 649。

克隆能貝克 (Cronenberg) ——亚琛的天主教堂神甫。——488。

克洛斯, 卡尔 (Kloß, Karl 1847—1908) ——社会民主党人, 八十年代为斯图加特細木工联合会的领导人, 1898—1903年为帝国議會議員。——622。

克呂格尔 (Krüger) ——柏林的警察顾问。——558, 573。

克斯勒尔, 古斯塔夫 (Keßler, Gustav 1832—1904) ——建筑师, 在柏林建筑工人的工会組織中担任领导工作。——649。

科采布,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斐迪南·馮 (Kotzebue, August Friedrich Ferdinand von 1761—1819) ——德国剧作家, 俄国沙皇的間諜, 自由主义运动的敌人, 后来被德国大学生协会会员卡尔·路德維希·桑德所杀。——543, 650。

kong

孔采特 (Conzett) ——瑞士社会民主党人, 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印刷厂的技术指导。——567, 655。

孔內尔特, 弗里茨 (Kunert, Fritz 1850—1931) ——作家, 社会民主党人, 1890—1893, 1896—1906, 1909—1924年帝国議會議員。《前进报》編輯部秘书, 1917—1922年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人, 以后又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672。

ku

庫米茨 (Kumicz) ——奥地利的細木工, 无政府主义者。——588。

la

拉凡特, 魯道夫 (理查·克拉麦尔的笔名) (Lavant, Rudolf (Pseudonym von Richard Cramer) 1844年生) ——社会民主党作家, 《实話报》撰稿人。——664—665。

拉夫 (Laaf) ——亚琛的天主教堂神甫。——488。

拉赫曼, 奥托 (Lachmann, Otto 1862—1887) ——柏林的模型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641。

拉薩尔, 斐迪南 (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01—402, 413, 420—421, 424—427, 450—451, 453, 480, 482—483, 508, 514, 534, 558, 562, 609, 624, 661, 664, 680, 683—684, 692—693, 705。

拉斯克尔, 爱德华 (Lasker, Eduard 1829—1884)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82, 391, 403, 412, 436—437, 439, 456, 507—508, 518, 535。

腊科夫, 亨利希 (Rackow, Heinrich) ——柏林的书商, 社会民主党人, 1875年以前为全德工人联合会成员, 八十年代侨居伦敦。——466, 476, 647。

腊提博尔·翁特·柯尔威, 维克多 (Ratibor und Corvey, Viktor, Herzog von 1818—1893) ——公爵, 西里西亚大地主, 1871年起为普鲁士贵族院議員, 北德意志帝国議會議員和德意志帝国議會議員 (德意志帝国党) ——400。

lai

賴因德斯, 克拉斯·彼得斯 (Reinders, Klaas Peters 1879年死)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47, 504, 523。

賴因斯多夫, 奥古斯特 (Reinsdorf, August) ——爱北斐特的排字工人, 无政府主义者。——589, 613。

賴辛施佩格, 彼得·弗兰茨 (Reichensperger, Peter Franz 1818—1895) ——司法官吏, 天主教政治活动家, 1848年为预备議会和普鲁士国民議會議員 (右翼); 以后为中央党领导人之一。——652。

萊麦尔, 奥托 (Reimer, Otto 1841—1892)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34, 542。

萊辛, 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 (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76, 700。

萊維 (Levy, H.) ——銀行職員, 社会民主党人, 七十年代末期为《前进报》撰稿人。——478。

lang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40—441, 478, 581, 585。

朗克, 奥托 (Lang, Otto) ——瑞士的官吏。——654。

le

勒迪格尔, 卡尔·胡果 (Rödiger, Carl Hugo 1850年生) ——格措的木雕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1884—1887年为帝国議會議員, 以后渡美。——461, 599。

勒洛, 弗兰茨 (Reuleaux, Franz 1829—1905) ——德国工程师, 1867年巴黎万国博覽会、1873年維也納万国博覽会、1876年費城万国博覽会的审查委員。——459。

勒文施坦, 加布里埃尔 (Löwenstein, Gabriel 1825—1911)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24。

lei

雷特維茨, 奥斯卡 (Redwitz, Oskar, Freiherr von 1823—1891) ——男爵, 天主教浪漫派詩人。——396。

li

利奧十三 (Leo XIII. 1810—1903) ——教皇 (1878—1903)。——638, 640。

利岑格尔 (Litzinger) ——亞琛的天主教副堂神甫。——488。

利斯克 (Lieske)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鞋匠帮工, 1885年被以暗杀警察顧問卢普夫的罪名处死。——613。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73—377, 381—382, 385, 389—390, 401, 420—421, 424, 431, 433—434, 437, 445, 447, 449, 451, 466, 470, 472, 478, 496, 501, 521—522, 524, 528, 545, 547—548, 552—553, 566, 591, 594, 597, 599—600, 617, 624, 642, 647, 663, 669, 671, 680, 682。

李希特尔, 欧根 (Richter, Eugen 1838—1906)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397, 458—459, 485, 490, 495, 499, 508, 565—566, 593, 595, 599, 615, 622, 642, 645。

里廷豪森, 摩里茨 (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470, 553。

里希特霍芬, 伯恩哈特 (Richtofen, Bernhard, Freiherr von 1836—1895) —— 男爵, 1885年起为柏林警察总监。—— 659。

lie

列翁哈特, 阿道夫 (Leonhardt, Adolf 1815—1880) —— 普鲁士邦司法大臣。—— 500。

lin

林道, 鲍尔 (Lindau, Paul 1839—1919) —— 作家, 戏剧批评家与剧院领导人。—— 396。

林哈尔特 (Lienhard) —— 斯图加特的药剂师, 1883年被无政府主义者暗杀。—— 588。

long

龙格 (Runge) —— 柏林市参议员。—— 361。

lu

路茨 (Lutz) —— 巴塞尔的裁缝, 社会民主党人。—— 658。

路德, 马丁 (Luther, Martin 1483—1546)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490。

路德维希二世 (Ludwig II, 1845—1886)

—— 巴伐利亚国王 (1864—1886)。—— 499, 603, 606。

路易十六 (Ludwig XVI, 1754—1793) —— 法国国王 (1774—1792), 根据国民议会的决议被处死。—— 688。

路易十四 (Ludwig XIV, 1638—1715) —— 法国国王 (1643—1715)。—— 686。

路秋斯·冯·巴尔豪森, 罗伯特 (Lucius von Ballhausen, Robert, Freiherr 1835—1914) —— 男爵, 大地主, 后备军官, 1870—1879年为帝国议会议员, 1879—1890年为普鲁士农业大臣, 俾斯麦的亲信。—— 485。

路特希尔德, 卡尔 (Rothschild, Karl 1820—1886)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547。

路易丝 (Luise 1776—1810) —— 普鲁士邦的王后,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之妻。—— 628。

卢格, 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 —— 激进的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4年与马克思合编《德法年鉴》, 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左翼), 五十年代为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 396。

卢普夫 (Rumpf) —— 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警察顾问, 1885年被暗杀。—— 556—557, 559, 563, 566, 613。

卢普施 (Rupsch) —— 爱北斐特的鞍匠, 1884年参与谋杀威廉一世, 未成。—— 589, 613。

lü

吕德尔 (Rüder) —— 莱比锡警察署长。—— 407, 547。

luo

洛貝爾圖斯-雅格左夫, 約翰·卡尔 (Ro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1875)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98—402, 489, 562, 578, 624。

洛曼 (Lohmann) ——普魯士商业部編密顧問。——586。

洛厄佛, 路德維希 (Loewe, Ludwig 1837—1886)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18, 615。

罗什弗尔, 昂利 (Rochefort, Henri, comte de 1830—1913) ——伯爵, 法国新聞工作者, 1868年創辦《灯籠》周刊, 进行反对帝国的斗争, 1870年入獄, 1880年創辦《不妥协者》。——518。

罗伊斯 (Reuß) ——歌唱家, 八十年代为在伦敦的德国警察密探。——646, 650。

ma

馬戴, 古伊多·馮 (Madai, Guido von 1810—1892) ——柏林警察总监 (1872—1885)。——513, 516, 659。

馬尔薩斯, 托馬斯·罗伯特 (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50。

馬考萊, 托馬斯·巴賓頓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Lord 1800—1859)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34。

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375—376, 387, 397, 415—420, 440, 449—451, 453, 478, 480—482, 485, 503, 524—525, 534, 562, 576—579, 581, 624, 628—629, 687, 693, 700, 702。

馬克思, 燕妮 (父姓威斯特华伦) (Marx,

Jenny (geb. von Westphalen) 1814—1881) ——卡尔·馬克思的妻子与助手。——415。

馬拉, 让-保尔 (Marat, Jean-Paul 1744—1793) ——法国革命家与政論家, 十八世紀末期法国資產階級革命时代雅各宾俱乐部最坚决的領袖之一; 《人民之友》(“Ami du peuple”) 的发行人。——480。

mai

迈巴赫, 阿尔伯特·馮 (Maybach, Albert von 1822—1904) ——普魯士商业大臣 (1878) 和公共事务大臣 (1879—1891), 普魯士众議院議員 (保守党)。——499。

迈斯特尔, 亨利希·恩斯特·奥古斯特 (Meister, Heinrich Ernst August 1842—1906)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99—600, 642, 669, 672。

迈耶尔 (Meyer)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警察局长。——626。

迈耶尔, 魯道夫, 赫爾曼 (Meyer, Rudolf Hermann 1839—1899) ——經濟学家, 洛貝爾圖斯的拥护者, 維也納《祖国报》編輯 (1877—1882 和 1893—1894)。——399—401, 432, 487, 489—491, 562, 703。

man

曼托伊費尔, 奥托·泰奧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Freiherr von 1805—1882) ——男爵, 普魯士国务活动家; 反动貴族官僚的代表人物, 1848年11月—1850年12月为內政大臣, 1849年为第二議院議員, 1850—1858年为总理大臣兼外交大臣。——443,

496, 636。

mao

毛奇, 赫尔穆特·卡尔·伯恩哈特 (Moltke, Helmuth Karl Bernhard, Graf von 1800—1891)——伯爵, 普鲁士元帅, 1857—1888 年任参谋总长, 军事著作家, 保守党人。——392、496、533、555。

mei

梅茨格尔, 弗里德里希·威廉 (Metzger, Friedrich Wilhelm 1848—1914)——白铁工人, 以后在汉堡任编辑, 社会民主党人, 1890—1914 年为帝国议会議員。——671、672。

梅尔施塔林格 (Merstallinger)——维也纳鞋厂主, 1882 年遭到无政府主义者槍劫。——587。

梅明格尔, 安东 (Memminger, Anton 1846—约 1924)——作家, 一度为爱森纳赫派成员。——424。

梅特涅, 克雷門斯·文采尔·洛塔尔 (Metternich, Clemens Wenzel Lothar, Fürst von 1773—1859)——公爵, 奥地利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 外交大臣 (1809—1821) 和首相 (1821—1848); 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456、658。

men

門德, 弗里茨 (Mende, Fritz 1879 年死)——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81。

meng

蒙克尔 (Munckel)——1886 年弗賴貝克案的辯护人。——635。

蒙森, 泰奥多尔 (Mommsen, Theodor 1817—1903)——德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477、592。

mi

米尔柏格, 阿尔都尔 (Mülberger, Arthur 1847—1907)——维尔滕堡的医师, 普鲁东的拥护者。——421、479。

米尔克 (Mielke)——伦敦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522。

米凯尔, 約翰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80、395—396、400。

米克, 馮 (Mücke, von)——莱比錫行政区法院院长, 1872 年审讯李卜克内西、倍倍尔和赫普纳尔叛国案的审判长。——390。

米特尔施泰特 (Mittelstädt)——帝国法院法官, 达佛和内弗叛国案 (1887) 的主审法官。——659。

弥勒 (Müller)——社会民主党人, 1886 年弗賴貝克案的被告。——635。

弥勒, 汉斯 (Müller, Hans 1867 年生)——新聞工作者和作家, 社会民主党人, 九十年代初期属于半无政府主义“青年派”。——678—680。

mo

摩尔根, 刘易斯·亨利 (Morgan, Lewis Henry 1818—1881)——美国民族学家, 原始社会的研究家。——576。

摩克, 庫尔特 (Mock, Kurt 1847—约 1900)——作家, 一度为爱森纳赫派成员。——424。

莫尔肯布尔, 赫尔曼 (Molkenbuhr, Hermann 1851—1927)——雪茄烟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1890 年起任《汉堡回

声》編輯，1890—1924 年为帝国議會議員。——461、672。

莫方，弗兰茨·克里斯托弗 (Moufang, Franz Christoph 1817—1890) ——美因兹大教堂司祭，1871—1890 年任帝国議會議員(中央党)。——413。

莫里尔，罗伯特 (Morier, Sir Robert 1826—1893) ——爵士，英国外交家，1866—1876 年任駐达姆施塔特、斯图加特和慕尼黑的代理公使，与德意志自由党人有密切联系。——658。

莫斯特，約翰 (Most, Johann 1846—1906) ——社会民主党人，1874—1878 年为帝国議會議員，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1880 年在維登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879—1906 年間先在伦敦，后在紐約出版无政府主义的杂志《自由》。——407、434、443—444、470、476—477、482、491、518—519、522—524、526、528、531、534、538—539、541、554、556—559、565、568、581—582、587、614、629。

莫特勒，尤利烏斯 (Motteler, Julius 1838—1908)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08、410、434、437、447、470、567—568、654。

na

納波拉 (Naporra) ——柏林警官，1888 年被揭露是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挑拨者。——629。

納赫提加尔，古斯塔夫 (Nachtigal, Gustav 1834—1885) ——非洲考察家，1864 年奉德意志帝国命令占领多哥和喀麦隆。——595。

拿破侖第三 (Napoleon III) ——見波拿巴，路易。

拿破侖第一·波拿巴 (Napoleon I. Bonaparte 1769—1821)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83、456。

nai

奈泽尔，麦克斯 (Neißer, Max) ——布勒斯劳的社会民主党人，1875 年以前属爱森納赫派，以后为《前进报》編輯。——424、483。

nao

瑙恩，罗伯特 (Nauen, Robert 1858—1887) ——柏林的鑄銅器工人，社会民主党人。——641。

nei

內貝尔，海尔曼 (Nebel, Hermann) ——萊比錫书商，警察密探。——650。

內弗 (Neve) ——霍尔斯坦的細木工，无政府主义者，1887 年被判徒刑十五年。——587、614、646、650、659。

ni

尼采，弗里德里希 (Nietzche, Friedrich 1844—1900) ——德国哲学家，德帝国主义反动侵略集团思想家之一。——704。

nong

农納，亨利希 (Nonne, Heinrich) ——在巴黎的普魯士警察密探(八十年代初期)。——650。

nuo

諾比林，卡尔·爱德华 (Nobiling, Karl Eduard 1848—1878) ——无政府主义者，1878 年 6 月 2 日謀刺威廉一世。

——496—497, 500, 506, 531, 600, 646。
諾斯提茨-瓦尔維茨, 赫爾曼·馮 (Nostitz-Wallwitz, Hermann von 1826—1906) ——薩克森邦內政大臣 (1866—1891) 和外交大臣 (1876—1882)。——548。
諾伊曼 (Neumann) ——漢堡的細木工, 警察密探。——538, 554—555, 650。

ou

歐倫堡, 博托 (Eulenburg, Botho, Graf zu 1831—1912) ——伯爵, 帝國議會保守黨議員 (1871年起), 普魯士內政大臣 (1878—1881 和 1892—1894), 普魯士總理大臣 (1892—1894)。——508, 614, 517, 632。
歐倫堡, 弗里德里希·阿爾布萊希特 (Eulenburg, Friedrich Albrecht, Graf zu 1815—1881) ——1842—1843 年為《萊因報》的檢查官, 普魯士內政大臣 (1862—1878)。——463, 506。

pa

帕爾姆 (Palm) ——織布工人, 警察密探。——589。
帕爾烏斯 (原名赫爾芳特, A. L.) (Parvus (eigentl. Helphand A. L.) 1869—1924) ——俄國社會民主黨人, 九十年代起在德國社會民主黨 (左翼) 工作, 以後為極端社會沙文主義者。——695。

peng

彭霍爾斯特, 列翁哈特·馮 (Bonhorst, Leonhard von 1840 年生)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77, 379, 389。

pi

皮洛提, 卡爾·馮 (Piloty, Karl von 1826—1886) ——畫家。——499。

pu

普方庫赫, 威廉 (Pfannkuch, Wilhelm 1841—1923)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99。

普芬德, 卡爾 (Pfänder, Carl 約 1818—1876) ——織細畫家, 正義者同盟盟員; 倫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協會積極的會員, 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 以後為第一國際總委員會委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擁護者和朋友。——424。

普腊斯特 (Praast)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42。

普魯士國王 (1861—1888) ——見威廉一世。

普魯士王儲 (1861—1888) ——見弗里德里希三世。

普特利希, 路德維希 (Puttrich, Ludwig 1908 年死) ——茨維考的律師, 社會民主黨人, 薩克森邦議會議員。——528。

普特卡默, 羅伯特·馮 (Puttkamer, Robert von 1828—1900) ——普魯士反動分子, 教育兼內政大臣 (1879—1886), 反社會黨人法時期是對社會民主黨的迫害的主要組織者之一。——543, 547, 555—556, 559, 563—566, 583, 591—594, 597, 612—613, 628—630, 632—633, 644, 648—651, 654—656, 658, 678。

蒲魯東, 比埃爾·約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17, 554, 693。

qiao

喬泊 (Tzschope) ——1835 年左右為柏

林最高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人。——543。
 乔治五世 (Georg V 1819—1878) ——
 汉诺威邦国王 (1851—1866)。——500。

qu

屈恩, 奥古斯特 (Kühn, August 1846 年生) ——上郎根比劳的裁缝和报纸出版人, 社会民主党人, 1889—1890 和 1893—1898 年帝国议会议员。——461、663。

屈恩, 约翰·奥古斯特·卡尔 (Kühn, Johann August Karl 1829 年生) ——不伦瑞克裁缝, 属爱森纳赫派, 1871 年不伦瑞克叛国案的被告。——377、389。
 屈克尔哈恩 (Kückelhahn) ——阿尔托那的雪茄烟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626。
 屈希勒尔 (Küchler) ——爱北斐特的排字工人, 1884 年参加谋杀威廉一世的挑衅活动。——589、613。

sa

萨博尔, 阿道夫 (Sabor, Adolf 1841—1907)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教师, 社会民主党人, 1884—1890 年帝国议会议员。——461、599、642。
 萨克斯 (Sachs) ——作家, 八十年代伦敦的德国警察密探。——650。

sha

沙皇 (1856—1881) ——见亚历山大二世。

she

舍尔姆 (Scherm) ——纽伦堡的爱森纳赫派成员。——424。

shi

施拉姆, 卡尔·奥古斯特 (Schramm,

Carl August) ——自由党人, 后来是社会民主党的作家; 经济学家, 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和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科学年鉴》的撰稿人, 以后退出社会民主党。——420、479、525、624—625。

施腊普斯 (Schraps) ——见第三卷人名索引。——381、384、391。

施勒德尔-布伦瓦特, 卡尔 (Schröder-Brenwald, Karl) ——利斯巴赫-苏黎世的细木工, 德国警察密探。——559、588、650—651。

施勒德尔, 路德维希 (Schröder, Ludwig 1848—1914) ——社会民主党人, 1889 年威斯特伐里亚矿工罢工的领导人之一。——662。

施留特尔, 海尔曼 (Schlüter, Hermann 1919 年死) ——社会民主党人, 流亡美国, 在美国参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 著有一系列关于英美工人运动史的著作。——567、654。

施纳佩尔-阿伦特, 哥特利普 (Schnapper-Arndt, Gottlieb 1846—1904) ——社会统计学家, 1901 年起为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商业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所讲师。——577。

施奈德, 卡尔 (Schneidt, Karl) ——哈赛尔曼的朋友。——538。

施涅采尔 (Schnitzer) ——破产者, 警察密探。——557。

施米特 (Schmidt) ——在瑞士的迫害社会民主党的密探。——569。

施米特, 阿尔伯特 (Schmidt, Albert 1858—1904) ——社会民主党人, 马格德堡《人民之声》的编辑, 1890—1899 年帝国议会议员, 1899 年因“侮辱皇帝罪”被判三年监禁。——671—672。

- 施米特, 康拉德 (Schmidt, Conrad 1863—1932) —— 社会民主党人, 修正主义杂志《社会主义月刊》的创办人之一。——578。
- 施米特, 威廉 (Schmidt, Wilhelm 1851—1907) —— 法兰克福的石印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1890—1903年帝国議會議員。——672。
- 施穆勒, 古斯塔夫 (Schmoller, Gustav 1838—1917) —— 资产階級国民經济学家, 讲坛社会主义者, 柏林大学教授, 1872年为社会政治同盟的创建人之一。——402。
- 施帕里希 (Sparig) —— 萊比錫的民族自由党人。——492。
- 施皮尔, 薩姆埃尔 (Spier, Samuel 1838—1903)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77, 384, 389。
- 施塔特哈根, 阿尔都尔 (Stadthagen, Arthur 1857—1917) —— 作家和律师, 社会民主党人, 1893年起任《前进报》編輯, 1890年起为帝国議會議員, 直到死时为止, 1917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671—672。
- 施泰恩, 雅科布 (Stern, Jakob 1843—1911) —— 犹太法学家, 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加入社会民主党, 爱尔福特綱領的起草人之一, 发表过很多哲学著作与文章。——663。
-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 —— 警察顧問, 普魯士政治警察的领导人, 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的組織者和主要证人之一, 与维尔穆特合著《十九世紀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382。
- 施蒂尔弗里德 (Stillfried, Graf) —— 伯爵, 柏林警察局长。——657。
- 施蒂纳, 麦克斯 (約翰·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 (Stirner, Max (Pseudonym von Johann Caspar Schmidt) 1806—1865) —— 哲学家和作家, 资产階級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家之一, 著有《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等书。——417。
- 施特尔馬赫 (Stellmacher) —— 西里西亚的制鞋工人, 无政府主义者, 1882年为《自由》杂志的編輯。——588—589, 600。
- 施特克尔, 阿道夫 (Stoecker, Adolf 1835—1909) —— 柏林的宫廷传教师; 反犹主义者, 1878年与瓦格納创办基督教社会党, 1881—1893和1898—1909年为帝国議會議員。——490—492, 538, 544—546, 552, 562, 565, 572, 579, 598, 653, 657。
-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 —— 哲学家和政論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487。
- 施特鲁斯堡, 貝特耳·亨利 (Strousberg, Bethel Henry 1823—1884) —— 德国金融資本家和投机商, “铁路大王”和大地主, 保守党人。——400, 487。
- 施特騰海姆, 尤利烏斯 (Stettenheim, Julius 1831—1916) —— 资产階級諷刺作家, 滑稽报纸《柏林馬蜂》的创办人, 由于虚构战地通訊記者維普辛的形象而出名。——518。
- 施托尔貝克-維涅格罗德, 烏多 (Stolberg-Wernigerode, Udo, Graf zu 1840—1910) —— 伯爵, 大地主, 保守党人, 1877—1881, 1884—1893, 1895—1910年为帝国議會議員, 全德联合会會員。——485。

施托尔, 卡尔·威廉 (Stolle, Karl Wilhelm 1842—1918)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550, 553, 598, 671。

施瓦尔茨, 約翰·卡尔·泰奥多尔 (Schwartz, Johann Carl Theodor 1841—1922) —— 社会民主党人, 1875年以前为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 《卢卑克人民使者》的营业主任, 1890—1893和1898—1918年为帝国議会议员, 1917年起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 461, 672。

施魏舍尔, 罗伯特 (Schweichel, Robert 1821—1907) —— 社会民主党人, 短篇与长篇小说作家, 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朋友。—— 665。

施韦泽, 約翰·巴普提斯特·馮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von 1834—1875)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372, 374, 379—381, 383—385, 421, 423, 427—433, 436, 534, 680。

施文哈根 (Schwennhagen) —— 馬格德堡的作家, 警察密探。—— 650。

shu

舒尔采 (-德里奇), 弗兰茨-海爾曼 (Schultze (-Delitzsch) Franz-Hermann 1808—1883)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384, 435。

舒尔采, 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 (Schultze, Karl Friedrich Wilhelm 1858—1897) —— 哥尼斯堡的旅館主, 社会民主党人, 1890年起为帝国議会议员。—— 672。

舒馬赫, 格奧爾格 (Schumacher, Georg 1844年生) —— 佐林根皮革商, 社会民主党人, 1884—1898年为帝国議会议员, 1898年投靠自由党, 于是被开除出社会民主党。—— 461, 599。

舒曼, 理查 (Schumann, Richard 1818—1856年死) —— 萊比錫的細木工, 社会民主党人, 1885年被逐, 以叛乱罪被判四年懲役。—— 636。

tao

陶舍尔, 列翁哈特 (Tauscher, Leonhard)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567, 654。

te

特耳克, 卡尔·威廉 (Tölcke, Karl Wilhelm 1817—1893)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423, 428—429, 431, 433, 444—445, 451, 471。

特劳特納尔 (Trautner) —— 作家, 在巴黎的德国警察密探。—— 646, 650。

特賴奇克, 亨利希·哥特哈特·馮 (Treitschke, Heinrich Gotthard von 1834—1884) ——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民族自由党議員, 《普魯士年鉴》的发行人, 工人运动的凶恶敌人, 常发表反动的煽动文章。—— 393, 441, 459, 496, 499。

特雷滕巴赫 (Trettenbach 約1810年生) —— 慕尼黑的医生。—— 499。

特森多尔夫, 海爾曼 (Tessendorf, Hermann 1831—1895) —— 柏林的檢察官, 反社会党人法时期是迫害社会民主党人的組織者。—— 442—445, 452, 464, 472, 499, 506。

特韦施騰, 卡尔 (Twesten, Karl 1820—1870) ——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 444。

tu

图曹尔, 弗兰茨·奧古斯特·阿道夫 (Tutzauer, Franz August Adolf 1852—1908) —— 柏林的細木工師傅,

社会民主党人, 1884—1892 年为市議會議員, 1885—1888 年为《柏林人民报》編輯, 1890—1907 年为帝国議會議員。——461, 671。

tuo

托特, 魯道夫 (Todt, Rudolf) ——勃兰登堡馬克的牧师, 基督教社会运动的創始人之一。——489—490。

wa

瓦德西, 阿尔弗勒德 (Waldersee, Alfred, Graf von 1832—1904) ——伯爵, 威廉二世的密友, 德国陸軍參謀总长 (1882—1891), 元帅 (1900), 鎮压中国义和团起义的欧洲联軍总司令 (1900—1901)。——660。

瓦尔德克, 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Waldeck, Benedikt Franz Leo 1802—1870)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83。

瓦尔特希, 卡尔·尤利烏斯 (Vahlteich, Karl Julius 1839—1915)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34, 447, 483, 504, 528, 535, 550。

瓦盖納, 海爾曼 (Wagener, Hermann 1815—1889)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99, 403, 480, 489, 563。

瓦格納, 阿道夫 (Wagner, Adolph 1835—1917)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02, 440, 489, 548—549, 552, 562, 579, 598。

瓦伦頓, 海爾曼·弗里德里希 (Valentin, Hermann Friedrich 1812 年生) ——1844—1866 年任柏林高等法院檢察官和公证人; 1871—1878 年为帝国議會議員 (民族自由党人)。——470。

wei

韦德, 約翰奈斯 (Wedde, Johannes 1843—1890) ——社会民主党《市民报》的創辦人之——与发行人 (1881—1887); 1887 年被逐出汉堡。——424, 542。

韦勒尔 (Weller) ——德累斯頓的刑事顧問。——570。

維多利亞 (Viktoria 1840—1901) ——英國女王維多利亞之女, 德国皇后和普魯士王后 (1888)。——656。

維爾特貝格爾, 卡尔 (Wildberger, Karl) ——柏林的裱糊匠, 社会民主党人, 属于“青年”派, 1891 年被开除出党。——680—681。

維德, 弗兰茨 (Wiede, Dr. Franz 1857 年生) ——博士, 苏黎世《新社会》月刊的发行人 (1877—1880)。——478。

維勒, 布魯諾 (Wille, Bruno 1860—1928) ——作家, 1890 年在柏林創辦自由人民劇場。——678—680。

維麥爾, 菲力浦 (Wiemer, Philipp 1849—1925) ——紐倫堡商人, 社会民主党人, 1878—1881 和 1884—1887 年帝国議會議員。——461, 504, 528, 599。

維希曼 (Wichmann) ——阿尔托那的染工, 打入莫斯特-哈賽爾曼无政府主义派里的警察密探。——538, 555—556, 558—559, 650。

威廉二世 (Wilhelm II 1859—1941) ——普魯士国王和德国皇帝 (1888—1918)。——657, 662, 666, 689, 684—685。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75, 379—382, 386, 390, 403, 490—494, 497—500, 516—517, 545, 556, 560, 575, 583, 589—590, 592, 596, 637, 640, 653—

654, 658—659。

威納尔 (Werner)——莱比錫的排字工人, 无政府主义者。——492。

威納尔 (Werner)——柏林的印书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1891年被开除出党。——679, 681。

魏斯 (Weiß)——德累斯頓的白铁工人, 在瑞士的德国警察密探。——588, 614。

魏斯, 古伊多 (Weiß, Guido 1822—1899)——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96, 442, 497。

魏特林, 克里斯提安·威廉 (Weitling, Christian Wilhelm 1808—1871)——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17, 424, 486。

wen

文特 (Wendt)——汉堡的教师, 八十年代为帝国議会的进步党議員。——565。

文特霍尔斯特, 路德維希 (Windthorst, Ludwig 1812—1891)——保守的政治家, 汉诺威的司法大臣 (1851—1853 和 1862—1865), 天主教中央党的領袖, 帝国議会的議員, 反对德国統一, 因而反对俾斯麦。——394, 535, 565—566, 591—592, 633, 638。

weng

翁魯, 汉斯·維克多·馮 (Unruh, Hans Victor von 1806—1886)——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78。

wo

沃尔弗 (Wolff)——打入莫斯特-哈赛尔曼无政府主义派里的警探。——555, 558。

沃尔格穆特 (Wohlgemuth)——莱因河畔米尔豪曾的警局督察。——658。

wu

烏尔利希, 卡尔 (Ulrich, Carl 1853—1933)——机器制造者, 以后在奥芬巴赫任編輯和印刷厂主, 社会民主党人, 1890—1903 和 1907—1930 年的帝国議会议員, 1919—1928 年为黑森自由邦的国务总理。——461, 635, 672。

烏尔姆, 艾曼努尔 (Wurm, Emanuel 1857—1920)——作家, 社会民主党人, 1902—1917 年为《新时代》的編輯, 1890—1906 和 1912—1918 年帝国議会议員, 1919 年国民議会议員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671—672。

烏耶斯特, 胡果 (Ujest, Hugo, Herzog von 1816—1897)——公爵, 西里西亚大地主, 普魯士將軍, 1870—1875 年帝国議会议員 (德意志帝国党)。——400。

xi

席尔, 斐迪南·馮 (Schill, Ferdinand von 1776—1809)——普魯士軍官, 反拿破侖一世的战争中担任一部分义勇軍的指揮。——383。

席勒, 弗里德里希·馮 (Schiller Friedrich von 1759—1805)——497, 530。

席佩尔, 麦克斯 (Schippel, Max 1859—1928)——社会民主党政論家, 属于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 以后为改良主义的理論家之一, 1886—1887 年为《柏林人民报》編輯, 1887—1890 年为《柏林人民論壇报》发行人, 1890—1907 年为帝国議会议員, 《社会主义月刊》的編輯。——578, 663, 671—672。

希尔曼, 卡尔 (Hillmann, Karl)——汉堡排字工人, 社会民主党人, 1875 年以前属爱森納赫派, 八十年代退出工人运动。——422, 469, 542—543。

希尔施, 卡尔 (Hirsch, Karl 1841—1900)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53, 518—519, 525, 528。

希克尔, 查理 (Hickel, Charles 1848年生) ——細木工, 以后为哈佐尔施塔特的粮商, 社会民主党人, 1890—1893年为帝国議会议員。——671—672。

西姆桑, 馬丁·爱德半·西吉斯蒙特·馮 (Sim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von 1810—1899)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91, 436。

西維尔斯 (Sievers) ——不伦瑞克的印书厂主。——377, 379。

xie

謝夫萊, 阿尔伯特 (Schäffle, Albert 1831—1903) ——奧地利的国务活动家, 庸俗經濟学家。——441, 514, 524—525。

xin

欣茨佩特, 格奥尔格 (Hinzpeter, Georg 1827—1907) ——威廉二世的老师, 在威廉二世执政期間多次为他的顧問。——657。

xue

雪恩朗克, 布鲁諾 (Schoenlank, Bruno 1859—1901) ——社会民主党多种报刊的編輯, 《前进报》編輯部的成員 (1891—1893) 和《萊比錫人民报》的总編輯 (1894—1901), 1893年起任帝国議会议員。——582, 625, 663。

雪萊, 派尔希·毕希 (Shelley, Percy Bysshe 1792—1822)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80。

ya

雅科比, 列奥波特 (Jacoby, Leopold

1840—1895) ——作家, 著有社会主义傾向的詩歌。——513, 664。

雅科比, 約翰 (Jacoby, Johann 1805—1877)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78, 434—435, 602。

亚历山大二世 (Alexander II 1818—1881)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543, 559。

yao

約克, 泰奥多尔 (York, Theodor 1830—1874)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377, 410—411, 423, 446—447。

約斯特, 弗兰茨 (Jöst, Franz 1851年生) ——美因兹的鞋植工厂主, 社会民主党人, 1890—1896年为帝国議会议員。——672。

yi

伊林 (Ihring) ——警察密探, 化名馬洛夫潜伏于柏林工人联合会中做奸細, 1866年2月被揭发。——628—629, 633, 643, 649。

易卜生 (Ibsen) ——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社会民主党人。——529—530。

zai

宰菲尔特, 亨利希·尤利烏斯 (Seifert, Heinrich Julius 1848—1909) ——鞋匠, 以后为茨維考的消費合作社員, 社会民主党人, 1890—1903年为帝国議会议員。——671—672。

zong

宗納曼, 列奥波特 (Sonnemann, Leopold 1831—1909) ——見第三卷人名索引。——433, 436, 601。